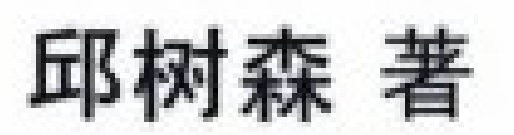
HISTORY Students

中国读本

元朝史话

邱树森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历史特级教师鼎力推荐

《中国读本（史话分卷）》丛书是目前所见学生历史读物中最好的。一是丛书的各单本作者都是史学界的专家学者，这保证了内容的专业性；二是丛书的内容深浅适中，既体现了大纲要求，又有所拓展，可以作为课内知识的有效补充，很适合学生阅读。同时，本书也适合老师们作为资源来储备。

——白幼蒂（北师大附属中学历史特级教师，北京市高级中学实验课本编委）

本套丛书是按照新课标要求进行编辑的，扣住了教学大纲，既体现了教学重点，又有适当的延伸，对拓展学生知识面很有必要，是一套质量很高的学生课外读物。

——李明赞（北京四中历史特级教师，国家新课标高中历史教材编撰者之一）

此书最大特点就是将知识、学术融为一体，既有严谨治学态度、科学辩证唯物史观，又能够栩栩如生描述再现一个过去，语言表达通俗易懂，人生哲理深入浅出，满足了不同学生的学习层面要求，更有助于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和知识的拓展。对于青少年学习、探究历史，《中国读本（史话分卷）》无疑是一部难得的好书。

——范桂英（北京十五中学历史特级教师，市级骨干教师）





ISBN 978-7-5078-3074-3

9 787507 830743 >

定价：18.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朝史话 / 邱树森著.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10
（中国读本）
ISBN 978-7-5078-3074-3

Ⅰ.元…　Ⅱ.邱…　Ⅲ.中国—古代史—元代—通俗读物
Ⅳ.K247.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54316号

元朝史话

著　　者	邱树森
责任编辑	何宗思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广内印刷厂
开　　本	640×940　　1/16
字　　数	165千字
印　　张	12
印　　数	5000册
版　　次	2009年10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09年10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7-5078-3074-3 / G・1282
定　　价	18.00元

出 版 说 明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
胄衍祀绵，岳峨河浩。
聪明睿智，光被遐荒。
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这是半个世纪前我们祭祀轩辕始祖——黄帝时留下的华美篇章。

我国是有着6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而不懈的考古挖掘，还在不断延伸着她的历史源头。放眼全球，我泱泱中华，江山多娇；检点历史，我华夏文明，源远流长。从《周易》到《诗经》，自《天问》而《警世钟》，六七千年，流淌不息。这里既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浩然博大，也有“何必马革裹尸还”的坦荡豪壮；既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忠贞刚烈，也有“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的忠奸判定。曾经长时期居于世界前列的中华文明，为人类的进步无私贡献出了自己无数的珍藏。

曾几何时，延绵几千年的中华文明遭遇了暂时的挫折，“打倒孔家店”的激愤一度让很多人盯上了西方的月亮。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发展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让媚外的思潮重新暗流涌动。但与之同时，过度物质化了的西方国家，却把他们的目光重新投向东方文明的古邦，试图从中找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良方。为此，我们曾一度犹豫彷徨，当一片飞叶被远风捎来时，我们因分不清它来自仙草还是毒藤而迟疑；当一堆泥沙被湍流冲去时，我们为

说不清它含金蕴宝还是藏垢纳污而烦躁。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发展，曾经徘徊在一些人心头的迷茫逐渐扫去，重视传统，回归本源，从中华文明中寻找持续进步的动力重新成为热门话题。清理我们的文化遗产，描绘她的真实面貌，发扬她的优秀传统，规划她的锦绣前程，是当代中国人既严肃又富有魅力的历史使命。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脉络者，我们的历史是最应珍视的一笔遗产。但中国历史博大精深，古籍文献、文书档案浩如烟海，一部中国史，真不知从何处说起！

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我社约请、组织在史学界享有崇高声望的老一辈历史学家，精心编撰了这套《中国读本》丛书（中国历史史话分卷）。本分卷共16分册，分别是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上、下）、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上、下）、五代、宋朝、元朝、明朝、清前期和晚清。本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作者在专业研究的基础上，以大手笔撰写小文章，在各分册中，对该断代的重大事件、经济发展、民族关系、中外交流、社会生活、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科技发展等都作了详细的介绍，既有专业的厚度，又不乏诙谐和幽默，文笔平实流畅，通俗易懂。

历史是一个辉煌的存在，历史学是一门智慧之学、启迪之学，我们衷心希望广大的读者朋友能从这套丛书中寻到灵感，从6000年历史积淀中汲得智慧，熔铸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崭新的智慧王国。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9年6月1日

开 头 语

——略说元朝

元朝是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封建王朝。1206 年，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建立大蒙古国。1227 年灭亡西夏，1234 年灭亡金国，完成了中国北方的统一。1235 年窝阔台以和林（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南）为国都。1260 年，忽必烈即位，以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为上都，燕京（今北京）为中都，政治中心南移。1271 年，改国号为大元，升中都为大都。1276 年灭南宋，实现了全国的大统一。

大蒙古国共 4 汗，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共 10 帝，合计 14 帝。1368 年，明军攻入大都，元顺帝退出中原，元亡。自成吉思汗建国到元朝灭亡，共 162 年，通称元朝。

蒙古统治者通过不断征战，统治了欧、亚广大地区。他们在中亚先后建立了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这些汗国名义上为大汗的藩国，实际上拥有独立地位。元朝与这些汗国有驿路相通，交通十分方便，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往来十分频繁。元朝政府容许和鼓励各国商人从事国际和国内贸易，因此各国来华的商人特别多；元朝政府对各种宗教、文化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因此除了佛教（包括藏传佛教）、道教外，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等在中国也广为传播，中亚、西亚和欧洲的天文、地理、医药、化学、数学知识大量传入中国，中国的印刷术、火药制造等技术，也在这时传到西方。所以，元朝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朝代，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遵用汉法，改革旧制，奠定了有元一代的典章制度。忽必烈采取重农政策，注意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人口的迅速增加、官私手工业的发达、钞法的推行、运河的开凿和海运的开拓、四通八达的驿道、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都是前代无法比拟的。事实证明，元代的社会经济并不是“一团漆黑”，而是有明显的进步和发展。

元朝的大统一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是无法低估的。自从唐朝中期安史之乱后，中国大地上战乱频仍，分裂割据达500余年之久。在这5个世纪中，各族统治者争权夺利，互相残杀，以致土地荒芜，人民流离，广大百姓蒙受了巨大的灾难，社会进步受到了极大的阻碍。正是由于元朝的统一，长达5个世纪的割据对抗、无休止的战乱才得以终止。元朝统一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各族人民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从事生产，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中央政府强有力的统治，使西藏从此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云南地区得到了开发，西北、东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社会发展有了明显的进步。元朝时期奠定了我国辽阔的版图，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结构更加牢固了。

与历代封建统治一样，从忽必烈后期开始，元代的社会矛盾日益暴露出来，久而久之，政治肌体便发生了溃坏，虽然忽必烈和他的继承者试图通过政策的调整来缓解矛盾，但总的趋势是向坏的方向发展。忽必烈以后、元顺帝妥懽帖睦尔之前，不到40年时间，竟换了8个皇帝。皇位继承危机、权臣擅权、财政空虚、农民起义，终于使元朝的政治肌体病入膏肓，社会矛盾积重难返。忽必烈的继承者并不都是昏君，至少像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英宗硕德八剌都曾推行过改革措施，也收到过一定的效果，即使像末代皇帝妥懽帖睦尔也有过励精图治、中兴元朝的宏图，但他终究改变不了积重难返的局面，迅速转向腐朽没落，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分崩离析，把先祖们开创的蒙元帝国拱手让给了大明皇帝朱元璋。

目　　录

第四章　蒙古国的统治

第五章　元朝的建立

第六章　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

第七章　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第八章 文化与科技的进步

第九章 民族关系的新格局

第十章 中外友好关系的新发展

第十一章 元朝的灭亡

第一章　蒙古的兴起和各部的统一

一、“蒙兀”和“鞑靼”

在我们谈起元朝历史的时候，总是要首先谈起蒙古族的起源和它的早期活动。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的元朝是由蒙古族的领袖建立的。

在祖国的东北边疆上，有一条滔滔东流的大江，即著名的黑龙江。黑龙江的上游叫额尔古纳河。唐朝时，人们把这条河叫望建河。望建河源出俱伦泊，就是今天内蒙古的呼伦湖。望建河的南岸有着幽深的密林，俱伦泊周围则水草丰满。这里，就是蒙古部①的祖先最早生息、繁衍和劳动的地方。

蒙古部的祖先是中国境内东胡语系室韦的一支。唐朝时，人们称他们为“蒙兀室韦”。“蒙兀”就是蒙古部祖先最早的称号，他们是室韦部落联盟诸部之一。当时，“蒙兀室韦”人已经驯养马牛，有了初步的畜牧业。社会发展正处于原始社会的末期，氏族制开始瓦解。

到了公元7世纪时，蒙古部人在他们的首领孛儿帖赤那（成吉思汗的始祖）率领下，渡过俱伦泊西迁，来到今天蒙古高原的克鲁伦河和鄂尔浑河流域驻牧。从此，肯特山地区成了蒙古部活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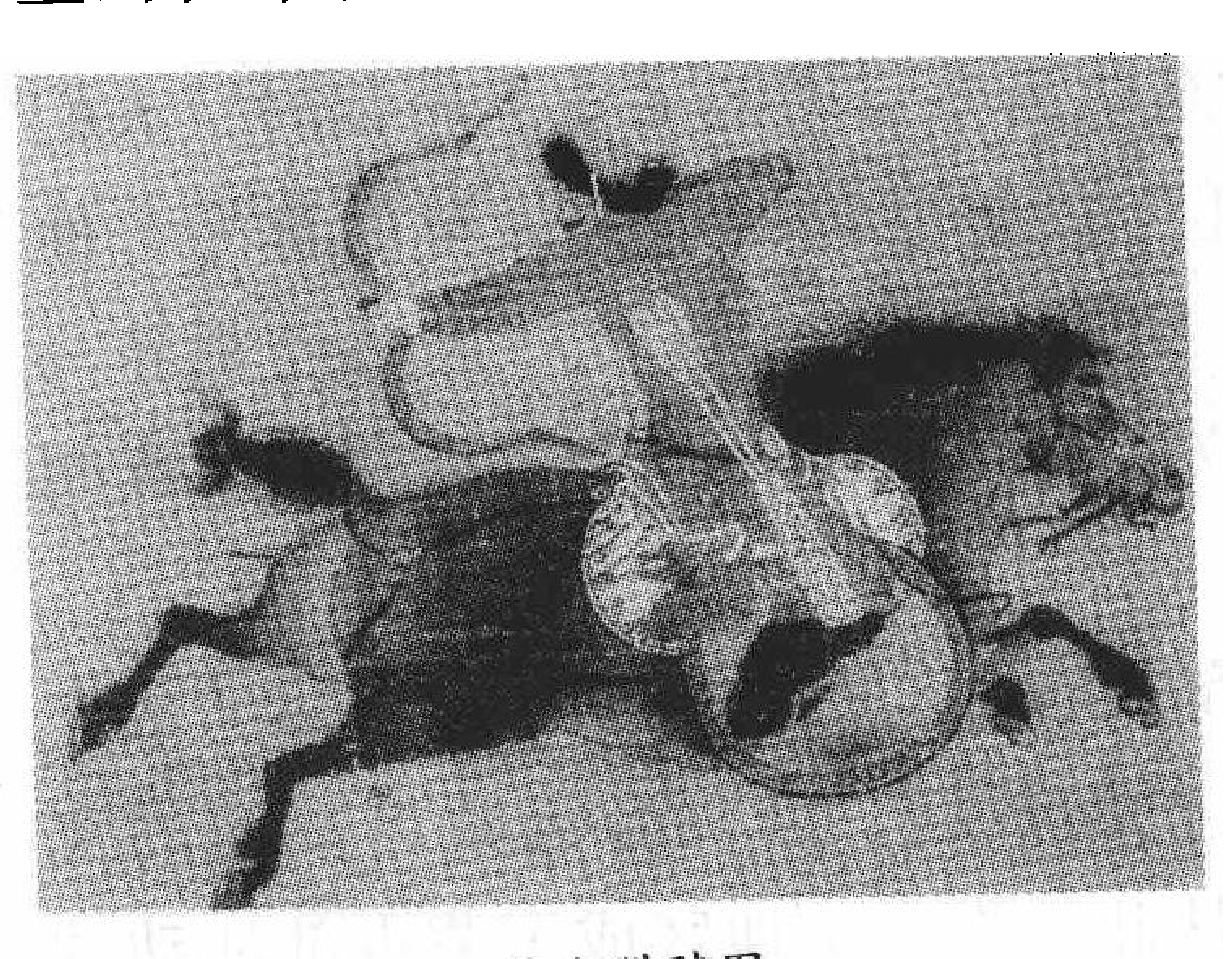
---

① 蒙古民族共同体形成于公元13世纪初。这里说的蒙古部，只是构成蒙古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就像鞑粗部（后来的塔塔儿）和其他各部也是蒙古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一样。

中心。

在蒙古部来到蒙古高原之前，这里一直是北方游牧民族生息和劳动的地区。早在公元前3世纪时，匈奴族就统一了大漠南北，建立了奴隶制政权。匈奴人善于畜牧，常以数以万计的牛马和中原地区进行交易；匈奴政权瓦解后，鲜卑、柔然、突厥、回鹘等少数民族又先后控制大漠南北，这些民族和匈奴一样，都建立过政权，也都从事畜牧经济，他们与中原地区关系密切，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工具和产品丰富了草原地区的经济生活。因此，西迁到蒙古高原来驻牧的蒙古部人，在与突厥、鲜卑、回鹘各族人民相处过程中，不断接受原有这些民族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响，走上了不断发展的道路。

呼伦贝尔富饶的草原在唐朝中期以前，一直是蒙古各部放牧的地方。除了7世纪时蒙古部西迁以外，在呼伦贝尔南部还居住着鞑靼部落。到了唐中期以后，这个部落也逐渐壮大起来，历史上开始有了关于他们活动的记载。公元9世纪时，回鹘政权被黠（xiá）戛（jiá）斯人所灭，这时鞑靼人开始大规模西迁，占领了回鹘的故地，并与大漠南北的各族人民杂居，其势力一直扩展到阴山、贺兰山和鄂尔浑河、克鲁伦河流域。显然，到了唐后期鞑靼联盟已经形成。在鞑靼联盟中，居住在今土拉河、鄂尔浑河一带驻牧的“九姓鞑靼”，就是后来的克烈部；在阴山以北驻牧的“阴山鞑靼”就是后来的汪古部；留在东部鞑靼发源地呼伦贝尔草原的称“三十姓鞑靼”，就是后来的塔塔儿部。由于鞑靼联盟势力很大，“鞑靼”的名声也随之传播。于是，大漠南北的所有蒙古部落都统称为鞑靼，连最早进入漠北高原的蒙古部，到辽、金时也


元人猎骑图

被称为“黑鞑靼”。

从臣属关系上看，大漠南北的所有少数民族都是唐朝政府的属部。公元630年（唐贞观四年），东突厥灭亡后，唐太宗又击败了薛延陀，于是铁勒、回鹘等十余部落归附唐朝。公元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唐朝特设燕然都护府（后改为翰海都护府和安北都护府），下辖六府七州，以管理大漠南北，蒙古各部亦在其管辖之内。唐末，阴山鞑靼曾随沙陀首领进入内地镇压庞勋起义，后来又随李克用镇压黄巢起义。作为唐朝政府的属部，有的蒙古部落已经卷入了国内战争。

公元10世纪，契丹人崛起于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并于公元916年建立契丹（后改为辽）政权。契丹人把蒙古各部称为“达怛”或称为“阻卜”。他们不断对蒙古各部用兵，并征服了蒙古各部，后来设府、卫、司等机构进行管辖。

10世纪上半叶，蒙古各部处于“人多散居，无所统一”的状况下，鞑靼部落联盟是很松弛的。当时较大的部落有：在阴山一带的“阴山阴卜”（即“白鞑靼”），在肯特山一带的蒙古部（即“黑鞑靼”），在呼伦泊至哈拉哈河一带的乌古部（即后来的翁吉剌部），在克鲁伦河中下游一带的敌烈部（即塔塔儿六部之一），在土拉河、鄂尔浑河一带的“北阻卜”（即“北鞑靼”，后来的克烈部），力量最强大的当然是在呼伦贝尔草原的鞑靼本部。公元919年（神册四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大举北征，征服乌古部；后来辽太宗耶律德光又征服了敌烈部。辽政府专门设立了乌古敌烈统军司来统辖这两个部。同时，辽政府还派兵征服了西北的蒙古各部，专门设立西北路招讨司管辖各属部。这样，鞑靼的部落联盟就瓦解了。

西北路招讨司和乌古敌烈统军司是辽政府管辖大漠南北的最高军政机构，它负责镇守边区，向各部征税和代表中央向各部颁发赏赐。其所辖各部，设置节度使、详稳等官职，由契丹人和本部酋长担任。各部人民必须向辽政府缴纳马、驼等牲畜，遇有战争，还要

从这些部落中征兵。各部人民由于不堪契丹统治者的压迫，特别是乌古、敌烈两部人民经常开展反抗辽统治者的斗争。

自从唐中期蒙古各部大批西迁以后，从事游牧经济的蒙古人，放牧的范围更加广阔了，畜牧业有了迅速的发展。10世纪初，阿保机北征乌古部时，一次就俘获牲口14 200余头，牛马车辆、庐帐器物20余万件；辽天祚帝时，仅鞑靼部贡的马驼就有2万匹之多。畜牧业的发展是与牧业技术的提高分不开的。早在成吉思汗十二世祖脱罗豁勒真时代（约9世纪末）就有了“好骟马”，马匹品种有骟马、骒马等；牧人也有了分工，有放马人、放羊人、放羔儿人、放骆驼人等。随着畜牧业的发展，畜产品加工也发达起来，他们不但加工皮毛、皮革，而且用它制成甲胄、衣着、毛毡、弓弦、器皿等。蒙古各部人民用他们自己的牲畜、畜产品与中原人民进行互市，从中原人民那里获得铁器等生产工具和生活必需品。

公元10世纪以后，蒙古社会的私有制已经产生，牲畜和其他财产成为各个家庭的私有物，游牧也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氏族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化。富裕的家族拥有越来越多的财产，他们被辽政府任命为令稳、详稳或太师、大王等官职，成了本部的统治者，本部的贫困成员，则变成他们的臣民。《蒙古秘史》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大约10世纪中叶，成吉思汗十世祖孛端察儿的母亲阿阑果阿死了，弟兄分家。四个哥哥把家里的牲口、食物都分掉了，因为孛端察儿是小弟弟，他们欺侮他，一份也不给他。孛端察儿只好骑着自己仅有的一匹烂脊梁、断尾巴的青白马，离开哥哥们到别处谋生。在鄂尔浑河上游的巴勒谅阿懒地方，他遇到一群从远处来的兀良哈氏族，他们每天供给他马奶，不但不要报酬，甚至连姓名也不曾过问。后来孛端察儿的哥哥们找到了他，带他回去。孛端察儿对哥哥们说：“人要有头，衣要有领。刚才那些百姓，不分尊卑，不别贤愚，没有上下之分，是多么平庸的百姓！咱们可以把他们全部掳来。”于是弟兄们合伙把这群兀良哈人连同他们的牲畜都掳来，

做了自己的奴隶和财产。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成吉思汗祖先的蒙古部里已经有了上下尊卑，并以掳掠较落后部落的人做奴隶为荣。这就清楚地表明，蒙古部社会已经具有奴隶制因素。而比蒙古部更发达的一些部，也许已经进入了奴隶制社会。

到了 11 世纪初，这种财产集中、掠人为奴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成吉思汗的八世祖母莫拏伦是一个大奴隶主。她拥有的马匹不计其数，当这些牲畜站立起来时，从山顶到山脚大河边，大片草地全被马蹄覆盖。一次，游牧于克鲁伦河上的札剌亦儿部被辽军打败，退到莫拏伦的牧地上，在那里放牧，莫拏伦要把他们赶走。札剌亦儿部的一些人气极了，就把莫拏伦杀死了。后来，莫拏伦的孙子海都长大了，攻灭札剌亦儿部，把他们的妇幼都掠来做奴隶。从此，被俘的札剌亦儿人就世世代代成为蒙古部的奴隶。

二、12 世纪的蒙古各部

随着岁月的推移，蒙古各部人口逐渐增加了，旧有几个部落又分衍出许多部落来。到 12 世纪时，大漠南北，东起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西到阿尔泰山，北自叶尼塞河、贝加尔湖、额尔齐斯河，南至阴山山脉的广阔区域内，分布了许许多多蒙古部落。各部分布的情况大体是这样的：

塔塔儿部落联盟（即鞑靼联盟）解体后，塔塔儿部本身的力量仍很强大，他们的活动范围在今呼伦贝尔盟一带，主帐设在贝尔湖。这时塔塔儿部分成六个小部，这就是：都答兀惕部、阿勒赤部、察罕部、忽因部、迪列土部、备鲁兀惕部。这六部之间经常互相争斗，但当他们与其他部发生战争时，则团结一致对敌。金灭辽后，他们曾献羊于金，与金保持了长期的臣属关系。

克烈部，其牧地在今蒙古国境内的鄂尔浑河与土拉河之间。他们也分衍出许多小部。后来与成吉思汗争雄的克烈部首领王汗的祖

父马儿忽思，曾被塔塔儿部的首领诺儿·杯禄·汗俘送金朝，被处死了。

乃蛮部是当时蒙古各部中人数最多的一部，居住在杭爱山与阿尔泰山之间。乃蛮人大部分是突厥人种，又与文化发达的畏兀儿人为邻，因而继承了水平较高的突厥文化。他们有自己的文字，出现了农耕地区。有自己的管理机构，设有掌印官。

汪古部，游牧于今内蒙古自治区的阴山一带，他们替金朝政权守护长城。“汪古”就是蒙古语“守护”的意思。

札剌亦儿部居今蒙古国鄂嫩河一带，这个部也分衍成察惕等10个小部。

斡亦剌部居住在今叶尼塞河上游，此部也分衍成许多小部。

蔑儿乞部分布于今贝加尔湖西南岸、色楞格河及鄂尔浑河下游。

蒙古部西迁到漠北高原后发展得也很快。公元10世纪时，成吉思汗十一世祖母阿阑果阿丈夫死后，传说因感受了灵光生了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称为尼伦部。“尼伦”是蒙古语“腰脊”的意思，转意为山脊、山顶之意。在尼伦部里又有许多小部，如：乞颜、别速惕、哈塔斤、泰赤乌、阿答儿斤、札答剌等等。到12世纪初，成吉思汗的曾祖合不勒时，统一尼伦各部，开始称“汗”①，后来多次进攻金朝的边境。合不勒汗死后，其堂弟俺巴孩继立。有一次，俺巴孩汗送女出嫁，途中被塔塔儿人抓获，送到金朝，金朝皇帝残酷地把他钉死在木驴上。俺巴孩汗死后，尼伦部推选合不勒汗之子忽图剌为汗。忽图剌是尼伦部人民酷爱的英雄，据说，他歌声嘹亮，犹如山中雷鸣；他力大无穷，能像折断弓箭那样把人一截为二；他胃口很大，一天能吃掉一只羊。于是，忽图剌联合俺巴孩的儿子合丹太师、侄儿也速该等攻打塔塔儿人，双方打了13仗，

① “汗”，或译成“可汗”、“合罕”，是古代北方民族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合不勒汗的“汗”，实际上只是部落酋长，因为当时蒙古还没有统一。

但还是没能打败塔塔儿，替俺巴孩汗报仇。金朝统治者就是用这种办法，挑拨蒙古各部之间的关系，让他们互相仇杀。由于也速该作战勇敢，他继忽图剌之后成为尼伦诸部的首领。也速该就是成吉思汗的父亲，他自己的这一氏族称为孛儿只斤氏，即后来著名的“黄金家族”。

蒙古部中除了属于尼伦的各部外，还有非尼伦的普通部落——迭列列斤，蒙古语是山岭下的意思。迭列列斤蒙古人有捏古思、兀良哈、翁吉剌、亦乞剌思等氏族。其中翁吉剌部居塔塔儿部之南、今哈尔哈河一带，这个部也是很大的；兀良哈则属于“林木中百姓”，住在今贝加尔湖以东地区，过着比较原始的生活。

总之，到12世纪末时，居住在蒙古高原上的部落差不多有100个左右。这些部落强弱不一、大小不一，就是语言、宗教、民族、文化水平也不完全相同。不过，这时已形成了几个大的集团：蒙古部集团、塔塔儿集团、克烈集团、蔑儿乞集团，以及乃蛮政权。

这些部落当时都受金朝管辖。公元1125年金朝推翻辽政权后，即派兵北上，漠北各部相继归金，金置西北、西南、东北三路招讨司管辖。金朝统治者向蒙古各部宣扬说：“金国像大海，属部像一掬沙，岂能动摇!”蒙古各部的首领接受金朝的封职，直到公元1210年时，成吉思汗才正式起兵反金。

12世纪时，蒙古的社会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通过与中原地区的贸易，获得了大量的铁器和丝、纻等生活必需品，因而大大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到12世纪下半叶，已经有了铁匠、木匠等手工业工人，说明当时已有了这类手工业部门；打铁时已使用风箱，说明手工业技术大大提高了。其产品除了铁镫、铁蹄、铁索、铁锅、铁锹、铁斧等外，还有刀、箭等武器，金银饰品，车辆等运输工具。蒙古诸部中，有不少部从事农业生产。像接近汉地的汪古、翁吉剌等部能种粮食，以稻米为食，过着“筑室而居”的生活；甚至连漠北的蔑儿乞等部也有农业生产。至于畜牧业，则在

原有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以致到成吉思汗与札木合发生“十三翼之战”时，双方出动6万人、近20万匹马之多。

蒙古的社会形态也有了进一步发展，阶级分化更加明显。蒙古社会是由这些阶级构成的：

奴隶主（“那颜”）：蒙古各部的奴隶主拥有许多尊贵的称号，如把阿秃儿（勇士）、蔑儿干（善射者）、薛禅（贤者）等；有中原皇帝的封号，如令稳（成吉思汗六世祖海都的次子叫察剌孩·领稳，“领稳”即“令稳”）、详稳（察剌孩·领稳生子名想昆·必勒格，“想昆”即“详稳”）、太师（俺巴孩的儿子合丹太师）、大王（乃蛮部塔阳汗、克烈部王汗）等。这些有尊贵称号的奴隶主称为“那颜”，即“官人”之意。那颜阶级拥有大量牲畜和财富，役使奴隶从事各种生产劳动；他们还向本部落属民征收赋税，分派劳役和军役。

奴隶（“孛斡勒”）：奴隶的来源主要来自战争中的俘虏和被征服部落或氏族。如前面说的孛端察儿兄弟把兀良哈部的一些人掳来做奴隶，海都征服札剌亦儿部，让该部妇幼世代为奴等等。奴隶的地位很卑下，如成吉思汗十一世祖朵奔蔑儿干只用了一些鹿肉就换来了一个贫穷的伯牙兀部的小孩做奴隶；成吉思汗手下最著名的大将木华黎，原是札剌亦儿人的后代，当他还在幼年时就成了成吉思汗家里的奴隶，木华黎的父亲把他送到成吉思汗家里时说：“教他永远做你们的奴隶，要是离开了你们的门户啊，就把他的脚筋挑了，心肝割了。”奴隶是世袭的，一旦进了主人的家门，就任凭主人处置，甚至施以刑罚和处死。奴隶们从事生产劳动和家内劳动，如放牧、剪毛、送奶、看门、备鞍、屠宰，等等。克烈部的王汗7岁时被蔑儿乞人抓去舂米，13岁时又被塔塔儿人抓去放骆驼。奴隶长大后可以娶妻成家，拥有自己的牲畜，不过仍附在主人的门下。

属民（“哈剌抽”）：这些人本是个体自由牧民，但随着奴隶主贵族财富与权力的增长，原来的各氏族成员的平等地位日益消失，

成了贵族的属民。另有一部分奴隶在奴隶主互相争斗的动乱中，挣脱了奴隶主的枷锁，逃亡到其他地方去，寻求新的部族领袖去谋生，这些原来是奴隶的人也成了属民。属民也是蒙古社会的基本劳动者，他们不但要受奴隶主贵族的剥削，向他们的统治者交纳赋税，服军役和劳役，而且不能随便离开或背叛自己的主人。部族首领和奴隶主为了战争的需要，也要拉拢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成为自己的伴当（“那可儿”）。那可儿是部族首领的侍从，负责保卫和随从他们的领袖，并外出征战。这部分人后来上升为统治阶级。而广大的属民则依然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有的还沦落为奴隶。

在蒙古各部的奴隶制中，奴隶主借助氏族血缘关系统治着世世代代被奴役的部落奴隶。由于氏族血缘关系十分牢固，一直保留着氏族组织，因此，不论奴隶主、奴隶和自由民，他们都清楚地知道自己出身的家族系统。奴隶主就利用这一特点，把奴隶和属民束缚在自己的统治下。当然，要巩固自己的统治，更重要的是依靠镇压奴隶的工具——政权和军队。

蒙古各部的政权，最早出现在11世纪末和12世纪初，最高统治者称“汗”。11世纪末，塔塔儿部有诺儿·杯禄·汗，克烈部有马儿忽思·杯禄·汗，乃蛮部有亦难赤·卜古·必勒格·汗。蒙古部则在12世纪20年代时，由合不勒统一起来。合不勒也称汗。这些奴隶主政权是依靠他们掌握的武装力量维持的。例如成吉思汗兴起之前，统治着蒙古部的泰赤兀氏奴隶主就拥有一支护卫军，蔑儿乞部、克烈部、乃蛮部等也都有护卫军。这些护卫军主要由忠诚地为奴隶主效劳的“那可儿”所组成。各部奴隶主依靠这些武装力量互相攻掠，把抢劫、掠夺作为他们的职责，因此，无休止的战争持续了很长时间，使广大蒙古牧民遭受了极大的灾难。12世纪末蒙古社会的情景，《蒙古秘史》的这首诗把它如实地反映了出来：

有星的天，
旋转着。

众百姓反了，
不进自己的卧内，
互相抢掠财物。

有草皮的地，
翻转着。
全部百姓反了，
不卧自己被儿里，
互相攻打。

这种情景的出现，不仅是蒙古各部奴隶主互相残杀造成的，也是金朝反动统治的结果。金朝统治者为了防止蒙古的强大和侵扰内地，采取了挑拨蒙古各部关系、使之互相残杀和直接派兵镇压两种办法来对付。他们先是利用塔塔儿部去攻击蒙古部，后来又联合蒙古、克烈部去攻打塔塔儿部，使蒙古各部之间本来就存在的血族复仇战争，连续不断地打下去。金世宗大定年间，金朝统治者还派兵剿杀蒙古人，称为“减丁”，出征的金军大肆掳掠蒙古人民，并把掳掠来的蒙古孩子充当奴婢卖给山东、河北的地主和官僚。在贸易上，金朝统治者对他们也有很多歧视和限制。因此，蒙古人民对金朝统治者恨入骨髓。

以上讲的这些，就是12世纪末蒙古社会的图景。当时蒙古各部人民强烈希望结束这种互相残杀的无休止战争，迫切要求实现蒙古各部的统一，渴望解除女真贵族的民族压迫。成吉思汗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登上历史舞台的。

三、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

公元1162年，蒙古尼伦部孛儿只斤氏族的首领也速该把阿秃儿的妻子诃额仑生了一个男孩。恰巧生孩子的那天，也速该擒获了

两个塔塔儿人，其中一个名叫铁木真。为了纪念他这次突袭的战功，也速该就把刚生下的儿子取名叫铁木真。铁木真就是后来的成吉思汗。

铁木真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是在动乱的岁月中度过的。他的父亲也速该继忽图剌汗之后成为蒙古尼伦部的首领，因为长期以来一直与塔塔儿部发生争斗，所以结下了很深的仇恨。铁木真9岁时，也速该想替他找一个妻子，于是把他带到他母亲的亲戚那里去。在途中，也速该遇见了翁吉剌部的德薛禅，德薛禅听说也速该要为儿子定亲，就把自己的女儿孛儿帖介绍给他。双方同意后，也速该就把铁木真留在德薛禅家，独自一个回家去了。也速该在回家的路上，正遇着一群塔塔儿人在举行宴会。这时，他很饥渴，便下马参加他们的宴会。塔塔儿人认出了这是仇人也速该，便在饭菜中下了毒药。也速该吃过饭后便上马再行，结果药性发作，只好熬着疼痛，走了3天才勉强回到家中，不久就死去了。

也速该之死造成了蒙古尼伦部的分裂。泰赤乌部奴隶主看到孛儿只斤氏族失去了首领，认为也速该留下的寡妇幼子成不了大气候，就带头脱离孛儿只斤氏的统治，独立去游牧了；接着，大批的奴隶、那可儿、仆从都纷纷去寻找新的主人。诃额仑只剩下有限的几个奴仆和极少的牲畜，扶养着铁木真兄弟几个，日子很不好过。孛儿只斤氏衰落了。



成吉思汗

俗话说：“祸不单行。”泰赤乌部的奴隶主很担心铁木真长大后会报仇，就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去抓铁木真。铁木真被抓后，泰赤乌部的奴隶主把他带着枷到处示众。后来，铁木真乘泰赤乌部人举行宴会的机会逃回家中，并把全家迁到不儿罕山（今肯特山）去居住。过了不多久，铁木真家里又遭到了强盗的抢劫，真是多灾多难。铁木真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取得翁

吉剌部的支持，就与孛儿帖结婚了。

铁木真决心恢复他父亲也速该时的势力。这时在他身边有两个忠心耿耿的那可儿——博尔术和者勒蔑，还有他的两个有力气的弟弟——合撒儿和别勒古台。他们团结在一起，准备逐步积聚力量。不料这时又遇到蔑儿乞人的袭击，在仓促逃命时，铁木真连他的妻子也来不及带走，使她成了蔑儿乞人的俘虏。

遭到一连串挫折的铁木真，逐渐懂得了斗争策略。他知道单凭自己几个人的力量是不能打败敌人的，只有利用蒙古各部之间的矛盾，取得一些部落奴隶主的支持，才能壮大自己的力量，打败自己的敌人。于是，他忍痛把妻子的嫁妆黑貂裘献给克烈部的脱斡里勒汗，作为取得他支持的进见物。脱斡里勒汗则愿意帮助铁木真重新召集以前离散的亲属和部众。铁木真还争取了札答剌部首领札木合薛禅对他的支持。

铁木真为了把妻子孛儿帖从蔑儿乞人那里夺过来，就约定脱斡里勒汗和札木合一起出兵攻打蔑儿乞人。三方约定：脱斡里勒汗出兵 2 万，札木合出兵 1 万，铁木真带领住在鄂嫩河上的原来属于他的 1 万军队，共同进兵。他们很快就击败了蔑儿乞人，迫使蔑儿乞人向色楞格河方向逃去，大批蔑儿乞人成了俘虏，许多男子遭到屠杀，而妇女则留下来做他们的妻子、奴婢，儿童留下来做奴隶，掠夺来的牲畜成了铁木真的财产。为了报答脱斡里勒汗和札木合的恩德，铁木真把脱斡里勒汗当作自己的父亲，并把掳来的蔑儿乞人送给他当奴隶，他对待札木合比亲兄弟还亲。铁木真通过这次胜利之后，实力大大加强了，许多旧时的属民、那可儿、奴隶，也重新投靠他。

公元 1189 年（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铁木真被一部分蒙古尼伦部的奴隶主们拥戴为汗。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和防止邻部的袭击，他重新整顿了军队，成立了专门警卫他的侍卫队，建立了保护、训练战马、管理战车等专门机构，使战斗力有了提高，为未来的统一战争作了种种准备。

铁木真的壮大引起了札木合的不快，恰好札木合的弟弟给察儿因掠夺铁木真部下的马群而被杀了。札木合气极了，便集合其所属的札答剌的13部3万之众进攻铁木真，铁木真也将他的3万士兵分成13翼迎战札木合。双方战于答兰巴勒主惕地方（今克鲁伦河畔）。这就是蒙古历史上著名的“十三翼之战”。会战结果，铁木真失败，被迫退到鄂嫩河去。札木合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把战俘处死，引起了札木合部下许多人的不满，他们毅然脱离札木合，反而投奔到铁木真那边去。因此，铁木真虽然在“十三翼之战”中战败了，却使坏事变成了好事，札木合部下许多奴隶主、属民和奴隶成了铁木真新的支持者，铁木真反而更壮大了。

不久，塔塔儿部首领蔑古真反抗金朝，金章宗命丞相完颜襄约克烈部的脱斡里勒汗和铁木真合兵进攻塔塔儿，蔑古真大败并被杀死，塔塔儿的部民和牲畜全部被脱斡里勒汗和铁木真掳获。完颜襄打了胜仗，十分高兴，因而封脱斡里勒汗为“王”，从此脱斡里勒汗就称为“王汗”；封铁木真为“札兀惕忽里”（乣军统领。乣军是辽金时地方部落所组成的军队），铁木真正式接受了金朝的封职。这样，铁木真在蒙古尼伦各部中的威信更高，权力更大，他惩罚和处死了几个不听指挥和他作对的奴隶主，并收管了他们的部众。后来成为成吉思汗“四杰”之一的木华黎就是在这时由他的父亲送来做奴隶的。

铁木真在漠北高原上崛起后，与其他蒙古各部的矛盾越来越大。1201年，合答斤、撒勒只兀、豁罗剌思、朵儿边、塔塔儿、翁吉剌、蔑儿乞、斡亦剌、泰赤乌等11部的首领在阿鲁灰地方（今内蒙古乌尔虎河）集会，共推札木合为古儿汗（天下之主的意思）。札木合称汗后迅速出兵攻打铁木真。铁木真联合王汗对抗札木合，结果札木合的军队大败。王汗乘胜追击札木合，铁木真乘胜追击泰赤乌部，取得了胜利。

1202年，铁木真又发动了对塔塔儿残部的战争。结果，塔塔儿人被全歼，部民都成了铁木真的俘虏，他们或是被杀，或是沦为

奴隶。塔塔儿部的消灭标志着东部蒙古各部已被铁木真征服。

这样，铁木真的劲敌就剩下西部蒙古各部了，而西部蒙古各部中最靠近铁木真的就是强大的克烈部。面对铁木真咄咄逼人的锋芒，王汗也紧张起来，加上逃亡的札木合的挑拨，王汗决定先发制人，对铁木真发动袭击。但是，由于王汗部下的两个牧民透露了消息，铁木真已做好了战斗的准备。王汗的攻击没有摧垮铁木真，反使他的儿子桑昆受了箭伤。然而，王汗毕竟兵多将广，实力雄厚，铁木真是经不起这种消耗战的，因而不得不把部队撤走，并派人向王汗求和。与此同时，铁木真抓紧时机，继续扩充力量，准备伺机决战。当他发现王汗思想麻痹、失去警惕时，发动了突然袭击，占领了王汗的金帐。王汗败逃，在鄂尔浑河畔被乃蛮人所杀。他的儿子桑昆一直逃到合失合儿（今新疆喀什），也被当地人杀了。从此，强大的克烈部完全瓦解。克烈部的败亡为铁木真统一全蒙古扫除了最大的障碍。所以，对王汗作战的胜利是铁木真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

铁木真继续沿着统一全蒙古的道路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剩下的敌人还有乃蛮人、蔑儿乞人、南方的汪古人以及其他一些小部落。其中蔑儿乞人是世仇，乃蛮人是最有力量的大部落。

克烈部败亡后，到处流窜的札木合只好投奔到乃蛮人那里去栖身了。乃蛮是一个文化发达、建立了政权的大部落，当时的统治者叫塔阳汗。塔阳汗得知克烈部被消灭、铁木真统一了大半个蒙古的消息后非常惶恐，加上札木合的挑拨，决定以铁木真为敌。他采取的对策是：南联汪古，上下夹击。但是汪古人不愿与铁木真结怨，反而把塔阳汗的计谋告诉了铁木真。铁木真知道这个消息后，知道与乃蛮的战争不可避免，于是一面通过中亚的商人摸清乃蛮的军队实力和部署，一面再次整顿自己的军队，以增强战斗力。他把自己的军队按十人、百人、千人组织起来，任命自己的亲信当百夫长和千夫长；设置“扯儿必”（把总）管理辎重；挑选精兵组成“怯薛”（护卫军）；又从精兵中挑选上千名勇士当前锋。这样一支机

动灵活、配合协调的军队，是非常适应草原作战的需要的。

1204年夏，铁木真率领大军出征乃蛮。铁木真驻军于哈勒哈河畔的建忒该山；塔阳汗则纠集蔑儿乞、克烈、塔塔儿、哈答斤等残部及斡亦剌、朵鲁班、散只兀诸部，声势颇大，扎营于杭爱山。当铁木真与手下众将领商量出征时，有人认为夏天马瘦，不宜行军，主张缓至秋高时再征。铁木真采纳了其弟别里古台的意见，认为正可利用乃蛮轻敌而不备之机出兵，必获全胜。铁木真率军沿克鲁伦河前进，驻军萨里川。塔阳汗也率军渡过鄂尔浑河东进。双方在纳忽昆山相遇。摆好阵容后，恰巧铁木真军营中有一匹瘦马受惊逃入乃蛮营中。塔阳汗一看铁木真的马瘦成这样子，更加轻敌。他亲自跃马索战，铁木真摆好阵势准备迎战。这时跟随塔阳汗一起上阵的札木合，看到铁木真的军容十分整肃，简直今非昔比，知道交战后凶多吉少，就偷偷地溜走了。这一天，战斗十分激烈、残酷。到下午时，塔阳汗的军队渐渐招架不住，塔阳汗身负重伤被俘。于是形势急转直下，乃蛮军队顿时溃散，在黑夜中到处奔逃，坠崖身死者不计其数，只有少数军队在塔阳汗的儿子屈出律率领下逃到西辽境内。不久塔阳汗因伤重死去。这场大战后，乃蛮的百姓都成了铁木真的俘虏，追随塔阳汗的朵鲁班、塔塔儿、哈答斤、散只兀等部也纷纷投降了。

乃蛮战役的胜利使铁木真离完成统一全蒙古的事业越来越近了。从此，铁木真的威名震动了蒙古高原，余下的一些尚未征服的部落都不是铁木真的对手，他们或被击破，或自动归附。1204年秋，铁木真最后击溃了他的宿敌蔑儿乞残部，大败蔑儿乞首领脱脱，俘获了他的百姓，脱脱带了他的两个儿子、几个那可儿远远地逃走了。不久，翁吉剌残部、汪古部也归附了铁木真。这时只剩下十分潦倒的札木合。由于大势所趋，他的几个那可儿知道败局已经不可挽回，便将他绑了送交铁木真，最后被铁木真处死。至此，铁木真统一全蒙古的大业完成了。

1206年（金泰和六年、宋开禧二年），全蒙古的奴隶主贵族们

在鄂嫩河畔举行了忽里勒台（大聚会之意），推举44岁的铁木真为全蒙古的大汗，并上尊号为成吉思汗。“成吉思”是蒙古语强大的意思。

成吉思汗成为全蒙古的汗，标志着蒙古族的历史进入了新的阶段。几个世纪来，蒙古各部从来没有统一过，他们互相残杀，纷争不已；现在，他们在强有力的领袖成吉思汗的统治下形成了统一的局面。在东起呼伦贝尔草原，西至阿尔泰山的辽阔地域内，过去语言、民族、文化水平各有差异的各部落开始结合成一个共同体，他们之间文化和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共同的语言逐步形成，勤劳勇敢的蒙古族开始了形成的过程。从此，伟大的蒙古族开始在中国和世界历史舞台上发挥巨大的作用。

成吉思汗成为全蒙古的汗，也标志着蒙古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政权——大蒙古国正式建立。这个政权的性质是奴隶制政权。成吉思汗在建设政权机构的过程中，显示了他的非凡组织能力。

早期的蒙古国实行了军事、行政和生产相结合的分封制度。成吉思汗的亲属和大小奴隶主都获得了分地，这些分地上的蒙古牧民被编为十户、百户、千户和万户，并设十户长、百户长、千户长和万户长。成吉思汗委任归附他的各部领袖和他的亲信为万户长、千户长和百户长。当时任万户长的只有博尔术、木华黎、纳牙阿和豁儿赤4人，千户长有95人。他们都拥有大小不等的疆域作封地，以及封地内数量不等的封户为他们服役、纳贡和当兵。万户长、千户长是世袭的，他们都是新的奴隶主阶级。这种行政制度实际上也是军事制度。成吉思汗将蒙古军队也分为十户、百户、千户和万户，并有相应的长官。全部蒙古军队分为左中右三军，木华黎为左军万户、纳牙阿为中军万户，博尔术为右军万户；后来又封豁儿赤为管辖“林木中百姓”的万户。凡15岁以上、70岁以下的男子，统统编为士兵，10人为一牌，设牌头，“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他们平时是从事畜牧生产的牧民，战时则成了跃马弯弓的骑兵。

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亲自控制一支精锐部队，成吉思汗大大加强了“怯薛”（护卫军）的实力和地位，他把怯薛的人数从550人增加到1万人。“怯薛歹”（护卫军士兵）由万户长、千户长、百户长及“白身人”（自由民）中有技能、身体健壮的孩子来担任，他们平时负责大汗“斡耳朵”（帐殿）的保卫工作，大汗亲征时则参加战斗。怯薛歹是世袭的，享有各种特权。

成吉思汗还建立了司法机构和初步的成文法。他任命其义弟失吉·忽秃忽为“札鲁忽赤”（断事官），失吉·忽秃忽根据成吉思汗“凡断了的事，写在青册上”的指示，编成“札撒黑”（习惯法），依此标准来断决各种案件。

在宗教方面，成吉思汗任命兀孙老人为“别乞”（萨满教的最高僧侣）。蒙古人信奉的萨满教，以天为主尊，相信整个宇宙由天主宰，天与人的联系是由萨满教的巫师媒介的，因此最高的巫师——别乞是十分受人尊敬的。

蒙古原无文字，在攻灭乃蛮后，成吉思汗命被俘的乃蛮掌印官畏兀儿人塔塔统阿用畏兀儿文书写蒙古语，并教蒙古奴隶主的子弟习写。

此外，在掌印、狩猎、马匹、牲畜的管理和经营，军务的总管，军需的供应等方面，也进行了整顿，制定了各项制度。

蒙古政权的建立和逐步完善是蒙古社会前进中一件大事，它巩固了蒙古各部的统一局面，有利于蒙古社会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蒙古共同体的形成。当然，这个政权是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保证奴隶主对广大蒙古劳动人民剥削和压迫、为使蒙古奴隶主阶级统治范围不断扩大而设置的。

第二章 发动国内民族战争

一、臣服"林木中百姓"

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国后，并不等于所有的蒙古部落都已向他臣服了。在辽阔的西伯利亚地区还居住着许多依靠狩猎为生的蒙古部落和属于突厥语族的吉利吉思人。这些蒙古部落由于生活在无边无际的森林中，被称为"林木中百姓"。成吉思汗对"林木中百姓"的征服，是蒙古各部统一的继续。

"林木中百姓"主要生活在今叶尼塞河以东、贝加尔湖周围地区，他们人数较少，经济和文化水平比蒙古高原上的草原部落落后。他们住在白桦树皮覆盖的棚屋里，从事猎兽和捕鱼，以兽皮为衣，桦树汁为饮料。"林木中百姓"的主要部落有：贝加尔湖周围的不里牙惕部（即后来的布里亚特），叶尼塞河上游的斡亦剌部（即后来的瓦剌），靠近吉利吉思部的秃马惕部、巴儿忽惕部等。

成吉思汗等奴隶主对西伯利亚出产的珍贵毛皮是十分羡慕的。因此决定于1207年派他的长子术赤出兵征服林木中百姓。不里牙惕、秃马惕、斡亦剌等部纷纷投降。接着又进兵吉利吉思部。吉利吉思部是突厥语族人，是唐朝时黠戛斯人的后代。公元840年，黠戛斯曾击败回鹘，统治大漠南北，后来臣服于唐朝，部分黠戛斯人退居叶尼塞河上游。蒙古军队来后，吉利吉思的首领表示臣服，将白海青（鹰）、白骟马、黑貂鼠等名贵动物献给术赤。这样，西伯利亚地区的各部落都接受了蒙古国的统治。

蒙古统治者对各部的统治是很残酷的。成吉思汗为了自己的享受，派豁儿赤到秃马惕部去挑选30名美女，引起秃马惕人的极大愤慨，他们把豁儿赤抓了起来；成吉思汗只好派忽都合别乞去镇压，结果又被抓了起来。成吉思汗不得不派他的心腹“四杰”之一的博尔忽领兵前往，不料博尔忽进入秃马惕境内后，被秃马惕人截断去路，抓住杀了。连续损兵折将，使成吉思汗大为恼火，他决定亲征，诸将竭力劝阻，改派朵儿伯领兵马出征，这样才把秃马惕人的反抗镇压下去，并把秃马惕人分给有功人员为奴隶。

二、畏兀儿、哈剌鲁的归附和西辽之亡

成吉思汗为了使自己的统治范围进一步扩大，让他的弟兄、儿子们“各分土地，共享富贵”，决定继续向外进行军事行动，降服蒙古境外的相邻政权。这些向外扩张的战争，具有很大的掠夺性和破坏性，暴露了蒙古奴隶主阶级的贪婪本质。

13世纪初蒙古周围的形势大体上是这样的：在它的西部有畏兀儿和西辽，在它的南部有西夏和金朝。成吉思汗在征服畏兀儿和西辽的同时，对西夏和金朝进行了骚扰和攻掠。

畏兀儿是突厥语系中文化比较发达的一个古老民族。唐朝时先称回纥，后称回鹘，曾在蒙古高原建立过回鹘汗国，后被黠戛斯击败，被迫西迁。其中有一支迁到今新疆吐鲁番盆地一带，到公元10世纪末期时，地域已扩大到西抵葱岭，东达甘（今甘肃张掖）、肃（今甘肃酒泉）二州，北界天山，南越戈壁，并建立了高昌回鹘政权。其都城在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或称“哈拉和卓”；其首领称“亦都护”。公元12世纪初西辽建立后，畏兀儿臣属于西辽，西辽于畏兀儿境内设立了一个专门监管畏兀儿事务的官员——少监，他像太上皇一样，为所欲为，骄恣用权，激起了广大畏兀儿人民的极端不满。所以，自从畏兀儿沦为西辽的藩属后，境内的社会矛盾十分尖锐，不仅广大畏兀儿人民和西辽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很尖锐，

就是畏兀儿统治者与西辽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也很尖锐。

西辽是契丹贵族耶律大石建立的。公元1124年契丹族建立的辽王朝在各族人民反抗斗争的冲击下，在女真军队的打击下，正处于灭亡的前夕。这时辽宗室耶律大石自立为王，率其部众西迁，在我国今天的新疆西部及中亚一带建立了政权，历史上称为西辽，也称“黑契丹”、“哈剌契丹”。其都城在虎思斡耳朵（在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以东楚河南岸）。西辽建立后不久便控制了畏兀儿，战败了中亚大国花剌子模，势力扩展到巴尔喀什湖以西的两河流域，成为中亚地区势力强大的政权。

成吉思汗称汗后，虽然统一了蒙古各部，但是蔑儿乞部的首领脱脱和他的两个儿子——忽秃、赤老温，乃蛮部塔阳汗的儿子屈出律，依然盘踞在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一带。1208年，成吉思汗命速不台和者别分别追袭脱脱和屈出律。结果，脱脱战死，其子率残部逃奔畏兀儿，当时畏兀儿的亦都护叫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他没有收容他们，还把他们打败后驱逐走了，又派人向成吉思汗通好。1209年，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不满西辽少监的横征暴敛，杀了西辽少监。这时，成吉思汗已派使臣到达畏兀儿，巴而术阿而忒的斤立即向蒙古臣服。1210年，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亲至蒙古朝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因他主动归附，将女儿也立可敦嫁给他，并给他享有“第五子”的待遇。

在畏兀儿的西部，今巴尔喀什湖东南伊犁河、楚河一带居住着哈剌鲁人。哈剌鲁，唐朝时译为葛逻禄，本来是西突厥的一个部落。公元9世纪中叶，回鹘汗国解体后，一部分回鹘人西迁到葱岭以西、葛逻禄人居住的地域，建立了喀喇汗朝，并使葛逻禄人臣服，使他们成为王朝军队的主要支柱，但葛逻禄人常起来反抗。西辽建立后，耶律大石把哈剌鲁人与喀喇汗朝分开，使他们成为单独的汗国，建立汗庭于海押立（今巴尔喀什湖之南塔尔迪库尔干东），西辽派少监监护，与畏兀儿一样成为藩属。西辽少监专横暴虐，欺压人民，再加上哈剌鲁人信奉伊斯兰教，与西辽崇信佛教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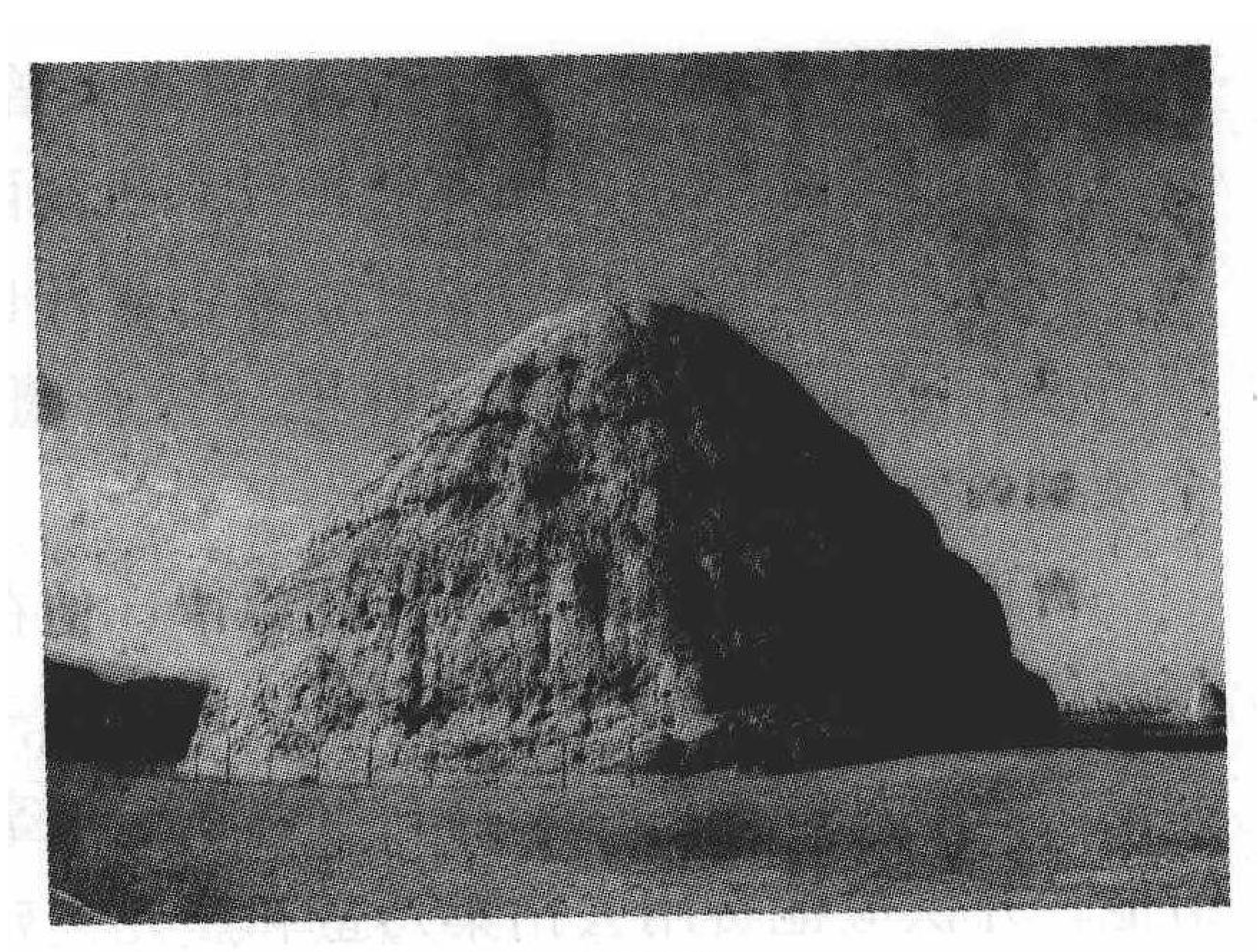
有矛盾。1211 年，成吉思汗大将忽必来曾因追击乃蛮残部进入西辽境内，哈剌鲁统治者阿儿思兰汗乘机杀西辽少监归附蒙古。阿儿思兰汗亲赴蒙古朝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也把公主嫁给他，给予优厚待遇。随后，居住在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西）的哈剌鲁另一个领袖斡匣儿也归附蒙古。

再说乃蛮部塔阳汗的儿子屈出律，他在蒙古军队的追击下逃奔到西辽。当时西辽的大汗叫直鲁古，他是一个昏庸无能、不理政事的统治者。屈出律奔西辽后，直鲁古对他毫无警惕，反而将女儿嫁给他，并供应他费用去招集乃蛮和蔑儿乞残部，使屈出律势力渐渐增强起来。屈出律为了达到篡夺西辽政权的目的，先是挑起花剌子模与西辽互斗，继而于 1211 年抓获直鲁古，夺取西辽大汗位。屈出律统治下的西辽，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都十分尖锐，政权是极不稳固的。1218 年，成吉思汗命大将者别率两万人进军西辽，讨伐屈出律。者别利用西辽境内的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宣布信教自由，并保证对居民不干涉，立即赢得了广大穆斯林的支持，他们纷纷起来杀掉住在老百姓家里的屈出律的兵士，使蒙古军队很快就占领了西辽都城，屈出律仓皇出逃，者别追至巴达哈伤（今阿富汗巴达克山）地区，屈出律被当地山民擒获，后被者别处死，西辽终于被蒙古军队征服。西辽的灭亡为蒙古军队的西征扫除了障碍。

三、灭亡西夏和金朝

蒙古国的南方，有两个政权：一个是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另一个是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当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后，就不断派兵南下。他的主要目的也是两个：一是掠夺财物，供蒙古奴隶主享受；一是灭亡夏、金，达到为其祖先复仇和扩大统治区的目的。西夏地处今天的甘肃、宁夏、陕西北部地区，与金朝成犄角之势，是成吉思汗灭亡金朝的障碍，而且它的力量比较弱，所以，成吉思汗

要灭金朝，首先先灭西夏。



西夏王陵

西夏政权是党项贵族建立的。蒙古兴起时，西夏国王是桓宗李纯佑。当时，西夏名义上称臣于金，但与金的矛盾很深。西夏政权内部也是矛盾重重，贵族之间互相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国力日渐衰落。但西夏的物产很丰富，稻麦五谷、手工业产品特别是铁器很著名。早在1205年，成吉思汗的军队就袭击过西夏，大肆掠夺而还。1206年，西夏镇夷郡王李安全废桓王，即位称帝，是为襄宗。1207年秋，成吉思汗又以西夏不肯纳贡为借口，再次派兵大肆掳掠。1209年秋，成吉思汗第三次派兵进入西夏，蒙古军队击败了西夏军队，西夏向金朝求援，金朝却坐视不救，以致蒙古军长驱直入，包围西夏京城中兴府（今宁夏银川）。蒙古军引黄河水灌城，由于堤决，水向外灌，反淹了蒙古军队的阵地，只好撤围。李安全纳女请和，双方达成协议，规定西夏每年向蒙古纳贡。成吉思汗通过三次征西夏，大大削弱了西夏的力量，不仅使西夏不能成为支援金朝的力量，而且加深了金夏之间的矛盾，有利于蒙古对他们的各个击破。

接着，成吉思汗就开始筹划对金朝的进攻。

蒙古反对金朝，在开始时是带有反抗民族压迫的正义性质。如前面所说的，女真统治者为了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对蒙古各部采取了分化瓦解，挑拨离间的政策，并不断派兵屠杀蒙古人民、掠夺子女，经济上又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因此摆脱女真贵族的压迫和统治是蒙古各部的强烈愿望。

1208年，金章宗完颜璟死，卫绍王完颜永济即位。1210年，

完颜永济遣使到蒙古下诏书，要成吉思汗拜受。成吉思汗问道："金朝的新皇帝是谁?"金使说："卫王也。"成吉思汗面向南方吐了一口唾沫，轻蔑地说道："我原来以为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的，像卫王这样平庸懦弱的人居然也做了中原皇帝，叫我怎么为他下拜呢?"说罢，上马挥鞭北去了。原来，成吉思汗与卫王完颜永济曾经有过一段交往。那是几年前的事情：有一次成吉思汗按照金朝的规定，将贡品送到净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北），接受贡品的金朝官吏就是完颜永济，成吉思汗见了他没有按规矩行礼。完颜永济大怒，回朝后曾要求派兵攻打蒙古。他们的关系本来就很不好，现在完颜永济当了金朝皇帝，成吉思汗决心与金朝闹翻，先发制人，派兵攻金。

蒙古灭金的战争前后经过三个阶段：1211 年至 1217 年为成吉思汗攻金时期；1217 年至 1223 年为木华黎攻金时期；1229 年至 1234 年是窝阔台灭金时期。

1211 年 3 月，成吉思汗率领他的四个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和者别、速不台、木华黎等将领发兵进攻金朝。在发兵前，他登上克鲁伦河畔的一座高山，对天祈祷道："长生之苍天啊！金朝皇帝辱杀了我的祖先俺巴孩等人，假如您允许我去复仇，就助我一臂之力，并让已经死去的人和各位神仙来帮助我。"就这样，蒙古军队在"复仇"的鼓动下，越过大漠南下。事先，成吉思汗从为金朝守长城的汪古人、到中国经商的回回商人那里了解了金朝境内的通道、城市、财产等状况，掌握了金朝统治下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和人民群众反对女真统治的情况。蒙古军队首先进入今河北境内。金将完颜承裕（胡沙）率 30 万金军于野狐岭（今河北万全南）拒战，成吉思汗率军进攻，金军大败，蒙古军追至浍河堡（今河北怀安东），金朝的主力部队几乎全部被歼。蒙古军乘胜突入居庸关，进攻中都（今北京），不克。另一路蒙古军在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率领下攻取净、丰（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云内（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武（今山西五寨北）、朔（今山西

朔州）等州，金将纥石烈执中（胡沙虎）弃西京逃到中都。1212年，蒙古军队攻破宣德（今河北宣化）、兴德（今河北涿鹿）诸要塞。1213年秋，蒙金双方激战于怀来（今河北怀来），金将术虎高琪大败，蒙军乘胜攻破紫荆关，夺长城，占南口、居庸关，进而围攻金中都。成吉思汗深知中都城防坚固，不易攻克，决定除继续围中都外，分兵三路深入中原腹地：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率右路军沿太行山南下，抵黄河北岸再折向西北，大掠平阳（今山西临汾）、太原等地；合撒儿（成吉思汗弟）率左路军攻占滦州（今河北滦县）、蓟州（今河北蓟县），进入东北辽西地区；成吉思汗和拖雷率主力军南下，攻破河间（今河北河间）、济南、益都（今山东益都），前锋直抵邳州（今江苏邳县）。1214年春，成吉思汗回到中都城下，准备返回蒙古。这时金宣宗完颜珣派宰相完颜襄为使，向成吉思汗求和。金朝将公主嫁给成吉思汗，并献了大量金帛、马匹、童男女，蒙古军队满载战利品，离开中都北去。

蒙古军队退走后，金宣宗异常惶恐，怕蒙古军队再次南下包围中都，决定迁都汴京（今河南开封）。驻扎在鱼儿泺（今内蒙古达尔泊）的成吉思汗得知这个消息后，借口金朝缺乏诚意，再次发兵南下攻围中都。次年五月，蒙古军占领中都，金朝中都留守完颜福兴自杀。接着，成吉思汗又派兵进攻汴京，直抵杏花营（在开封西12里），大掠河南后北去。



金代塑像

成吉思汗的第一次攻金战争，是以反对女真贵族的民族压迫战争开始，以转变成掠夺性战争告终的。蒙古军队所过之处，民舍被毁，人民被杀，金帛人畜被掳。特别是当蒙古军队占领中都后，

纵兵掳掠，大火月余不灭，给中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因此，北方各族人民对蒙古军队的反抗也是十分强烈的。当时山东地方正爆发红袄军农民起义，红袄军本来是反对金朝黑暗统治的，但他们也痛恨蒙古铁蹄的蹂躏，所以当1214年蒙古军队再次南下时，红袄军曾奔赴潼关阻击蒙古军队。1216年，蒙古军队进入河南后，也受到金朝军民的顽强抵抗，迫使蒙古军队撤走。

成吉思汗的攻金战争对蒙古本身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由于蒙古国的统治地区扩大到黄河流域，使蒙古国的经济基础由畜牧经济逐步转变为农业经济，中原地区的封建政治、经济制度促使蒙古国的奴隶制开始演变，特别是汉化很深的契丹人耶律楚材等知识分子投靠蒙古后，大大加速了蒙古政权采用封建制度的过程。蒙古国占领黄河流域后不仅增强了经济实力，还获得了许多先进的军事知识和武器。

1226年春，成吉思汗以西夏拒绝派兵参加西征和迟迟不履行交纳质子为理由，发动对西夏的两路进攻。十一月，蒙古军包围中兴。成吉思汗围而不攻，清除周围未下州县，切断西夏退路。1227年闰五月，成吉思汗到六盘山（今宁夏固原南）避暑。中兴府被围半年，粮尽援绝，军民病困。六月，中兴发生强烈地震，城内房屋倒塌，瘟疫流行，西夏迫遣使请降，称："为了准备贡物，迁民户，请宽限一月，到时亲来朝谒。"成吉思汗同意了。


成吉思汗陵

成吉思汗自六盘山移至清水县的西江（今属甘肃），因染上斑疹伤寒，于七月己丑（公历8月25日）病死，终年66岁。遵照成吉思汗遗嘱，死后秘不发丧，待西夏国主出城来降时，执而杀之。不久，西夏国主李晛投降，

被杀，中兴城居民也惨遭杀戮，西夏亡。

成吉思汗在他临死之前，虽然统一了全蒙古，虽然取得了西征的重大胜利，并且即将灭亡西夏，却没有能亲自把金朝灭亡。这是他深为不安的大事。因此，临终前还念念不忘把灭金的战略嘱咐给他的儿子们："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黄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直捣大梁（即汴京）。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这就是联宋灭金的战略。他还指定第三子窝阔台为他的大汗继承人。

窝阔台即大汗位后，即执行成吉思汗遗愿，一面大举出兵攻金，一面联宋假道灭金。

南宋对蒙古的情况，本来一无所知。1211 年，南宋派使臣出使金朝，方才知道蒙古已经强大起来。于是，南宋朝廷内联金还是联蒙议论不休，举棋不定。到 1221 年时，终于决定采取联蒙灭金的方针。在这之前，蒙古曾派使臣到南宋通好，因此，南宋也于 1221 年、1223 年又两次派使臣出使蒙古，秘密定下了联合灭金的默契。由于这一默契并未公开，1227 年底蒙古军队突入四川北部诸关隘和 1231 年拖雷入川都是依靠武力夺取的，并遭到南宋军民的反抗。宋蒙双方正式达成灭金协议，那是 1233 年的事。

从 1229 年到 1231 年的 3 年间，蒙金战争并不激烈。1231 年四月窝阔台分军三道，大举伐金。其中拖雷所率右路军先取宝鸡（今属陕西），然后遣使赴宋，要求假道宋境，包抄汴京，结果蒙使被宋将张宣所杀，于是拖雷攻入大散关（在今陕西宝鸡西南），经凤州（今陕西凤县东），进入南宋境内之洋州（今陕西洋县），围攻兴元（今陕西汉中），进取四川北部。十一月，拖雷夺饶风关，取金州（今陕西安康），蒙古军沿汉水东下，直抵邓州（今河南邓县），终于实现了假道宋境包抄汴京的战略。

但是，金朝虽然腐败，却还有防守能力。特别是归德（今河

南商丘）、洛阳、汴京等城市还在坚守，山寨、城堡中还屯聚了不少地方武装。1232 年二月，蒙古军包围汴京。猛攻了 3 个月还是攻不下来。原来，汴京城墙特别坚固，蒙古军用大炮轰击，汴京城墙只是凹下一块，而守城的金兵却用震天雷、飞火枪大量杀伤蒙古军队，蒙古军十分害怕。震天雷是铁罐装的火药，击发后其声如雷，杀伤范围达半亩以上，连铁甲都能击穿；飞火枪是把火药装进火枪内，点着后射程有十余步，也很有威胁。1232 年年底，金哀宗完颜守绪因汴京粮绝，逃奔归德。

蒙古军队虽然取得了不少胜利，但伤亡很大，粮饷十分紧张，一时还灭不了金朝。1232 年十二月，窝阔台派人使南宋，商议夹攻金朝事宜，双方达成协议，蒙古答应灭金后以河南地归宋。1233 年四月，南宋遵约派孟珙进攻唐、邓，击败金将武仙。五月，金哀宗逃奔蔡州（今河南汝南）。蒙古军进而围攻蔡州。八月，蒙古以蔡州城坚池深，久攻不下，又派人使宋，要求发兵运粮支援。同时，金哀宗也从蔡州遣使以唇亡齿寒的道理，要求南宋援助粮食，被南宋拒绝。十月，正当蒙古军队进攻蔡州很不顺利的时候，孟珙率兵 2 万、运粮 30 万石来支援。1234 年正月，宋蒙联合攻破蔡州，金哀宗自杀，金亡。

四、进攻南宋和统一吐蕃、大理

蒙宋联合灭金后，蒙古却没有实现将河南地归宋的诺言，反而迫使宋朝将陈州、蔡州西北的大片土地归蒙古占有。蒙宋开始对峙。历史又开始重演了：100 多年前，当女真进攻辽朝时，约北宋联合灭辽，结果辽被灭后女真大举进攻北宋；现在蒙宋联合灭金后，蒙古又大举进攻南宋。

这时的南宋政权，已经腐朽到极点。宋理宗赵昀在位达 40 年（1225—1264）之久。他先后重用权臣史弥远、史嵩之、董宋臣、丁大全、贾似道等人，这伙人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依然过着纸

醉金迷、腐化挥霍的生活。“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情景，有增无减。面对强大的敌人，他们不是加强国防，坚决抵抗，而是束手无策，和战不定，把希望寄托在委屈求和、敌人自动退兵上。所以蒙宋40年战争，南宋一直被动挨打，直到灭亡。下面要讲的，是忽必烈即位以前蒙古进攻南宋的情况。

金朝灭后，蒙古主力军北还，河南处于空虚状态下，南宋乘机出兵，企图收复洛阳（西京）、汴京（东京）、归德（南京）三京和河南其他地方。1234年六月，宋理宗赵昀命全子才等出兵汴京，汴京蒙古守将杀长官崔立降宋，宋将赵葵自滁州（今属安徽）取泗州（今江苏盱眙北），至汴京会师。七月，宋兵入洛阳，洛阳近乎一座空城，宋兵军饷无着。蒙古军在洛阳东南龙门设伏，大败宋军，进而包围洛阳，宋军因严重缺粮，只好弃城突围，在洛东大败，几乎全军覆没。在汴京的宋军，也因粮饷不继，无法坚守，在蒙古军决黄河水淹城后，也只好退走了。南宋收复三京的失败，是缺乏周密准备和史嵩之等人破坏的结果。当时，河南遭战争破坏，州县多半是空城荒地，控制朝政的史嵩之等又不供应军饷，所以无法坚守。这次军事行动，反而成了蒙古进攻南宋的借口。1234年底，王檝再次使宋，责怪南宋破坏协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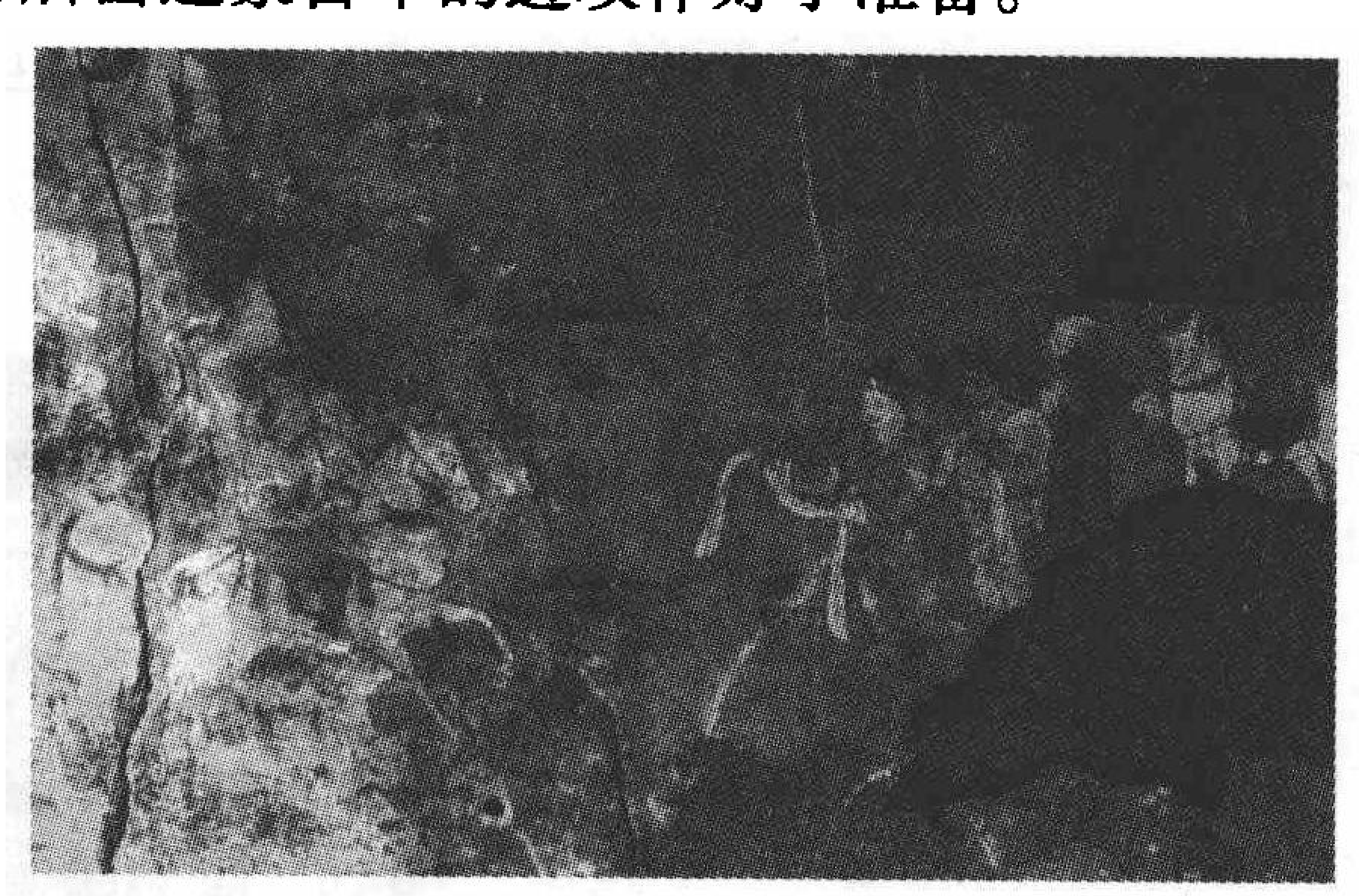
1235年初，窝阔台大举进攻南宋。蒙古军队分兵三路：西路由窝阔台次子阔端等率领攻取四川；中路由窝阔台第三子阔出等率领，进犯汉水流域和长江中下游；东路由宗王口温不花等率领入侵江淮。这次南下的蒙古军队是由“蒙古军”（由蒙古人和西域人组成）、“汉军”（由北方汉族地主武装和新降附的金军组成）所组成的。蒙古统治者由于兵力枯竭，在西


元太宗窝阔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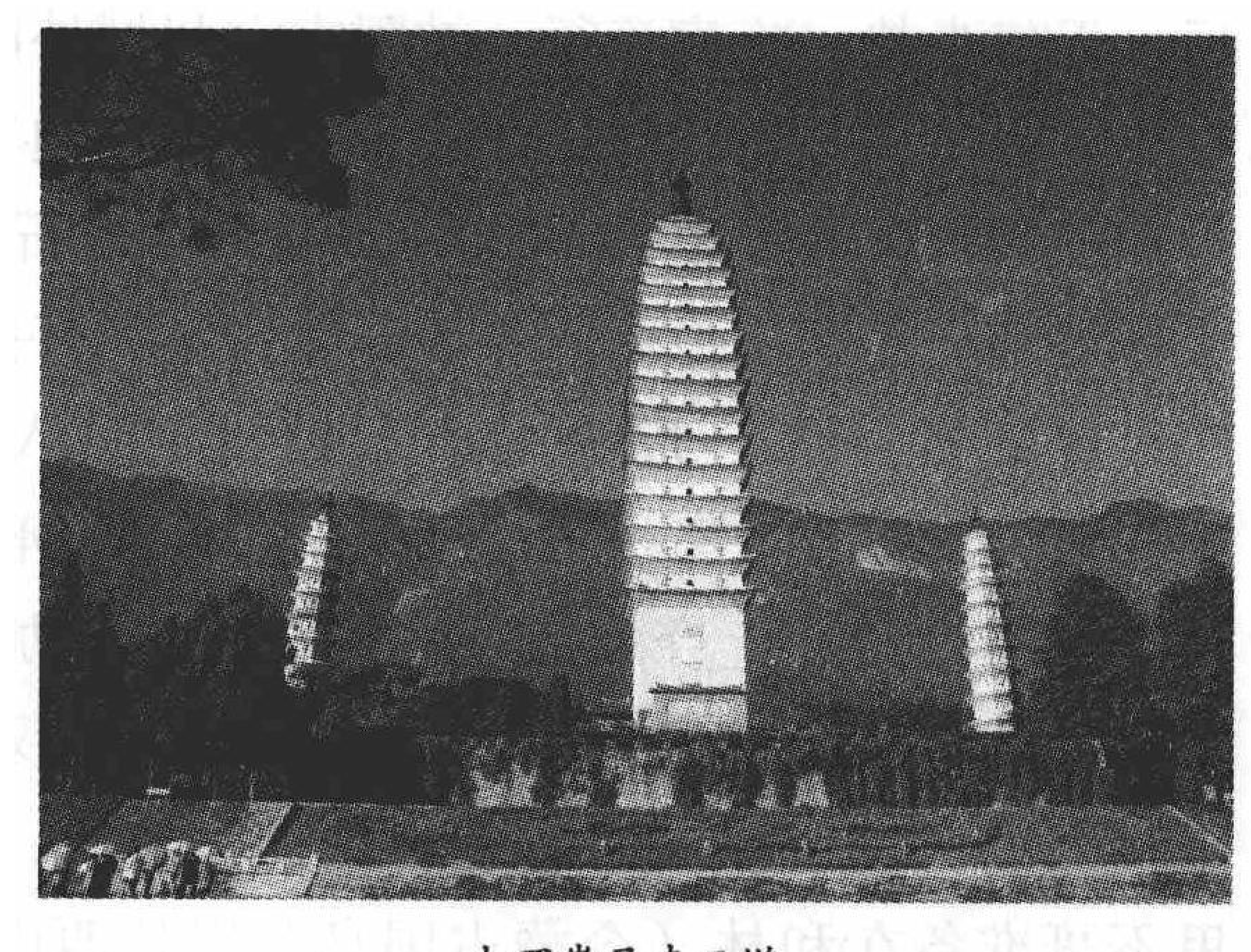
征和南侵时，都是用征服地区的人民来补充自己的军队。

1241 年窝阔台死，蒙宋战争暂时休止。

蒙古军退后，南宋开始在四川部署防御。孟珙、余玠等先后主持屯田积粮，立寨筑城等，卓有成效。特别是合州（今四川合川）钓鱼山城的修筑，为日后击退蒙古军的进攻作好了准备。


《八思巴拜见忽必烈》壁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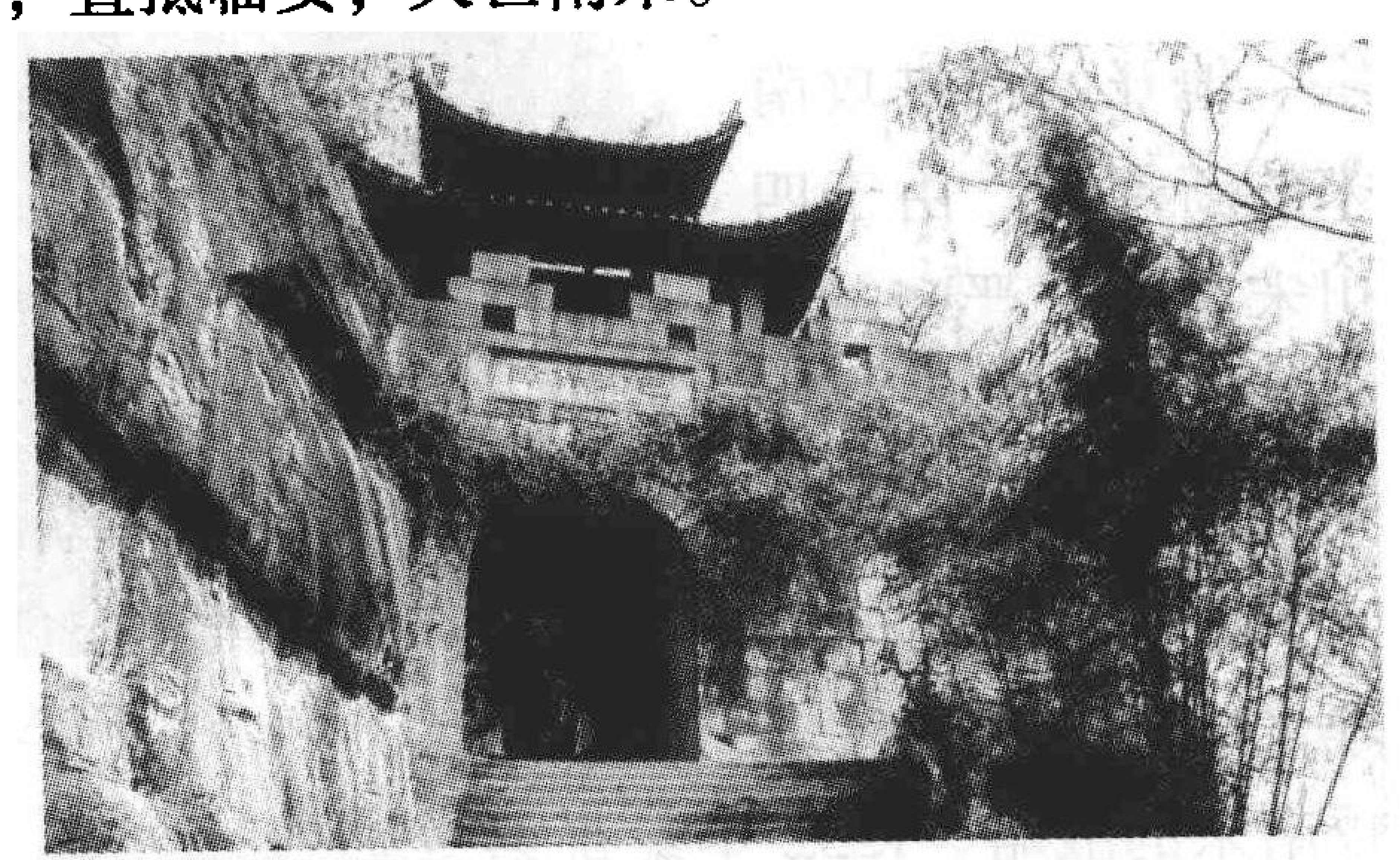
1251 年，蒙哥即大汗位，是为宪宗。他开始作进攻南宋的新部署。由于四川宋军防守严密，蒙古军队不敢轻易进攻。因而采取了绕道吐蕃，进攻云南的大理，然后南北合兵进攻南宋的战略。1252 年蒙哥弟忽必烈、老将速不台子兀良哈台奉命出征。1253 年秋，忽必烈经六盘山、临洮，抵忒剌（今四川松潘北），分军三道前进，穿越吐蕃东部（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进入大理。吐蕃政权自 842 年解体后，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下。1246 年，吐蕃佛教萨斯迦派首领萨斯迦班智达曾携其侄八思巴到凉州，会见阔端，议定归附蒙古条款，萨斯迦班智达返藏后致书乌思（前藏）、藏（后藏）、纳里（阿里地区）的僧俗官民，宣布归附蒙古，并传达阔端关于清查户口、建立驿站的命令。忽必烈率军进入吐蕃东部地


大理崇圣寺三塔

区，击败反抗的吐蕃割据势力，实际上是蒙古管理西藏的具体实施。

1253 年十二月，忽必烈攻占大理城。

1258 年初，蒙哥再次发动三路大军进攻南宋。他自率主力军进入四川；命忽必烈攻打鄂州（今湖北武昌）；又命兀良哈台从云南北上攻潭州（今湖南长沙），然后在鄂州与忽必烈会师。准备三路军会师后同时东进，直抵临安，灭亡南宋。


钓鱼城遗址

蒙哥先派纽璘占领成都，自率大军攻下利州（今四川广元）及其附近地方，然后沿嘉陵江南下，准备进攻重庆。1258 年底，蒙古军到达合州。合州在嘉陵江东岸，地势险要，是重庆的北边门户。合州宋将王坚调集 17 万人增筑钓鱼城御敌，军民抗蒙情绪高涨。1259 年春，蒙宋双方在合州及其周围展开了激烈的攻守战，蒙军始终未能攻破钓鱼城。入夏后，天气炎热，疾病流行，被阻在合州城外的蒙古军病倒很多。七月，蒙古军围合州，先锋汪德臣差一点被炮石击中，回营后得病死去。随后，蒙哥等率大军攻城，宋军发炮石，击退蒙古军。不久，蒙哥得病死于军中。大汗一死，蒙古军只好撤退。

忽必烈一路于 1259 年八月渡淮河，入大胜关，抵黄陂（今湖北黄陂北），向鄂州推进。九月，蒙哥死讯传来，忽必烈企图攻下鄂州后再北上夺取汗位，因而攻城更加激烈。由于南宋援兵来到，忽必烈一直未能得手。十二月，在汉阳声援鄂州的南宋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似道向忽必烈求和。这时，忽必烈已得知其弟阿里不哥准备在和林（今蒙古国乌兰巴托西南）即大汗位，于是便

采纳谋臣郝经的计策，匆匆与贾似道签订密约：双方以长江为界，南宋每年献银20万两、绢20万匹给蒙古。然后，急速撤兵北上争夺汗位。

兀良哈台一支军队到达潭州后，因南宋军民奋战抵抗，未能攻下，兀良哈台便绕道北上与忽必烈会师。

第三章　侵入欧亚各国

一、成吉思汗西征

成吉思汗为了确定谁当他的继承人，有一天他把4个儿子叫来。当着成吉思汗的面，术赤和察合台发生了争执。成吉思汗对他们说："世界广大，江河众多。使你们攻占外国，去各自分配，扩大自己的牧地。"这段话，就是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奴隶主阶级的哲学：要想富贵，就去抢掠；要想称王，就去攻占外国。这也是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为什么连年累月发动对外战争的原因。

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对西部的战争，在1218年成吉思汗击败乃蛮的屈出律灭亡西辽以前属于国内民族战争，从1219年成吉思汗亲自率军侵入花剌子模开始，则属于向国外的侵略扩张战争。

蒙古奴隶主早就闻知花剌子模是一个广袤富饶的国家。这个国家原是阿姆河下游的一个古国，到13世纪初花剌子模沙[①]摩诃末时，已控制今天的中亚各国、阿富汗、伊朗这些地方，都城在玉龙杰赤（今乌兹别克斯坦郭耳加纳契），是中亚的一个大国。1218年，有一队四五百个穆斯林商人组成的蒙古商队，受成吉思汗委托，带了500只骆驼运载的金银、皮毛、纺织品等到西方去经商。

① 沙，或译算端，是中亚伊斯兰国家和地区对国王的称号。

行至花剌子模边境的讹答剌城（在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西北），该城守将亦纳勒赤黑以为是间谍，将这个商队全部洗劫，商人被杀。成吉思汗得知后即派专使前往交涉，要求交出亦纳勒赤黑，花剌子模沙摩诃末不但拒绝要求，还把成吉思汗的使者杀了。成吉思汗闻讯后，又是震惊，又是愤怒，气得眼泪也淌了下来。他一口气登上附近一座山的山顶，脱下帽子，跪在地上求老天保佑。不饮不食，祈祷了三天三夜，方始下山。于是便抓住讹答剌事件，发动了对花剌子模的战争。

1219 年秋，成吉思汗率 20 万军队侵入花剌子模。花剌子模虽然拥有 40 万军队，又有精良的武器和充足的财富，但是这个国家民族复杂，人心不齐，加上摩诃末独断独行，战斗力很弱。蒙古军队首先围攻讹答剌城，但久不能下。成吉思汗留下察合台、窝阔台攻城，另派术赤率一支军队进攻锡尔河下游各城镇，派阿剌黑等进攻别纳客忒和忽毡（今塔吉克斯坦列宁纳巴德），自率主力进攻不花剌（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

1220 年二月，成吉思汗到达不花剌。经过三天围城后，守城的将领眼看有城破的危险，无心坚守，只想逃跑，他们乘夜率 2 万士兵突围。蒙古军毫无准备，只得慌忙撤退。可是，这些一心逃跑的花剌子模将领们不但没有乘势进攻，反而溜之大吉。成吉思汗率军回过头来追击，一直追到阿姆河畔终于歼灭了这支军队。次日，不花剌投降。城中内堡尚有 400 士兵坚守，12 天后也被消灭。蒙古军队在不花剌掠取所有财物后，把它付之一炬。与此同时，察合台、窝阔台攻下了讹答剌，为报复杀害穆斯林商人之仇，他们大肆杀戮；术赤和阿剌黑军所攻占的城池，也遭到了大屠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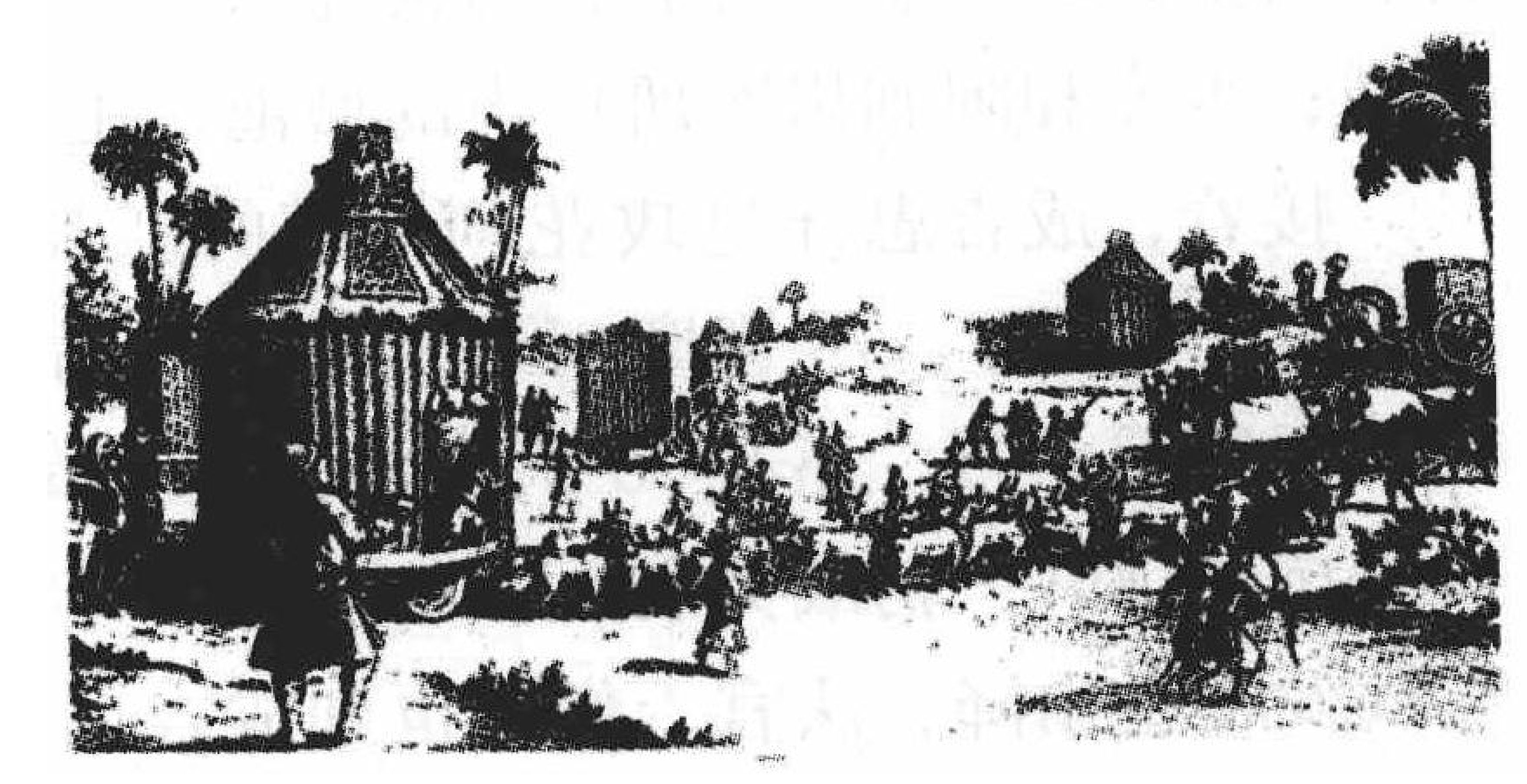
接着，成吉思汗进攻花剌子模的新都撒麻耳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尽管摩诃末增修了工程浩大的壁垒，调集了波斯、突厥兵 4 万，还有 20 只战象，但是腐败的花剌子模统治者毫无抵抗的勇气。初战失利后，城中属于突厥人种的康里士兵纷纷携眷属及辎重出降，法官、僧侣也到成吉思汗军营中商洽投降条件，并开城投降。成吉思汗入城后照样屠杀，连康里士兵也不例外。只

留下了3万工匠，把他们押到蒙古军营供驱使。

昏庸无能的摩诃末，眼看自己的城池或被攻破，或不战而降，弄得他神志沮丧，一筹莫展，也不知往哪里逃才好。后来决定采取逃奔哥疾宁（今阿富汗加兹尼）以纠集残兵作抵抗的计划。但是，他的儿子札兰丁坚决反对，力主坚守阿姆河以遏止蒙古兵南下，反而受到摩诃末的训斥。成吉思汗为了生擒摩诃末，派者别和速不台追击。摩诃末只好逃到宽田吉思海（今里海）的一个小岛上，1220年十二月病死在这里，札兰丁继承花剌子模沙。

札兰丁是花剌子模统治集团中抗蒙很坚决的统治者，他坚定勇敢，有计谋。摩诃末死后，札兰丁决心以旧都玉龙杰赤为基地，抗蒙复国。这时成吉思汗已命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等追来。守卫玉龙杰赤的花剌子模将领帖木儿蔑里，指挥3万士兵英勇地击退了术赤的军队。但是，由于花剌子模统治集团发生内讧，一些将领准备谋杀札兰丁，札兰丁只好带着帖木儿蔑里等300人逃奔呼罗珊（今土库曼斯坦南部、伊朗东北部和阿富汗的西北部一带），在玉龙杰赤的反札兰丁的势力则拥忽马儿为新沙。札兰丁走后，蒙古军进而围攻玉龙杰赤，忽马儿出城投降。但城中军民继续抗战，蒙古军围城6个月付出了极大的伤亡，至1221年四月破城。城中军民继续巷战，直到最后牺牲为止。蒙古军除将10万工匠遣送军中外，居民大部分被杀。最后，蒙古军队引阿姆河水灌城，将玉龙杰赤城变为一片汪洋。与此同时，拖雷的一支蒙古军队攻占了马鲁（今土库曼斯坦马里）。

这时，花剌子模的力量只存下札兰丁的残余部队。札兰丁在呼罗珊避开了蒙古军队的追击，进入哥疾宁，收集余部，图谋反攻。成吉思汗决定亲自率军追



西征中的蒙古军

击。其先锋在八鲁湾（今阿富汗喀布尔北）与札兰丁军相遇，被击败。但每当胜利的时候，花剌子模统治集团就发生内讧，札兰丁的部将们为争夺战利品发生争执，纷纷离去。蒙古军队再次发起进攻，札兰丁被迫于1221年四月逃到忻都（今印度），在申河（今印度河）被蒙古军打败。札兰丁弃家室辎重，跃马投入申河，游至对岸，后来在外高加索一带继续与蒙古军队作战。

1223年春，成吉思汗准备进攻印度然后越过雪山（今喜马拉雅山）从吐蕃返回蒙古。由于道路崎岖，气候炎热，只好改由原路退回蒙古。

前面提到，1220年摩诃末逃跑时，成吉思汗曾派者别、速不台去追赶。现在再把这支蒙古军队的活动告诉读者。

者别和速不台一直追到宽田吉思海西岸，然后攻破阿哲儿拜占（今阿塞尔拜疆）各地。阿哲儿拜占的都城在帖必力思（今第比里斯），当时的阿塔卑①叫月即伯。蒙古大军压境后，年老而嗜酒的月即伯以货币、衣服、马畜等物赠献蒙古，作赎城费，才免遭劫掠。

1222年初，蒙古军侵入谷儿只（今格鲁吉亚），击败谷儿只王阔儿吉·剌沙。随即逾越太和岭（今高加索岭），侵入阿速部（其驻地在今俄罗斯境内）及钦察草原（波罗夫赤草原），迫使钦察人迁至亦的勒（伏尔加）、涅卜儿（第聂伯）两河之间，与该地之钦察人联合。钦察人也是突厥人种，已经在这里生活了2个世纪之久。

蒙古军队追击至克里木，占领速答黑城（今俄罗斯萨波罗什）。钦察部的忽滩汗向南斡罗思（俄罗斯）的伽里赤大公密赤思老求援，于是密赤思老联合南斡罗思诸大公，推乞瓦（今乌克兰基辅）大公罗曼诺维赤为盟主，决定迎击蒙古军于斡罗思

---

① 阿塔卑，原意为“太傅”，因阿哲儿拜占亦勒迪吉思王朝的建立者为伊剌克（今伊拉克）沙的奴隶，后被封于阿哲儿拜占，获“阿塔卑”称号。不久，成为该国之主，所以阿塔卑又有“国主”之意。

境外。

斡罗思和钦察联军虽然人数众多，但缺乏统一指挥，步调不一。1223 年五月，联军与蒙古军激战于迦勒迦河（在今乌克兰境内），联军大败，6 个斡罗思大公阵亡。罗曼诺维赤乞降，结果斡罗思军全被屠杀。蒙古军长驱直入斡罗思境。这年冬，者别和速不台率军经过现在的哈萨克草原东返，与成吉思汗的主力军会合，经撒马尔罕回到蒙古本土。1225 年成吉思汗西征至此结束。

西征结束后，成吉思汗把术赤留在被占领的钦察等地，不久，术赤病死。成吉思汗在中亚各地置达鲁花赤（镇守官），命回回商人牙剌瓦赤总督一切军政事宜。后来又改命牙剌瓦赤的儿子马思忽惕代其父职。

二、“长子西征”和钦察汗国的建立

蒙古军队虽然在迦勒迦河击败了斡罗思诸大公和钦察人的联军，但是并没有完全征服钦察人，更没有使斡罗思人屈服。所以，当窝阔台即位后就考虑再次出兵征服西方诸国的问题了。

在 1235 年的忽里勒台上，决定派遣成吉思汗 4 个儿子的长子、长孙或儿孙率领军队西征。他们是：术赤的次子拔都，察合台的长子拜答儿、孙不里，窝阔台的长子贵由，拖雷的长子蒙哥等，而以长房的拔都作统帅，由老将速不台任先锋，蒙古军队万户长以下军官的长子也都从军。历史学家把这次西征叫做“长子西征”。其实参加西征的不仅有各系的长子，还有各系长子的弟弟；不仅有蒙古军队，还有许多被征服的各族、各国的部队。

1236 年春，蒙古军队抵达亦的勒河中游，击败不里阿耳人。1237 年春，蒙古军队进击钦察。当时钦察人在“有胆勇”的领袖八赤蛮领导下进行了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他们出没于亦的勒河两岸的森林中，使蒙古军队受到不少损失。后来八赤蛮被俘身死。

蒙古军队在击败了钦察、波尔塔斯、毛而杜诸部族后，进入斡罗思的也烈赞公国。拔都命令也烈赞王献出所有财产的十分之一。也烈赞王不允，求援于兀剌的迷儿公国，遭拒绝。结果也烈赞全境被屠。1238 年初，蒙古军破兀剌的迷儿公国。

由于斡罗思军民的英勇抵抗，蒙古军的伤亡也很重。在攻占兀剌的迷儿公国后，蒙古军折回亦的勒河上游，继续征服太和岭以北的薛儿客速、马里木等部，再破钦察部忽滩汗的军队，忽滩汗被迫率所部逃徙到匈牙利。1238 年冬，蒙古军攻陷长期坚持抗蒙的阿速部人的蔑怯思城。1239 年春，取打耳班，再入南斡罗思境。

1239 年秋，贵由、蒙哥奉命返回蒙古。等他们回到蒙古时，窝阔台已于 1241 年十一月死去。皇后乃马贞氏监国。

侵入斡罗思的军队在拔都率领下继续攻打各公国。当时诸大公之间纷争不已，大敌临头，也不能团结抵抗，纷纷溃逃至匈牙利境。1240 年蒙古军进一步蹂躏斡罗思的伽里赤公国，尽管伽里赤是一个富庶强大的公国，大公答尼勒竟不敢抵抗，也逃奔匈牙利。1241 年侵入东欧的蒙古军队分成两支：一支进入波兰（中国史籍称“昔烈儿”）；一支在拔都、速不台率领下进入匈牙利（中国史籍称“马札儿”）。进入波兰的一支蒙古军摧毁了波兰的守军，接着又在里格尼志堡附近击溃波兰和德国诸侯的联军，进入莫剌维亚，然后进入匈牙利与拔都军会合。匈牙利国由于收容了钦察人，内部矛盾非常严重。后来匈牙利王别剌袭杀钦察汗忽滩，引起钦察人骚乱。拔都率领的蒙古军进入匈牙利后，匈牙利王连战皆败，蒙古军攻陷佩斯城（今布达佩斯之佩斯），匈牙利全境遭到蹂躏。后来，蒙古军队又进入奥地利及亚得里亚海东岸。

蒙古军队征服斡罗思，侵入奥匈，大大震动了西欧各国，他们惊呼“黄祸”来了。西欧许多城市修筑工事，罗马教皇也发出号召准备组织十字军。但是，由于斡罗思和东欧各国人民的奋勇抵抗，蒙古军队已经无力西进了。1242 年四月窝阔台去世的消息传到蒙古军营，拔都率军东撤。1243 年，拔都在亦的勒河下游的东

岸，建筑了萨莱城（今俄罗斯阿斯特拉罕附近），并以此为都城来统治他占领的地域，拔都的统治区叫钦察汗国，也叫金帐汗国。其疆域东起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西包斡罗思诸公国。



元宪宗蒙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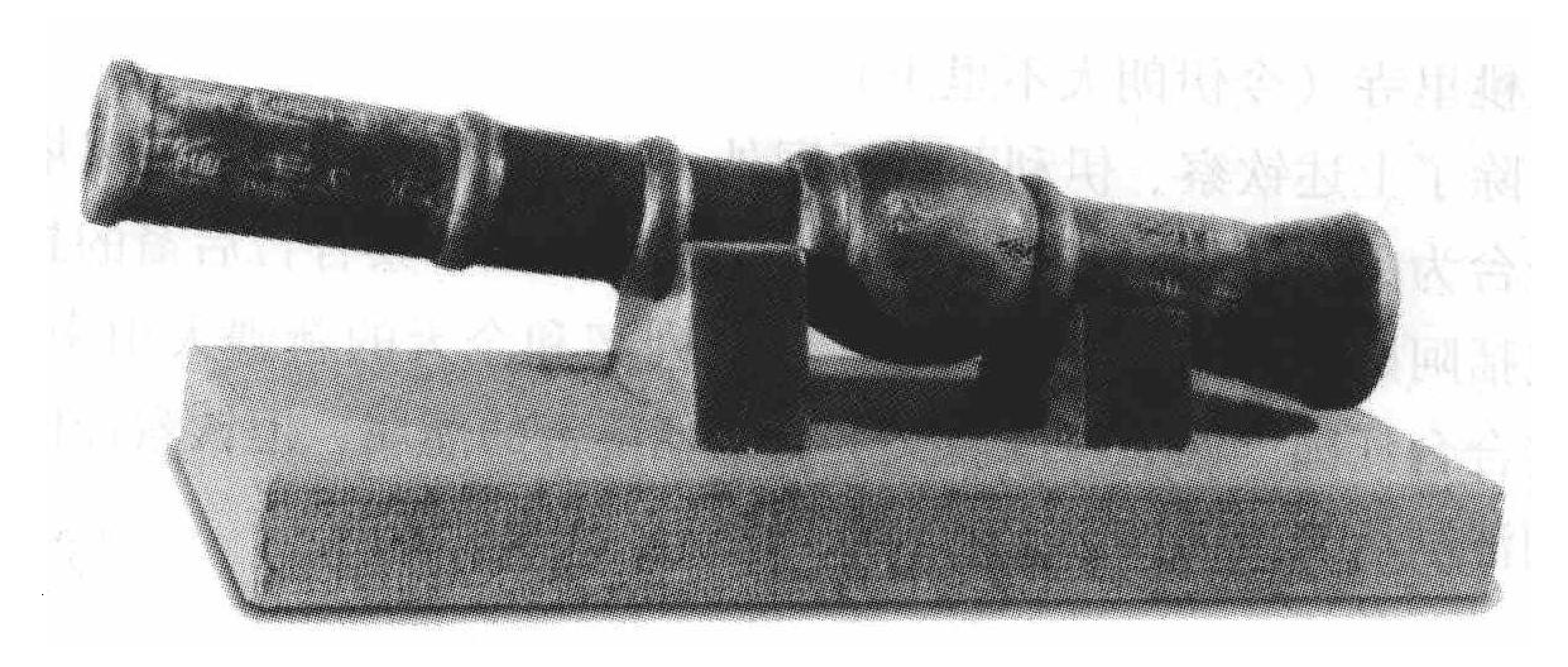
窝阔台死后，汗位争夺很激烈。在1246年春召开的忽里勒台大会上，窝阔台之子贵由被推为大汗（定宗）。但拔都拒不参加忽里勒台大会，与贵由关系十分紧张。1248年初，贵由以养病名义，率军西行，意欲突然袭击拔都。三月，途经横相乙儿之地（今新疆青河东南），得病死。在1251年召开的忽里勒台大会上，由于拔都的支持，蒙古诸王共推拖雷的儿子蒙哥为汗（宪宗），从此大汗位由窝阔台系转到了拖雷系的手里。

三、旭烈兀西征和伊利汗国的建立

成吉思汗西征时，并没有征服花剌子模沙札兰丁。因此，在他返回蒙古时留下绰儿罕继续追击札兰丁。1231年，札兰丁败亡。后来绰儿罕和拜住继续率领蒙古军队在西亚和波斯用兵20年，却并没有全部征服这些地区。

1252年，蒙哥决定派其弟旭烈兀发动一次新的西征。这次西征除了动用诸王的士兵外，还抽调了1 000多名中国的工匠从征，其中包括著名的火器专家郭侃。

1256年，旭烈兀进兵木剌夷国。木剌夷地处里海之南，11世纪末建国，统治祃拶答而（今伊朗马赞德兰省）诸山城，为伊斯兰亦思马因派。蒙古军入境后攻陷许多城堡，国主兀鲁兀投降，木剌夷人民遭到残酷屠杀。



铜火铳

1257年，蒙古军队开始进攻报达（今伊拉克巴格达）。报达是黑衣大食[①]阿拔斯王朝首都。黑衣大食建国已500年，一度虽为塞尔柱突厥人占领，但名义上仍为阿拔斯王朝哈里发[②]统治。蒙古人侵时，哈里发穆斯塔辛是一个怯懦无能、只知享乐的统治者。旭烈兀致书哈里发，要他投降。哈里发自认为是“穆斯林国家的共主”，回书拒绝，但又不认真备战。1258年初，旭烈兀用火炮攻陷报达，哈里发投降，被杀。蒙古军队入城后劫掠7天，居民被屠杀的有数十万人之多，阿拔斯王朝的艺术珍品和华丽的建筑物遭焚毁，这座著名的古城被彻底破坏。

旭烈兀继续率军西进，蹂躏了美索不达米亚，侵入叙利亚，逼近埃及。1260年，蒙古军攻陷阿勒波和大马士革，但埃及马穆鲁克苏丹[③]的军队在大马士革以南阿音札鲁特地方大败蒙古军，阻止了蒙古向埃及和非洲的扩张。

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封旭烈兀于波斯，旭烈兀在自己的封地内建立了伊利[④]汗国。伊利汗国东起阿姆河，西迄小亚细亚，北接钦察汗国，南至印度洋，都城蔑剌哈（今伊朗马腊格），后来

---

① 黑衣大食是中国史书对阿拉伯帝国的称呼。

② 哈里发，阿拉伯语“代理人”、“继承者”，是指穆罕默德事业的继承人。实际上就是国王。

③ 苏丹，阿拉伯语君主、统治者之意。

④ 伊利，突厥语从属的意思。

移至桃里寺（今伊朗大不里士）。

除了上述钦察、伊利两个汗国外，窝阔台后裔的封地是以塔尔巴哈台为中心的阿尔泰山地区，称窝阔台汗国；察合台后裔的封地是包括阿姆河以东的中亚细亚、谢米列契和今天的新疆天山南北，称察合台汗国。四大汗国名义上是元朝皇帝的藩属，但钦察汗国和伊利汗国后来成为实际上的独立国家。

四、东侵高丽

成吉思汗向外扩张时，高丽由王氏所统治。1216 年，契丹人金山、元帅六哥因不满蒙古的统治，率 9 万人进入高丽。1217 年金山等攻占江东城作为据点，金山自称辽东王。不久，统古杀金山，喊舍又杀统古。1218 年，蒙古借口讨伐契丹人，遣哈只吉、札剌等侵入高丽，与高丽军合作攻破江东城，喊舍自杀。高丽王王瞮称臣，并纳贡方物。1224 年，由于蒙古使臣被高丽人杀，两国关系开始恶化。

1231 年，窝阔台命撒礼塔率军进攻高丽，华裔高丽人洪福源投降，并协同蒙古军攻克许多州郡。王瞮被迫投降。撒礼塔在高丽安插京、府、县达鲁花赤 72 人实行监督。

1232 年，高丽爆发了大规模的反蒙斗争。王瞮杀蒙古达鲁花赤，倾朝徙居江华岛抗敌。蒙古再派撒礼塔前往镇压，为高丽军击毙，高丽军收复西京（今平壤）等地。从 1233—1241 年，蒙古虽多次派军联合洪福源入侵高丽，王瞮却始终没有投降。

1241 年，王瞮派族子王綧入质。贵由、蒙哥统治时期，又以“岁贡不入”为由，四次派兵入侵，对高丽人民进行残酷的屠杀，迫使王瞮又派子王倎入朝。直到忽必烈上台后，两国关系方有好转。当时王瞮已死，子王倎继位，蒙古以高丽“永为东藩”，令其每岁入贡。两国使臣和商旅往来频繁，经济和文化联系也很密切。

元朝建立后，利用高丽作侵略日本的基地，对高丽人民的剥削

加重，高丽人民曾多次举行反元的武装斗争。

五、对西征和东侵的分析

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对亚欧各国的侵略，与蒙古灭畏兀儿、西辽、西夏、金和南宋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前者是向国外发动的侵略战争，后者是国内民族战争。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在西征和东侵过程中，杀戮人民，掠民为奴，毁灭城镇，破坏农田，给中亚、西亚、东亚和欧洲不少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造成这些地方的经济和文化的严重破坏，各国人民对他们表示憎恨，这是很自然的。虽然蒙古铁骑冲破了亚欧各国的此疆彼界，促进了东西交通的沟通和文化交流的繁荣，但这毕竟不是成吉思汗西征的历史功绩。

我们并不讳言西征给各国人民带来了战争的灾难，但是，无论当时和现在，包括蒙古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是没有责任的。事实上，蒙古人民、中国北方各族人民都是西征的受害者。为了战争的需要，蒙古统治者规定："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尽管把十五六岁的少年，六七十岁的老人都送上前线，蒙古兵源仍然枯竭，从成吉思汗到旭烈兀西征的过程中，又强征大批北方汉人、契丹人、女真人的军士和工匠去从军远征。1235 年时，窝阔台曾有"遣回回人征江南，汉人征西域"的打算，只是因为耶律楚材的反对才作罢。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并没有利用蒙古统一的有利条件来建设蒙古社会，反而发动战争，造成大量劳动力的丧失，社会生产力停滞不前。蒙古各部统一后 15 年，即 1221 年，应成吉思汗之召到西征前线去的长春真人丘处机，途经漠北陆局河（今克鲁伦河）地区，看到当时蒙古牧民还是过着"俗无文籍，或约之以言，或刻木为契"的生活。随军远征的蒙古人往往葬身异国，留在漠北的蒙古人则过着水平极其低下的生活，这就是西征给蒙古广大牧民带来的苦痛。

中国的其他各族人民，对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的西征，是极力反对的。成吉思汗发动西征与南下灭金是同时进行的。富有抗蒙斗争传统的山东红袄军，曾多次抗击南下的蒙古军队，有力地牵制了蒙古东线的军队，间接地支援了中亚各国人民的抗蒙斗争。一些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对成吉思汗西征也是反对的。丘处机在谒见成吉思汗的往返途中，目睹了战争对人民生命财产破坏的惨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夹道横尸人掩鼻，溺溪长耳我伤情。十年万里干戈动，早晚回军复太平"。他是多么希望尽早结束这场战争啊！随成吉思汗西征的耶律楚材借出现怪兽"角端"的机会，劝成吉思汗早日班师，并说"愿承天心，以全民命。"可见，反对西征的人，当时大有人在。



元代永乐宫壁画（局部）

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的西征和东侵，是在人民群众无权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国各族人民虽然反对西征和东侵，但他们不是当权者，不是决定政策的人们，因此无法制止西征和东侵的进行。包括蒙古人民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和被侵略的亚欧各国人民一样，都是西征和东侵的受害者。

第四章　蒙古国的统治

一、定都和林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漠北诸部后，建立了蒙古国家政权，这个政权定名为大蒙古国（蒙古语也可·蒙古·兀鲁思）。当时的统治中心在漠北。蒙古人是游牧民族，没有都城建设，成吉思汗居住、议政的地方称大斡耳朵（第一宫帐），在今蒙古国克鲁伦河与臣赫尔河合流之间的多伦孛勒答山旁。随着蒙古国统治地区的扩大，各国的国主、使臣、商人、传教士源源不断地来到漠北，大斡耳朵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但成吉思汗一直忙于西征南攻，没有时间考虑都城建设。窝阔台即位后，考虑把大斡耳朵迁到更西边的地方，并筹划建设永久性的都城。1235年五月，他在鄂尔浑河上游的达兰达葩建立宫帐式行宫，在此召集忽里勒台大会，宣布宪章。由于西夏、金朝和西域诸国的相继征服，各地来到漠北朝觐的国主、官员、使臣越来越多，从各地掠夺来的金银、财富和运来的粮食也越来越多，建设统治庞大帝国的政治中心更加迫切。

大约在窝阔台建造鄂尔浑河上游的宫帐式行宫之后不久，就命宣德人刘德柔（刘敏）开始营建都城哈剌和林城。刘德柔选定鄂尔浑河上游东岸、回鹘故城南为城址，按汉族城市设计的要求加以规划，抽调山东十路、山西五路工技之军的二个总管府和西域工匠500人去漠北建造和林城。和林城的主要建筑是大汗的宫

殿——万安宫，坐落在和林城的西南部，依照汉族宫殿的式样，筑宫墙环绕，约有2里长。据法国传教士、法王路易九世的使臣卢布鲁克的记载（他在1254年到达和林）：万安宫极为富丽堂皇，宫殿的中间有一个正殿，两边各有一条走廊，正殿南面有三座门，殿内两边排列圆柱，殿北中央设一高台，是大汗御座所在，左右有两条阶梯通向御座。御座左右两侧置有平台，右边平台为诸王座位，左边平台为后妃和公主们座位。御座前为臣僚、使节们奏事或进贡时站立之处。殿南中门之前，原来是放置盛着奶和其他饮料的皮囊的地方，来自巴黎的著名工匠威廉师傅觉得不大雅观，专门为蒙哥汗制造了一棵大银树，根部有4只银狮，每只银狮嘴里有一根管子，喷出白色的马奶。银树的树干里，有4根管子通到树顶上，每根管子上有一条镀金的蛇，蛇尾盘绕在树干上。这4根管子，分别能流出葡萄酒、马奶、蜂蜜酒和米酒。银树顶上制造了一个手执喇叭的天使，需要饮料时，天使吹响喇叭，指挥仆人们把各种饮料倒入管内，流入银盆中，由侍从送到宫殿内供男女贵族们饮用。这套饮料供应系统的装置，工艺水平之高超是无与伦比的。

和林城也是蒙古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根据卢布鲁克的记载，当时和林城内除居住着蒙古人、汉人之外，还有许多信奉基督教的法国人、英国人、匈牙利人、阿速人、斡罗思人、谷儿只人、阿美尼亚人等，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城里有两个地区：一个是穆斯林区，市场就在这个区里。许多商人聚集在这里，由于宫廷就在它附近，因此世界各地来的使臣也多住在这里。另一个是汉人区，这些汉人都是工匠。和林城里还有12座属于各种不同民族的、各种不同宗教的庙宇，还有2座伊斯兰教寺院，1座基督教的教堂。城的周围环绕着土墙，共有4道门。东门出售小米和其他谷物，西门出售绵羊和山羊，南门出售牛和车辆，北门出售马匹。

窝阔台又命在万安宫周围为诸子和宗王们每人建造一座漂亮的

宫室，与万安宫连成一片，形成宏伟壮观的建筑群。城内还建造了百官们的官邸，贮放珍宝、金银和食品的库房，并设仓库官专门看守。窝阔台又命令西域工匠在和林城北70多里的迦坚茶寒湖旁建造一座宫殿，名为扫邻城，作为他春季游猎时的行宫；在和林城南30里处，建造一座图苏湖城，又名迎驾殿，作为从冬营地翁金河返回和林时途中休息之所。

蒙古国定都和林标志着蒙古政权从草创阶段逐步走向完善阶段。由于有了这个稳定的政治中心，使国家的行政管理水平大大提高，世界各地的使者、商人、传教士聚集在和林城的越来越多，进而大大促进了蒙古国的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

二、统治方式的转变

随着蒙古国统治区域的不断扩大，他们的统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契丹人耶律楚材曾起了重大的作用。



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字晋卿，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九世孙。父耶律履，在金朝官至尚书右丞。耶律楚材世居中都（今北京），3岁时父亲病故，由其母杨氏教他读书。长成后，他博览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金章宗时，他担任过开州同知；金宣宗时，他任左右司员外郎。1215年，成吉思汗攻占中都时，听说过耶律楚材的大名。1218年，召耶律楚材到漠北。成吉思汗见他身高八尺，美髯垂胸，声音洪亮，亲切地叫他“吾图撒合里”（蒙古语长髯人之意）而不喊他的姓名，命他长处左右，并随军西征。西夏人常八斤，善造大弓，受到成吉思汗的信任，看到耶律楚材不离大汗左右，常常自负

地说："当今国家用武之时，要耶律楚材这样的儒者有何用？"楚材回答他说："治弓尚须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成吉思汗听了大喜，更为器重。在西征期间，楚材为大汗占卜常常应验；后来又与道家的长春真人丘处机进行佛道辩论，占了上风，所以成吉思汗指着楚材对窝阔台说："此人是天赐给我家的，你以后要把军国事务交给他处理。"

耶律楚材真正受到重用并施展他的治国才能，是在太宗窝阔台统治时期。1227 年成吉思汗去世前已确立窝阔台为大汗继承人，但还要经过忽里勒台，由宗王们最后议决。当时拖雷以皇子监国，楚材催促拖雷早日举行仪式："此宗社大计，宜早定。"楚材又通过窝阔台登基典礼，依照中原王朝传统礼仪为蒙古国立下仪制。由于术赤已去世，察合台成了窝阔台唯一的兄长，因此楚材又对察合台说："王虽兄，位则臣也，礼当拜。王拜，则莫敢不拜。"察合台表示同意。在即位仪式上，察合台率领汗族及臣僚百官行下拜礼。从此，蒙古国有了君臣的礼仪制度。

蒙古奴隶主侵略亚欧各国和征服国内其他民族时，曾有这样的规定：凡攻城邑，只要对方进行抵抗，一旦攻克，即行屠城。不问老幼、贫富、顺逆，除工匠外，大部分屠杀，少数妇幼掠为奴隶。这种残酷的屠城政策，受到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大将速不台攻汴京，屡攻不下，蒙古军民死伤很多，他上奏窝阔台说："城攻破之日，准备全城屠杀。"耶律楚材听说后对窝阔台说："将士打了几十年仗，所要得到的是土地和人民。得地而无民，将有何用！"窝阔台犹豫不决，耶律楚材又说："手艺很巧的工匠，拥有财富的大户，都集中在汴京，假使全部杀了，能得到些什么呢？"窝阔台点头称是，下令速不台："除了金朝皇族外，其余一概勿杀。"当时逃难住在汴京的人有 147 万之多，他们都险些遭到屠杀。从此以后，屠城的事渐渐减少了。像忽必烈征大理攻打大理城时，大理国权臣高祥杀蒙古使臣，忽必烈大怒，要屠城。张文谦、刘秉忠、姚枢等汉族地主知识分子竭力劝阻，忽必烈听从他们的劝告，

并约法三章：今后大家都不许随便杀人。后来在灭宋战争中，忽必烈曾三令五申，诸将不得妄杀。

蒙古向外扩张后，实行“裂土分民”的分封制。成吉思汗的儿子们，分封在西部，诸弟封在东边，各部贵族也有封地。窝阔台即位后，曾于1236年派大断事官失吉·忽秃忽检括中原户口，得110万余户。失吉·忽秃忽按照蒙古传统，把76万户分给诸王、贵族，这种户称为“位下”或“投下户”；其余属各级政府。耶律楚材竭力反对，说“裂土分民会造成许多矛盾，可以多给这些诸王功臣一些金帛，不能把大权都交给他们。”窝阔台说：“我已允许了该怎么办?”耶律楚材说：“那就得由朝廷设置官吏来征收分给他们州县的赋税，年终分一点金帛给他们，切勿让他们自行征税。”于是定下了“五户丝”制，给诸王一些财物，而把征税的权利夺了过来（下节具体介绍）。

在行政制度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蒙古统一后，以万户、千户、百户等统率军队，没有官吏等设置。成吉思汗时，攻下城邑后，连置兵戍守也没有。后来占领中原地区，北方汉族地主和金朝官吏纷纷投降，也只是用金朝原来的官职像行省、元帅等封给他们。耶律楚材注意到这个问题，在《便宜一十八事》中提出：“地方置官吏统治老百姓，另设万户总管军队，使军政互相遏制，防止独断独行。”窝阔台采纳了。又设立中书省，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女真人粘合重山为右丞相、蒙古克烈部人镇海为左丞相。但这时的中书省并不是全国最高行政机构，它只是大汗侍从官中主管文书的必阇赤（汉语书史之意）班子。蒙古国最高行政长官是大断事官（蒙古语也可·札鲁忽赤），当时担任此职的仍是成吉思汗的义弟失吉·忽秃忽。

窝阔台在耶律楚材等人的劝说下，注意尊重儒学，选拔儒士。1232年，蒙古军进攻汴京，耶律楚材请求派人入城，找到孔子51代孙孔元措，奏请袭封为衍圣公。攻破汴京后，招收金朝的太常礼乐生，赡养流散在各地的儒生，召名儒梁陟、王万庆、赵著等，让

他们将儒家经典加以注释，到东宫进讲，又让百官大臣的子弟，读儒家经书，使之懂得孔孟之道。1235年，姚枢奉窝阔台之命，到中原各地招募儒士，他在阔端太子的俘虏营中找到南方大儒赵复，送到燕京（今北京），赵复以其所记程朱理学诸经注，开办太极书院讲学，使程朱理学得以在北方传播。1236年，楚材在燕京设编修所，在平阳设经籍所，编纂出版经史。1238年，窝阔台采纳耶律楚材的建议，通过考试从儒生中选拔官吏，确定儒户，结果得儒生4 030人，这些中试的儒生不少原是战俘、驱口，他们中试后可以免去赋税，优秀者可获得一官半职。这次考试，史称“戊戌选试”。

蒙古国建立后并无完整的法律，靠“札撒黑”做习惯法。随着统治地区的扩大和情况的不断变化，州郡官吏贪暴之风，富豪任意兼并土地，地痞流氓杀人越货等现象十分严重。在这种情况下，耶律楚材提出了《便宜一十八事》作为临时法律，对地方官吏擅自科差、商人侵吞官物、蒙古色目贵族不纳税收、贪污官物、死刑判决等作出了具体规定。这些规定对于抑制官吏枉法、豪强兼并，以及安定社会秩序是有作用的。

三、赋税制度的制定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经说过：“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蒙古向外扩张，进入先进的中原地区以后，正是依照这个历史规律，向前发展的。

蒙古开始向外扩张时，目的是为了掠夺。因此，每到一地后，总是把财产掠夺一空，把掳来的人民、工匠充作奴隶，然后按功大

小分赐给诸王贵族、将领，而大汗则从中各取得一份。这时，他们简直不知道有赋税这回事。所以这种以掠夺为主的剥削方式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是极其严重的。耕地荒芜，人口死亡，王公贵族占地为牧场的情景，比比皆是。这种状况对蒙古政权的巩固来说是很不利的。窝阔台即位后注意到这种抢掠对社会生产破坏的严重性，于是下令对已征服地区不许肆行抢掠和破坏。但随意向人民征取财物、索要贡献却是普遍的事，诸王、将领、官吏每到一地总要强迫人民送“撒花”（波斯语，意为礼物），而且用这种方式搜刮来的财物不必交给政府。至于如何能使农民安于农业生产，使国家有稳定的财政收入，则有着不同的见解。大臣别迭提出：“汉人对国家毫无用处，不如把他们统统赶走，使田地上长起繁茂的绿草，让我们去放牧。”耶律楚材却对窝阔台说：“大汗你即将要大举南伐金朝，少不了要一大笔资金作军需之用，如果定下中原的地税、商税，加上盐、酒、铁冶、土产等项收入，每年可得银 50 万两，帛 8 万匹，粟 40 余万石，足足可以供应军需，怎么能说汉人对国家没有用呢?”窝阔台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对耶律楚材说：“那就让你代我去试着办吧!”这样，蒙古国终于设立了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不多久，十路征收课税使把征收到的金帛和记录仓库收藏谷物等的簿籍交给窝阔台。窝阔台十分高兴地对耶律楚材说：“你整天不离我左右，却能使国家财政充足，真了不起!”这个故事雄辩地说明了：在蒙古政权统治集团内部对于用什么方法来剥削新统治区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分歧，一部分代表蒙古守旧贵族利益的人，主张把旧有的掠夺方式或蒙古的游牧经济扩大到中原地区；另一部分代表中原地


元人狩猎图

区地主阶级利益的人，主张采用中原地区原有的封建统治方式。蒙古最高统治集团通过实践，认为后者比前者更为有利，终于采用了封建剥削制度。

耶律楚材设立十路课税使是一种临时的收税措施。当时，在中原的燕京、宣德、西京、太原、平阳、真定、东平、北京、平州、济南等十路设征收税课所，每路置正副课税使 2 员，专掌钱谷，不受地方官管辖。根据 1230 年征税的结果其效益是十分明显的，当时的办法是汉民以户为单位负担地税，标准是每户纳粟 2 石（后来增加到 4 石），另加户调。

由于耶律楚材在中原征税取得成功，窝阔台为了扩大征税地区，保证国家有更多的财政收入，迫切需要掌握更多的中原汉地民户的数目。1233 年，窝阔台即开始派人检括中原民户，得到 73 万多户的数字。1235 年灭亡金朝后，又派大断事官失吉·忽秃忽负责大规模括户。1236 年，失吉·忽秃忽完成户口的检括，总共 110 余万户。

如前所述，这次括户的结果，失吉·忽秃忽在窝阔台的批准下，实行“裂土分民”的办法。耶律楚材没有权力改变这种状况，不得不建议实行“五户丝制”，其具体办法是：每 2 户出丝 1 斤，随路输于官府；每 5 户出丝 1 斤，随路输于得到封地的诸王贵族。这种办法虽不能阻止分封制度，但对受封的诸王贵族是一种限制，使他们不能任意搜括，同时也保证了政府对民户的征税，使国库有稳定的收入。因此，“五户税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到 1236 年后，在耶律楚材等人的努力下，中原地区的税制基本上确定下来：

地税——上田每亩 3 升，中田每亩 2 升半，下田 2 升，水田 5 升。

丁税——验民户成丁之数，每丁每年缴纳粟 1 石，驱丁（奴婢）5 升，新户丁驱各半，老幼不纳税。

凡田多人少者按地税计；凡田少人多者按丁税计。

户税——以户为单位缴纳科差，有丝料、包银两种。丝料之法始于1236年，其标准为：每2户出丝1斤缴给官府，每5户出1斤缴给受封之主。包银之法始于1251年，定每户出包银6两，后因许多汉官认为太重，减为4两，2两输银，2两折收丝绢等物。

此外，还有许多商税、杂税。大体上商税征三十分之一。

总之，蒙古国时期虽然剥削方式和统治方式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新的制度还处于草创阶段，不但很不成熟，而且还很混乱。这种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是生产关系逐步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这种转变，表明了蒙古国正由奴隶制急遽向封建制过渡，到忽必烈登上大汗位后，这种过渡最后完成了。

四、奥都剌合蛮擅权

太宗窝阔台是从统治漠北游牧社会扩大到中原发达的农业社会、从奴隶制统治向封建制统治过渡时期的一位大汗。《元史》的作者说他"有宽弘之量，忠恕之心"，评价大体是恰当的。窝阔台晚年时总结他的功过时说："我自从继承父亲的大位以来，曾做了四件事：第一，平定了全国；第二，为了便利使臣来往，设立了驿站；第三，在没有水的地方掘井，使百姓获得丰富的水草；第四，在各城池内设置探马赤军镇守，使百姓平安居住。但是我又做坏了四件事：第一，既然身为大汗，竟沉湎于嗜酒；第二，轻信了妇人的言语，将斡赤斤叔叔分地中部众的女子纳入宫中，赏赐给诸臣；第三，将忠义的宿卫大臣朵豁勒忽暗害了；第四，为了不让天生的野兽跑到兄弟们的封地中去，建筑围墙阻挡，以致兄弟们发出怨言。"窝阔台能够检讨自己的所作所为，应当肯定他有"宽弘之心"。

然而，窝阔台并没有认识到晚年重用奥都剌合蛮给国家带来的重大损害，使蒙古国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窝阔台虽自责嗜酒误事，但丝毫没有收敛。耶律楚材屡次进

谏，还是不听。一次，耶律楚材拿着被酒腐蚀的铁制酒槽对窝阔台说："发酵的酒曲能腐蚀物体，铁槽尚且如此，况五脏乎！"窝阔台虽很受感动，但终究不能控制自己。到晚年时嗜酒更加厉害，而朝政也日益懈怠，大权逐渐被皇后乃马贞氏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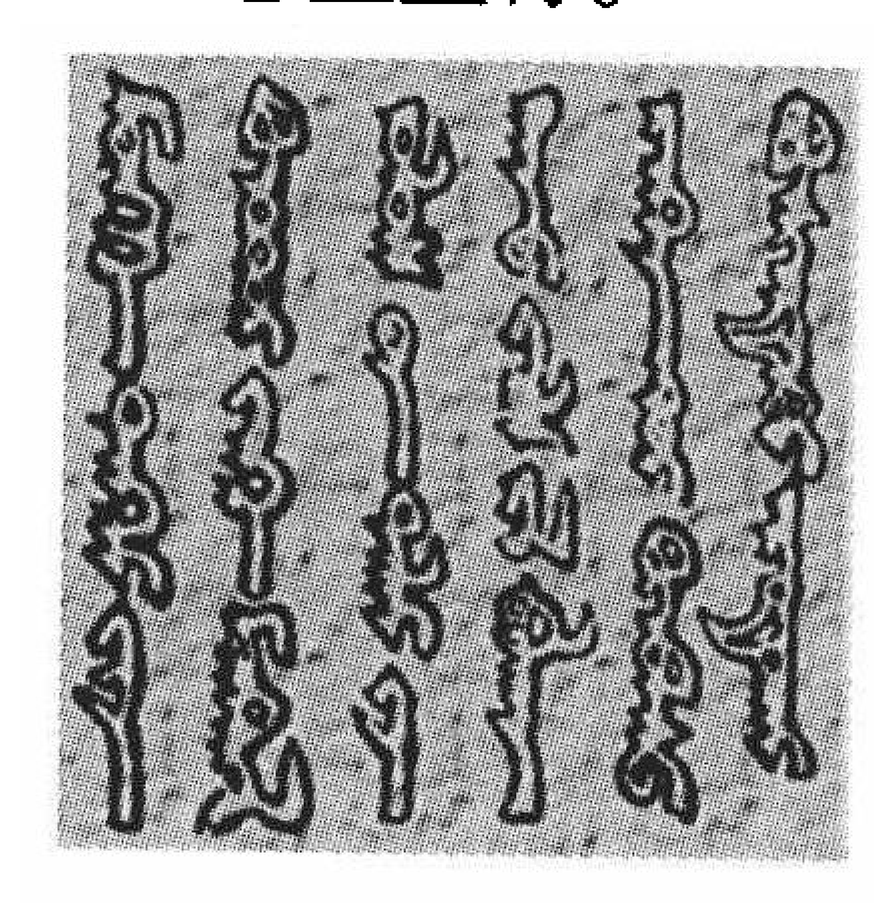
乃马贞氏宠信一个名叫法迪玛的女人。法迪玛是麦什特（今属伊朗）人，1222 年成吉思汗西征时被拖雷军队所俘，掳掠到漠北，后来在和林的市场上充当中间人。她阴险狡诈，能说善辩，诡计多端。通过不断接近乃马贞氏的办法，受到宠信。她成了乃马贞氏重要的参谋，重要机密的知情人，重大决策的参与者，甚至可以任意发号施令。许多贵人、大臣走她的门路求得保护，特别是呼罗珊（今伊朗东部阿姆河以南、兴都库什山脉以北地区）的贵人和有"赛吏"（先知穆罕默德后裔）称号的贵族。这时，有一位叫安天合的回回译史（从事阿拉伯文、波斯文翻译的官员）因未被耶律楚材重用，改投镇海的门下，并百般讨好镇海。他引荐回回商人奥都剌合蛮给镇海。因为奥都剌合蛮是法迪玛的同乡同族人，所以很快受到法迪玛的提拔和重用。

奥都剌合蛮一开始就提出十分诱人的"扑买"中原银课 4.4 万锭的方案，这比原课额高出一倍。窝阔台大为赞赏，于 1239 年同意他扑买中原银课。又于 1240 年正月任命奥都剌合蛮为提领诸路课税所长官，使之控制蒙古国财政大权。所谓"扑买"就是由扑买者承包某一地区或某一项目的赋税。承包者用提高赋税、加重人民负担的办法大幅度增加财政收入，除缴给政府那部分承包额外，其余全归己有。早在金朝时就实行过扑买。蒙古灭金后，许多人也提出要求扑买权，如燕京刘忽笃忽，阴结权贵，以银 50 万两扑买天下差发；回回人涉猎发丁以银 25 万两扑买天下系官廊房地基、水利、猪鸡；刘廷玉以银 5 万两扑买燕京酒课；回鹘（人名）以银 10 万两扑买天下盐课；又有要求扑买天下河泊桥梁渡口者。这些扑买要求都因当时握有某些实权的耶律楚材的反对而未能实现。耶律楚材说："此皆奸人欺下罔上，为害甚大。"

但是，奥都剌合蛮却不是那些扑买者所能比拟的。他是法迪玛提拔的，扑买课税是得到镇海首肯的，而最大的靠山是乃马贞皇后。耶律楚材反复争议，皆因势单力薄，无法阻止，叹息道：“扑买之利既兴，必有追随其后者。民之穷困，将自此始。”

奥都剌合蛮上台后，一种叫“斡脱”的高利贷也兴盛起来。“斡脱”是突厥语的音译，本意为同僚、同伴。回回商人从事长途贩运贸易，往返于草原和定居城镇之间，所以往往结成商帮，结队而行，故自称“斡脱”。回回商人投靠蒙古后，蒙古上自大汗，下至诸王、公主、后妃等将掠夺来的银子交给他们去经商或放高利贷，收取利息。回回商人发放的高利贷就叫“斡脱钱”，其年息高达百分之百，次年转息为本，又生利息，1 锭银 10 年后本利达到 1 024锭。这种高利贷又叫“羊羔儿息”。借贷者除一般百姓外，还有地方官府等。许多人因借了“斡脱钱”倾家荡产，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窝阔台感到事态严重，下令以官物代为偿还，仅 1240 年一年官府就代偿还 7.6 万锭，又下令借贷斡脱钱时间长久的，不得转息为本。但终究制止不了斡脱钱的猖獗，而且愈益盛行。

1241 年，窝阔台从西域把牙剌瓦赤召来，命为燕京行省大断事官，接替年迈的失吉·忽秃忽。牙剌瓦赤、耶律楚材、镇海三大臣联手是可以钳制奥都剌合蛮的，但窝阔台对奥都剌合蛮仍很信任，这年十一月，窝阔台外出打猎，与奥都剌合蛮饮酒至深夜，次日晨病逝。窝阔台死后，乃马贞氏称制，权力牢牢地控制在奥都剌合蛮——法迪玛——乃马贞氏手中。乃马贞氏对几个大臣一直怀恨在心，一旦权力在手，立即施加报复。她派人去抓捕牙剌瓦赤、镇海，两人机智地逃到凉州（今甘肃武威）阔端太子处去避难了。



元定宗印文

奥都剌合蛮攫取权力后，朝中官员多趋炎附势，但他仍很惧怕耶律楚材，曾用白银 5 万两贿赂耶律楚材，遭到拒绝。乃马贞氏称

制后，奥都剌合蛮更加肆无忌惮，皇后给他盖上御宝的空白纸，让他随意填写，耶律楚材坚决反对。皇后下令："令史若不书填，则断其手！"耶律楚材宁死不屈，皇后也无可奈何。不久，楚材忧郁而死，乃马贞氏、奥都剌合蛮这才拔除了眼中钉。

1246 年，定宗贵由即位。法迪玛等阴谋毒害阔端太子等事暴露，贵由将法迪玛、奥都剌合蛮处死，重新启用牙剌瓦赤、镇海。但贵由挟私仇，兴兵征拔都，造成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更加尖锐。贵由死于途中，其妻斡兀立海迷失称制，当时政局混乱，横征暴敛，内外离心，民不聊生。1251 年，在拔都支持下，拖雷的长子蒙哥继为大汗。蒙哥借口窝阔台和察合台两系有人企图政变，先后处死两系诸王、臣属 87 人，镇海亦以贵由党被处死。但蒙哥很快结束了内部纷争，迅速整饬朝政，派兵出征，不仅挽救了蒙古国的统治危机，还使它不断巩固和发展。

第五章　元朝的建立

一、忽必烈夺取汗位

1259 年七月，蒙哥在合州钓鱼城病死后，以阿里不哥为代表的守旧派和以忽必烈为代表的“汉法”派，都积极活动起来，准备夺取汗位。

阿里不哥是拖雷的幼子。蒙哥即汗位后，命阿里不哥留守都城和林，统帅漠北的蒙古军。阿里不哥长期在蒙古本土，与外界接触不多，特别对汉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了解甚少。后来，以他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个墨守蒙古成规的保守集团，他们主张维持蒙古原来的统治方式，反对采用中原地区原有的封建统治方式。



刘秉忠

忽必烈是拖雷第二个儿子，他很早就结识了一批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像信佛崇儒的刘秉忠，熟读孔孟之道的张文谦、王鹗等，都是忽必烈十分信任的。他们把历代封建统治的经验，灌输给忽必烈。蒙哥即位后，以漠南汉地委托给忽必烈来管理，从此忽必烈与各族地主阶级进一步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他一方面继续网罗人才，像杨惟中、姚枢、郝经、王文统等汉族地主知识分子，都纷纷前来投靠。这些人都是忽必烈的谋士，对忽必烈影响很大。刘秉忠对忽必烈说：“今天谁能重用士大夫，又能推行

中国原有的治国之道，就能当中国的皇帝！”这对抱有统治全中国愿望的忽必烈无疑是极大的启发，因此，像官吏的任用、对南宋的作战方略、经济政策、屯田措施等事，甚至后来的夺取汗位，建立元朝，几乎都出自这些人的策划。除了汉族地主分子外，忽必烈对其他各族上层人物也是加以争取的。像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畏兀儿人廉希宪、西夏人高智耀等接受汉文化很深的一些人也受到忽必烈的重用。另一方面，忽必烈为了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采取拉拢、利用北方地主武装的方针。早在蒙古灭金时，北方地主武装头目董俊、严实、史天倪、张柔等就投靠了蒙古。忽必烈总管漠南汉地后，继续对他们加以重用，像董俊的儿子董文炳，在忽必烈进兵西南和灭宋战争中就非常卖力；史天倪的弟弟史天泽在平定阿里不哥和李璮的战斗中出力很多；张柔和他的儿子张弘范也是忽必烈十分信用的，最后灭亡南宋、逼迫赵昺投水而死的就是张弘范；红袄军头目李全的儿子李璮，忽必烈也给他很大的权力，封他为江淮大都督，忽必烈十分信用的王文统，就是李璮的岳丈。忽必烈联合汉族和其他各族地主阶级的目的，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学会统治汉地的方法。因此，在忽必烈夺取汗位之前的十多年间，他已跳出了蒙古“黄金家族”的小圈子，逐渐成为懂得汉法、决心推行汉法的新的封建统治者。

忽必烈不仅为自己夺取政权奠定了政治基础，而且还奠定了物质基础。在他主持漠南汉地后，十分注意招抚流亡的人民，大搞屯田积粮，并采取整顿财政等措施。早在1252年，忽必烈就已在河南的唐、邓等州实行屯田，后来又在陕西凤翔等地屯田，这样就使他掌握了大量军粮。忽必烈又立交钞提举司，印发纸钞。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使忽必烈完全控制了蒙古国的财政大权。

1256年三月，忽必烈命刘秉忠在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北）东北、滦河北岸的龙岗，营建宫室、房屋，3年后建成，称开平府。在这里聚集了忽必烈的一批重要谋士，成为忽必烈集团的根据地。

蒙哥死后，阿里不哥和他的支持者立即采取夺位措施。他命令脱里赤为断事官，占据燕京，号令各方面；又命令各地军队听从调度，由阿兰答儿纠集漠北各地军队，脱里赤纠集漠南各地军队，形成对开平的包围势态。阿里不哥企图先发制人，迫使忽必烈就范。

忽必烈这时还在围攻鄂州，蒙哥死讯传来后，他召集诸将、诸谋士研究蒙哥死后的形势和对付阿里不哥的策略。这时郝经提出了如下建议：一面遣军去迎接蒙哥的灵车，接收大汗的宝玺，一面赶快与南宋贾似道议和，签订密约，迅速撤军，并派轻骑兵赶到燕京，防止阿里不哥的势力南下。忽必烈采纳了此计。1260年三月，忽必烈抵达开平，诸王合丹、阿只吉等率西道诸王，塔察儿等率东道诸王，会集开平。他们都是忽必烈的支持者。忽必烈废弃了贵族选汗的旧制，宣布即位。并定当年为中统元年，开始建元纪岁。

同年四月，阿里不哥也在和林召开忽里勒台，宣布为大汗。支持他的除阿兰答儿、脱里赤等外，还有窝阔台后王阿速带、玉龙答失、昔里吉，察合台后王阿鲁忽，旭烈兀子出木哈赤等。

阿里不哥和忽必烈双方为争夺地盘开始了第一个回合的争斗。阿里不哥命霍鲁海、刘太平等去陕、甘地区任职，忽必烈则命廉希宪为京兆等路宣抚使。双方发生冲突，廉希宪擒霍鲁海，杀刘太平等，忽必烈控制了陕甘地区。阿里不哥又派遣阿兰答儿南下联合浑都海作乱。但两人均被忽必烈军队所杀。

1260年冬，忽必烈决定亲征和林。阿里不哥闻讯后不敢抵抗，逃至谦谦州（今叶尼塞河上游南），忽必烈占领和林，命亦孙哥驻守，自回开平。1261年秋，阿里不哥至和林，伪装愿意归顺，却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占领和林，并南下骚扰，被忽必烈击败。由于阿里不哥多次战败，支持他的诸王纷纷向忽必烈投降，加上连年饥荒，阿里不哥不得不于1264年向忽必烈投降。经过4年的战争，阿里不哥的分裂势力终于被消灭，漠北和中原地区重新恢复统一。忽必烈战败阿里不哥后，取消和林为蒙古国的都城，改设宣慰司都

元帅府，后来改为和林路，成为岭北行省的治所。

忽必烈夺取汗位的胜利，从本质上来说是蒙古统治集团内部“汉法”派战胜了守旧派，这对于蒙古国最后完成封建化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同时也说明了历史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像阿里不哥那样坚持维护旧的统治方式，失败是注定的；而忽必烈能够顺应历史发展，适应汉族地区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采用原有的封建统治方式，因而在历史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二、中统建元和建立元朝

忽必烈夺取政权后，决心沿着“汉法”的道路继续前进。1260 年五月。忽必烈宣布用“中统”年号，这是忽必烈采用“汉法”的重要标志。因为在这以前，蒙古国从来没有用过年号，成吉思汗时，纪年用十二生肖，如鼠儿年、羊儿年等等，窝阔台以后虽然进入中原地区，也没有用年号。忽必烈一上台就开始用中统作为年号，这是忽必烈按照中原封建王朝的规格改造蒙古国所跨出的第一步。1263 年（中统四年），忽必烈以开平为上都；次年，以燕京为中都（后改为大都），政治中心移至漠南汉地。


忽必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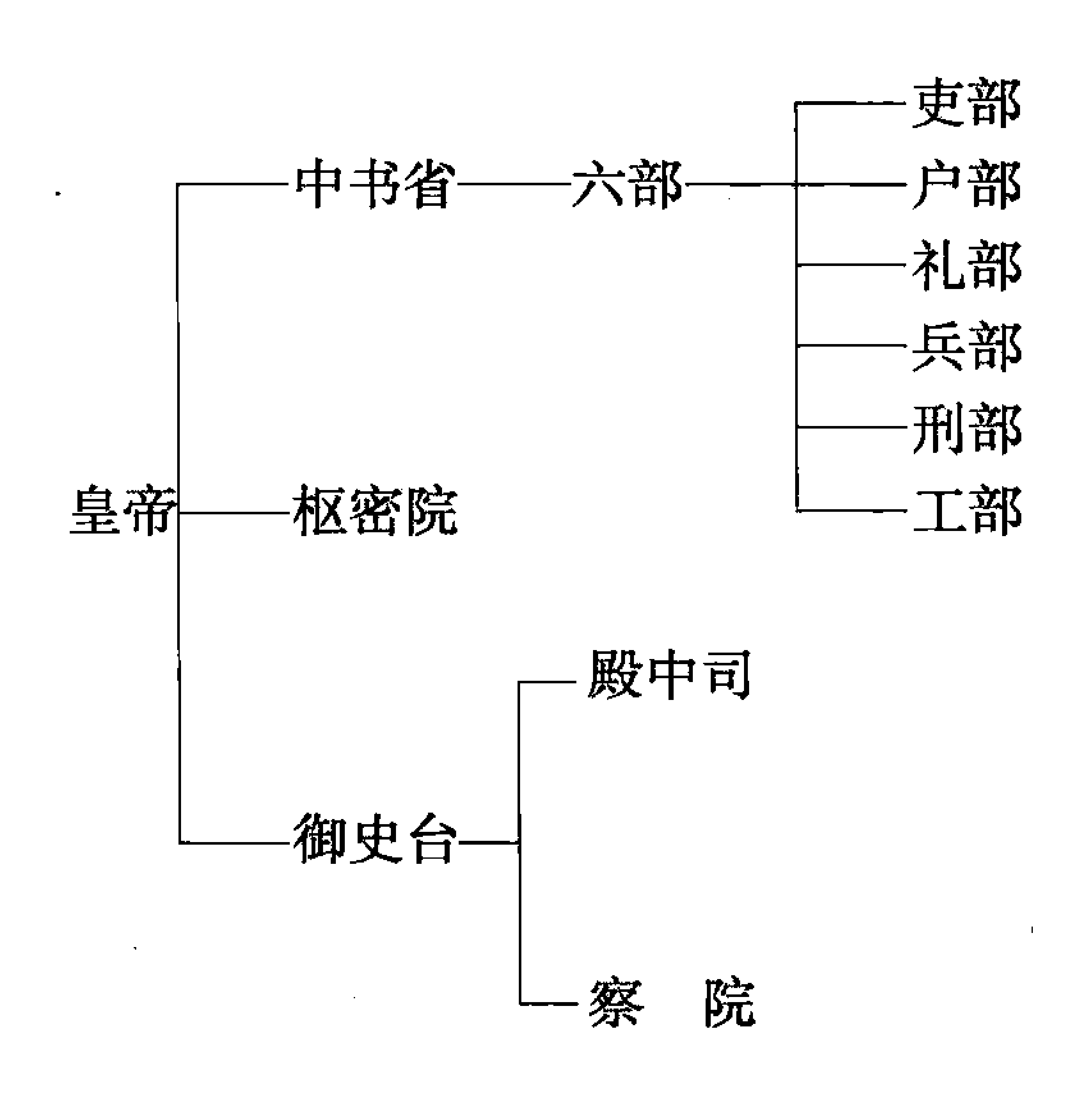
1271 年（至元八年）十一月，在进攻南宋取得了巨大胜利之后，忽必烈又采取了一个重大的措施，公开废弃“蒙古”国号，按照《易经》中“乾元”之意，改国号为“大元”。他在《建国号诏》中说：“我太祖圣武皇帝（指成吉思汗），掌握了天符而崛起于北方，以其神武而成帝业，他的威名震天动地，帝国范围之广，自古以来未曾有过。最近，耆老们纷纷奏章申请说：‘大

业既成，宜早定鸿名。'我想这从制度上来说是当然的。故决定建国号'大元'，这是取《易经》'乾元'的意思。"

忽必烈在这个诏书里进一步申述了他建立的元朝，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继承，因此，元朝的建立，标志着蒙古政权已从一个地区性政权转变为采用汉族传统封建统治方式的全国性封建政权，标志着蒙汉各族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最后确立。

元朝建立后，各种制度开始逐步完备。在行政制度方面，忽必烈根据汉族地主知识分子的建议，多半采用金朝的制度；在军事制度方面，则沿袭蒙古国的旧制加以调整、发展。

元代中央一级的行政机构主要由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组成的：



中书省是中央最高行政机构，窝阔台时采用过这个名称，蒙哥时废。忽必烈即位后，根据刘秉忠等人建议，于中统二年立中书省，设中书令、右丞相、左丞相、平章政事、右丞、左丞、参知政

事等职。因蒙古人以右为上，故右丞相高于左丞相，右丞高于左丞。忽必烈规定皇太子担任中书省的首脑——中书令。但元朝自忽必烈以后皇太子大都年幼，故中书令等于虚设，右、左丞相才是中书省的实际首脑。自中书令以下至参知政事都称为丞相。担任丞相职务的人来自各族上层分子，可见忽必烈即位后一直注意到联合各族地主阶级。中书省之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书省的设立对于加强中央集权有很大作用。枢密院是掌兵权的。设有院使（由皇太子兼任）、副使、佥书枢密院事等职，以后又在副使之上设知院、同知，佥枢之下设同佥枢、院判，名额不定。四宿卫（怯薛）各出代表 1 名、中书省派平章政事 2 人参与枢密院议事。御史台是最高司法机构，最高长官为御史大夫，其属下有殿中司和察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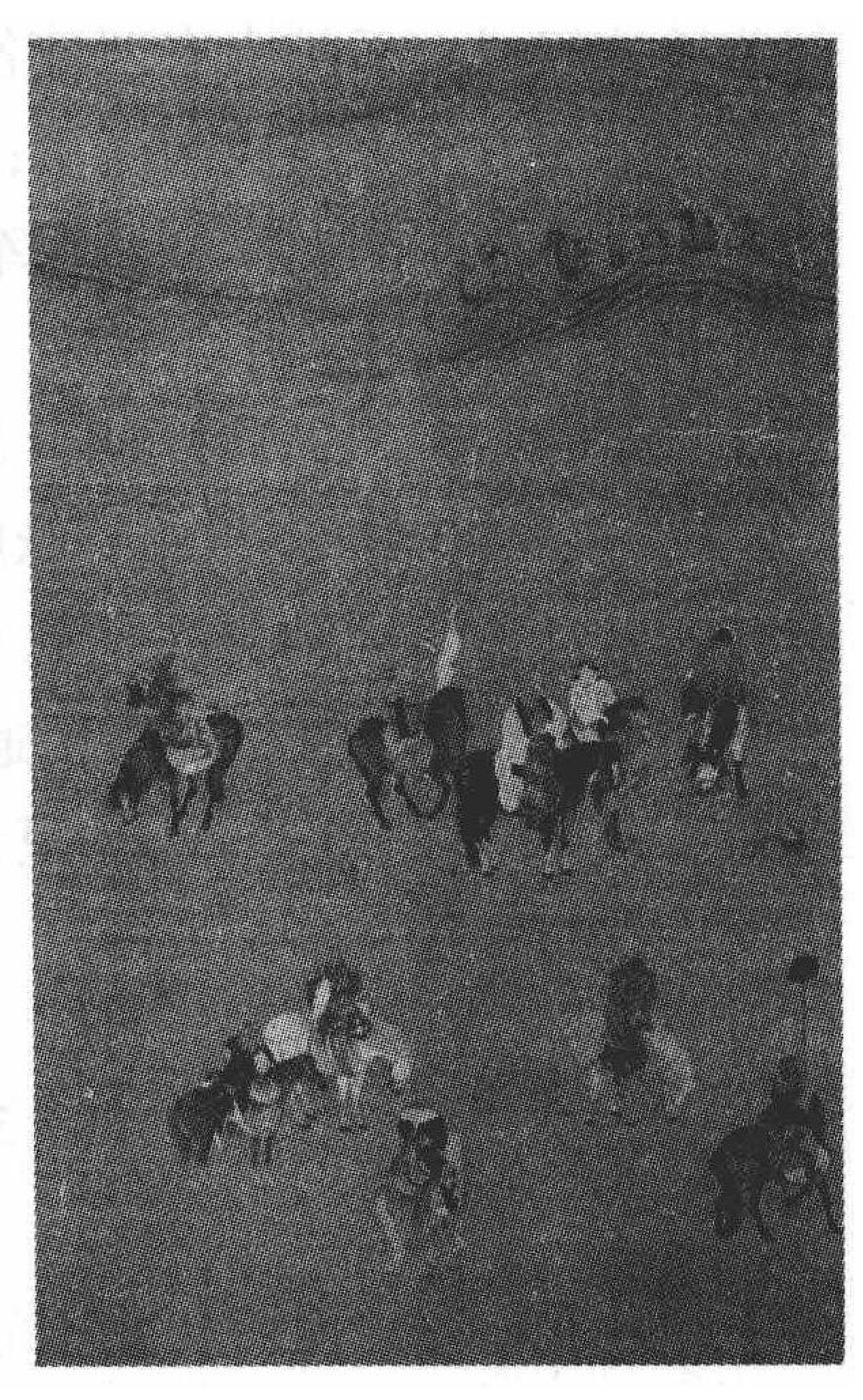
此外，还有大司农司（掌农桑水利）、翰林兼国史院（掌制诰文字、纂修国史）、集贤院（掌提调学校、征集人才）、宣政院（掌宗教及吐蕃事务）、宣徽院（掌诸王等供应）、太史院（掌天文、历数）、匠作院（掌工艺）、通政院（掌驿传）等，都是中央的专门机构。

地方最高行政机构是行中书省，简称“行省”。1260 年，忽必烈曾置十路宣抚司作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统归中书省领导。宣抚司根据中书省所颁条令，审理狱讼，整顿赋役，省并州县等。之后，忽必烈陆续在全国设行中书省，作为地方一级行政机构。当时，除中书省直接管辖山东、山西、河北等地，称为“腹里”，宣政院管辖吐蕃以及诸王封地外，全国共设 10 个行省：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行省的最高长官一般是平章政事，另有右左丞、参知政事等。行省之下置路、府、州、县。吐蕃地方置万户府。路有总管，府有知府或府尹，州有州尹，县有县尹，各路、府、州、县都设有由蒙古色目人担任的达鲁花赤。枢密院和御史台也各有自己的相应的地方机构。行枢密院简称“行院”，是专为征伐而设于某处的，虽有时也掌管民政，

但主要目的是用兵或镇戍地方之用。诸路万户府是地方路一级的管军机构，下有千户所、百户所，均属行院或行省管辖。行御史台简称“行台”，忽必烈时曾设江南行台和陕西行台。另有提刑按察司，分属于御史台和行御史台管辖，其职责是监督、纠劾地方官等事宜，1291 年（至元二十八年）改称肃政廉访司。关汉卿的元杂剧《窦娥冤》里窦娥的父亲窦天章，他的官职就是肃政廉访使。

元代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特别是行省制度的建立，不仅奠定了有元一代的行政制度，而且使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制达到了新的规模，做到了“都省（中书省）握天下之机，十省（行省）分天下之治”，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元朝的疆域十分辽阔，所谓“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因此 10 个行省中就有 4 个行省涉及到边远地区。例如岭北行省的治所设在和林，称和宁路，管辖范围除了蒙古高原外，北边一直到北冰洋；东北地区由辽阳行省管辖，设开元路（今吉林农安），管辖黑龙江中游，设水达达路，管辖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流域，又在黑龙江口奴尔干地方设征东元帅府，管理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元朝又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澎湖和台湾，上级为江浙行省泉州路同安县。西藏地区虽然没有设立行省，由中央的宣政院对它直接管辖，其下设立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其下又设若干万户府，所以管理方式与行省制度相仿。行省制度使这些边远地区和中原地区的联系大大加强了，它有利于巩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对



元世祖出猎图

明、清的政治制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元以后，"行省"这个名称一直沿用了下来（明代虽改称布政使司，但口语仍相沿不改）。元代行省的划分，也初步奠定了今天中国的行省规模。

元代的军事制度，是在蒙古政权军事制度的基础上日趋完备的。

宿卫制——成吉思汗时以木华黎、赤老温、博尔忽、博尔术四功臣领"怯薛歹"，成为自己的宿卫军，成吉思汗以后各朝仍用"四杰"的子孙掌宿卫军。忽必烈即位后，设左、右、前、后、中五卫，以后又陆续增设若干卫，均为侍卫亲军；又增设大朝会用的围宿军、大祭祀用的仪仗军、巡幸护驾的扈从军、守卫皇帝财富的看守军、夜间巡逻的巡逻军、保护漕运的镇遏军，统统属于宿卫军。

镇戍军——是宿卫以外的镇戍全国各地的军队，由枢密院和行枢密院调遣。镇戍军分五类：由蒙古人组成的蒙古军；初由蒙古各部落挑选组成，后扩大有西域各族人组成的、战时充当先锋的探马赤军；由北方汉人组成的汉军；由南方汉人组成的新附军；各地方的乡军：如辽东的乣军、女真军、高丽军，云南的寸白军，福建的畲（shē）军等。

驿站——元朝疆域辽阔，为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全国设驿站1 383处，真是"星罗棋布，脉胳贯通，朝令夕至，声闻毕达"。驿站分陆站、水站两种，陆站用马、牛、驴、狗和引车，水站用船。内地驿站由兵部统领，北方由通政院统领。与驿站相辅而行的有急递铺，每10里、15里或20里设一急递铺，其主要任务是传送朝廷及州县的紧急文书。

三、平定叛乱

忽必烈夺取汗位后，并不等于万事大吉了。是统一还是分裂？是行"汉法"还是反"汉法"？在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长期的争

斗。这种争斗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出现了武装叛乱。对这些叛乱势力是坚决镇压还是妥协投降？这是摆在忽必烈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

忽必烈即位后，除了前面讲过的阿里不哥武装叛乱外，较大的叛乱是李璮之叛和海都、乃颜之乱。

李璮之叛 李璮是金末红袄军领袖李全的儿子。红袄军起义最早爆发于1211年，他们在杨安儿、刘二祖等领导下曾与金朝统治者进行过英勇斗争，后来杨安儿、刘二祖等先后牺牲，余部由杨安儿妹杨妙真和李全领导，两人结合后队伍逐渐壮大。1218年，李全降宋，他一面火并其他红袄军，一面在金宋之间要挟，博取高官厚禄。1226年，李全投降蒙古，换取了“山东淮南行省”的官职。1230年十月，李全发兵突然袭击南宋的扬州，次年败死。杨妙真逃回山东，子李璮承袭益都行省职。

从那以后，李璮在山东擅权达30余年之久。他继承其父的衣钵，或假名攻宋，向蒙古要钱要粮要官，或联宋反蒙，发动叛乱。其真正目的是要把山东变成他割据一方的独立王国。

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不久，加封李璮为江淮大都督。李璮乘机谎报敌情，大修益都城堑，骗取赐银、军饷、军械。他的岳丈王文统这时已当上了中书平章政事，他们内外勾结，互为表里，选择时机，准备叛乱。

1262年（中统三年）二月，作为朝廷质子的李璮之子李彦简溜回山东传递消息，这时阿里不哥的叛乱尚未平定，李璮以为时机已到，遂攻占益都、济南，发动武装叛乱。他将涟（今江苏涟水）、海（今江苏连云港）等三州献给南宋，南宋封他为保信宁武军节度使。其实，这是李璮害怕蒙宋联合夹攻所要的花招。因为在这以前，李璮攻宋都是不遗余力的，这次叛乱又未事先与南宋联系。为了壮大叛乱力量，李璮四处联络汉族地主武装，但几乎无人响应，山东人民也纷纷逃避，叛乱势力十分孤立。

忽必烈得知李璮叛乱后，立即杀了王文统，命诸王合必赤总督

各路军马，进攻李璮，来自河南、河北、山东各地的蒙古军、汉军围攻济南，困守在济南的李璮无计可施，被迫投大明湖自杀，由于水浅未死。后被俘杀。1264 年（至元元年），李璮余党毛璋再次发动叛乱，结果兵败被杀。

忽必烈迅速平定李璮叛乱，对于巩固刚夺取的政权、对于巩固蒙汉各族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对于避免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具有很大作用。李璮之死还有杀鸡儆猴的作用，投降蒙古拥有武装的北方汉族军阀，从此更加死心塌地为新王朝服务了。

海都、乃颜之乱 中统建元和平定阿里不哥后，守旧的蒙古贵族对忽必烈推行“汉法”依然强烈反对。西北藩王遣使到朝廷来，气势汹汹地责问忽必烈：“蒙古风俗制度与汉法素不相同，现在你竟留居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全都遵用汉法，到底是什么原因?”因此，守旧与推行汉法的矛盾，在蒙古统治集团内部依旧很尖锐。

阿里不哥投降后，守旧的藩王以争夺汗位的名义，继续发动叛乱。其中以窝阔台的孙子海都的势力最大，叛乱的时间也最长。

海都以其父合失未能承袭汗位，即自己未能袭汗位为由，一直心怀不满，但苦于兵力不足，只好等待时机。当阿里不哥在和林称大汗并发动叛乱时，他竭力支持阿里不哥。阿里不哥兵败投降后，海都即返还其在叶密立（今新疆额敏东南）的封地，勾结术赤后裔诸王，占有窝阔台汗国封地，组织叛军，时时企图南下。忽必烈为了阻止海都势力的扩张，册封八剌为察合台汗国之汗，以争取察合台汗国服从中央夹击海都。察合台汗国军队在锡尔河南击败海都，海都又求助术赤后王忙哥帖木儿，击败八剌。后来，海都请窝阔台孙乞卜察克调解，双方结盟，海都势力反而伸展到察合台汗国境内。八剌死后，海都于 1272 年（至元九年）立八剌子笃哇为汗。海都与笃哇勾结在一起，在西北地区不断进行骚扰。

1275 年（至元十二年），忽必烈命皇子北平王那木罕率诸王镇守西北，蒙哥子昔里吉、诸王脱脱木等随行。那木罕驻守阿力麻里

（今新疆霍城西北）。脱脱木是成吉思汗弟帖木格斡赤斤的后裔，与忽必烈一直不和，蓄谋叛乱已久。1277 年（至元十四年），脱脱木勾结阿里不哥子药木忽儿、察合台子撒儿班等，劫持北平王那木罕，立昔里吉为帝，率叛军进攻和林。忽必烈急命正在进攻南宋的主帅伯颜率土土哈等北征。伯颜用断绝粮道的办法阻困聚集在鄂尔浑河的诸叛王。土土哈在土拉河和鄂尔浑河两次大捷。1278 年（至元十五年），昔里吉败走也儿的石河，叛军内讧，脱脱木又立撒儿班为帝，药木忽儿不服，执送脱脱木至昔里吉处，脱脱木被杀。撒儿班又执昔里吉押送至忽必烈处，忽必烈将昔里吉流放至海南岛，后来死于该地。

在昔里吉等发动叛乱时，海都又乘机占领阿力麻里，骚扰天山南北。忽必烈特置别失八里和州等处宣慰司，派兵戍守。

为了防止西北藩王的叛乱势力与东北藩王的叛乱势力相联结，1286 年（至元二十三年）忽必烈改山北辽东道宣慰司为东京行省，加强对东北地区的控制。早与海都有勾结的帖木格斡赤斤的后裔乃颜，立即纠集合撒儿后王势都儿、合赤温后裔哈丹等发动叛乱。海都闻讯后，答允率 10 万军队前来汇合。忽必烈一面让伯颜驻军和林，阻止海都东来，一面率军镇压乃颜。1287 年（至元二十四年）乃颜被俘，忽必烈将其处死。1288 年（至元二十五年），忽必烈命皇孙铁木耳率军镇压哈丹，哈丹逃至高丽。1292 年（至元二十九年），在高丽军民的配合进攻下，哈丹兵败自杀。

忽必烈在平定东北诸王叛乱后，置辽阳行省统辖各路，并在叛王封地内设万户府。这些措施大大削弱了藩王的权力，巩固了东北地区的统一。

正当忽必烈镇压东北叛乱诸王时，海都、笃哇等气焰更加嚣张了。1289 年（至元二十六年），74 岁高龄的忽必烈决定再次亲征。海都得知忽必烈亲征，急忙逃遁。忽必烈仍命伯颜负责西北军事。到忽必烈去世前，海都的势力已被逐出金山之外，平定西北叛王的战争基本上取得了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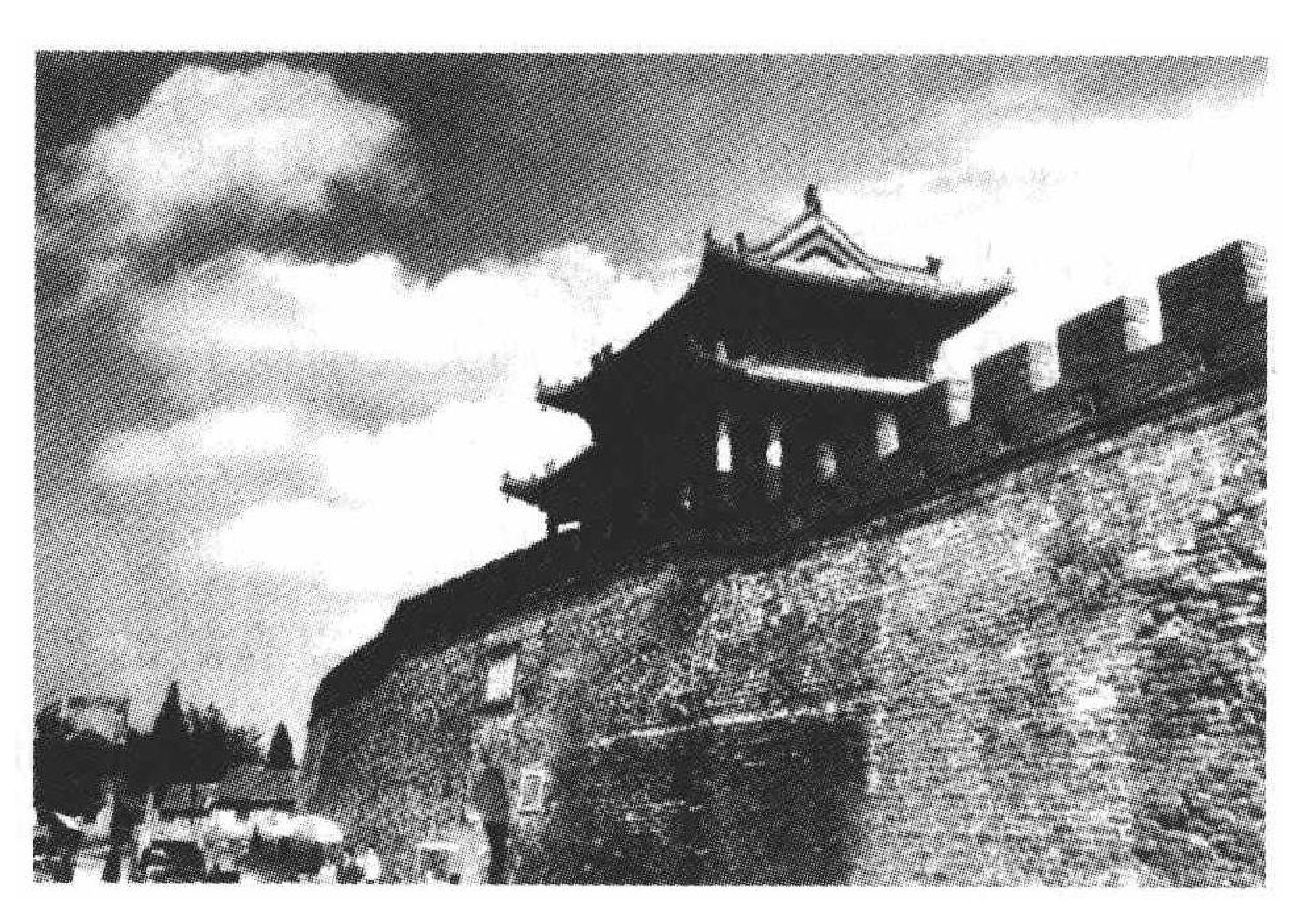
忽必烈在位30多年中，与分裂割据势力和叛乱势力进行了十分激烈的斗争。在军事上对叛乱势力的坚决镇压，对巩固元代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起了很大作用。

四、灭亡南宋

忽必烈自鄂州撤围北上夺位后，贾似道以“再造之功”班师回朝。为了掩盖那个见不得人的密约，他把忽必烈的使臣郝经长期拘留在真州（今江苏仪征）。昏庸透顶的宋理宗赵昀竟下诏褒扬贾似道，加封少师、卫国公。贾似道更加飞扬跋扈，将左丞相吴潜逐出朝外，贬到循州（今广东龙川西南），曾在潭州、鄂州等地与蒙古军浴血奋战过的向士璧、曹世雄则因“侵盗官钱”的罪名庾死于狱中，曾出兵收复三京的赵葵等人也被罢官。守卫四川的骁将刘整因与主帅俞兴不和，以泸州等15郡，户30万投降蒙古。南宋政权在贾似道等人的把持下，覆亡的命运已经注定了。

1267年（至元四年），忽必烈在平定了阿里不哥和李璮的叛乱后，以南宋扣留郝经为理由，再次大规模发兵进攻南宋。忽必烈用阿术为主帅，采用南宋降将刘整“先事襄阳，浮汉入江”的建议，把攻击目标直指南宋防御蒙古最重要的据点——襄阳。

襄阳地处汉水中游南岸，与北岸的樊城相对，是扼守长江的屏障。金亡后，宋蒙多次争夺襄阳，但自1239年孟珙收复襄阳以来，蒙古军一直未能攻下。襄樊两城



襄阳古城墙

城防坚固，兵储足够支持10年，特别是广大守城军民有着决心与来犯之敌决一死战的大无畏英雄气概。这次阿术、刘整等率蒙古军再次来攻后，虽然用了筑堡、封锁、强攻等方法，使襄樊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但一直未能攻陷。

1271年（至元八年）五月，蒙古又调四川等地军队，水陆并进，加紧包围襄樊。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襄樊城内的广大军民依然斗志高昂。这时，由于两城已被围5年，城里特别缺少盐、柴、布匹等物。1272年（至元九年），南宋援军李庭芝驻郢州（今湖北钟祥），招募民兵三千，由张顺、张贵率领，沿清泥河乘船运送物资，强行突破元军封锁去襄阳。张顺号称“竹园张”，张贵号称“矮张”，都是智勇双全的勇将。这3 000民兵明知此去九死一生，但人人感奋，决不动摇。元军为封锁襄樊，用铁链、木筏填塞江口，简直无隙可通。张顺、张贵率轻舟百艘，顺流而下，元军见张顺、张贵突如其来，夜中不敢交锋，张顺、张贵转战120里，黎明抵达襄阳。城中宋军久不见援军，此时欢欣鼓舞，勇气百倍。但这时独不见张顺，数日后张顺尸体在江中浮起，身中4枪6箭，手执弓矢，怒气勃勃如生，南宋军民惊叹不已。几天后，张贵又带领能浮水中数日的水手2人，泅水去郢州，约宋将范文虎发兵夹击元军。不幸途中负伤被俘。阿术劝降不成，张贵被害牺牲。张顺、张贵可歌可泣的事迹激励着南宋军民的抗元斗争。

1273年（至元十年）正月，元军采用张弘范计，断襄樊之间水上联络，又用西域“回回炮”攻樊城，樊城陷落。宋将范天顺力战不屈，城破自缢死。宋将牛富率百余人巷战，重伤投火死。二月，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元朝。至此襄阳保卫战结束。

襄樊失守后，等于打开了南宋的大门。1274年（至元十一年）忽必烈命左丞相伯颜率师南下。伯颜分军两道：一路以合答为主帅，刘整为先锋，进犯淮西淮东，直下扬州；一路由伯颜、阿术率领，吕文焕为先锋，沿汉水入长江，沿江而下，直趋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

伯颜所率领的这支元军，顺汉水南下，包围郢州，南宋守将在汉水中设防坚守，元军被迫绕道，进攻沙洋。沙洋守将王虎臣、王大用坚决抵抗，元军用金汁炮焚毁民舍，突破城防，占领沙洋。再围新城，新城守将居谊拒战，城破后牺牲。元军进入长江，攻下要塞阳逻堡，南宋汉鄂舟师统帅夏贵逃跑，汉阳、鄂州相继降元。伯颜派阿里海牙守鄂，并由鄂进兵湖南，自率大军沿江东下。长江两岸的宋军毫无斗志，纷纷不战而降，黄州（今湖北黄冈）、蕲州、江州（今江西九江）被元军轻取，范文虎亦以安庆降元。

1274年七月，南宋度宗赵禥死，幼子赵㬎即位，是为恭帝，朝政仍由贾似道控制。十二月，在朝野压力下，贾似道被迫出兵应战。次年二月，贾似道率各路精兵7万驻芜湖，准备迎战元军。同时又派使臣去元兵军营，要求议和，遭伯颜拒绝。元军发起进攻，双方激战于池州下游的丁家洲，元军在长江两岸立炮轰击宋舰，并以大船数千艘乘风冲击宋舟船，宋军大败，杀溺死者不可胜数，军资器械尽为元军所夺。贾似道败逃，朝野对贾似道祸国殃民的罪行怒不可遏，朝廷不得已贬贾似道于循州，押送途中被看管人员杀死。

元军在丁家洲大胜后，沿江太平、和州、无为诸城纷纷降元。1275年三月，元军占领建康（今江苏南京），接着又攻占镇江、常州、无锡等地。元军占领常州后不久，张世杰即遣刘师勇等克复，十一月，元军再破常州，守将姚訔（yín）、刘师勇等坚持巷战，全城惨遭屠杀，只刘师道等8人逃出。

元军进逼临安，谢太后（理宗后）下诏勤王。可是，各地官员响应的很少，只有赣州（今属江西）知州文天祥和郢州守将张世杰率兵入卫临安。文天祥是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以状元当上了赣州知州，勤王诏下后，他招募了3万士兵星夜赶来，却遭到宰相陈宜中的拒绝，派他到平江（今江苏苏州）做知府。元军进攻临安，形势十分危急，文天祥又奉命守余杭附近的独松关，这时元军已先破独松关，而平江亦已失守，文天祥只好去临安。张世

杰是北方大地主军阀张柔的部下，张柔投降蒙古，张世杰南下投宋，在抗击蒙元战斗中英勇善战，但陈宜中对他很不信任。临安危急时，文天祥、张世杰都到了临安，他们主张让谢太后、全太后（度宗后）、恭帝入海，留下自己背城一战，但陈宜中不许。陈宜中多次与伯颜洽谈投降事宜，但没有成功，竟撒手不管逃到温州去了。谢、全两太后只好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派他去元营谈判。文天祥到元营后，不顾伯颜的威胁利诱，始终坚持先撤军后谈判的立场，伯颜无可奈何，把他强行扣留在军营中。1276 年（元至元十三年，南宋德祐二年）元军进入临安，谢太后率赵㬎投降，谢、全太后、赵㬎等被俘送大都。南宋灭亡。

临安失陷后，江浙、江西、湖南等地大部分被元军占领，但各地的抗元斗争仍在继续进行，特别是扬州、潭州、合州等地的抗元斗争更是英勇壮烈。

守卫扬州的是抗元英雄李庭芝。他早年在孟珙部下任职，孟珙死后便一直驻守扬州，襄阳失陷前，蒙古军队在合答、刘整率领下多次进攻扬州，李庭芝坚壁固堡，英勇抗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襄阳危急时，李庭芝奉命率军支援，却遭到范文虎的排挤，但仍为襄樊保卫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襄阳失陷后，元军攻扬州，他继续坚守。临安被元军占领后，投降元朝的谢太后曾两次命令他投降，谢太后派使臣到扬州城下，送书给李庭芝说："我和皇帝已经臣服了元朝，你还能为谁守城呢?"李庭芝怒不可遏，以射杀来使作为对谢太后无耻投降的回答。1276 年七月，益王赵昰（shì）诏李庭芝南下会合，李庭芝命部将朱焕守扬州，自率 7 000 人经泰州入海。不料朱焕以城降元，李庭芝被困于泰州，被俘牺牲。

1275 年三月，元军阿里海牙攻占岳州（今湖南岳阳）。1276 年正月，阿里海牙攻潭州，守将李芾（fèi）坚守了 3 个月，城破，李芾命部将沈忠杀李芾全家，沈忠忍痛杀李芾全家，然后又杀自己一家，最后自刎身死。

阿里海牙入广西，邕州（今广西南宁）知州马塈率所部及少

数民族兵坚守静江（今广西桂林）3 个月，前后百余战，宁死不屈。阿里海牙、忽必烈多次诱降，均遭拒绝。外城破，马塈率战士坚守内城，再破，巷战牺牲。其部将娄钤辖又死守月城十余天，最后自焚而死。

四川军民从 1234 年蒙古军入境到 1278 年合州失守，进行了 40 多年的艰苦斗争。1267 年，蒙古军数万进攻合州，为宋军击退，有力地支援了襄樊保卫战。1275 年，元军在击败了南宋主力后再次大举进攻四川，包围重庆，合州守将张珏率兵支援，重创敌军。但因双方力量悬殊，四川大部州郡失陷。1278 年，元军攻陷重庆，张珏率军巷战，不敌，以小舟走涪州（今四川涪陵），不幸被俘，在解送大都途中自缢而亡。

下面再讲南宋最后两个小皇帝被消灭的情况。

临安失守前夕，益王赵昰和他的弟弟广王赵昺（他们都是度宗妃杨氏所生）逃到永嘉。1276 年五月，赵昰在福州（今属福建）被张世杰、陆秀夫拥戴为帝，是为端宗。这时文天祥已从元营逃出，抵达永嘉，又到福州，被赵昰任命为右丞相。他们重新组织残余部队继续抗元。1276 年，文天祥到江西，收复宁都、雩都（今江西于都）等地，一时军心大振。但是福建方面却节节败退。十一月，赵昰逃到泉州（今属福建），又逃到潮州（今属广东）。回回大商人蒲寿庚以泉州降元。1277 年（至元十四年），文天祥、张世杰在江西、广东继续抗击元军，各地纷纷响应，特别是福建农民起义领袖陈吊眼、许夫人等，率汉、畲各族人民投入了反元斗争，使南宋兵势稍有振作。年底，赵昰逃到香山（今广东中山）。



文天祥

1278 年初，赵昰逃到广州（今属广东），又逃至硐州（今广东

硇州岛)。四月，赵昰病死，弟赵昺即位。六月，赵昺逃至广东新会海中的厓山，元将张弘范以水陆师2万来攻。十二月，文天祥被俘于五岭坡（今广东海丰境内)，张弘范要文天祥投降，文天祥严词拒绝。他面对珠江口外的零丁洋，抱定必死的决心，写下了悲壮的《过零丁洋》这首著名的诗篇。其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表达了他为反对蒙古贵族发动的战争而决心献身的高尚品质，成了几百年来激励人们为正义而献身的名言。后来张弘范不得不把他送到大都，1283年（至元二十年）正月十七日，文天祥在大都柴市口就义，当时他只有47岁。

1279年（元至元十六年，南宋祥兴二年）二月，元朝水军在厓山海面发起总攻势，南宋水军大败，陆秀夫抱赵昺投海死，张世杰突围后遇到大风，水船覆没淹死。南宋的残余力量至此全部被消灭。

五、元朝的大统一

蒙古灭金后，经过长达40年的灭宋战争，终于最后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大业。实现全国统一，这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是，在12世纪末、13世纪初时，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当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腐败无能的南宋政权根本不可能担负起统一全国的历史重任。忽必烈作为蒙汉各族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在政治上主张采取“汉法”，抛弃蒙古旧俗，坚持统一、反对分裂，是比较有力量、有生气的，因此，统一全国的历史重任就在



宋代张胜温绘《大理国梵像卷》

他统治时期完成了。

实现全国统一，这是历史的进步现象，元朝实现大统一以后的几百年历史证明，元灭宋是历史的进步，而不是历史的倒退。元代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过程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我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这2000多年中，大部分时间是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统治着全国，也有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统治着全国。我国既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是有资格成为全国的统治民族的。在封建时代里，全国的统一几乎都是通过战争来实现的，要实现各民族的平等联合，在那个时代是不可能的。特别像忽必烈这样一个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为了实现和巩固这种统一，就不可避免地要采取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政策。所以，我们肯定元朝统一对祖国历史发展的作用，并不是肯定以忽必烈为首的元朝统治者所采取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政策。同样，各族人民反对元朝统治者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反对蒙古贵族的军事占领，都是正义的。文天祥等南宋将领的抗元斗争也是正义的，因为在反对外来民族压迫上，文天祥维护了汉族的民族利益。但是我们肯定文天祥的反元斗争，并不是肯定他忠于腐朽的南宋小朝廷的忠君思想。元朝统一全国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错综复杂现象，我们都要一一加以具体分析，然后辩证地把它统一起来。

元朝的统一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很重大的意义，归纳起来就是：

首先，元朝的大统一使我国历史上较长时间的分裂割据局面结束了。自从唐末藩镇割据以来，我国先后出现了五代十国的分裂，辽、宋和金、宋的对峙，西夏、蒙古、高昌、大理、西辽、吐蕃等民族政权的并存，这种分裂达三四百年之久。长期的分裂割据阻碍了各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影响了多民族国家的继续发展，是不符合历史发展的需要和各族人民要求统一的愿望的。忽必烈把各割据政权统一于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元朝之下，这是与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的趋势相适应的。元朝时，中央与地方、中原与边疆的联系十分紧密，这就为以后各朝代我国基本上保持统一局

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元朝的大统一促进了国内各民族之间联系的加强，有利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发。由于全国各民族生活在一个没有此疆彼界的共同环境里，使他们在共同的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共同的生产斗争中，进一步密切了原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许多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他们带来了少数民族的生产技术和文化艺术，丰富了中原地区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许多汉人迁到蒙古、西域、东北、云南地区，带去了汉族地区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为祖国边疆的开发，作出了贡献。元朝时期，由于大批少数民族留居中原，他们接受了汉文化，出现了许多用汉文从事著作的文学家、艺术家、科技家，他们为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三，元朝的大统一为祖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由于元朝版图辽阔，南北统一，对天文、地理、水利、农业等学科的发展特别有利。杰出的天文学家郭守敬就是利用了这些条件，开展了世界天文史上规模空前的实测活动，从北纬65°到北纬15°的范围内设立27个观星站，得到了当时能够得到的最科学的数据，编出了水平很高的《授时历》；都实探索黄河河源、《元一统志》的编纂、王祯总结全国范围的农业生产经验，以及航海、气象、水利等方面的成就，无不与元朝的大统一有关。

第四，元朝的大统一还大大加强了中外交通和中外关系。蒙古向外扩张和各汗国的建立，客观上打通了中国与外国之间的交通往来，元朝与各汗国之间的往来频繁，与欧洲、亚洲、非洲各国的联系也很频繁，中国的航船一直到达非洲，我国的四大发明——印刷术、火药、造纸术、指南针通过阿拉伯人传入欧洲。中国的商品远销世界各地。来自欧、亚、非的各国客人，长期居住中国，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等，他们回国后又把中国的情况介绍给世界各国人民。外国的许多科学文化也传到了中国。中国人民在元朝时对世界的了解比过去更多了。

第六章　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

一、统治集团的内部纷争

元朝建立后，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权利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前面已经讲过元朝建立前后的几次斗争，下面还要讲的阿合马、桑哥事件，南坡之变和后期诸帝之立等事件，大体上概括了元朝前、中、后三个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纷争的情况。

阿合马、桑哥事件　忽必烈统治的30多年，是从连年不断的战争向全国安定过渡的时代。诸王叛乱、南下灭宋、镇压反元武装起义，迫切需要军饷；百废待兴、恢复封建经济，迫切需要金钱。因此，谁善于理财，谁就受到忽必烈的重用。忽必烈时期主要帮助他管理财政的是花剌子模人阿合马、汉人卢世荣和吐蕃人桑哥。他们3人在旧史书里是大大有名的奸臣，其实他们做的事未必每件都是坏事，在理财上他们都有一套本领，如果没有足够的金钱，忽必烈是办不成这么许多大事来的。正因为忽必烈宠信他们，他们自以为理财有了功，就居功自傲，专权不法，干了不少坏事，引起了统治集团中其他人的不满，最后遭到杀头的下场。

1262年（中统三年），阿合马任诸路都转运使，专理财政，他在钧州（今河南禹县）、徐州（今属江苏）兴办了炼铁业，每年产铁103.7万斤，铸成农器20万件，换成官粮4万石；又因太原私盐盛行，盐课收入大减，他大大增加了当地赋税，不论僧道军民户，一律不得免税，于是收入大增。这两件事办成后，忽必烈非常

高兴，升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从此，阿合马深受忽必烈宠爱，日益骄横，连中书右丞相安童也不在他眼里，左丞相史天泽等也常被他弄得很窘。他还让他的儿子忽辛当大都路总管，又不通过中书省，安插自己的亲信任要职，还依仗自己的理财特权，派人经商，从中获得巨额财富。1278年（至元十五年）中书左丞崔斌上书，揭露阿合马任用亲信，一家身居要职等罪，忽必烈罢免了阿合马子侄们的职务，但仍对阿合马十分信任，并认为他有当宰相的才能。1280年（至元十七年），阿合马以清理江淮钱谷的名义，打击诬陷异己。当时崔斌已调任江淮行省左丞，阿合马乘机诬陷他与江淮平章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儿等盗官粮40万、擅自更换朝廷任命的官员800人，加以杀害。皇太子真金知道这件事后，立即派人去制止，竟来不及了。

阿合马搜括钱财，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大失人心。1282年（至元十九年）三月，益都千户王著秘密铸造了一个大铜锤，准备击杀阿合马。这时正好忽必烈和皇太子到上都去了，阿合马留守大都。王著知道皇太子很痛恨阿合马，就伪装皇太子返京作佛事并假传太子命令，命阿合马等中书省臣来见，当阿合马来迎接假太子时，王著对他加以痛斥，并用铜锤把他打死了。王著被捕处死，临刑时高呼："王著为天下除害，现在虽然死了，日后必有人为我载上史册！"后来忽必烈知道了阿合马的罪恶，下令剖棺戮尸，他的死党和忽辛等4个儿子都被处死。

阿合马死后，朝廷里没有人再敢言及理财的事了。总制院使桑哥推荐卢世荣到朝廷来理财，忽必烈任命卢世荣为中书右丞。卢世荣上任后提出改革钞法、制定市舶条例、将没收来的各地富豪私造的铁器买去以充实常平仓、官营酿酒、于上都等地收购羊马选蒙古人放牧、选拔阿合马原来任用过的一些理财能手等一系列主张，忽必烈一一采纳。卢世荣得宠后，引起了一批官僚的反对，纷纷上奏弹劾，他干了不到一年，就被杀了。其实卢世荣被杀是有点冤枉的，他的理财措施有不少还是可取的，只是因为触犯了不少富豪、

官僚、贵族的利益，在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很深的情况下做了牺牲品。

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卢世荣死后不久，忽必烈起用桑哥理财，第二年任命为平章政事。他更改钞法，发行至元钞，解决了朝廷的财政危机，于是声名大著，升任尚书右丞相兼总制院使。接着，又清理江南六省钱谷，增加江南赋税和盐酒醋税，大大加重了剥削，引起了天下骚动。他的权势非常大，一些阿谀逢迎之徒，特地为他立了德政碑。桑哥更加跋扈，于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任意调动内外官员，官爵刑赏全凭钱买和贿赂，引起了一批朝臣的反对，纷纷上奏弹劾。当时百姓失业，起义烽火连年不断，忽必烈深感事态严重，为缓和社会矛盾，于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把桑哥杀了。在抄家时发现桑哥收藏的珍宝至少有宫廷里的一半那么多。

忽必烈统治时期发生的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事件，牵涉面很广，持续的时间也很长，它反映了元朝初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斗争的尖锐和残酷。

在与阿合马、桑哥擅权的斗争过程中，皇太子真金起了很大作用。

真金是忽必烈的长子，自小就接受汉儒姚枢、窦默、许衡等教育。他主张全面推行汉法，曾对中书省官员说："汝等学孔子之道，今始得行，宜尽平生所学，力行之。"又主张蒙古贵族子弟学汉字。朝廷中的汉法派官员对真金寄予很大希望。他们力促忽必烈确立中国封建王朝传统的嫡长子继位制度，立真金为皇太子。1273年（至元十年），忽必烈正式册立真金为皇太子，兼中书令。真金对阿合马擅权恨之入骨，甚至当着忽必烈的面责打阿合马。但当时忽必烈急于敛财，十分宠信阿合马，父子之间逐渐产生隔阂。以后在信用卢世荣、桑哥问题上，两人矛盾日益尖锐。

真金威望越来越高，实际上成了朝廷中汉法派的靠山。当时忽必烈年事已高，而且固执己见，对敛财之臣依然那么轻信，汉法派

急盼真金上台。1285年初，江南行台监察御史上奏说："皇帝春秋已高，当禅位给皇太子。"皇太子得知这个消息，十分恐慌。尽管御史台的官员把这个奏章封存了起来，但时隔不久，消息传到忽必烈那里，忽必烈大怒，皇太子更加惊惧，竟一病亡故，年仅43岁。

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 皇太子真金死后，忽必烈一直未立继承人。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年，才让他的孙子、真金的第三子铁穆耳受皇太子宝。铁穆耳就是成宗。成宗在位12年，《元史》说他"承天下混一之后，垂拱而治，可谓善于守成者矣"。成宗死后，他次兄答剌麻八剌的两个儿子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相继嗣位，就是武宗和仁宗。后来仁宗的儿子硕德八剌即位，就是英宗。到英宗统治时期，元朝皇室内部的矛盾再次尖锐化，爆发了著名的南坡之变。



元成宗

自从忽必烈建立元朝，推行"汉法"以来，蒙古贵族内部的保守势力总是千方百计要加以阻挠和破坏。但是，推行"汉法"以适应中原地区固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这是不可抗拒的客观需要。因此，主张行汉法的势力与保守势力之间的矛盾总是时暗时明地进行着斗争。英宗即位后这种矛盾又逐渐突出起来。

当武宗取得帝位后，武宗和仁宗兄弟之间曾达成协议：兄终弟及，叔侄相承。武宗死了，仁宗即位；仁宗死了，武宗的儿子即位。但仁宗即位后，右丞相铁木迭儿为了取得皇帝的欢心，在太后答己的支持下，废武宗子和世㻋，改立仁宗子硕德八剌为太子。他们满以为硕德八剌年幼无知，易于控制。然而，硕德八剌却是一个自幼就接受儒学教育、熟读汉儒著作的蒙古贵族，与答己、铁木迭儿的政治主张很不一致。仁宗死后，英宗硕德八剌即位，答己十分懊悔。为了巩固她的地位，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再次任命因侵吞

田地牧场贪赃枉法而被仁宗罢官的铁木迭儿为右丞相；诛杀和罢免反对过铁木迭儿的一批官吏，幕后指挥失烈门等搞废立阴谋……英宗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任命功臣木华黎的后代、有“蒙古儒者”之称的拜住为左丞相；千方百计限制铁木迭儿的权力……元朝统治集团内部两派的斗争日益尖锐。

双方矛盾正在进一步发展时，铁木迭儿和答己太后都在1322年（至治二年）相继死去，御史大夫铁失成了这一派在朝中的代表，但力量不如从前了。这时水旱灾荒连年发生，各族人民不断起义，社会矛盾十分尖锐。英宗深深感到再不调整原有的统治政策，将会发生统治危机。他在拜住的协助下实施了一系列新政：

任用大批汉族官僚和知识分子，如张珪、虞集、吴元珪、王约等都得到了重用。他还颁布《振举台纲制》，提倡“举善荐贤”，到处搜罗人才；

罢冗官，使大批依靠特权获得肥缺的蒙古色目官僚失去官职；

推行“助役法”，规定拥田百亩者以3亩入官，作为补偿一般农民徭役的助役费，使豪家大姓稍有损失；

减轻徭役，减免赋税；

颁布《大元通制》，把这些措施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英宗是比较有作为的元朝皇帝，这些措施对于扩大元朝统治基础、适应封建生产力的发展多少是有些好处的。但由于这些措施触犯了一部分蒙古贵族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拼死反对。

1323年（至治三年），英宗下令追查铁木迭儿贪污案，处死了一批有牵连的官吏，同时追夺铁木迭儿官爵，抄没其家资。这时铁木迭儿的余党铁失等十分恐慌，害怕进一步追查到他们自己，于是串连了一批诸王贵族，于1323年八月五日夜晚，当英宗自上都南返大都，途经上都以南30里的南坡店时，刺杀了英宗和拜住。这就是“南坡之变”。

英宗被刺后，铁失等拥立在漠北高原的晋王也孙铁木儿（忽必烈孙子甘麻剌之子）为帝，即泰定帝。

泰定帝即位后，先是加封拥立他的人官爵，但是只过了30多天，他为了维护皇权的尊严，对“大逆不道”的铁失、也先帖木儿等一概加以诛杀。

后期诸帝之立 泰定帝死于1328年（致和元年），到1333年（元统元年）顺帝妥懽帖睦尔即位止，其间只有5年，却换了5个皇帝，可见蒙古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和大臣弄权的情况何等严重！

1328年七月，泰定帝病死在上都。消息传到大都，留守大都的佥枢密院事燕铁木儿发动政变，立武宗之子为帝。在上都的左丞相倒剌沙在宗室诸王脱脱、王禅支持下，匆匆忙忙地立年仅9岁的泰定帝子阿剌吉八为帝，就是天顺帝。于是，一场新的争夺帝位的斗争又在蒙古贵族之间展开了。

按照封建正统的标准，帝位应该由泰定帝之子阿剌吉八继承。但是，由于大臣们争相夺权，因帝位的继承使夺权矛盾公开化。燕铁木儿是平定海都叛乱的功臣土土哈之孙，武宗时因受宠提拔，当然希望武宗的后代保持皇位。他仗着控制宿卫的有利条件，逮捕中书平章乌伯都剌等，强行召集百官，威胁道：“祖宗正统应属武宗之子，敢有不顺者斩！”当时武宗长子和世㻋封周王于漠北，次子图帖睦尔封怀王于江陵。漠北太远，于是立即遣人去江陵迎图帖睦尔来京继位。同时募战士、买战马、备军粮，准备迎战上都之敌。九月，图帖睦尔即位，就是文宗。他即位后立即封燕铁木儿为太平王，兼中书右丞相、知枢密院事。这时，和世㻋也从漠北开始南下。

上都方面得知大都谋立武宗之子的消息后，即派王禅率军入关；大都方面也派燕铁木儿迎战。双方经过多次激战，上都方面败北。倒剌沙被迫奉皇帝玺宝投降，幼帝阿剌吉八不知所终。“两都之战”结束后，文宗让位给其兄。

1329年正月，和世㻋在和林北即位，是为明宗。三月，文宗命燕铁木儿奉玺宝北上迎接明宗。八月，文宗以皇太子身份迎明宗于王忽察都（今河北万全西）之地。其实这是一出掩人耳目的假

戏，他们早就策划好毒死明宗的阴谋。踌躇满志的明宗，浸沉在欢乐的气氛中，完全失去了警惕。在宴请皇太子、诸王、大臣后，当夜惨遭毒手。明宗一死，燕铁木儿立即以皇后命奉皇帝玺宝授文宗，为防止明宗诸臣发难，文宗、燕铁木儿疾驰上都，文宗重新登基。

文宗即位后，为表彰燕铁木儿的卓著功勋，命文学家马祖常制文，在大都北郊立石，并大封其三代，中书省中只任命燕铁木儿一人为丞相，使他独揽大权。而燕铁木儿则居功自傲，挥霍浪费，荒淫无度，公然娶泰定帝后为妻，还以宗室女40人为妾。文宗又以"文治"粉饰太平，立奎章阁，收藏古器物、书画、图书，聚集文人学士，鉴赏文籍书画；又置艺文监，以蒙古语翻译儒书；命赵世延、虞集等修纂《经世大典》……

但文宗与燕铁木儿内心非常空虚。他们怕毒死明宗的事败露，先是杀害明宗皇后八不沙，接着把明宗长子、年仅9岁的妥懽帖睦尔贬送到高丽大青岛监禁起来。明宗与文宗兄弟之间，本来有"兄终弟及，叔侄相承"的成约，明宗死后，本应立妥懽帖睦尔为皇太子。文宗出于私心，精心策划了妥懽帖睦尔出身之谜，正式诏告天下："明宗在朔漠之时，素谓（妥懽帖睦尔）非其己子。"然后把妥懽帖睦尔移于广西静江（今桂林），立自己的长子燕王阿剌忒纳答剌为皇太子。立了皇储之后只过了39天，皇太子就死去了。燕铁木儿劝文宗再立次子燕帖古思为皇太子，文宗没有答应。原来皇太子之死对文宗刺激太大，使他常常精神恍惚，往事历历在目，仿佛明宗要来讨还血债。文宗一共做了不足4年皇帝，到1332年（至顺三年）八月，竟不治身亡。临终前，他对皇后、太子、燕铁木儿说："昔者王忽察都之事，为朕平生大错。朕尝中夜思之，悔之无及。燕帖古思虽为朕子，朕固爱之，然今日大位，乃明宗之大位也，汝辈如爱朕，愿召明宗子妥懽帖睦尔来，使登大位。如是，朕虽见明宗于地下，亦可以有所措辞而塞责耳。"言毕而终，享年29岁。

文宗死后，燕铁木儿仍要立燕帖古思为帝，皇后不愿违背文宗遗言，不从。燕铁木儿迟迟不立皇帝，后来考虑再三，为便于控制起见，改立明宗幼子、7岁的鄜王懿璘质班为帝。懿璘质班只做了43天皇帝即得病而死，庙号宁宗。燕铁木儿再请立燕帖古思为帝，皇后不从，只好从广西把妥懽帖睦尔接到大都来。这时妥懽帖睦尔已经13岁，燕铁木儿害怕他追查毒死明宗案，因而千方百计阻挠他登基。过了几个月，燕铁木儿病死。妥懽帖睦尔方得以即位称帝，他就是末代皇帝元顺帝。

二、残酷的民族压迫

元朝是蒙古族中的上层贵族建立的。蒙古贵族为了保持他们的政权和特权，必然既要推行阶级压迫政策，又要推行民族压迫政策。这就决定了这个政权必然具有双重压迫性质。

在封建社会里，民族压迫政策是专制制度和君主制度的必然产物。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总是要在民族之间制造隔阂，挑起矛盾。我国历史上，中央王朝的统治者大多数时间掌握在汉族统治阶级手里，因此，多数情况下是汉族统治者欺侮、压迫少数民族；当少数民族统治者强大起来并掌握了中央王朝的政权后，则又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元朝时期就是这样。

蒙古统治者在统一全国过程中，继承了女真统治者把金朝统治范围内的人民分为女真、渤海、契丹、汉儿四个等级的民族分化经验，把全国各族人民基本上按征服的先后划分为四个等级：

蒙古人：指漠北蒙古各部人民，但克烈、乃蛮、汪古等部属色目人；

色目人：指西域各部、各国人民，如畏兀儿、阿速、唐兀、康里、钦察、斡罗思、回回等。因为它包括的部族、国家很杂，又多姓氏稀僻，有“各色名目”之意，故称色目人；

汉人：大体指淮河以北原金朝统治下的各族人民和较早被蒙古征服的四川、云南各族人民，除汉人外，还包括契丹、高丽、女真、渤海人等；

南人：指原南宋统治下的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

这四个等级在政治待遇和法律上都有严格的区别，对蒙古、色目人特别优厚，对汉人、南人百般歧视。

从政治地位上来看，虽然元朝统治集团是蒙古贵族联合包括汉族地主分子在内的各族上层分子组成的，但是在元朝政权内部仍保留着浓厚的民族色彩。元朝建立后，世祖忽必烈定下了这样的规章：中央或地方官，正职一律由蒙古人担任，副职才允许汉人、南人担任。特别是中央统治机构中的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正职绝大部分由蒙古人担任，只有极个别的汉人短期内担任过正职，至于掌握军机的枢密院中的要职，汉人、南人不得染指。整个元朝期间，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二职，没有一个汉人担任过，至于各种军队的数量和驻防状况，对汉人也是绝对保密的。地方上各路、府、州、县，都设有只许蒙古、色目人担任的达鲁花赤，负责对所在地方的官吏和军民进行监督，掌握实权。



元仁宗

对汉族知识分子入仕的途径也加以种种限制。唐朝以来，知识分子多是通过科举当官。元朝前期科举一直没有恢复，汉族分子主要通过推荐，被皇帝看中后才当官，因此人数不多。到仁宗皇庆二年（1317）时才恢复科举。元朝的科举制度也带有鲜明的民族压迫色彩。当时规定：蒙古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分两榜录取，对汉人南人的要求十分严格，而且还规定南人不得登前三名，汉族儒生要通过科举做官简直像登天一样难，所以社会上形成了对读书人很看不起的风气，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

之说。许多汉儒情绪沮丧，感到前途渺茫，认为科举只是粉饰太平的门面，对此毫无兴趣。

从法律规定上来看，民族歧视尤其严重，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报；蒙古人打死汉人，只罚凶手出征，给死者家属烧埋银；蒙古人犯罪由蒙古人断罪处罚，汉人官吏不得受理案件；蒙古色目人犯罪不必刺字；而汉人、南人打死人除了判处死刑外，还要付50两“烧埋银”。法令、条文还对汉人加以种种限制：严格禁止汉人、南人拥有军器、马匹，不许汉人田猎、习武、集会，包括神赛会、唱戏说书、祠祷、夜行，甚至夜间点灯也禁止。忽必烈灭南宋后，曾在江南农村建立社甲制度，以20户为一甲，北人为甲主，“北人”是指“南人”以外的各种人，他们在新降服的地区充当甲主，自然为所欲为。史书上说，这些甲主“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令”。可见，这种社甲制也是利用四等级的规定来加深民族和地区之间的隔阂，对南人特别加以歧视。

但是，元朝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政策并不能掩盖其阶级压迫的本质。他们一方面歧视、压迫汉人，一方面又拉拢、争取汉族上层分子。尽管中书省的要职原则上是不容许汉人、南人这一等级的人担任的，但忽必烈之前就有契丹人耶律楚材、汉人杨惟中任过中书令，忽必烈即位后，汉人史天泽和耶律楚材的儿子耶律铸担任过右丞相和左丞相。这正说明了各族统治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相反，蒙古、色目人虽然有很多优厚的待遇，但是每个民族中都是划分为阶级的，许多蒙古、色目劳动人民经常处于饥寒之中，蒙古劳动人民在军役和劳役压迫之下，早在忽必烈时代就已经有人沦为奴隶，并被贩运到海外去。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元世祖曾有诏令禁止泉州海舶携带蒙古男女出海，贩往阿拉伯、印度等地。以后，蒙古人卖身于色目、汉人、南人为奴的记载仍旧很多。1322年（至治二年）元朝政府为了收容赎回被卖为奴的蒙古子女成立了宗仁卫，一次就收容了3 000多户。色目人也有沦为奴隶的。这些事例，充分说明了元朝统治者推行民族压迫政策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他

们的封建统治，遭受阶级和民族双重压迫的汉族劳动人民是这种政策的最大受害者。

三、土地兼并和赋税徭役

元朝统治者通过各种途径夺取土地，并以名目繁多的赋税徭役来剥削、压榨广大劳动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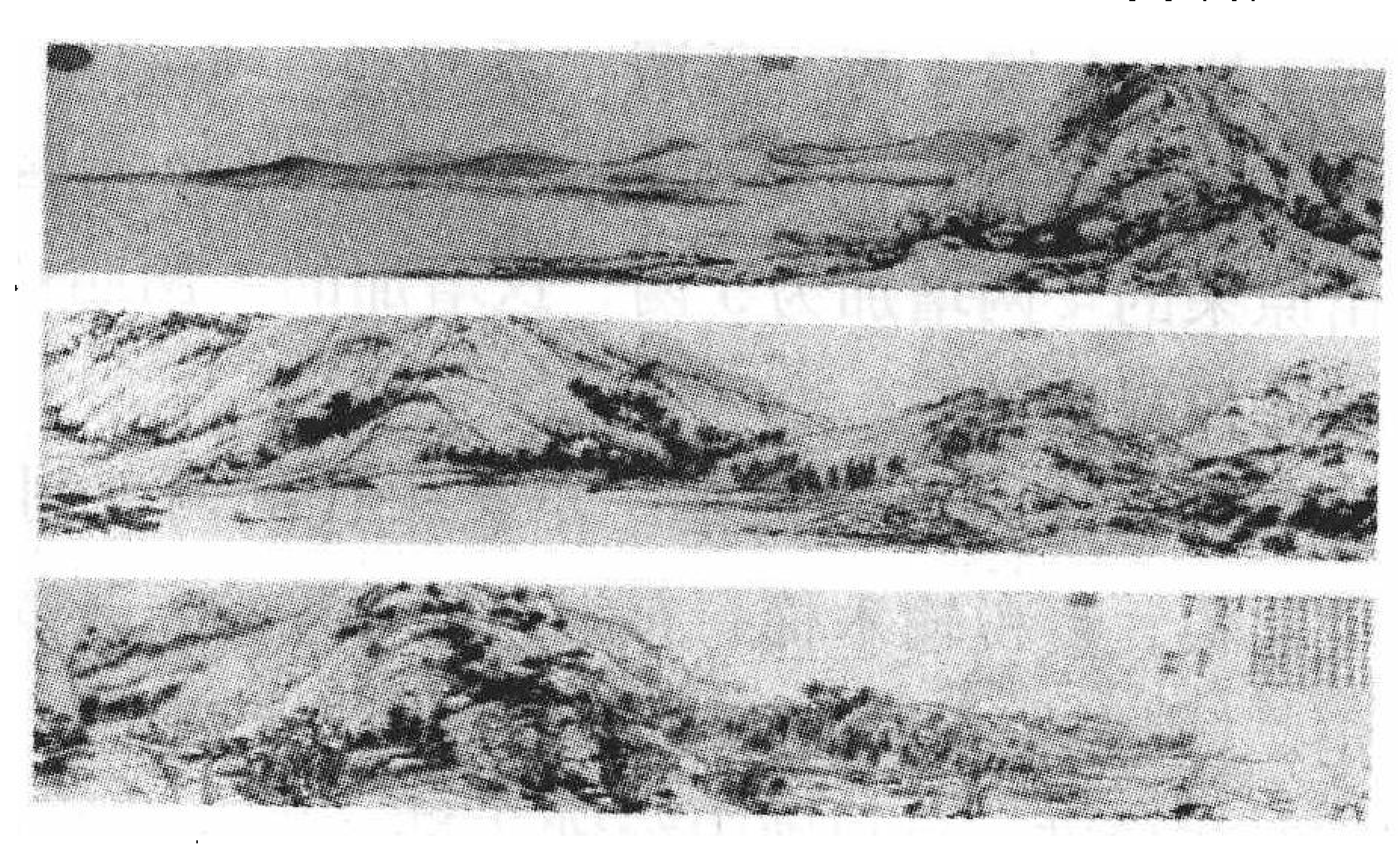
在封建社会，皇帝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也是全国最大的大地主。元朝统治者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到处夺取田地，除没收南宋官田外，还占领了战争中因人口逃亡而留下的无主荒田，也有新开垦的屯田。总之，皇庄、官田、屯田、牧场等等，都是以蒙古皇室为中心的官僚统治机构所控制的田地。

元朝皇帝对皇亲、贵族、功臣、寺院道观用“赐田”的办法使他们保持特权地位。如忽必烈赐给撒吉思益都田 1 000 顷；元文宗图帖睦尔赐给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平江田 300 顷，赐给鲁国大长公主平江等处官田 500 顷；元顺帝妥懽帖睦尔赐给公主奴伦引者思 5 000 顷，权臣伯颜前后共得赐田有 2 万顷之多。这些皇亲、贵族、大臣攫取了大量赐田后并不以此满足，他们依靠自己的权势继续兼并土地。明宗和世㻋在做皇子的时候，就搜括了河南归德、汝宁境内的濒河荒地 6 万顷。

元朝统治者崇信佛道，因此对寺院道观赏赐特厚，这些拥有大量财产的寺院实际上成了地主庄园，寺观头目就是大地主。大都的大护国仁寺就拥有大都等处水田 28 600 余顷，陆田 34 400 余顷，河间、襄阳、江淮等处水田 13 000 余顷，陆田 29 000 余顷，山林、河泊、柴苇、鱼竹场等场 29 处，江淮酒馆 140 个，还有房舍、矿产、牲畜等其他财产。1347 年（至正七年）元顺帝一次赐给大承天护圣寺山东田 16 万多顷，该寺连同以前所赐的田共达 30 余万顷。

蒙古统治者在统一全国过程中，为了拉拢各族地主阶级，对金

朝、南宋的降官、降将倍加照顾。早期投降蒙古的北方大地主史、张、董诸家，不仅挤进了统治集团，还在地方上称霸一方；一批投降蒙古的南宋官僚，也成了大地主。如范文虎在湖州南浔一带强占大批膏腴田土，死后在墓中还装了玉带、金冠、金饰等殉葬品200多件。元朝的一般官吏除了俸禄之外还有职田，他们通过与当地富豪勾结侵占私田，剥削佃户，作恶多端。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

金、宋时期的汉族大地主，在朝代更替过程中并没有受到多大损失。在江南，元朝政府承认："富户每（们）有田地，其余百姓每无田地，种着富户每的田地。"这些富户，有的"每年有二三万石租子的，占着二三千佃户"。富户们勾结官府，霸占、兼并田地的情况比比皆是。如松江大地主曹梦炎占有湖田数万亩；大地主瞿霆发占有民田并转佃官田达百万亩；河南地区的黄河沿岸涸露水泊汙地，多为势家所据，造成黄河泛滥时河水无法排泄，以致河患无穷。更加严重的是，豪强兼并土地后，把一切差役负担都转嫁在普通农民身上。在福建崇安，富豪只占全县纳粮户的九分之一，但所占田地却有六分之五，少地无地的普通农民负担绝大部分税役，往往在沉重的徭役下家破人亡。

元代的劳动人民担负着沉重的赋税、差役，以及其他苛捐杂税，统治者还通过滥发纸币来榨取劳动人民的财富。

元朝的赋税制度很复杂，南方和北方又不一样的。北方的赋税基本上是窝阔台以来的税制加以调整后确定的，有"税粮"和"科差"之分。根据1280年（至元十七年）所颁布的则例，"税粮"包括丁税和地税，丁税的全科户，每丁每年纳粟2石；地税每

亩纳粟3升。根据1260年（中统元年）所定户籍科差条例，“科差”包括户税、包银、俸钞3项，各种税户所纳户税、包银数量各不相等，以全科系官户为例，每年每户要纳系官丝1斤6两4钱，包银4两，全科系官五户丝户，每年每户纳系官丝1斤、五户丝6两4钱，包银4两。所谓“系官丝”是缴给官府的，所谓“五户丝”是缴给食邑的贵族的。1267年（至元四年）纳包银的民户，由原来的4两增加为5两，这增加的1两叫“俸钞”，是给大小官吏作俸禄用的。

江南地区的“税粮”沿袭宋代的两税制，即夏税和秋税，秋税输粮，夏税输木棉、布绢、丝绵等物，其数量根据地利、产量而定。“科差”分户钞和包银，江南户钞相当于北方的五户丝，以成宗时作标准，每户纳中统钞2贯（即中统交钞2两），1万户田租输钞400锭；江南包银相当于北方的俸钞，每户纳2两。

元朝的皇亲国戚、贵族官僚从这些法定的赋税中攫取了大量民脂民膏。元朝政府每年税粮收入总数达12 114 708石，江南三省的夏税总计149 273锭33贯（天历元年数，下同），包银差发：钞989锭，贝（bèi）1 133 119索，丝1 098 843斤，绢350 530匹，绵72 015斤，布211 223匹。元朝政府对皇亲国戚、贵族官僚十分宽厚，他们除了获得大量赐田外，又得到大批食邑分地，从分地中取得“五户丝”和“江南户钞”的份额，其数量是十分可观的。如成吉思汗弟斡真那颜除岁赐银100锭、绢5 000余匹、绵5 000余斤、缎300匹、诸物折钞120锭、羊皮500张、金16锭45两外，还有五户丝11 000余斤，江南户钞2 800余锭。



中统元宝交钞

除了正税外，还有许多规定和没有规定的杂税，如盐、茶、酒、醋、金、银、铜、铁、铅、矾、竹、木以至山泽、河泊、煤炭、蒲苇、乳牛、鱼苗、日历等等，无不有税。到了元朝后期，官

僚机构进一步腐朽，贪官污吏更加明目张胆，他们不知“廉耻”二字，公开要钱。据当时人叶子奇的记载，官吏搜刮钱财的名目有：下级来参见要“拜见钱”，无事白要叫“撒花钱”，逢年过节叫“追节钱”，生日要“生日钱”，办事要“常例钱”，送迎宾客要“人情钱”，办差事要“赍发钱”，诉案要“公事钱”。真是“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劳动人民已经被赋税压得透不过气来了，哪有钱去孝敬官老爷！

除了赋税和各种名目的盘剥之外，元政府还通过所谓“和雇”、“和买”的办法来征购统治者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他们把价格压得很低，实际上是强行夺取。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为了应付和雇和买而卖家产、卖儿卖女的情景。

随着元朝统治者挥霍浪费的日益严重，政府国库空虚，出现了财政危机。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常常滥发纸币，造成物价飞涨。中统时，曾发行过“中统钞”，1287 年（至元二十四年）时，因物价比中统初上涨了 10 倍以上，政府又发行了“至元宝钞”，1 贯等于中统钞 5 贯；1309 年（至大二年）又造“至大银钞”，票面值又上涨 25 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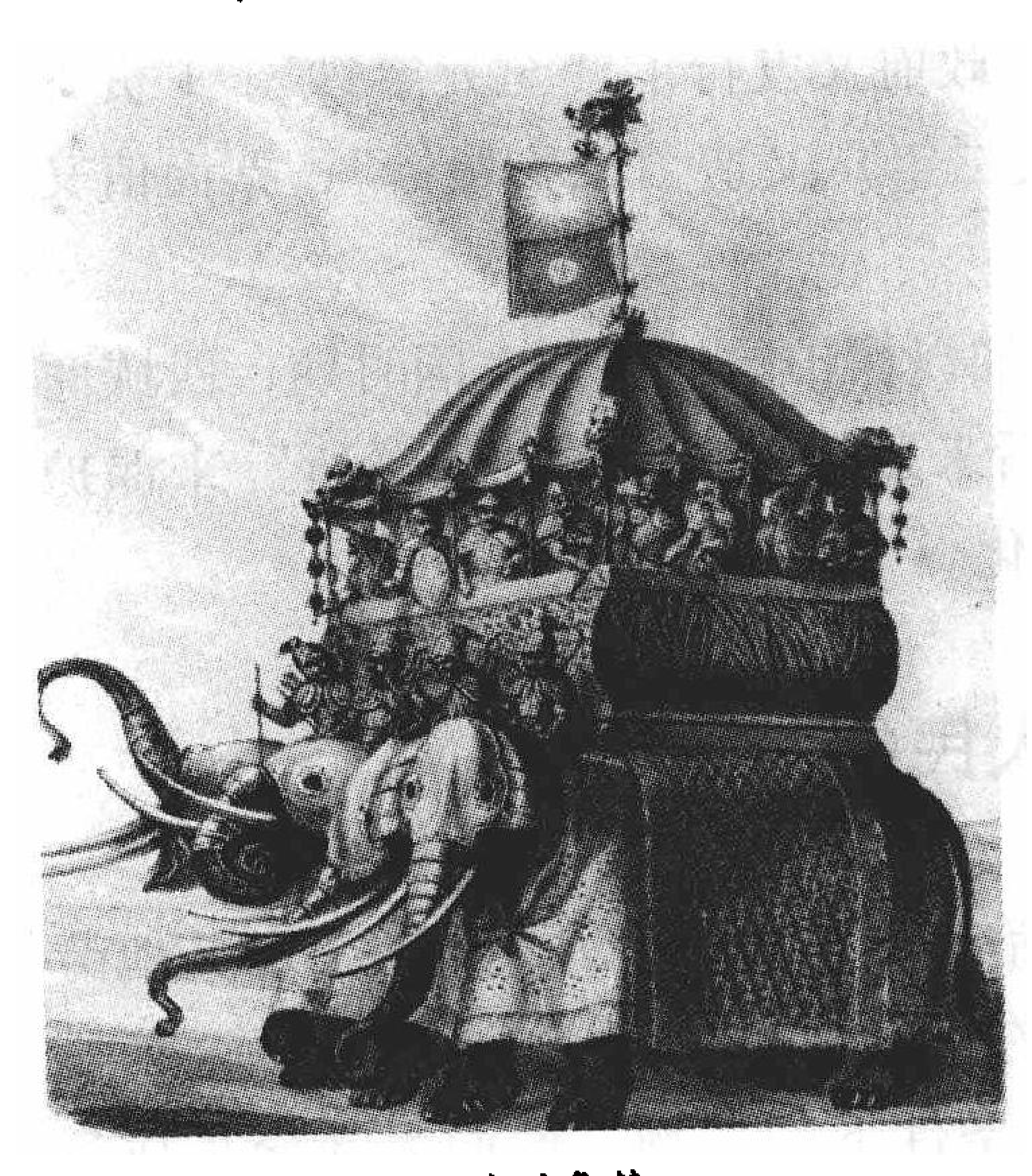
元朝政府对发放高利贷是加以保护的。在蒙古国时期，西域商人发放的高利贷“斡脱钱”，后来元朝政府特设“斡脱所”来保护这种剥削，使之合法化，官商化。

四、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

在元朝统治阶级的残酷统治和剥削之下，元代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处境，是十分悲惨的。其中，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的是“驱口”。驱口是元朝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他们大部分是战争中掳掠来的人口，如阿术攻陷襄阳时俘虏人口 5 万，阿里海牙在攻打南宋过程中多次掳掠人民，占为己有。这些被掳掠的人口绝大部分被强占为奴，或分赐给功臣为奴；也有一部分驱口是良民因债务

抵押或饥寒灾荒卖身、或因犯罪而沦为驱口的。驱口有官奴和私奴之分。一般北方称“驱”，南方称“奴”或“奴婢”。他们另有户籍，与一般编民严格区别，子孙永远为奴。官奴主要从事官手工业劳动，也有的用来代替军役，也有作为家内奴仆。私奴是与财物相同的地主私有财产，主人虽然不能随便将他们屠杀，但可以将他们任意买卖，大都、上都市场上除了马市、牛市、羊市外，还有人市，就是专门买卖驱口的。所以从人身依附关系上看，驱口近似于奴隶；驱口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或家内劳役，从事农业劳动的驱口像佃户一样给地主纳租，因此在剥削关系上又近似于佃户。所以，总的来说，驱口是一种半佃农、半奴隶性质的特殊阶层。元朝的法律为了保障拥有驱口的大地主的利益，规定：驱口杀伤主人处死，杀死主人“凌迟处死”，而主人杀死驱口只需杖八十七，因醉杀死降一等，将被杀驱口全家放良可免罪。

山东东平路有一个叫张歹儿的探马赤住坐，因丢了马匹，便将他的驱口李留住的老婆燕粉儿用铁筋打死了，结果将李留住全家放良了事。法律还规定：良人打死他人驱口者杖一百七，而私宰牛马法律上要杖一百，可见在元朝法律里驱口与牛马之间的差别相差无几！



元代的象辇

佃户的地位虽然与驱口有些区别，但处境并不好多少。官府、贵族、官僚、地主攫取和兼并了大量的土地后，通过地租来剥削广大农民。佃户有两种：一种是官佃，一种是私佃。种官田的佃户叫官佃，种地主私人土地的叫私佃。江南地区的产量高，剥削量也高：

如浙江湖州每亩田收租1石，余姚每亩收租达3石2斗，台州平均也要2石到2石4斗。北方产量低，剥削量稍低：如河北真定亩收谷子1石。无论南北方，剥削率一般都在五成、六成以上，甚至达到八成。这种状况连元朝政府的文件中也不得不承认，说地主“他每（们）佃户身上要的租子重，纳的官粮轻”。地主对佃户可以任意撤田。法律还规定：地主打死佃户，杖一百七，征烧埋银50两；而佃户打死地主，除处死刑外，还要付烧埋银50两。地主可以设私刑，对佃户任意凌虐，甚至折磨致死。地主与佃户的界线十分严格，像浙江黄岩地方，贵贱等级很严，佃户看见地主连作揖也不容许，要低着头让地主走过后方可再走。有些地区佃户的地位与驱口差不多：如江南有些地方，佃户生男，便供地主役使，佃户生女，便为女婢，或充当妻妾；在峡州路（今湖北宜昌）甚至出现把佃户当驱口一样随便买卖，或者随田典卖的情况。佃户遇有水旱灾荒、婚丧事宜，不得不向地主借高利贷，到期不能还清，常常用妻女、牲畜抵偿，或沦为驱口，或离乡流亡。

种官田的佃户，日子更加难过。元代在南北各地都有大量官田，这些官田由政府机构管理，有的直接租给农民，有的由官僚豪强承佃，再转租给农民。地租是很高的，如山西有的地方亩收田租6斗，浙江上虞高达每亩2石2斗。所以，当时有人说，公田的地租比私田的地租高20倍。广大佃户终年勤劳，所得无几。当佃户纳不起租时，官府则动用政权机器，严刑拷打，使许多佃户卖子鬻妻，弃家流亡。特别是苏南一带的公田，收租更高，人们说：“言及公田，孰不怨恨！言及公田，谁肯耕种！”

自耕农处在不断分化之中。由于地主勾结官吏，常常把赋役转嫁给自耕农，以致变卖仅有的一小块土地，弄得倾家荡产，不得不投靠寺院或权要之家，求得庇护。但产去税存，他们还要负担原有的赋役。因此自耕农破产后流亡他乡的情况也很普遍。

元代的官手工业中的劳动者，一方面来源于战争中俘虏的工匠，他们是封建政府掌握的驱户；元朝建立后，工匠来自检括来的

“系官人匠”，他们的身份等同于工奴。这些手工业劳动者成年累月在劳动条件极差的官手工业工场中辛勤劳动，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

军户、站户负担也很沉重。他们要自备马匹、车船、装备，在辽东路就发生过以妻换马应差役的事例。老百姓一入军户、站户就是世袭，他们常年在外服役，以致累死在异乡，弄得家破人亡。

元代劳动人民的苦况在诗人的笔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描写。请看王冕的《江南妇》。

江南妇，何辛苦！
田家澹泊时将雨，敝衣寒落面如土。
馌彼南亩随夫郎，夜间绩麻不上床。
绩麻成布抵官税，力田得米归官仓。
官输未了忧心触，门外又闻私债促。
大家揭帖播通衢，生谷十年还未足。
长儿五岁方离手，小女三周未能走。
社长呼名散户由，下季官盐添两口。
舅姑老病毛骨枯，忍饥忍寒蹲破庐。
残年无物做慈孝，对面冷泪空流珠。

五、各族人民的武装斗争

严重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促使元代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从元朝建立起，各族人民反抗元朝统治者的武装斗争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这种斗争一直延续到元朝灭亡。

元末农民大起义之前，各族人民的武装斗争大致经过三个阶段：从元朝建立到元世祖去世为第一阶段；从元成宗到元顺帝即位前为第二阶段；从元顺帝即位到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前为第三阶段。

在忽必烈统治时期，由于南宋刚刚灭亡，南方人民的起义往往带有“复宋”的性质，而且次数很多，成分复杂，规模有的也很大，带有反对民族压迫的色彩。特别是忽必烈统治后期的20年里，人民起义在不断地发展着，据崔彧1283年（至元二十年）的奏报，当年各地起义就达200多处，这是已经缩小了的数字。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时，已达400多处。特别是在浙、闽、赣、粤交会的地区，斗争在不断高涨。参加起义的各族人民，除了汉族以外，还有壮族、彝族、侗族、瑶族、黎族、畲族、仡佬族、水族等等。这一阶段起义的特点是，次数很多，规模较小，分散性大，时间较短，成分复杂，带有反民族压迫的色彩。其中声势较大的，有1277年（至元十四年）汉族陈吊眼联合畲族女英雄许夫人，起兵响应张世杰，进攻降元的泉州宋臣蒲寿庚，聚众数万，增至10万，活动于漳、汀一带，势力到达江浙一带，一直坚持到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才被元军镇压。1285年（至元二十二年）有四川赵和尚自称宋福王广，公开反元复宋，不久被镇压。1288年（至元二十五年）有畲族钟明亮领导的起义，拥众10万，活动于赣、闽、广地区，延续了两年时间。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有汉族杨镇龙领导的起义，参加起义的有12万人，活动于浙东各地。

在斗争的第一阶段，元朝统治者对于起义的人民，主要实行残酷的军事镇压，同时也采用政治诱骗的手段。但是由于起义地区的广大，除了调派国家军队以外，还必须依靠当地大地主阶级的武装力量进行联合镇压。当时的斗争虽然带有反民族压迫的内容，但随着蒙古统治者和南方汉族地主阶级的结合，阶级对抗的壁垒也就更加分明了。到了元世祖末年，各族人民的起义都在元朝统治者和南方汉族地主阶级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

从元成宗到文宗统治的30年中，阶级斗争进入第二阶段。各地起义的次数有所减少，但是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更加激发了各族人民的斗争意志。他们接受前一时期的教训，采取隐蔽的办法，通过传布白莲教的宗教活动形式，加强组织力量和积蓄力量，等待

时机。元朝统治者也看到这一点，他们三令五申，取缔人民群众的宗教活动和秘密结社。成宗以后，元朝政府屡次颁布禁止白莲教活动和秘密结社的命令。但各地人民仍然利用白莲教组织起义，如1325年（泰定二年），息州（今河南息县）民赵丑厮、郭菩萨，宣传“弥勒佛当有天下”，利用宗教进行起义活动。斗争的范围从南方扩展到北方，蔓延到元朝统治者的心脏地区。

第二阶段中起义规模最大的要算江西蔡五九起义。1315年（延祐二年），由于元仁宗推行铁木迭儿的“括田法”，大肆掠夺民田，对人民剥削加重，赣州人蔡五九率众攻下宁都，占领附近州县，并在宁化（今属福建）称王，后被元军镇压。

元顺帝即位后，由于社会矛盾进一步尖锐，人民起义进入第三阶段。

1337年（后至元三年）正月，广州增城县朱光卿起义，石昆山、钟大明率众响应，建“大金国”。四月，惠州归善县戴甲、聂秀卿起义，戴甲称定光佛出世，号召群众，并与朱光卿相结合，声势大振。同年二月，棒胡起义于汝宁（今河南汝南）。棒胡以善使棍棒闻名，有徒弟百余人，起义时烧香聚众，制弥勒佛小旗，建年号，称“李老君太子”，起义军攻破归德府之鹿邑，焚陈州屯营。起义坚持了一年多才被镇压。与此同时，四川合州大足县韩法师也起兵反元，自称“南朝赵王”；吐蕃藏民起义，杀镇西王子党兀班，元朝政府专立行宣政院进行镇压。

1338年六月，福建漳州南胜县畲民李志甫起义，一直坚持了两年之久。江西袁州（今宜春）有彭莹玉及其徒弟周子旺起义，起义军达5 000人之多，周子旺称“周王”，改国号。次年，河南杞县范孟，假传圣旨，杀行省长官，自称都元帅，拘收大小衙门印，事发被杀。

1341年（至正元年）四月，湖南道州徭民蒋丙率众起义，自称顺天王，连克数州，元朝虽调动三省军队围剿，蒋丙起义仍延续了好几年。这一年，山东、河北的农民起义达300余处之多。

从 1342—1349 年，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仍然连绵不断，而且扩大到边远地区。如辽阳有“吾者野人”、女真人起义，辽东镇火奴、辽阳兀颜拨鲁欢均自称“大金子孙”，起兵反元；山东有私盐贩郭火你赤起义，范围达到山西、河北等地；福建汀州有罗天麟起义；湖南徭民继蒋丙之后，有吴天保起义，活动于黔阳、沅州（今芷江）、武冈、宝庆、靖州（今靖县）、金州、辰州（今沅陵）等地；大都周围的通州（今北京通州区）、冀宁路（今山西太原）平遥等地均爆发起义。此外，漠北的蒙古八邻部，西北的哈剌火州（今新疆吐鲁番）也有反抗斗争。

总之，元末农民起义前夕，各族人民起义已遍及全国，全国性的政治大动荡即将来到，当时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之下。

第七章　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一、元初的重农措施

过去，人们常常有这样一种错误概念：来自北方游牧地区的蒙古统治者，是非常不重视农业生产的，因此，元朝时期我国的社会经济不是发展了，而是倒退了。其实，这是一种偏见。我们通过客观事实来实事求是地分析一下，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元朝的社会经济不是倒退了，而是发展了。

的确，在蒙古和元朝统一全国过程中，由于战争的破坏，全国不少地方、特别是中原地区，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人民遭杀戮，耕地任荒芜，这是极普遍的现象。尤其严重的是：大片耕地被蒙古贵族圈为牧地，昔日布满庄稼的田野，变成了牧场。他们在农业地区强行推行放牧的生产方式，造成了北方地区生产力的急剧下降。但是，这种倒退的生产方式不能持久。人民逃亡，武装反抗，社会动荡不安，威胁着蒙古政权的生存。所以，从窝阔台统治时起，就在耶律楚材等人的帮助下，开始对农业生产重视起来。到了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对农业生产就更加重视了。

忽必烈是一个很有作为的蒙古族政治家，他懂得只有保持中原地区原有的政治经济制度，才能成为统治全中国的皇帝，只有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才能安定社会秩序、保证国库充实，使新王朝得以巩固。所以，他即位后不久，就在诏书中说：“国家以人民为本，人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并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

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有：

第一，设立“司农司”等管理农业的政府机构。

早在1260年（中统元年）忽必烈刚上台不久，就设了十路宣抚司，命令各路宣抚司挑选通晓农事的人当劝农官。第二年，又设立了劝农司，命汉儒姚燧为大司农，陈邃等8名懂农业的专家为劝农使，叫他们分路去考察各地的农业生产情况。接着，忽必烈又多次发布官吏升降的条例，其中规定“户口增”、“田野辟”作为主要的标准。1270年（至元七年）正式成立司农司这一管理农业的政府机构。它的职责是：专管农桑水利事务；派出劝农官巡视各地，督促检查农业生产情况；考察地方官的勤惰，申报地方官升降的材料。还命令各道提刑按察司兼管农事，各县达鲁花赤或县令兼劝农事。司农司和劝农司在元初的一段时期内，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过程中曾起过积极作用。

第二，编写《农桑辑要》，指导农业生产。

司农司成立后，为了推广当时的先进耕作技术，使农户掌握气节，提高农业产量，下令遍求古今所有农书，组织写作，进行研究，选择这些古农书中切合当时实际的记载，于1273年（至元十年）编成《农桑辑要》一书。这本书共分七卷，包括典训（前代古农书中关于农桑起源及农桑重要性的叙述）、耕垦（耕种操作）、播种、栽桑、养蚕、瓜菜、果实、竹木、药草、孳畜、岁用杂事（农民家庭生活的月计划）等内容。这本书在其他古农书的基础上有了很大发展，不仅增添了许多新内容，总结了一些新的生产经验，还记载了一些新作物推广情况。例如：由于棉花在北方已开始种植，书中详细介绍了棉花种植的方法，于是一整套选种、栽培、加工等技术也随之推广。所以，这部农书既为我们今天保存了一些古农书资料，又总结了公元6世纪到13世纪之间我国劳动人民在农业生产中所取得的经验，对指导当时的农业生产是十分有用的。

第三，禁止毁农田为牧地，限制贵族占有过多的“驱口”。

忽必烈上台后，蒙古贵族侵占农田改为牧地的情况没有停止。

为了保证政府的军饷供给，恢复北方的农业生产，他下令禁止以民田为牧地，派官员清理被改为牧地的民田，一律恢复农业耕作，从此以后，占民田为牧场的现象渐渐停止了。1271 年（至元八年），忽必烈颁布了《户口条画》，对户口进行一次大整顿，将诸王贵族、权豪世家非法占为“驱口”的人追查出来，让他们编籍为民。但这一措施是不彻底的，诸王功臣在进攻南宋时仍然大规模地掠民为“驱口”。如进攻南宋的武将阿里海牙，在 1277 年（至元十四年）有“驱口”3 800 户，被忽必烈放还原籍为民；1280 年（至元十七年）时他又和另一个贵族占有俘民 32 000 余人，又被放为良民；1282 年（至元十九年）时再次占有 1 800 户“驱口”，虽经朝廷释放了一部分，但另一部分仍然赐给功臣为奴。实际上元代诸王、功臣、权豪占民为奴的情况是很严重的。

第四，招集逃亡，鼓励开荒，开展屯田。

忽必烈为了把战争中逃亡的人口招集起来从事农业生产，多次颁布诏令，减轻剥削，奖励垦荒。如 1261 年（中统二年）时规定：流民还业第一年免税，第二年减半，以后一直照此办理。

元代的军民屯田是很发达的。中央的枢密院以其所辖的诸卫军开展屯田，司农司主要招募无业农民进行开垦荒地。这些军民屯田，散布于江淮、襄阳、沿海，以及辽阳、岭北、甘肃、云南等边远地区。到至大年间时（1308—1311），全国屯田已有 120 余所。这些屯田对提高农业生产和开发边疆地区有很大作用。

第五，兴修水利。

元朝前期，统治者对兴修水利是很重视的。中央专门设都水监，地方置河渠司，以负责兴办水利和修理河堤等事务。有时为了某一工程的需要，还设行都水司、都水庸田司等临时机构。著名的天文学家郭守敬也是一位水利工程家，他主持过都水监的工作，曾在宁夏地区修复过唐来、汉延等大小 80 多条河渠，使 9 万余顷田地重新得到灌溉。

元代最大的水利工程是凿通南北大运河。元朝前，沟通南北的

大运河还是隋炀帝时凿通的那条迂回曲折的运河。到元朝时，这条运河的走向是：由杭州至镇江，过江后北上入淮，进入黄河，西去中滦（今河南封丘县南），由中滦陆行至淇门，入御河达白河，然后陆路至大都。这条运河曲折绕道，水陆并用，非常不便。元朝政府从1281年（至元十八年）起，开始分段开凿新的南北大运河，先开通泗水至汶水一段，又开自东昌路须城县（今山东东平）的安山、经过寿张到临清进入御河的一段，叫会通河；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由郭守敬主持开通惠河，自昌平白浮村穿过大都，东至通州，与白河联结。这样，一条沟通南北的新的大运河完成了。这条运河的开通，对南北交流、漕运的发展、农田灌溉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元朝前期的这些重农措施，总的来说，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有利的。

二、"户口增，田野辟"

忽必烈曾经以"户口增，田野辟"作为考核各级官吏的重要标准，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一切社会财富都是由劳动者生产的，在生产水平比较低的封建社会里，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劳动者增加了，生产力也随之增长，而农业生产的提高，又是封建经济繁荣的基础。

在长期的战乱中，人口锐减。1262年（中统三年）时，蒙古政权所辖的土地大致与金朝统治的范围相当，但当时只有1 476 146户，以每户5口来计算，仅700多万人，与1207年（泰和七年）时金朝有7 684 438户，45 816 079人比较，差得很远。到1275年（至元十二年）全国接近统一时，也只有4 764 077户，以每户5口计，人口只有2 400万左右，比金朝和南宋相加的全国总人口约7 300多万，相差更远。

由于忽必烈等元朝统治者采取了招集流亡、鼓励农耕、禁止杀

戮等措施，一方面使北方流亡的人口逐渐固定下来，另一方面在进攻南宋时屠杀人口相对减少，因此全国的人口逐年增加，基本上达到了“户口增”的要求。元代人口增加的情况，见下表：

公　元	元　纪　年	户	口
1235 年	太宗七年	873 781	4 754 975①
1262 年	中统三年	1 476 146	
1271 年	至元八年	1 946 270	
1275 年	至元十二年	4 764 077	
1290 年	至元二十七年	13 196 206	58 834 711
1330 年	至顺元年	13 400 699	

从上表来看，元代人口是不断增加的，估计到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前，全国人口总数有 7 000 万左右，接近或达到金和南宋人口的总和。

我们还可以从镇江地方的人口增加情况来看元代人口增长的一个侧面。镇江地处长江之滨，为南北交通要道。元朝进攻江南时，这里没有发生大的战争，因此居民基本上没有遭到杀戮，也没有发生大规模逃亡。到 1290 年时镇江的人口就已恢复到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的户 118 400、口 644 100 的水平，到元文宗至顺年间（1330—1332）时有户 114 000 多、口 660 000 多，超过了南宋嘉定时的水平。

有了充足的劳动力，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就有了条件。元代的农业生产虽然发展是不平衡的，但与前代比较，还是有不少提高的。

① 燕京、顺天等 36 路统计数。

北方黄河流域在金朝统治的100年间，农业生产水平大大落后于南方，加上蒙古军队的破坏，真是残破不堪。但经过劳动人民几十年辛勤劳动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陕西地区，元初开辟了6 000多顷屯田，使大量荒地、牧地开垦成农田，出现了五谷丰登的景象，关中的麦子竟闻名天下；在山西地区，由于水利搞得比较好，汾水流域能一年三熟；在河北地区，军民屯田面积很大，在新城地方出现了仓廪丰实的景象；在山东地区的登州地方（今山东蓬莱），由于当地农民“垦辟有方”，使农业产量大增；在河南地区，荒地开垦和水利建设都有不少成绩，使流民纷纷回到原籍，荒芜的土地变为腴田，地价竟十倍、百倍地上涨。

淮河流域是宋元长期争夺的地方，恢复起来是很不容易的。元初在两淮地区办了不少屯田，修了许多水利，因此成效显著。如安丰的芍陂可灌溉农田1万多顷，到1284年（至元二十一年），芍陂屯田1年就收获了粳糯2.5万石。

长江以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在南宋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江浙地区的粮食产量一直是全国最高的地区之一，产量继续提高，新辟农田大量增加，元朝的江浙行省（包括今天的苏南、浙江、福建等地）每年税粮占全国税粮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可见这一地区的田亩之多和产量之高；湖广地区是另一个重要的产粮区，湖广行省的税粮仅次于江浙行省；江西行省也是重要的产粮区，每年税粮占全国第三位。

四川地区的农业生产，战争中破坏十分严重。由于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发展缓慢，元朝在四川行省所设的军民屯田机构达29个之多，仅军屯就有2 000多顷。

在以汉族为主的各族劳动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元代的农业生产工具有所改进和创造。耘锄、镫锄、耘荡等中耕工具发展起来了，大大减轻了除草、疏泥等费时费力的劳动；收割用的镰刀，种类增加了，收荞麦用的推镰就是元代创造出来的；水力机械和灌溉器具

都有了很大改进；水轮、水砻、水转连磨等比前代更趋完备；牛转翻车、高转筒车等已经广泛应用。生产工具的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

元代农业生产的发展还表现在棉花和其他新作物的推广上。

棉花是与人民生活直接有关的一种经济作物。我国古代的衣着全靠丝麻，自从棉花在元代广泛种植后，人民的穿衣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棉花古称“吉贝”（由马来语转译）或“白叠”（由波斯语转译），分别由陆路和东南海道传入中国。南北朝时，西域的高昌境内已种植“白叠子”，并织成棉布。东汉时，云南境内的少数民族哀牢人也种棉花，并织成“白叠花布”。到宋代时，棉花开始推广到闽广及陕西地区。到元代时，棉花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普遍种植。因此在《农桑辑要》和王祯《农书》中还专门总结了棉花栽培经验。元朝政府还专门在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等地设木棉提举司，提倡大力种植棉花，后来甚至规定江南地区夏税缴纳木棉和布匹等实物。同时，江南的植棉技术也向北方推广。

除棉花外，西瓜、红花、蚕豆、亚麻等作物也广为种植。西瓜是契丹从畏兀儿地区引进的，原产北方，元朝时江淮、福建、两广、浙江等许多地方都已普遍种植；红花是张骞通西域时带回中国的，到元朝时已处处种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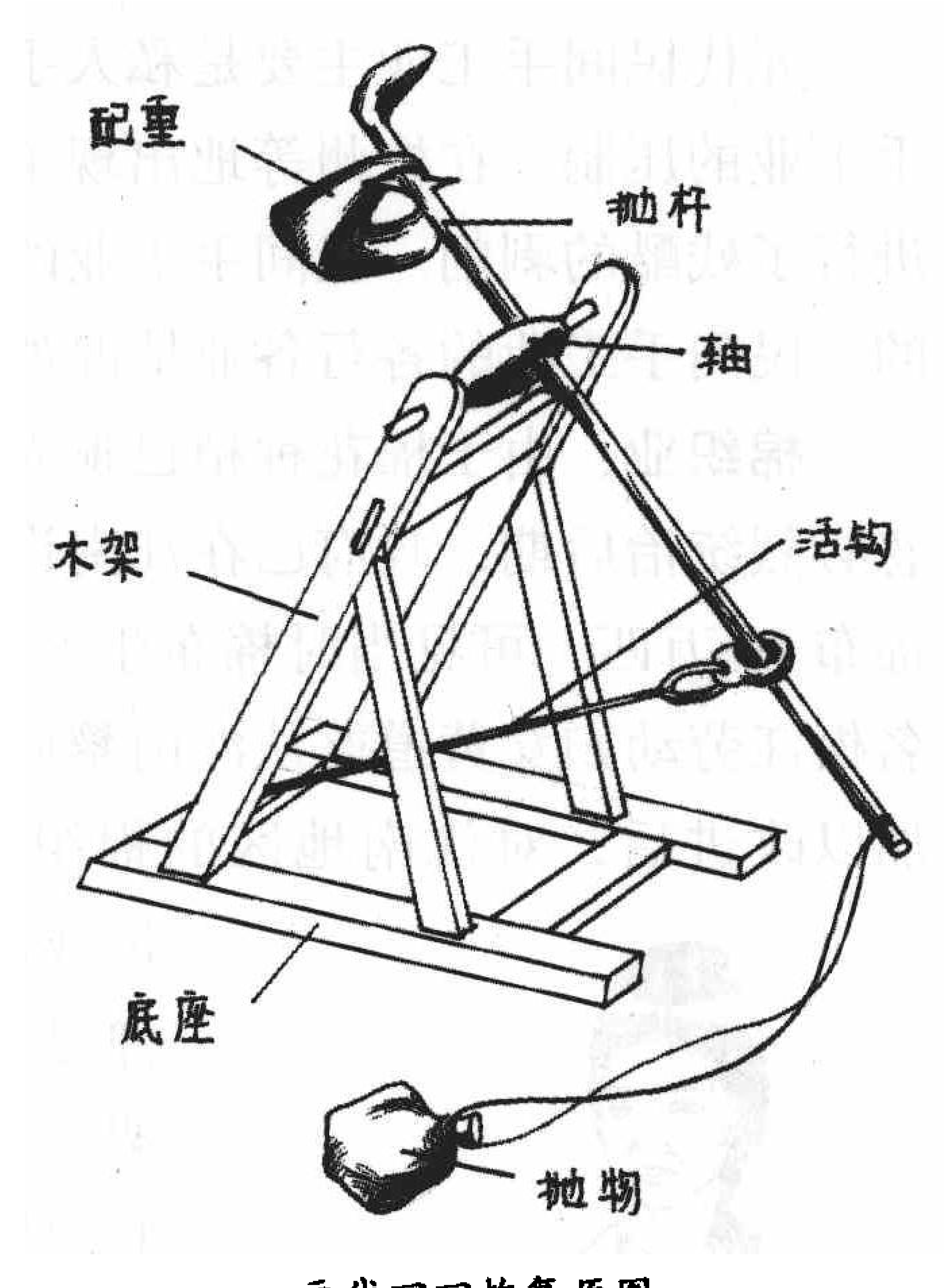
三、官私手工业状况

元朝的官私手工业规模都是很大的。手工业产品也很丰富，而且有它的特色。

政府直接控制的手工业局院，遍布全国各地，拥有许多工匠。这些工匠主要来自战争中的俘虏，还有逃奴、罪犯和世袭匠户。

官手工业的规模很大，主要从事军事生产和日用奢侈品生产。成本很低，但是生产效率不高，浪费却很厉害。各部门的情况大体如下：

兵器业：能生产“回回炮”、折叠弩等新式武器。回回炮威力很大。现存至顺和至正年间所造火炮是世界上最早的古代火炮。



元代回回炮复原图

冶铁业：工部总管府下设有镔铁局，专门炼镔铁等产品。解放后在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土城子村发现了元集宁路总管府的遗址，城分内外两重：外城西北部遍布焦结的大块煤渣，出土有风箱炉灶上用的多孔盘残片和风箱上隔灰用的砖球，还有大铁勺和大量铁镞；内城南部分布着冶炼遗址，出土有铜铁渣屑和坩埚片。从这个城堡的遗址来看，当时冶炼水平是很高的，规模是很大的。

毡罽（jì）业：也有专门的局院，规模很大，分工很细。用的羊毛分白秋毛、青秋毛、白绒毛等种类，染的毛绳有青、红、赤、黄、绿、银、褐、粉红、明绿等色，织出的品种有剪绒花毯、脱罗毡、入乐白毡、半白矾毡、无矾白毡、雀白毡、半青红芽毡、红毡、染青毡、白袜毡、白毡胎、回回剪绒毡等，地毯最大的长 50 尺，宽 22 尺半。

染织业：规模大、分工细。如庆元路织染局拥有房舍 101 间，机房 25 间，打线坊屋 41 间，染房 4 间，数百名工匠；金陵（今江苏南京）东西织染局共有工匠 3 000 多户，机 145 张，每年造缎 4 527匹，用丝 11 502 斤 8 两。产品主要是给皇室和官府用的，十

分讲究。

官手工业的优质产品是在人力、物力巨大浪费下，通过从全国搜括来的技术高明的工匠强制劳动下创造的。

元代民间手工业主要是私人手工作坊和家庭手工业，它受到官手工业的压制。在杭州等地出现了雇佣劳动，作坊主对手工业工人进行了残酷的剥削。民间手工业的产品是广大手工业工匠创造出来的。民间手工业的各行各业情况如下：

棉织业：由于棉花种植已遍及全国，棉纺织业已在全国推广。忽必烈统治后期，政府已在江南设木棉提举司，并要江南民每年输棉布 10 万匹，可见当时棉布生产已成为江南农村的家庭副业。著名松江劳动妇女黄道婆从海南黎族人民那里学会了先进棉纺技术并加以改进后，对江南地区的棉织业有很大推动，据王祯《农书》记载，当时使用的纺织工具有搅车、弹弓、卷筵、纺车、拨车、軠床、线架、织机等。到元末时又发明了檀木制的椎子，用它来敲击弓弦，功效大大提高。由于棉织品产量提高，使人民的穿着发生了很大变化，如 1975 年在山东邹县发现的元代李裕庵墓中发现了棉布长袖单袍等棉制品。元代的棉纺织品质量与花色品种也极为人们所欢迎，松江的棉布，色鲜美观，有人描写它像一幅院画，而且久洗不易脱色。



黄道婆

丝织业：元代丝织业发达的城市很多，杭州、金陵、平江、成都、泉州、嘉兴等地都有很多丝绸作坊，产品丰富。如嘉兴路崇德县的丝织品种类就有丝绵、绢、绫、罗、纱、紬、

绨、绮绣等。这些丰富的丝织品使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赞叹不已。1965 年在苏州发现的张士诚母曹氏墓中出土的一件薄丝绵缎袄，织工精细，工艺水平极高。它是平纹素绸里，缎纹为五枚经缎纹心，花五枚纬纹组织，以连续曲尺云朵纹饰，间以如意、珊瑚、玉钏、银锭等八宝图案纹。山东邹县李裕庵墓中出土的一幅绸织方巾，人物、鸟兽、花纹图案，连同框内的 42 个文字同时织成，也显示了元代丝织技术的高度发展。

瓷器业：江西景德镇的瓷器到了元代有了飞跃的发展，这里有官窑和私窑之分。官窑出产质量很高的白瓷，专供蒙古贵族饮乳食酪和马上使用，纹饰受到喇嘛教艺术的影响。民窑像雨后春笋一样，开设很多，湖广、四川等地所用的瓷器，都从这里运去，产品以青花、雕花、画花最著名。除景德镇外，浙江龙泉，山西的蒲州、潞安、霍州，河北的漳水，都有许多新产品。龙泉的青瓷和景德镇的青瓷远销国外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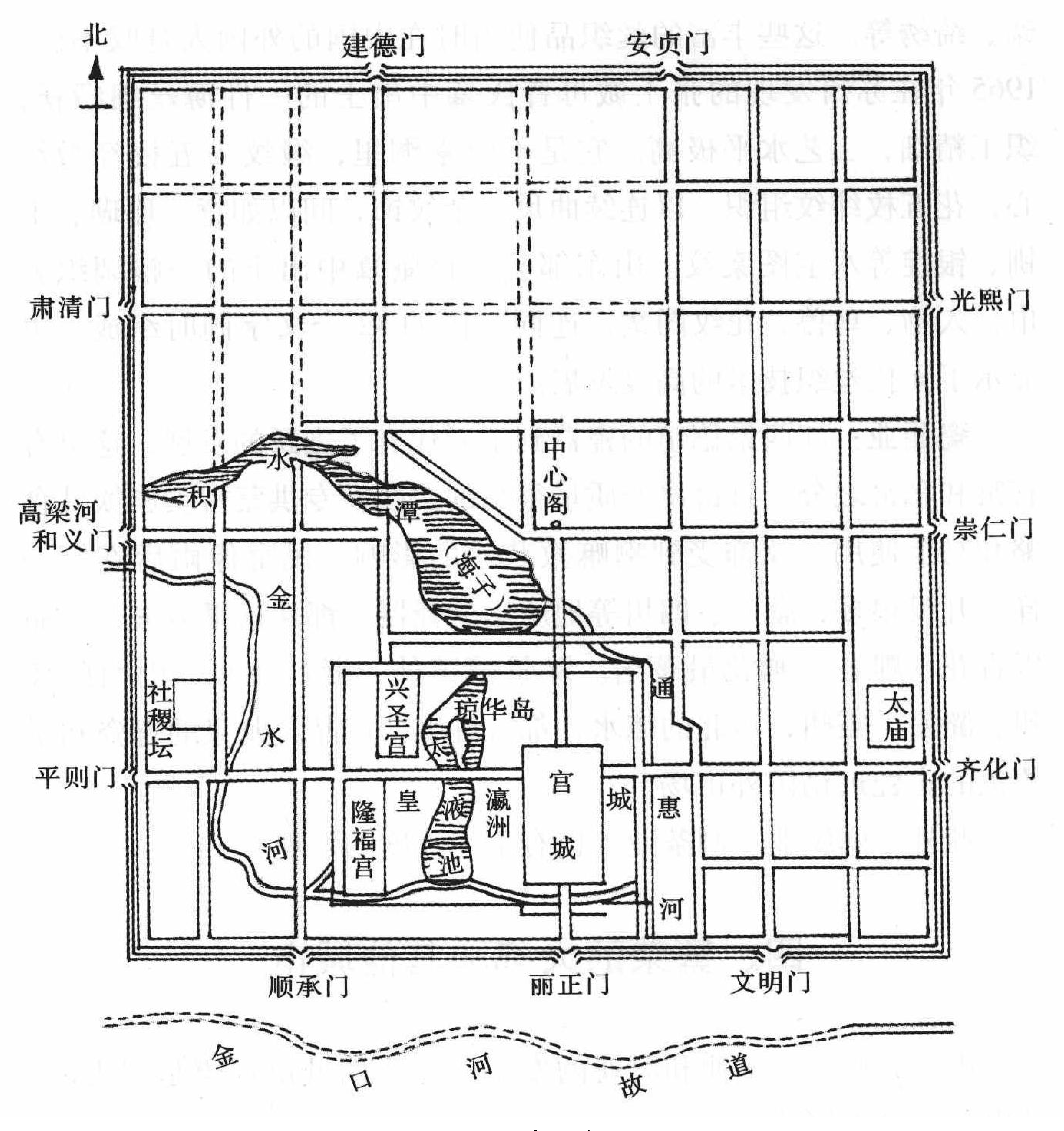
此外，麻织业、制茶业等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四、繁荣的大都和其他城市

由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元代的城市规模是很大的，城市经济也很繁荣。

大都是元朝的都城，就是今天的北京市。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公元 10 世纪的辽代、12 世纪的金代都先后在这里建都。1263 年（中统四年），忽必烈将开平升为上都；次年，将燕京（即今北京）升为中都，1267 年（至元四年）起在辽金旧城的东北重建新城。1272 年（至元九年）改中都为大都。

大都开始营建于 1267 年。由当时的工部尚书段天福和回回人、主管工匠的达鲁花赤也黑迭儿主持，也黑迭儿是主要设计师。大都的设计是非常科学和美观的。



元大都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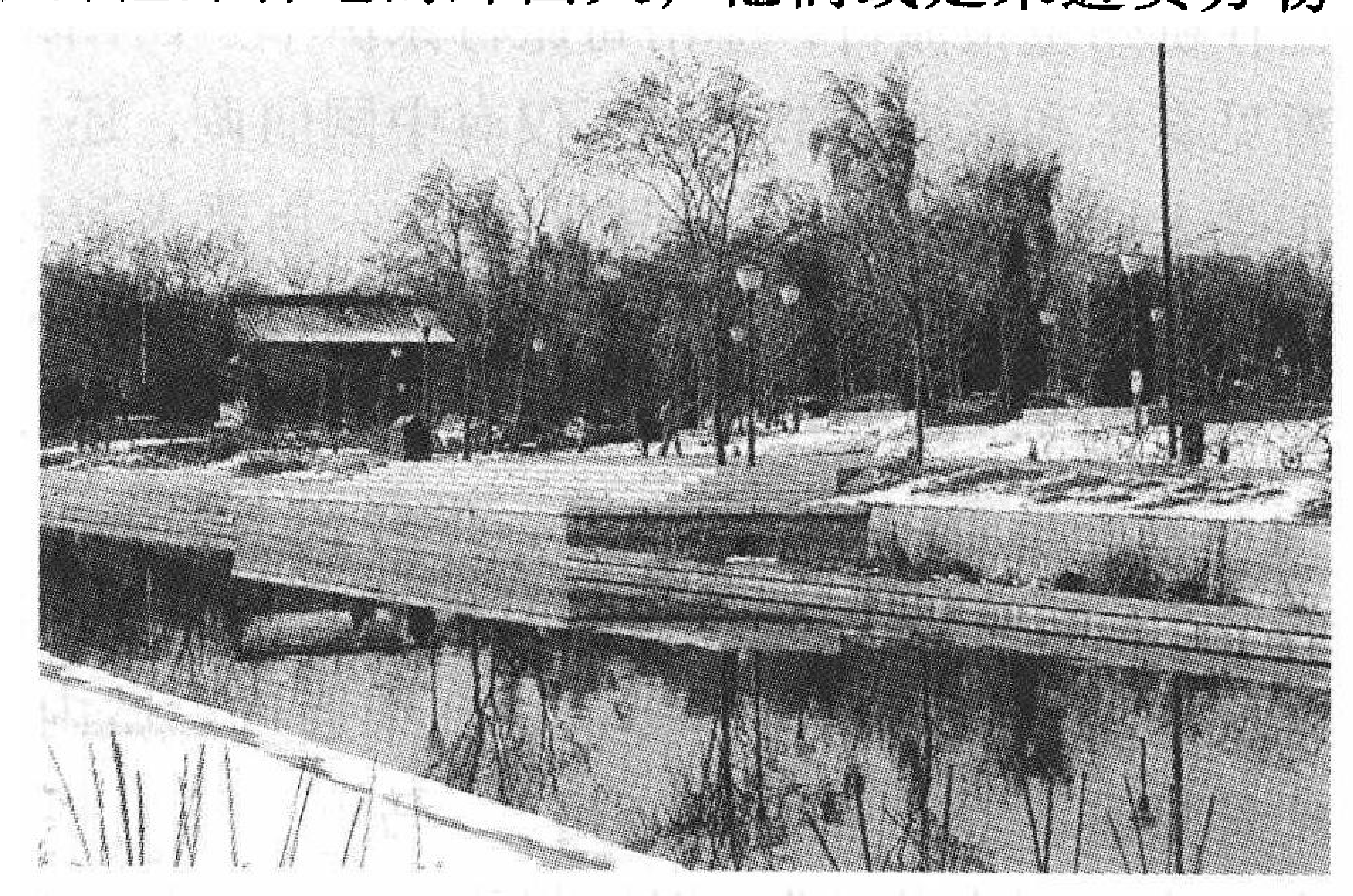
大都有三层城郭，分外郭城、皇城和宫城。外郭城墙用夯土筑城，是南北略长的长方形，周围 60 里（元制），合今 28 600 米。全城共有城门 11 座：南面自西向东是顺承门（今西单）、丽正门（今天安门南）和文明门（今东单），北面自西向东是健德门（今德胜门小关）、安贞门（今安定门小关），西面自北向南是肃清门（今北师大西）、和义门（今西直门）和平则门（今阜城门），东面自北向南是光熙门（今和平里东）、崇仁门（今东直门）和齐化门（今朝阳门）。皇城位于全城南部的中央地区，东墙在今地安门

南。皇城的西半部，有隆福宫、兴圣宫和太液池。皇城的东半部是宫城，其范围南起今故宫太和殿，北至今景山公园少年宫前，东西城墙大体与今天的故宫东西墙一致。

大都的街道十分整齐。城内有南北主干大道，大道的东西两侧有等距离的胡同。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说它“划线整齐”、“有如棋盘”，街道笔直，“此端可见彼端”。

宫城周围有9里30步，高35尺，分崇天、星棋、云从、东华、西华、厚载6门。宫城内以殿堂为主，亭台楼阁相配，修建十分雅致。宫城西边的太液池有万寿山，由玲珑石堆垒而成，峰峦隐映，松桧隆郁，秀丽得像天然形成的。金水河潺潺流入，引至山顶，从石龙口注入方池，流至仁智殿后面的石刻蟠龙，龙口昂首喷水，然后由东西流入太液池。此类胜景，宫城内外，比比皆是，都是元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大都人口众多，华丽的建筑栉次鳞比，交通发达，商业繁荣。马可·波罗把他目睹到的情况作了如下记载。他说：“汗八里（即大都）城内外人口繁多，有若干城门，还有不少附郭。居住在这些附郭中的有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他们或是来进贡方物的，或是来售货给宫中的，所以城内外都有华屋巨室，有的是贵族居住的，有的是供商人居住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专门住宅。国外运来的价钱昂贵的珍品和各种商品之多，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与之相比。来自各地的货物，川流不息。仅丝一项，每天进城的有成千车。还有不少丝织品。”马可·波罗的记载并非夸张，确实是当时大都的真实情况。



元大都城垣遗址

大都的文化生活也很丰富，戏院里演出杂剧、评话、散曲，是

元朝前期杂剧的中心，拥有许多著名的杂剧作家和演员。

除了大都外，还有杭州、苏州、广州、泉州、扬州、镇江、开封等大都市。杭州是南宋的都城，在元朝时也非常繁荣。马可·波罗描写道："此城周围广有百哩（意大利制），内有一万二千石桥，桥很高，大舟可以通行。城里有十二种行业，每个行业有一万二千户，每户至少有十人。人们非常勤劳，产品丰富，还供应其他城市。工厂的主人和他的家属都不劳动，过着像国王一样奢侈的生活。城里的西湖，周围广三十哩，沿湖有极其美丽的宫殿和华丽的住宅，都是城中的富户贵人所占有的。有一大河流到大海，因此船舶来往频繁。附近有澉浦城，是一个海港，种种商货都由此地运往印度和其他国家。"马可·波罗讲的也大体上是事实。在中国的史书里，记载了杭州工商业发达的情况，特别是丝织业十分兴旺，市内手工工场很多，到元朝末年时已经出现了雇佣劳动。中国史书里还记载了回回商人聚居在杭州八间楼一带的情况，他们在中国经商、定居，以杭州为家。杭州还是元代后期杂剧的中心。许多著名的杂剧家和著名小说家如施耐庵、罗贯中等都在这里从事过创作活动。西域音乐在杭州也很流行，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杭州游览运河时，看见奏乐和歌唱的节目，不仅有中国曲调，还有阿拉伯和波斯音乐，很受人们欢迎。和他一起旅行的人一再要求演奏者再来一个。

另一个大城市苏州，在马可·波罗的笔下也是非常吸引人的。他说："其城甚大，周围有六十哩，人烟稠密，简直不知其数，这些人大多是商人和手工业者，也有文人和医生，假如他们都是战士的话，一定可以占领世界的其他地方。这座城有桥六千，都是用石砌成的，两艘船可以并排从桥孔中通过。城内工商业发达，尤其以产丝最多，丝织品极其丰富。"马可·波罗根据中国的谚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把杭州称为"天城"，把苏州称为"地城"。

五、发达的国内外贸易

元朝时，国内外贸易很发达，这是因为元朝农业、手工业的发

展为商业活动奠定了物质基础，加上全国的统一和水陆交通的发达，钞法的通行，这就为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元朝农业、手工业发展的情况前面已经讲了。下面讲一下水陆交通和钞法流行的情况。

元代水陆交通十分发达。当时从大都到全国各地都有驿站相通，一直伸到极其边远的地区。水上交通更是超过了前代，南北之间有运河和海道。元运河的开凿，主要目的是为了漕运，但也为商人运输提供了方便。当时有的大商人建造了装载三四百斛或五百斛的大船，使货物南北沟通。杭州和楚州（今江苏淮安）间，有定期往返航船，沿河两岸出现了许多市镇，如楚州、济宁、东昌、临清、长芦、直沽等。海道是1276年（至元十三年）伯颜攻下临安后开辟的。当时元军夺取了南宋的图籍、仪仗、乐器等物，因两淮地区仍为宋军控制，不能从陆路北上，就让海盗张瑄、朱清用海船运到大都。1282年（至元十九年）因河运粮食北上不便，又命上海总管罗璧、朱清、张瑄等造平底船60艘运粮北上，这条海道就成为南粮北运的主要道路。它从平江路（今江苏苏州）刘家港入海，绕过山东半岛东北端的成山角，直抵杨村码头（今天津武清县东南50里）。以后，这条海道经多次修改，更加便捷了。海道的开辟不仅增加了南北货运量，也为外国海船去北方贸易提供了方便。

钞法的流行也是元代商业繁荣的重要因素。纸币的产生是商业发展的需要，我国古代使用纸币始于唐宋，唐代的飞钱，宋代的交子、会子，金代的交钞都是纸币的一种形式。蒙古灭金后，就开始使用钞法了。1260年（中统元年）忽必烈发行中统交钞，以丝为本；又发行中统元宝钞，以银为本。1287年（至元二十四年）发行至元宝钞。1310年（至大三年）又发行至大银钞。虽然出现了通货膨胀、物价腾贵，但纸币的发行，对商品贸易无疑起了促进作用。

元代的国内外贸易主要操纵在封建政府和贵族、官僚、大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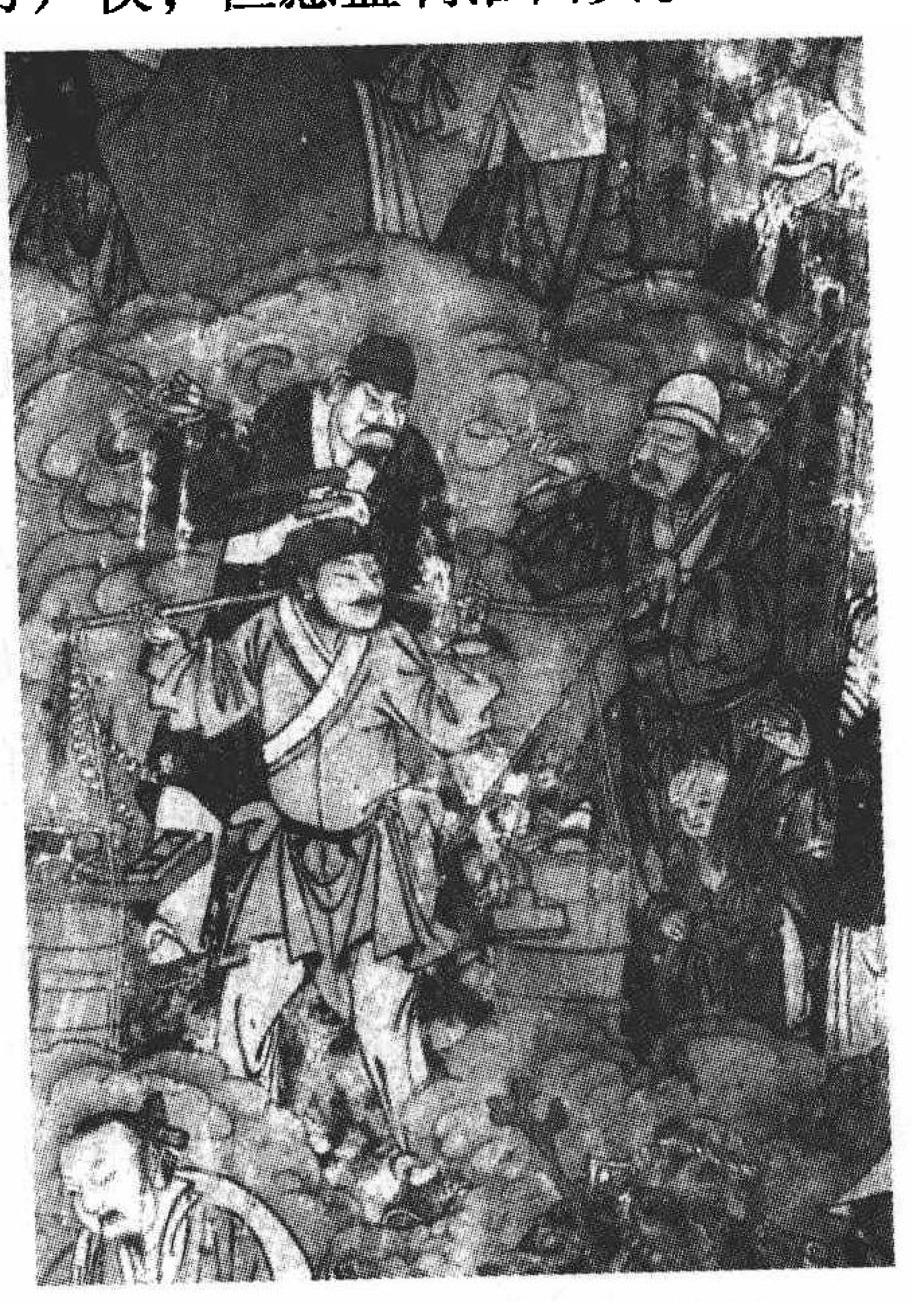
的手中。封建政府为了垄断专利，规定金、银、铜、铁、盐、茶、水银、矾、铅、锡、酒、醋、农具等都由政府专卖，或由封建政府转卖给商人，再由商人经营，或由商人经营，政府抽利。

蒙古的诸王、后妃、公主、驸马、大臣等往往通过其奴仆或西域商人进行商业活动，他们则坐收其利。如忽必烈的孙子、封王在湖广的威顺王宽彻普化，即曾纠集一批巨商，进行经商活动。他们依仗威顺王的权势，当地政府根本不敢干预。西域商人阿合马、桑哥，汉人卢世荣等都是以经商、理财得宠，爬上高位的。

在元朝政府的保护下，寺院、道观也经营商业，他们开设旅馆、浴室、酒店、栈房等，从中取利。像前面提到的大护国仁寺除了拥有大量田地外，还拥有数以百计的酒店、旅馆等。

民间的大商人也很富裕。如扬州的张文盛，拥有家僮数百，经商范围，北到河北、山东，南抵福建、广东，资金十分雄厚。两淮的盐商替官府贩运食盐，从中获取暴利，收入十分可观，过着极其阔绰的生活，有人说："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

元朝政府对国内商业采取了保护政策，使南北物资交流畅通。当时北运的商品主要有米、麦、绸缎、棉布、陶瓷器，以及从江南转运的国外商品；南运的商品有北方土产和来自西域的商品。景德镇的瓷器运销川、广、荆、湘、江浙、闽、两淮等地，长芦镇的盐供应中原广大城乡，岭南的商货运入吉州、赣州转向四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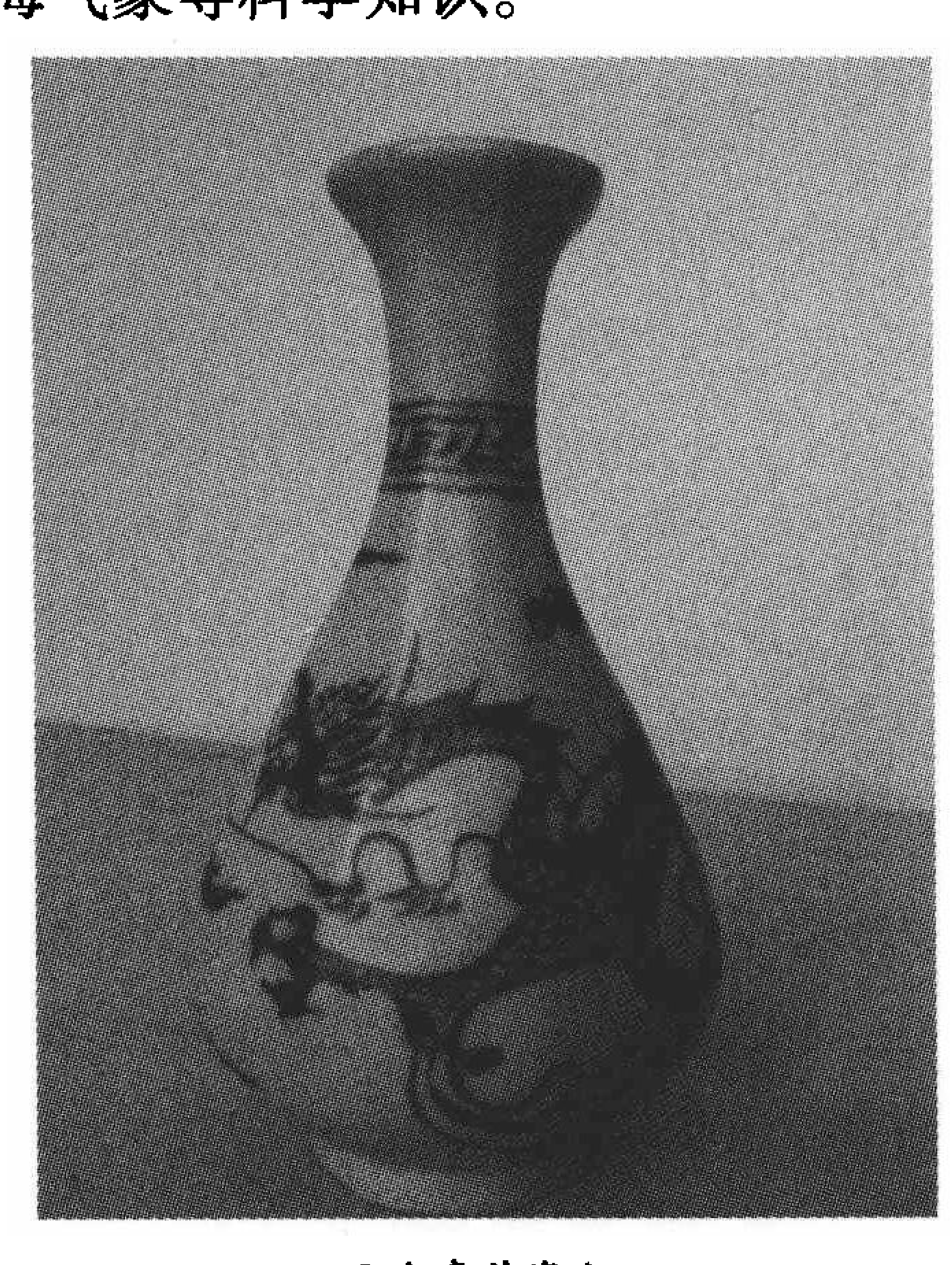
元代街市图

元代的海外贸易十分发达。政府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叫市舶司。1277 年（至元十四年）在

泉州、庆元（今浙江宁波）、上海、澉浦设立了4个市舶司，1293年（至元三十年）又增设温州、广州、杭州3个市舶司。政府通过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并收税。外国商船运来货物，十分取一，粗笨物品十五分取一，另外税收三十分之一。出口船只，由官船给本钱的所获得的利润官取七分，经营者得三分。国际贸易的范围，东到高丽、日本，南到印度和南洋各国，西达中亚、波斯、斡罗思以及阿拉伯各国、地中海东部，直到非洲东海岸。出口的商品有金、银、铜、铁货、丝绸、陶瓷器等等中国特产，进口的货物有珠宝、香料、珍兽野物等。详细情况，我们在第十章海外关系中还将谈到。

当时中国的海船活跃于海外的航线上。伊本·白图泰说，印度、中国之间的交通，都操纵在中国商人的手里。中国船舶，共分三等，大船有3帆至12帆，可载1 000人，其中水手600人，士兵400人。这种大船分4层，无风则用10人至30人摇橹，一条船有8到10根橹，有时也用纤夫拉纤。中国的航海技术是很高的，不仅广泛使用指南针，还掌握了航海气象等科学知识。

泉州是进行海外贸易的主要城市之一。有来自南洋、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地的商船，这里“百货山积”，有国外运来的胡椒、姜桂、豆蔻、纱布、珍珠、钻石、毛毡等，有等待出口的中国手工业品和农产品。广州是元代另一个海外贸易大港，这个港口拥有的船只比整个意大利还多，当时广州与世界上14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进口商品以香料、植物、木材、珍宝为主，出口商品主要是丝


元代青花瓷瓶

绸、陶瓷、茶叶等。太仓是新兴起的港口，各国商人云集于此，称为“六国码头”。外国商人认为，在中国进行贸易是最安全的。穆斯林商人到中国任何城市，可以自愿居住在已经在华定居的穆斯林商人家中或旅馆里，财物得到主人或店主妥为保管，即使商人单身一人携带大量财物，行程9个月也尽可放心。从广州到大都，沿途都有士兵保护，而且供应充足的食品。许多外国商人到中国后，向往中国的物质文明，常常买田盖房，定居下来。

第八章　文化与科技的进步

一、元曲的繁荣

元曲是元代文学的代表。它是元代封建城市经济繁荣发达、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的产物，也是我国历史上各种表演艺术，主要是歌舞艺术、讲唱伎艺、滑稽戏等长期发展互相融合的结果。

元曲包括散曲和戏剧。散曲是一种由诗词变化发展而来的新诗体；戏剧包括杂剧和南戏，杂剧是一种包括歌唱、音乐、舞蹈和完整故事情节的歌剧。通常所说的元曲，主要是指杂剧。



元杂剧演出壁画

我国唐朝时已经有戏剧的雏形。到了宋、金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宋代的一些城市里已经有许多民间艺人在戏院里进行说唱表演。宋金时期盛行一种“诸宫调”，就是有说有唱而以唱为主的演出形式，唱的部分是把多种宫调连缀在一起。元杂剧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元杂剧把歌曲、宾白、舞蹈动作结合在一起，是一种综合性的戏剧艺术。歌曲按一定的宫调和曲牌歌唱，是按规定韵律、富有抒

情性的新诗体；宾白包括人物的对白、独白，一般都用当时通俗的口语，动作叫“科”，是角色的动作表情。曲词一般由一个演员（男的称“正末”，女的称“正旦”）演唱，通过它抒发主人公的心情，表现主人公的思想性格，描绘环境，渲染气氛。反面人物和次要人物靠简短的宾白来勾画面目。

元杂剧大部分用四折（或加一楔子）演完一个完整的故事。元杂剧的作者大部分是下层知识分子，元朝前期没有科举制度，他们失去了通过科举当官的希望，就从事话本、诸宫调、杂剧的创作和演出。因为他们组织创作的专业团体叫“书会”，这些剧作家也就被称为“书会才人”。由于他们社会地位较低，又生活于城市市民中，所以作品充满了生活气息，为广大市民所欢迎。

元杂剧分前后两期。前期从13世纪50年代到14世纪初，这是元杂剧的鼎盛时期。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康进之、高文秀等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剧作家。当时杂剧的中心在大都，这些作家都是北方人，主要是大都人。14世纪初以后，杂剧中心南移到杭州，后期的杂剧作家有郑光祖、乔吉、宫天挺、秦简夫等，他们大部分是南方或寄居于南方的作家。元代后期的杂剧不像前期那样富有现实主义，比较追求曲辞的典雅工巧。据记载，元代创作了杂剧存目有600多本，现在保存下来完整的有近200本。见于记载的剧作家有近200人，最著名的有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白朴、郑光祖等。关、马、郑、白被誉为“元曲四大家”。

关汉卿，号已斋叟，大都人，大约生于13世纪20年代，死于13世纪末。他是大都创作剧本和唱本的团体——“玉京书会”里最优秀的杂剧作家。由于长期与市民接触，对社会现状很了解，他的作品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内容。他不仅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而且会下棋、蹋球、歌舞、演戏、吹弹、作诗，与艺人往来密切，常常与著名艺人朱帘秀一起粉墨登场。关汉卿共创作了63个杂剧，现在保存完全的只有12个剧本。悲剧《窦娥冤》是他最出色的代表作。

《窦娥冤》实际上是当时社会黑暗面的写照。故事情节大体是

这样的：窦娥7岁时，因父亲窦天章欠高利贷无法偿还，被卖给蔡婆婆家做童养媳。不料窦娥的丈夫早死，她就守了寡。一天，蔡婆婆出外讨账，遇赛卢医谋财害命，张驴儿和他的父亲救了她。张氏父子乘机要强娶她婆媳俩。张驴儿见窦娥不愿，就想药死蔡婆婆来威胁她，不料竟药死了自己贪嘴的父亲。这时张驴儿反咬一口，把窦娥扭送公堂，昏庸的官吏把窦娥判定死罪定斩。窦娥含冤屈死，托梦给做了官的父亲，终于平了冤狱，惩治了恶棍。剧中窦娥喊出的“衙门从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是对当时封建统治的强烈抗议。《窦娥冤》作为我国的优秀古典作品，早在100年前就被译成法文传播到欧洲各国。关汉卿的许多作品还流传到日本。



关汉卿

王实甫也是大都人。《西厢记》是王实甫的代表作。这是一部描写张生和崔莺莺恋爱故事的戏剧。作者歌颂了这一对青年男女为争取婚姻自主，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斗争精神，无情揭露和抨击了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性。《西厢记》是一部对后世文学有很大影响的优秀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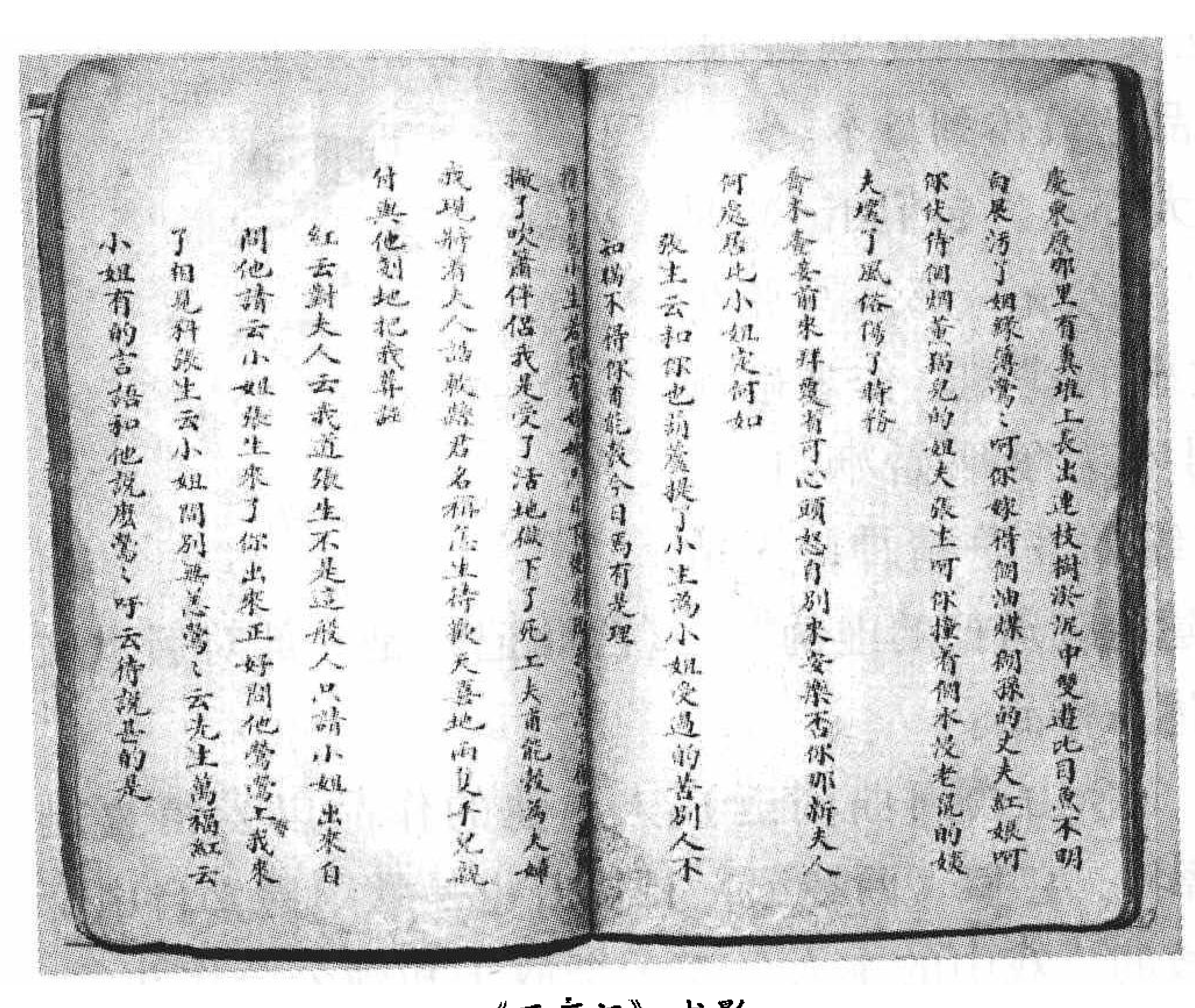
白朴是隩州（今山西河曲附近）人。他的作品以爱情喜剧《墙头马上》最著名。它和《西厢记》相似，也是歌颂男女自由恋爱、反对封建礼教的。戏中的主人公李千金敢于和她公公作斗争，最后终于和裴少俊重做夫妇。

郑光祖是元代后期的杂剧作家，平阳襄陵（今山西临汾西南）人。他的代表作是根据唐人传奇《离魂记》改编的《倩女离魂》。剧本通过张倩女灵魂出壳追随王文举进京的浪漫主义情节，突出地表现了在封建压抑下青年妇女追求爱情婚姻自由的强烈愿望。张倩女既有崔莺莺的温柔深情，又有李千金的勇敢坚定，是独具特色

的。这个剧本和关汉卿的《拜月亭》、王实甫的《西厢记》、白朴的《墙头马上》一样，都是元代著名的爱情剧。

元杂剧中以水浒英雄故事为题材的作品，至少有 33 种，今天流传下来的有 19 种。这些水浒杂剧的思想内容，大都是描写水浒英雄凌强扶弱、除暴安民的英勇事迹，歌颂他们主持正义，“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侠义行为。康进之的《李逵负荆》，以民间流传的故事为素材，描写了李逵主持正义、不怕官府和地痞流氓的英雄本质，又刻画了他粗中有细、知过必改的性格。故事情节曲折，有着自己显著的艺术特色。

南戏是流行于南方的一种剧种。形成于北宋末宣和年间，到南宋时盛行于浙江温州一带，故又称“温州杂剧”。南戏比较自由和灵活，一本剧没有一定的出数，一出中不限于通押一韵，也不限于一个宫调的曲牌；登场的角色，可生可旦，不必一人演唱到底，可以 2 人互歌，也可数人合唱，不受约束。元代后期，南戏得到进一步发展，唱腔也出现了昆山腔、海盐腔、余姚腔、杭州腔、弋阳腔等。现存南戏完整的剧本有 10 多种，存目 170 种左右。著名的南戏剧作家有高则诚等，高则诚的《琵琶记》艺术成就较高。《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被称为“四大传奇”。南戏的思想性不如杂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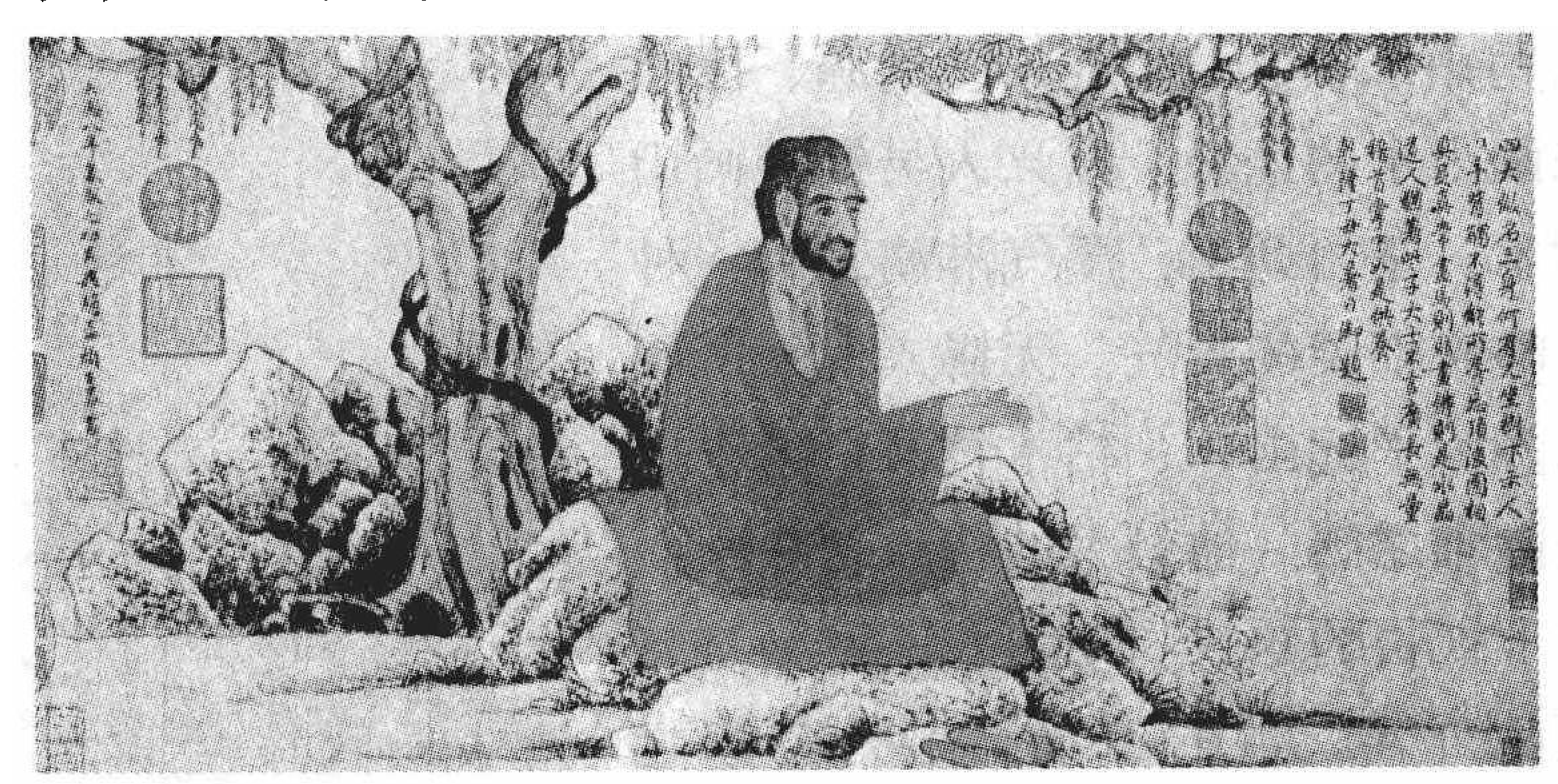

慶東原那里有糞堆上長出連枝樹淤泥中雙遊比目魚不明
白展污了姻緣簿鶯鶯呵你嫁箇油煠猢猻的丈夫紅娘呵
你伏侍箇烟薰猫兒的姐夫張生呵你撞着箇水浸老鼠的姨
夫壞了風俗傷了時務
喬木查妾前來拜覆有句心頭怒間别來安樂否你那新夫人
何處居比小姐定何如
張生云知你也損憔悴了小生為小姐受過的苦别人不
知俺不得你有般教今日為有是理
撇了吹簫伴侶我是受了活地獄下了死工夫甫能教為夫婦
我現將着夫人誥敕縣君名稱怎生待歡天喜地兩隻手兒親
付與他划地把我葬埋
紅云對夫人云我道張生不是這般人只請小姐出來自
問他請云小姐張生來了你出來正好問他鶯鶯上我來
了相見科張生云小姐間别無恙鶯鶯云先生萬福紅云
小姐有的言語和他說麼鶯鶯呵云待說甚的是

《西厢记》书影

元代的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数两种。小令主要是民间小曲，也有的脱胎于诗词，套数是合一个宫调中的几个曲子而联成的。散曲形式简单，坦率真挚，清新活泼，为一般市民所喜爱。由于散曲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常常成为群众暴露社会现实、议论时事的一种好形式。元代的散曲作家，见于记载的有 100 多人，前期有关汉卿、马致远、张养浩、卢挚、王如卿等，后期有刘致、张可久、乔吉等。康里人不忽木、畏兀儿人贯云石、回回人马九皋等成就最为突出。

二、清新的书画艺术

元代绘画风格摆脱了南宋画院的形式主义习气，形成了挥洒淋漓的写意风格，这在中国绘画史上也是一大转变。所谓写意，就是画家通过他们的作品来抒发自己那种孤傲清高的思想。比如以竹子直伸不屈比喻气节，以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比喻君子等。开一代风气的大画家赵孟频提倡“不求形似”，元代四大画家之一的倪瓒自我表白说：“我画竹是为了写胸中的逸气，何必计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所以，元代多数画家追求笔画情趣，在画面上常常题写很多诗文。



赵孟频《红衣罗汉图》

赵孟频（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湖州人。他作画主张“贵存古意”，认为人物画要继承唐人技法，山水画要学五

代人董源、巨然的风格，提倡以书法笔调写竹，用“飞白”手法画石，他的画清腴华润，成为元代画坛的宗师，传世作品较多，有《三马图》、《松水盟鸥图》等。赵孟頫是宋朝宗室，在元朝又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因此常常受到后人的非议，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

元代前期的画家中，与赵孟頫齐名的是回回人高克恭(1248—1310)，字彦敬，号房山，居大都，官至刑部尚书。他善画山水、墨竹，开始学宋人米芾、米友仁父子，后来学五代董源、李成，墨竹学黄华，但他并不拘泥于前人，自有独特创新，尤其是怪石喷浪、滩头水口，别人难以做到。高克恭的名声很大，当时就有人把他和赵孟頫相比拟，曾有：“近代丹青谁最豪，南有赵魏①北有高。”他传世的作品有《云横秀岭》、《墨竹坡石》等。


王冕《墨梅图》

继赵孟頫、高克恭之后，以“元四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最有名。常熟人黄公望的山水画笔势雄伟，以浅绛色居多；水墨画则苍茫简远，富有意境。他还是一位画论家，所作《写山水诀》，总结五代董源、巨然以来画山水的经验。嘉兴人吴镇善画山水竹木，笔力劲爽，墨气淋漓，有一种林木峥嵘郁茂的景气。无锡人倪瓒所画山水多为平远山林、枯木竹石，给人以简淡幽雅之感。他最大的特点是在画面上留下很长的题跋。湖州人王蒙，是赵孟頫的外甥，他的山水画融合各家之长，而独创一格，取景多山重水复，屋

① 赵孟頫死后追封魏国公。

字、人物点缀得宜，有曲尽幽深的情趣。

此外，元代著名的画家还有：兼长人物画和花鸟画的钱选，兼长人物画和鞍马画的任仁发，善画肖像的王绎，长于画竹的李衎、柯九思、王冕，王冕亦精于画梅，著有《梅谱》一卷，总结了前人和他画梅的经验。

元代书法艺术也达到很高的成就。赵孟頫是元代书法家第一人。当时一位著名的书画评论家陶宗仪说："孟頫以书法称雄一世。"赵孟頫5岁开始练习书法，每天清晨起床，盥洗完毕后，点好香，开始练字，一天少则几千，多则上万，几十年如一日。早年临摹王羲之《兰亭序》和隋代智永和尚《千字文》，又学唐代书法家褚遂良《孟法师碑》，又广泛搜集各种古帖，临摹笔法。由于他善于吸收各家长处，并融会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骨力秀劲，圆转流美，人称"赵体"。赵孟頫的书法不拘泥于一种形式，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他的作品在当时已是十分难得的艺术珍品，国内有不少人收藏；有一位印度和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专门请赵孟頫替他写字，带回国中收藏。

元代著名书法家还有鲜于枢、巎巎等人。鲜于枢善正、行、草书，悬腕作书，笔力劲健。巎巎是康里人，善真、行、草书，颇有晋人笔意，人们竞相珍藏他的作品。当时书法界有"北巎南赵"之说，可见他是一位与赵孟頫齐名的书法家。



永乐宫壁画《钟离权度吕洞宾》

壁画在元代相当盛行。至今在北方古寺古庙里还有不少遗迹。山西洪洞县广胜寺明应王殿的杂剧壁画，十分生动地描绘了杂剧演出场面。山西永济县永乐宫的壁画，是中

国和世界绘画史上罕见的巨作。

永乐宫是一组元代道教建筑，完整地保存了许多壁画。其中龙虎殿、三清殿的壁画用重彩勾填画法，富有装饰效果；纯阳殿、重阳殿的壁画是富有生活气息的连绘画。

三清殿《朝元图》是一套朝谒道教最高尊神元始天尊的壁画。共计人物286个，数量众多，但面型变化丰富，表情生动，每个像高达2米以上。画师具有相当高超的技艺，勾线劲紧有力，婉转自如。

三、理学的传播和邓牧的“异端”思想

理学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统治思想。它创始于北宋周敦颐，经过二程（程颢、程颐）的发挥和完善，南宋朱熹集其大成。他们把反映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三纲五常加以理论化、系统化，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秩序、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理。这在儒家的理论思维上，形成了一套比汉唐儒学更加成熟的唯心主义体系。

由于辽金和两宋的长期对立，理学在北方的传播是比较晚的。1235年（元太宗七年），蒙古军队占领德安（今湖北安陆），杨惟中、姚枢从俘虏营中找到理学家赵复，把他请到燕京，特地建立了太极书院，请赵复讲授其中。赵复把他所记得的程朱所著各种经传注，选取遗书8 000多卷，又著《传道图》等，对孔孟之道和理学的书目、宗旨、师承关系作全面介绍。于是，理学开始在北方传播开来，培养了一批著名的理学家。

被称为元代三大学者的许衡、刘因、吴澄是最有成就的理学家。

许衡（1209—1281），字仲平，人称鲁斋先生，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官至中书左丞、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曾参与议定朝仪和内外官制。他一生主要精力用于钻研理学和从事教育。在学术观点上，他在宣扬理学思想的同时，提出著名的“治生”论，认为首先要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要求，即重视吃饭穿衣的生理需要，才能谈学道、天理，反对宋儒空谈性命的习气。他的“治生

最为先务”思想，为明清时代进步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

刘因（1247—1293），一名骃，字梦吉，容城（今河北徐水旧容城）人，自号静修。一生授生，不仕官。他针对宋代理学家把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置于六经（《诗经》、《书经》、《礼记》、《易经》、《春秋》、《乐经》）之上，夸夸其谈四书中的妙语，提出六经为本、六经为史的思想，这在思想界是一种比较清新的见解。

吴澄（1249—1332），字幼清，人称草庐先生，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曾任国子司业，经筵讲官。主要从事著述、讲学。著作很多。学说上虽是朱熹的系统，但主张吸收陆九渊的“明心”（主观唯心主义）学说。他是元代“朱陆和会”的代表人物。

元朝统治者对理学大加提倡，把孔子尊为“仪范百王，师表万世”，“大成至圣文宣王”。仁宗延祐年间，朱熹的《四书集注》被定为科举考试的程式。理学实际上已成为元代的统治思想。

正当理学思想广为传播的时候，有一个自称“三教外人”的思想家邓牧，却提出了与正统理学思想相反的观点，并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统治。

邓牧（1247—1306），字牧心，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地主知识分子家庭中，年幼时读过许多古书，对诸子百家钻研很深。元军占领杭州时，他才20多岁。这时，他怀着南宋灭亡的悲愤心情，对民族压迫的强烈不满，决心放弃名利，拒不和元朝合作，周游名山大川，最后走上了隐居道观的消极道路。1305年（大德九年），元朝派当时的玄教大师吴全节到他隐居的余杭大涤山洞霄宫，请他出山做官，被他拒绝了。

邓牧为我们留下的著作不多，只有一本薄薄的《伯牙琴》。他的诗文为什么定名为《伯牙琴》呢？这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时代趋炎附势的人太多，蒙古统治者严密的控制和残暴的压迫，逼得他只能用隐晦曲折的手法来发泄他的不满，而世上能理解他的心情的人太少了。他就借用春秋时伯牙善琴、钟子期知音的故事，取了

《伯牙琴》作书名。他是非常希望也有一个“钟子期”懂得他的“琴声”的。

邓牧在《伯牙琴》中所写的《君道》、《吏道》和《二戒——学柳河东》各篇是他反对专制统治最杰出的篇章。

在《君道》篇中，邓牧对君主统治进行了无情的抨击。他说：古代立君，是为了人民。那时的皇帝生活极其俭朴，而且十分关心下民。帝位是没有人争着要做的。尧要让位于隐士许由，许由逃跑了；舜要让位给石户之农，而石户之农入海，一辈子不回来。皇位并不是至高无上的。不幸，秦始皇统一了天下，君主地位尊贵极了，横征暴敛，搜括天下的财富都供他挥霍。这样，他就像怀中揣着黄金的匹夫一样，唯恐人家来夺走它，死死地霸占着皇位不放。唉！老天生长百姓而立君，并不是为了君主呀！怎能以四海之广来供一人专用呢？皇帝并不是四睛两嘴、鳞头羽臂的怪物，是和普通常人一样的人。夺取人们的财富、霸占百姓的劳动果实是不可能“长治久安”的！

在《吏道》篇中，邓牧对那些助纣为虐的官吏进行了控诉。他说：协助皇帝治天下的官吏，由于古代君民之间相安无事，所以人数不多，而且都是选择有才能的贤者来担任的，但是有才能的贤者很不愿意当，当官的都是不得已的。后来那些当官的是怎样统治老百姓的呢？他们怕老百姓作乱，所以防范十分严密，大大小小的官吏布满了天下，取民愈广，害民愈深，有才能的贤者再也不肯当官了。于是天下愈来愈治不好了。现在的情况更加严重了，大官僚的食邑（从地方税收中分得的财富）达数万，小官吏虽无俸禄，但他们搜括资


朱德润《林下鸣琴图》

财，几十个农夫辛勤劳动也抵不上。唉！带了虎狼去放牧猪羊，猪羊怎能繁殖呢？夺取了百姓的财产，用尽了百姓的力气，百姓怎能不怒不怨呢？人民造反，就是因为剥夺了他们的生计才造成的。盗贼害民，能够随起随扑，不至于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为盗贼是有顾忌的；官吏是毫无顾忌，大白天也照样横行不法，百姓对他们敢怨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杀。这种情景难道是在老天爷怂恿之下，让他们像虎豹蛇虺（huǐ，毒蛇）一样都成为民害吗？

在另外两则寓言中，邓牧用讽刺的笔调对当时的统治者进行了揭露。在《越人与狗》中，他把元朝统治者影射为狗，刻画了“狗”的贪婪与凶残；在《楚佞鬼》中，描写了冒充“神”的“楚鬼”和依附于他的“市井亡赖”对“齐民”的欺压，后来“天神”闻知，灭了“楚鬼”，震死“亡赖”，“齐民”得安。

从以上几则短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邓牧对人吃人的君主专制统治极其痛恨，对人民反抗表示同情。这些方面说明了他的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人民性，确实是与元朝统治者提倡的儒、佛、道三教格格不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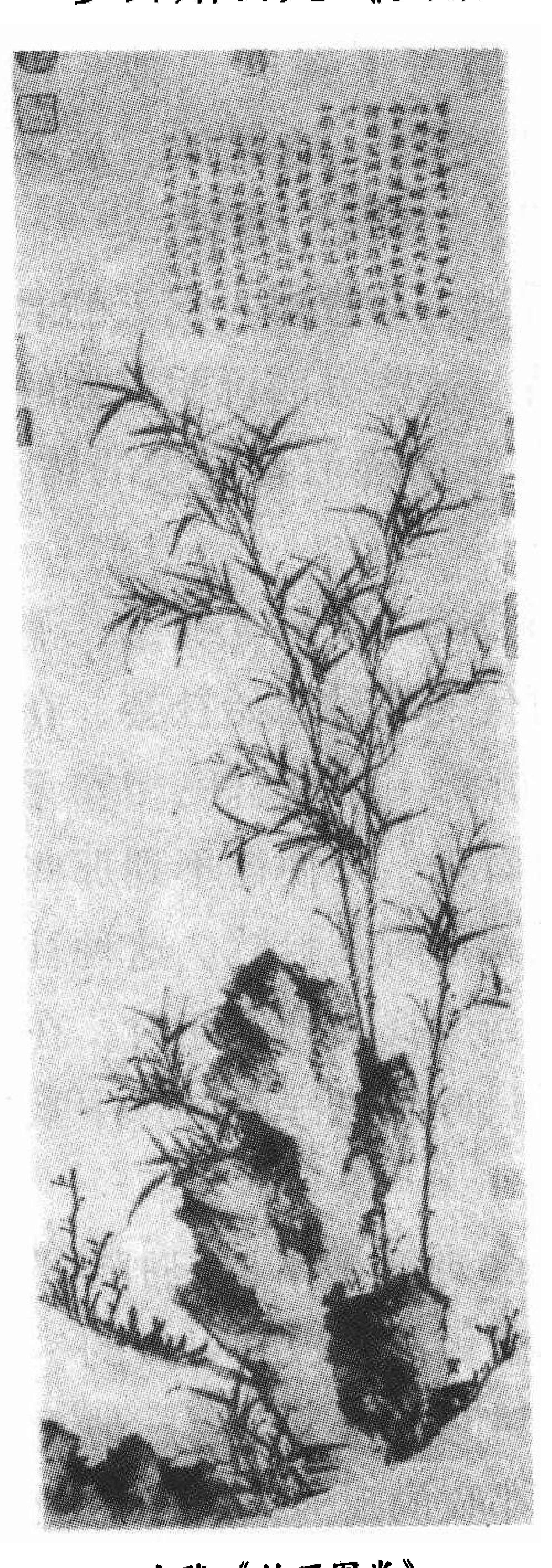
但是，在如何解决这种社会矛盾时，邓牧陷入了虚无缥缈、消极倒退的幻想之中去了。他竭力美化尧舜时代的那种原始社会，在《君道》、《吏道》中他勾画了这样的社会情景：那里君民相安无事，都是有才能的贤者来治理天下。在邓牧看来，即使得不到那些有才能的贤者，也宁可废官府，去官吏，让天下听其自然。这种社会理想当然是一种不可实现的空想。所以，当他找不到出路时，在人生观上表现得十分消极、十分悲观。最后只好躲进深山老林中默默地离开人间。

尽管邓牧的宇宙观道家色彩很浓厚，社会观充满了“乌托邦”式的幻想，人生观极其消极悲观，但他的思想仍然有极其可贵的一面，这就是他看到了封建制度的不合理，并对它进行了揭露；他看到了人民的悲惨遭遇，并对他们表示同情。邓牧的反专制统治思想在那个时代是难能可贵的，其中包含着许多民主性的精华。

四、史学的发展

元代是史学取得重大发展的历史时期。由南宋入元的两位大史学家——胡三省和马端临，分别留下了《资治通鉴注》和《文献通考》两部不朽著作；而辽、金、宋三部官修正史，亦颇具自己的特点。

胡三省（1230—1302），字身之，天台（今属浙江）人。他从26岁开始研究《资治通鉴》，曾著《广注》97卷、《论》10卷。南宋投降后，时局很乱，他在流亡新昌（今江西宜丰）时著作散失。但他以坚强的毅力，在隐居山村的条件下，继续进行研究，将自己的考异和诠释散入《资治通鉴》原文之下，而天文历法则附于各卷为注。凡历史事件的本末，地名的异同，州县建置的变迁，制度的沿革，一一加以疏证。并对南宋史昭的《资治通鉴释文》中若干谬误，加以改正，于1285年（至元二十二年）著成《资治通鉴音注》294卷、《释文辨误》12卷。完稿后，他仍精心修改，直至临终之前。他在注文中表达了自己的民族气节和对故国灭亡的哀痛，隐晦曲折地对元朝统治进行抨击。



方雅《竹石图卷》

马端临（1254—1323），字贵与，饶州乐平（今属江西）人。他是南宋丞相马廷鸾之子。宋亡后隐居不仕，花了20年著成《文献通考》348卷。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是唐代史学家杜佑《通典》的进一步丰富和扩大。《通典》分类太宽，

而且只写到唐天宝年间，而《文献通考》分类较细，还增加了《通典》中没有的门类。全书共分24门，即：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祀、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凡天宝以前史实，以《通典》为基础，作拾遗补缺；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五年（1212），搜集史料，加以续修。这部巨著以它丰富的史料和完整的体系，为我们今天研究宋以前的历史典章制度提供了重要的依据。马端临作为进步的史学家，在《通考》中揭露了历代封建政权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对百姓则寄予深切的同情。

二十四史中的辽、金、宋三史是在元朝时完成的，三史的修撰，是元代文化建设的一大盛事。

按照后朝修前朝历史的传统，早在忽必烈中统年间，就下诏准备修史，后来仁宗延祐年间也曾下令修三史。但终因义例未定，一直未能定稿完成。

到顺帝至正三年（1343），中书右丞相脱脱再次提出修撰三史。顺帝命脱脱为三史都总裁，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即太平）、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吕思诚为《辽史》总裁官，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李好文、杨宗瑞、王沂为《金史》、《宋史》总裁官。至正三年四月三史同时开始修撰，至四年三月完成《辽史》、四年十一月完成《金史》、五年十月完成《宋史》。三史共747卷，由于三史原有较好的基础，所以只用了2年半时间就完成了。

脱脱虽然没有秉笔写史，但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都总裁。首先，他在财政很拮据的情况下，决定把江南三省贡士庄的税收用作修史的资金。所谓贡士庄，是指被没收为官田的原南宋富豪的田地。第二，元朝建立后，三史迟迟未能修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辽、金、宋三朝谁是“正统”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脱脱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决定“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这是一个

平等看待三个民族、三个王朝的正确决定。

辽、金、宋三史在我国史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辽史》颇具特色，其《营卫志》为各史所无，保存了契丹早期的户籍、兵籍、土地制度、部族组织等珍贵资料，《部族志》记载了辽与周边各族的关系。《金史》体例严整，史料丰富，尤其在《本纪》前加《世纪》，末加《世纪补》，补充了太祖先世事迹和追尊诸帝生平。辽、金二史各有《国语解》，是今天研究契丹、女真文字的重要依据。《宋史》卷帙浩繁，全书496卷，为二十四史之冠，因而保存史料最多。当然三史中也有纪传不符、译名不一、名史互异等缺点。

尤其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三史是各族史家共同劳动的结晶。参加修史的除蒙古史脱脱为都总裁外，总裁官铁木儿塔识是康里人，修史官中廉惠山海牙、沙剌班是畏兀儿人，伯颜是哈剌鲁人，斡玉伦徒、余阙是党项人，泰不华是钦察人。这不仅在二十四史中，而且在其他史书的编纂中也是仅见的。

五、郭守敬的科学成就

我国是世界上文化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到了元代，由于国家实现了大统一，科学技术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我国也是世界上天文历法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元代的天文学在继承前人丰富遗产的基础上，吸取了阿拉伯的天文知识，创造性地发展了一大步。元代最杰出的天文学家是郭守敬。

郭守敬（1231—1316），字若思，顺德邢台（今属河北）人，他以毕生精力从事天文学的研究和天文仪器的创制，为祖国古代天文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其他学科上也有很多贡献。

郭守敬的祖父郭荣是一位精通数学和水利的学者，他的渊博知识对年轻的郭守敬影响很大。还在郭守敬年幼的时候，祖父就把他送到精通天文和地理的老朋友刘秉忠那里去学习了。刘秉忠和他的好友张文谦都是忽必烈非常赏识的学者。

由于郭守敬刻苦学习，十五六岁时就能弄通石刻的“莲花漏图”（古代的计时器）的原理。到32岁时，他的科学知识更加丰富扎实了，张文谦就把他推荐给忽必烈。忽必烈高兴地让他跟随张文谦到西北去视察水利设施，修复古渠。1265年（至元二年），他被任命为都水少监，使他得以专心致志地从事水利建设事业。



郭守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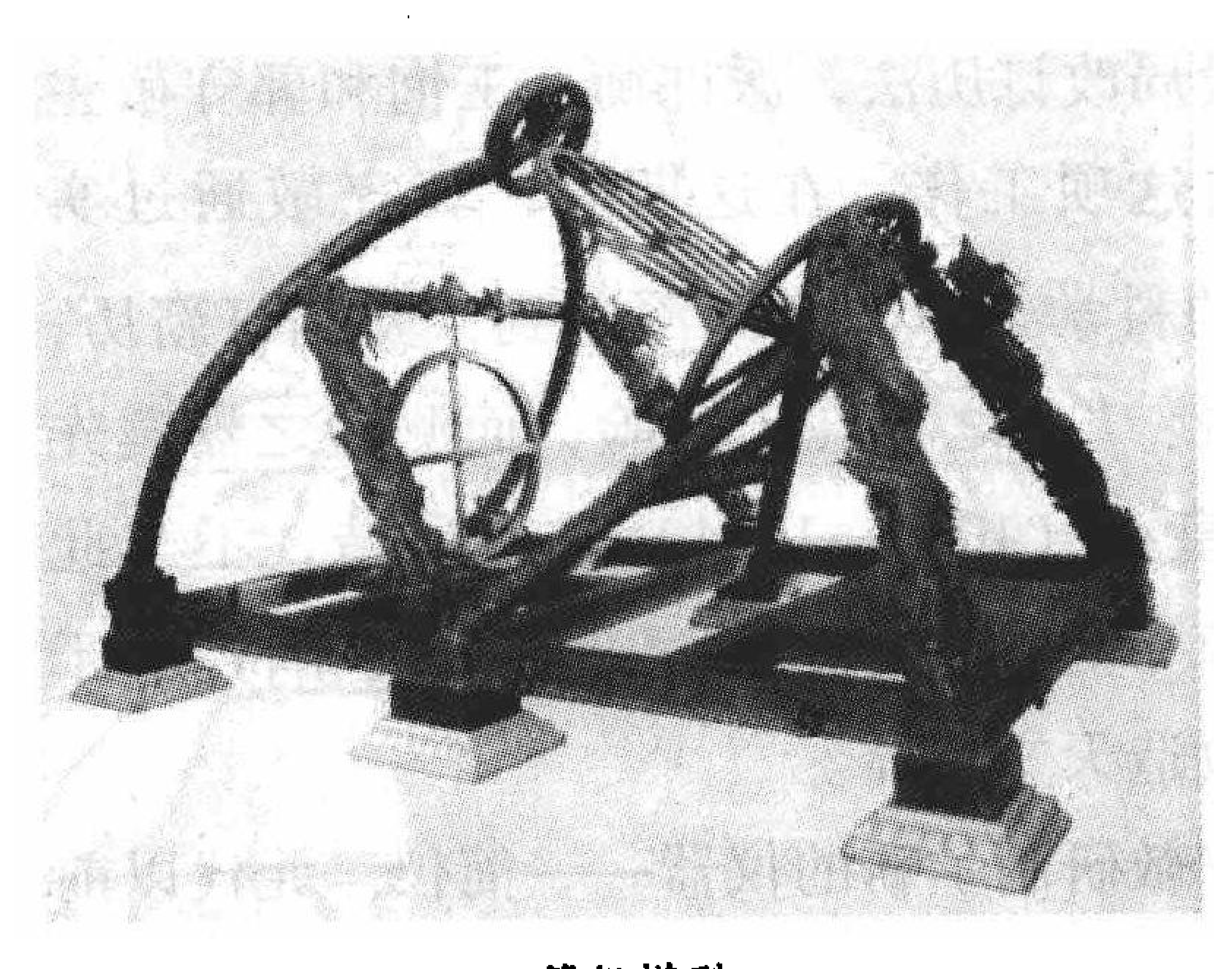
早在元朝统一全国以前，刘秉忠就提出要修改历法，因为辽、金以来沿用的《大明历》使用已经很久了，误差越来越大。1276年（至元十三年），忽必烈决定设局改订历法，派许衡、王恂和郭守敬主持这项工作。在这期间，郭守敬通过实测，获得了许多天文方面的科学知识，他深深感到：要制订新历，必须创造精密的仪器。他说：“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于仪表。今司天浑仪，宋皇祐（1049—1054）汴京所造，不与此处（指大都灵台，在今北京市建国门外泡子河北）天度相符。”于是他决心自己动手创制和改造天文仪器。

针对浑仪的缺陷，郭守敬研制了新的仪器——简仪。元代以前所用的浑仪越来越复杂，用它测量天体的赤道坐标、黄道坐标和地平坐标的读数，每个系统都需要有专门的环圈，因此大大小小的互相圈套的环圈有八九个之多，不但转动不便，而且妨碍观测。郭守敬摒弃了把测量三种不同坐标的圈环集中在一起的做法，精简了黄道坐标，而把地平坐标和赤道坐标分为两个独立的装置——赤道装置和地平装置。这两个装置都很简单，使用方便，因此这种仪器叫“简仪”。简仪的设计很精密，刻度最小分格达到1/36度，观测结果也就准确多了。当时从尼泊尔来的工艺家阿尼哥，帮助郭守敬制造了简仪。可惜的是，郭守敬的这一重大发明创造，竟在清初被法

国传教士纪理安（当时他在钦天监任职）当作废铜销毁了。明朝正德（1506—1521）年间仿制的一台简仪，也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被劫走。后来虽然归还了，但已残缺不全，现在保存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

郭守敬还研制了仰仪。仪器的外形很像一口朝天的大锅。在半球的大圆面上，刻着东、南、西、北和十二时辰；半球面上刻着与观测地纬度相应的横纵线网。大圆平面上用纵横相交的两根杆子架着一块小板，板上有小孔。太阳光线通过小孔，在球面上投下一个倒像，映在格网上，可以观测太阳的位置和日食。

郭守敬还改革了圭表，创造了景符等仪器。圭表是观测日中影长变化以决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时刻的天文仪器。古代的圭表一般高8尺，郭守敬把它加高到36尺，在表顶又添一根被抬起的横梁，横梁高出表顶4尺，这样表高就达到40尺，比原来的表高增加5倍，因而影长也增加了5倍，使观测的误差也下降到原来的五分之一。现在河南省登封县元代观星台还完整地保存着当时的圭表。景符是定影象的仪器。一块铜片，中有小孔，用一小架子斜撑在圭面上。太阳光经过横梁，再通过小孔，在圭面上形成了一个米粒大小的太阳像，像中间有一根细如丝线的横梁影子，非常清晰。景符与圭表是结合在一起使用的，用来观测太阳、星星和月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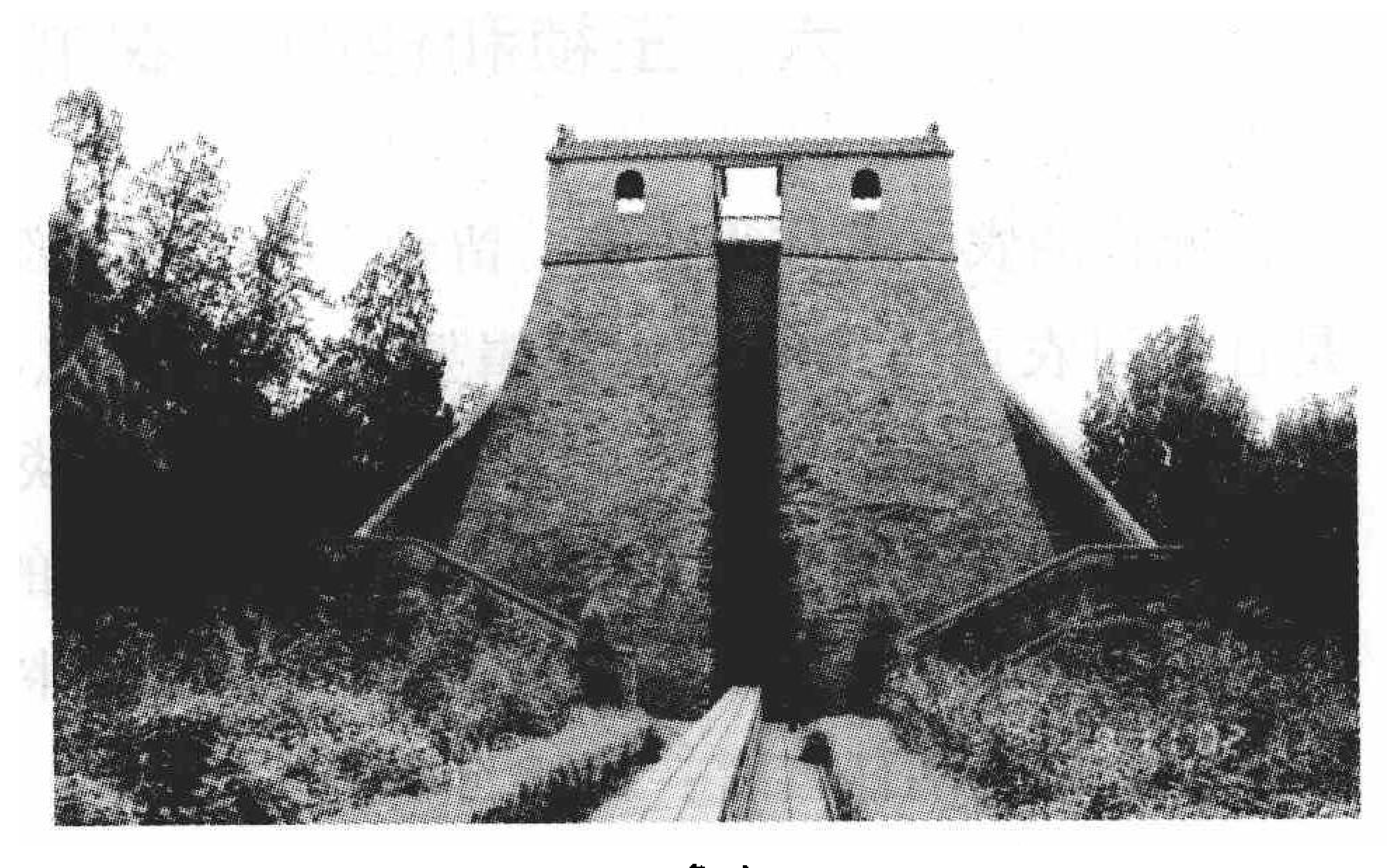


简仪模型

有了这些先进的仪器，郭守敬利用当时疆域辽阔的有利条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实测活动。他在全国各地设立了27个测景所，最北的北海测景所，设在大约北纬64°5′的地方，已在北极圈附近

了。他亲临全国各地，收集科学资料。经过这样大规模的实测，他不仅测定了有关地方的纬度与夏至日昼夜长短，还测定了黄赤交角为29°90′（合今23°35′5.3″），这个数字虽然与当时的实际交角尚有极小的误差，但这是科学上的一大进步，因为从汉朝以来，一直认为黄赤交角是24°。我国古代把黄道附近的星分为二十八宿，每一宿用一个星为代表，称为“距星”。两距星间的距离称为“距度”。古代是用距星来测定星辰的，因此测定二十八宿距是非常重要的。经过郭守敬的实测后，距度的误差减少了，精密度提高了一倍。郭守敬还进行了恒星位置的测定工作，对那些还没有定名的星，也作了观测，编制了星表。

1281年（至元十八年），经过郭守敬等人多年辛勤的劳动编制出来的《授时历》正式颁行了。郭守敬根据自己多次精密测定的冬至时刻的结果，并利用历史上从祖冲之《大明历》以来的6次冬至时刻的观测资料，证实了一年为365.2425日，它比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只差26秒，《授时历》就是采用这一数据的。这在世界的历法史上还是第一次。现在国际上通行的格利哥里历也是采用这一数据的，但格利哥里历比《授时历》晚了整整300年。《授时历》是我国古代的一部优秀的新历法。根据新历法推算出的节气，比较准确，因而对农业生产帮助很大。



观象台

郭守敬在天文、数学方面的科学著作很多，有《推步》、《立成》、《历议拟稿》等，可惜现在都已失传了。

在水利工程技术方面，郭守敬也有光辉的成就。1291 年（至元二十八年）春，他担任都水监长官，负责整修已经荒废的大都至通州的运粮河。他经过实地考察后，决定引白浮泉水解决了河水的来源问题，用了一年多时间疏通了这条运河，定名为通惠河。为了解决由于河床倾斜坡度造成运行的困难，他在这条运河上每隔 10 里设置一个闸门，在距离闸门半公里的地方又置斗门，使船只得以顺利通过。这样，从杭州到大都的大运河完全通航了，过去每年从南方运来的粮食到通州后就要陆运，驴马死伤不可胜数，现在通行无阻了。

郭守敬在科学技术上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一生坚持不懈，亲自从事科学实验，并善于吸取前人的科研成果，因而取得了更大的成就。一直到 86 岁那年他去世时为止，他始终没有中断自己的工作，可以说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科学事业。

六、王祯和他的《农书》

元代的农学著作很丰富，留到今天的有三部著名的农书，这就是官方司农司所编的《农桑辑要》、王祯的《农书》和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农桑辑要》已经在前面谈过，《农桑衣食撮要》下面将要谈到，这里我们讲的是王祯和他的《农书》。

王祯是山东东平人，由于他的生平活动史料记载很少，我们只知道他曾做过两任县官：1295 年（元贞元年）任安徽旌德县的县尹，在职 6 年；1300 年（大德四年）任江西永丰县尹。据《旌德县志》记载，他当县官时，生活比较俭朴，办学校、修桥梁、施医药，认真劝农，做了不少好事，受到当地人民的称赞，是封建时代的“清官”。

元朝的大统一，为全国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由于各族人民辛勤劳动，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很迅速的。在这样情

况下，人们渴望有一部总结和指导全国农业生产技术经验的农书，这是很自然的。

正因为有这样的社会需要，才促使王祯下工夫去研究农业技术，总结农业生产经验，写出这部《农书》来。他认为：农业是天下的大本。一夫不耕，就要挨饥；一女不织，就要受寒。作为一个地方官，应该熟悉农业生产知识，否则就不能担负起劝导农桑的职责。为了写好《农书》，他平常很注意农事，仔细观察，用心考察和积累农业知识，大约在永丰任职2年后，完成了该书的初稿，后来又花了10年时间进行修改补充，到了1313年（皇庆二年）时才正式付印出版。

我国古代历来有编写农书的优良传统，但是还没有一部书能从全国范围的角度来总结农业生产经验。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虽然很有价值，但还仅仅限于黄河中下游一带；南宋陈旉的《农书》也只限于江浙一带；元初的《农桑辑要》主要也是北方地区的。而且这些农书离开王祯那个时候已经有几十年或者几百年了。王祯这部书兼论南北，对南北农业技术和农具的异同、功能，进行分析比较，这在中国农书编写史上还是第一部。

《农书》的内容主要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农桑通诀》，第二部分是《百谷谱》，第三部分是《农器图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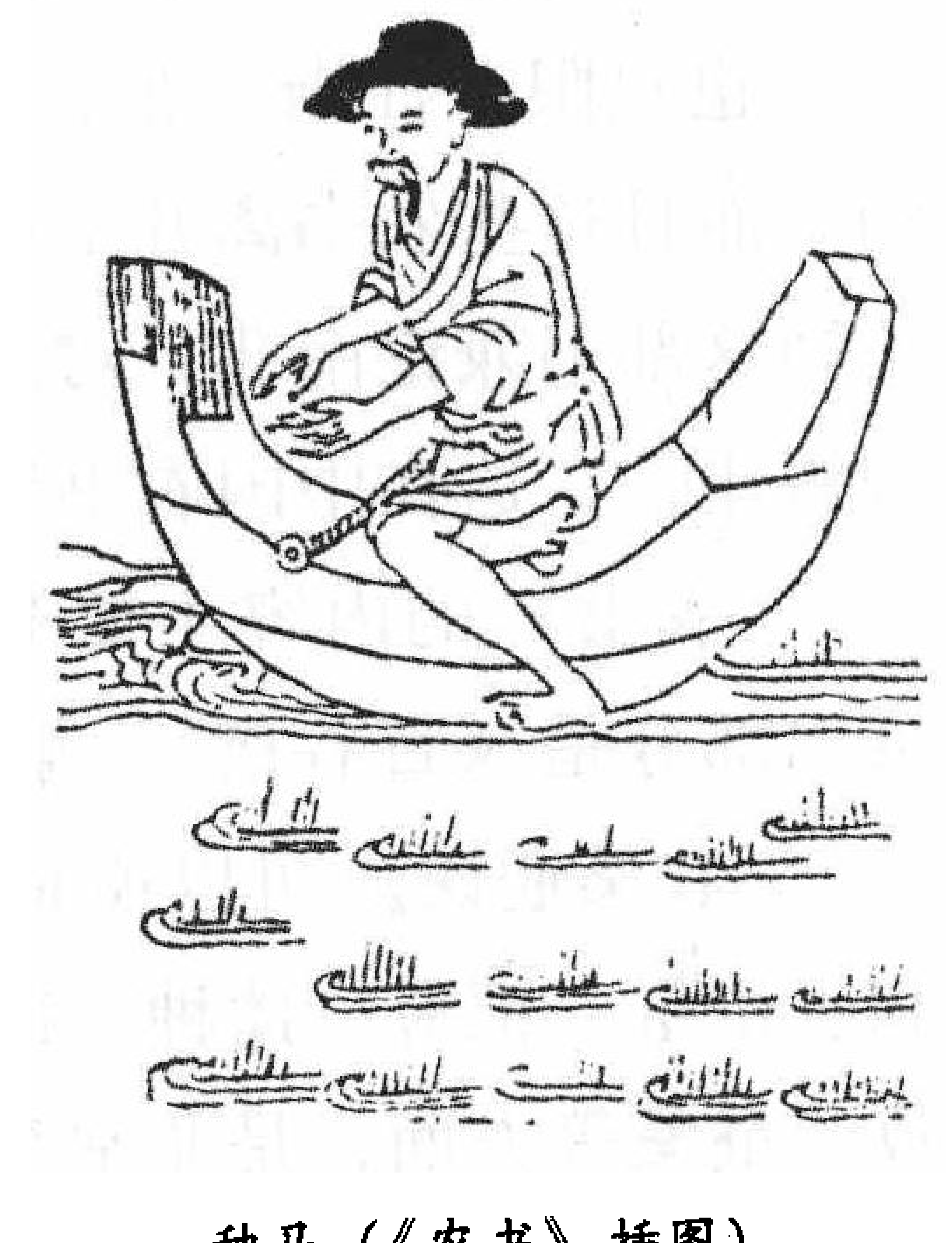
《农桑通诀》可以说是农业总论。内容包括农业史、授时、地利、耕垦、耙劳、播种、锄治、粪壤、灌溉、收获，以及植树、畜牧、蚕桑等方面，是非常系统和完整的。关于“授时”和“地利”：王祯很重视“不违农时”，认为播种一定要适合农时，不能错过时机；他对各地的气候、地形、土壤等自然条件作了比较，认为农作物应该根据环境不同而有所不同，提出了选择适宜于环境的作物和工具以及改造自然的主张。关于“播种”：他认为选种很重要，并介绍和推广占城稻等优良品种；他还主张实行多种经营和作物轮种，关于“粪壤”，他列举了大量肥源，并认为施肥是提高地力、

改造土壤的关键。关于“灌溉”，他的基本思想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就是说：依靠兴修水利等人事努力，可以克服天灾而夺得农业丰收，因此他特别强调灌溉的作用，具体介绍了引水的方法、南方围田和圩田的建设。

此外，王祯在这一部分里还主张推广北方的“锄社”，以解决农忙时劳动力的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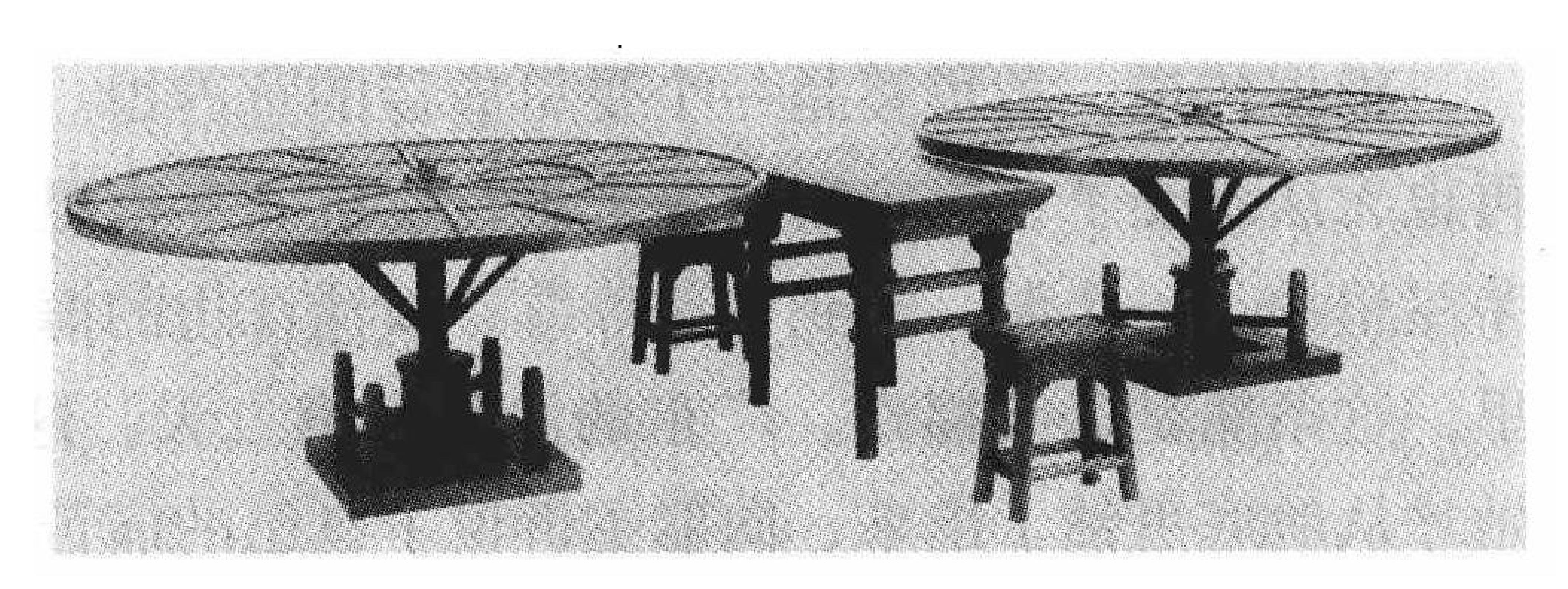
《百谷谱》分别叙述各种农作物、菜蔬、瓜果、竹木等种植培养法。这一部分主要是介绍农作物品种，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棉花的推广。元朝时棉花主要产于南方，后来北方和西北也渐渐种植，但当时有人以“风土不宜”为理由，认为北方不宜种植。王祯觉得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他说：种不好棉花是因为种植不认真、不得法造成的，于是他在书中详细介绍了种植的方法，并断言：种植棉花，南北方都可获利。

《农器图谱》是《农书》中最有创造性的部分。书中绘出各种农具，农业机械图和田制、农舍、灌溉工程、运输工具、纺织机具图共306幅，每幅图后面都有一段文字说明，描写这种工具的构造、来源、演变和用法。其中许多是当时最新式的农具和器具，如出现了用4牛拉的犁，节省施肥工序的下粪耧耘式耧车，割荞麦用的推镰和灌溉用的牛转翻车、高转筒车等。


秧马（《农书》插图）

王祯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农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机械设计师和印刷技术革新家。东汉杜诗制造的利用水力鼓风来炼铁的“水排”，到元朝时已经失传，王祯经多方搜访，加以研究、改进，把古人用皮囊鼓风改用木扇（简单的风箱）鼓风，对提高冶炼技术有重大意义。王祯还创制了木活字，并且成功地把它用来印刷。他在旌德县撰写《农书》时，估计到字数很

多，雕版有困难，就亲自指导木工花了两年多时间，制造了 3 万多个木活字，并试



元代转轮排字盘

印了他自己编写的《旌德县志》，全书有 6 万多字，只用了 1 个多月时间就印了 100 部，效果很好。王祯把这次造木活字的方法与排版、印刷经验，写成《造活字印书法》附在《农书》后面。他发明的“转轮排字盘”，工人只要坐着推动转盘，就可以拣字，大大节省了印刷工人的劳动强度。

王祯通过对劳动人民的接触，通过自己的科学实践，在《农书》中流露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他说：“种田是多么艰难啊！而高高在上者，不知道衣食来自何处，只知道骄奢淫逸，不想想寸丝口饭都出自农夫田妇之手，反而对他们拼命剥削和压榨！”在《农书》中还有许多地方强调了“人定胜天”的思想。因此，《农书》是一部进步的科学著作。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这本书也在一些地方带有迷信色彩，这些糟粕今天是应该剔除的。

七、黄道婆和她的纺织技术

黄道婆是一位劳动人民出身的女纺织家。她是松江乌泥泾镇（今上海县华泾镇）人。在乌泥泾镇长期传诵着一首歌颂她的民谣：

黄婆婆，黄婆婆！
教我纱，教我布，
两只筒子两匹布。

根据传说，黄道婆是一个受尽虐待的童养媳。非人的生活使她再也无法忍受了，决定用逃跑来进行反抗。半夜里，她费尽力气在茅屋里挖了一个洞，逃到一条停靠在黄浦江边的海船上，躲在舱底里。这条船是远航福建、广东的海船。第二天，这条船起锚出海，她才从舱底里钻了出来，向船主诉说了自己的痛苦遭遇，恳求他们把她带到远方去生活。海船上的人们非常同情她，于是把她带到了崖州（今海南海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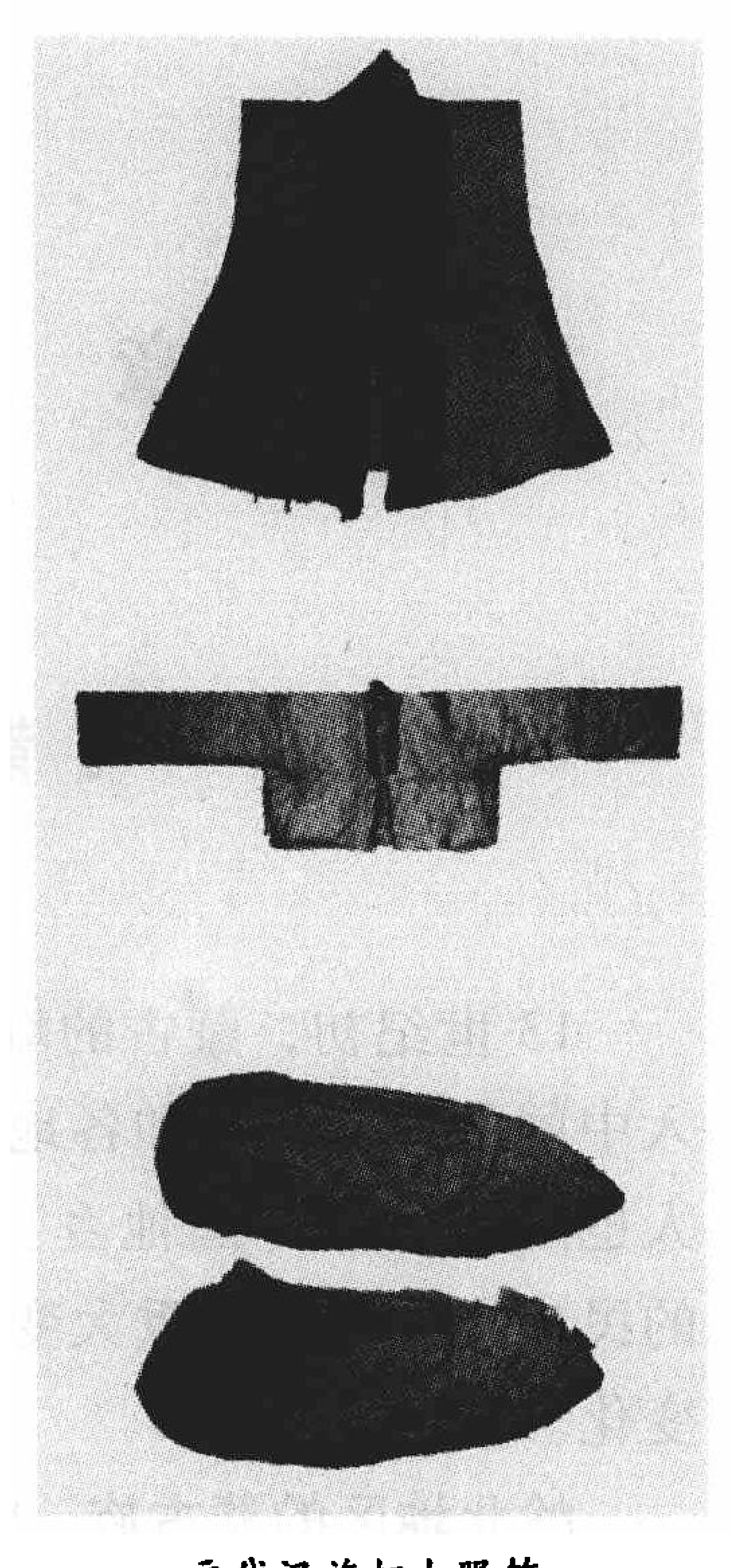
海南岛是我国少数民族黎族人民聚居的地方。黎族人民早就种植棉花，并有很高的纺织技术。根据南宋人的记载，海南岛的黎族创造了一套包括去籽、纺、织的生产工具，他们生产的黎幕、黎单、黎饰、花被、缦布等棉织品，十分美观、实用，深受内地人民的欢迎，是泉州商人经营的重要货物。黎族的棉织技术当时在全国是最先进的，包括乌泥泾在内的江南地区比海南地区要落后得多。例如，在黄道婆去海南前，乌泥泾一带连踏车、椎弯都还没有，棉花去籽还是用双手剖剥的，然后放在板桌上用线弦竹弓把净棉弹松弹匀，效率很低，费工很大。

黄道婆在海南岛大约生活了 30 年。在这段时期内，她与黎族姊妹同甘苦，共劳动，虚心向她们学习纺织技术。大约在 1295 年至 1296 年间，50 岁左右的黄道婆对自己的家乡越来越思念了，便搭乘了一艘商船，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她回到乌泥泾之后，就把崖州黎族使用的纺织工具引了进来，并以她的聪明才智，逐步加以革新，使乌泥泾以至江南地区的纺织水平有所提高。

黄道婆对棉织业的贡献，主要是改进纺织工具和提高生产技术两个方面。她推广和改进了捍、弹、纺、织等一整套工具。“捍”就是搅车，又叫轧车、踏车，利用上下两个回转方向相反的转轴，相互辗轧，去除棉籽。“弹”就是弹松棉花用的椎弓。黄道婆改制的弓有 4 尺多长，比以前所用的一尺四五寸长的弓大好几倍，并用弹力大的绳作弓弦。“纺”就是纺车。黄道婆创制的纺车是同时可

以纺3个纺锭的脚踏纺车，比以前使用的一个纺锭的手摇车，速度快、效率高。“织”就是织布机，黄道婆改造的纺织机究竟怎样，由于材料不足，还不很清楚。但她那时用的提花机，已能织出许多美丽的花布。在纺织技术上，黄道婆教人们学会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技术。所织成的被、褥、带、手巾，上面织有折枝、团凤、棋局、图案字等花饰，十分鲜艳，像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她还把崖州被的织造方法传授给镇上的妇女，一时“乌泥泾被”闻名全国，远销各地。



元代汉族妇女服饰

黄道婆的高超纺织技术为人们所称颂，松江地区有一首民谣唱道：

黄婆婆，
吃是吃，做是做，
一天能织三个（匹）布。

由于黄道婆传授了先进的纺织技术，使土地贫瘠、粮食不足的乌泥泾逐渐成了纺织业非常发达的地方。而且，这种新技术也从乌泥泾进一步向松江地区、向长江中下游、向全国推广开来。黄道婆对我国古代纺织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乌泥泾从事纺织业的居民越来越多了，元末时已达到1 000多家。到了明代，乌泥泾所在的松江，已成了全国的棉纺业中心，赢得“衣被天下”的声誉。乌泥泾人民永远忘不了黄道婆的功绩，在她去世后，人们把她安葬在今天华泾镇北面的东湾村，还立了祠堂，逢年过节都要去纪念她。

第九章　民族关系的新格局

一、散居各地的蒙古族

13世纪初，蒙古的崛起和随后的向外扩张，不仅使蒙古族进入中国的各个行省和各地区，而且随着蒙古铁蹄深入欧亚，蒙古人也随之进入异国他乡。所以，从13世纪前期开始，中国原有的民族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域外特别是中亚地区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岭北地区的蒙古族　岭北地区是蒙古的“祖宗根本之地”，是大蒙古国的统治中心，也是蒙古族最集中的居住地。

成吉思汗生前把岭北大部分地区（东起克鲁伦河上游，西至阿尔泰山）作为幼子拖雷的封地；从克鲁伦河中游东到大兴安岭是成吉思汗诸弟的封地。诸王后裔有的参与海都、乃颜叛乱，有的参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所以忽必烈即位后，先后派其第四子那木罕、真金太子长子甘麻剌出镇岭北，统领北方诸军。在行政建制上，建立岭北行省，掌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站等，使诸王的权力限于自己的封地之内。

诸王封地称投下或位下，蒙古语称爱马。置王府和各种官员，管理所领军民。但王位的继承和官属的设置，均需由皇帝批准。诸王及其官属、万户长、千户长等是大大小小的领主，是岭北蒙古族的统治阶级。各封地的牧民向领主缴纳的赋税叫“羊马抽分”：根据1233年（元太宗五年）的规定，牧民应缴纳的实物税为马、

牛、羊，每百头分别纳牝（pìn，雌的）马、牝牛、牝羊1头，牝马、牝牛、牝羊满10头纳1头。定宗贵由时有所增加，以后大体为三十者取一。牧民还要负担兵役和徭役，在发生战争时，男子15以上、70以下全部服兵役。牧民还要为驿站提供马匹、车辆、过往使臣的饮食。因此，许多牧民不堪忍受沉重的负担而破产，甚至出卖子女为奴。

蒙古统治者十分重视岭北地区的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早在成吉思汗西征时，就命镇海领所俘汉民万人辟地屯田，并因此修筑了镇海城（今蒙古科布多东）。以后各朝又将中原所俘汉民迁到克鲁伦河上游、和林附近从事屯耕。

元朝建立后，忽必烈继续在岭北地区进行大规模屯田。1272年（至元九年）至1293年（至元三十年）的22年内，曾10多次调动大批汉军、南宋降附军、南人及蒙古军民，给予耕牛农具、种子衣裘、钞币等物，于克鲁伦河、吉利吉思、谦谦州（今叶尼塞河上游一带）、杭爱山、五条河、和林、上都等地开渠辟田，从事屯种。1284年（至元二十一年）至1293年（至元三十年）间，4次调派吉利吉思、蒙古和汉族军民在东北忻都察、金复州（今辽宁金县）、合思罕（今辽宁旅大北）、瑞州（今辽宁绥中西南）、咸平府（今辽宁开原北）、茶剌罕（今黑龙江通河北）、剌怜（今黑龙江阿城南）等处利用荒闲地屯田。这些屯田在各族军民的辛勤劳动下，成绩很好。武宗至大年间，重新恢复称海（今蒙古哈腊乌斯湖和哈腊湖南）屯田，每年得米20余万斛。

忽必烈等元朝统治者对蒙古地区的农业生产采取了积极扶植的态度。1283年（至元二十年）于秃烈秃等富户内贷牛600头，给吉利吉思贫困的农牧民；1288年（至元二十五年）疏浚怯烈河以灌溉口温脑儿黄山民田，次年，又发侍卫军2 000人疏浚口温脑儿河渠。在蒙古地区任职的一些官员也较重视农业生产，如刘好礼在益兰州见居民不懂铸造农具，报请忽必烈派去了汉族工匠，专门生

产农具和传授铸造技术；山北道按察使姚天福，见当地居民不懂庄稼，就教他们种树和农艺，收获丰硕；至大年间，哈喇哈孙在称海地区也召来了手工工匠，派军队中懂农事的士兵，去帮助当地的部落土人，又疏通水渠，灌溉了数十顷农田。结果，谷物丰收，当地军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

蒙古地区历史上一直是游牧地区，游牧经济由于其产品的单一和自然条件的限制，常常不能自给。现在有了农业之后，有力地保证和促进了畜牧业生产的发展。

蒙古地区的手工业也有了发展。除了制革、皮毛、炼乳、制毡、弓箭等手工业外，这时也发展起制陶、冶铁、建筑等行业。出现了和林、上都、集宁等城市。在和林有许多汉族工匠，他们从事建筑、制陶等手工业。上都是一座规模很大的城市，有雄伟的宫殿、衙署、寺院，居住着蒙、汉各族人民，商业很发达。



元上都遗迹

在文化方面，漠北地区的蒙古族也有很大的发展。蒙古族的第一部历史、文学巨著——《蒙古秘史》（旧称《元朝秘史》）就是13世纪中叶写毕于克鲁伦河畔的①。这部著作根据古代蒙古人民世代相传的故事，生动地记载了古代蒙古社会状况、阶级关系和成吉思汗家族的历史，以及成吉思汗、窝阔台汗时期的军事政治活动，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该书蒙古文原稿已经失传，现存的《元朝秘史》是明初

① 《元朝秘史》第282节："此书大聚会著，鼠儿年七月于客鲁涟河阔迭额阿剌勒地面处下时写毕了。"

四夷馆用汉字音写蒙古语原文，逐词旁注汉译，保存下来的。

蒙古人原先信奉萨满教。蒙古向外扩张后，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均传入蒙古地区，但佛教占有明显优势。自从喇嘛教（藏传佛教）受到忽必烈等推崇后，岭北地区的蒙古族信仰喇嘛教的日益增多。

中原和南方各地的蒙古人　入居内地的蒙古人主要是蒙古的上层贵族、各级官吏和军士。其中最高统治者皇帝及其家族，虽然人数不多，但掌握着国家权力，其施政得失关系着社会的进步与否。元朝皇帝中不乏杰出的政治家，元世祖忽必烈推行汉法“心坚而确”，是顺应历史前进的帝王，在他执政的30多年中，奠定了元朝一代的典章制度，使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从持久的战争走向社会安定，尽管他有许多局限性，但他的历史功绩是显著的。忽必烈之后，并不是每个皇帝都是无能之辈，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在纠正武宗朝弊政、开创科举、重视法治等方面有许多可取之处；其子英宗硕德八剌锐意推行新政，是一位难得的社会改革家。即使末代皇帝顺帝妥懽帖睦尔，也并非一无是处，他也有过励精图治、中兴元朝的宏图，只是推行新政失败后，转而成为腐朽没落的亡国之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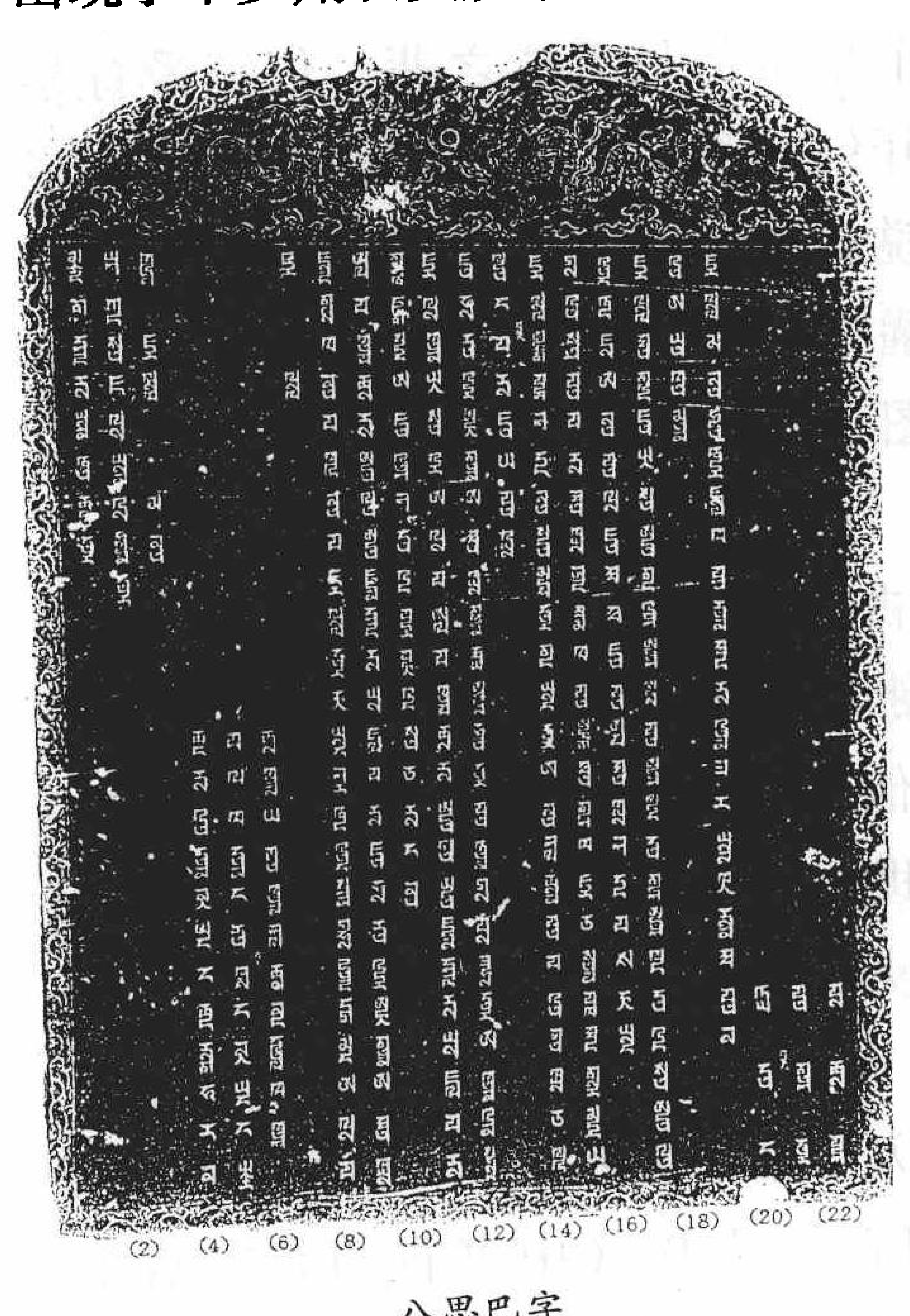
在元朝皇帝周围有一批蒙古族军事家、政治家。早期经略中原的木华黎、直捣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军事统帅伯颜、进兵大理的名将兀良哈台等等，他们辉煌的战绩，足以证明他们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骁将。帮助忽必烈推行汉法的安童，英宗的得力帮手拜住，顺帝时力图实行新政的脱脱，都是蒙古族的著名贤相。

元朝整个统治机构中，蒙古人占据了重要地位，他们享有种族上的优越感，掌握国家最重要部门的大权（中书省的右左丞相、平章政事）、最机要部门的要职（枢密院的主要官员），担任中央各部门及地方路府州县的达鲁花赤，因此很容易产生像铁木迭儿、铁失、伯颜（顺帝朝）这样专横跋扈、权倾天下的权臣、逆臣。

地方官中，有不少是不谙政事、不识汉字、不知刑名的无能之辈，也有不少贪赃枉法、鱼肉人民的官吏。

普通蒙古族士兵大都作为蒙古军、探马赤军驻守在全国各地，他们属于军户，世代为士兵，战时打仗，平时大部分务农或是从事军工生产。普通蒙古平民也有生活在内地的，有的因破产沦为驱口。

与数以千万计的广大汉族人民相比，蒙古人只是极少数。为了统治的需要，也为了生存和日常生活的需要，许多蒙古人努力学习和掌握汉文化。最高统治集团中，像真金太子、仁宗、英宗、文宗、顺帝，大臣中如拜住、脱脱等，都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元代实行科举，蒙古、色目人右榜虽然与汉人南人左榜要求不同，但考四书五经、用汉文答卷是一致的，因此蒙古官宦之家及普通蒙古平民中，出现了不少用汉文从事理学、文学、史学、书画创作的儒士。



八思巴字

蒙古上层贵族多信奉喇嘛教。忽必烈尊吐蕃僧八思巴为国师，命他用藏文字母创造蒙古新字（八思巴字）。喇嘛教在元廷中尤其盛行，每年用于佛事的费用不可胜计。

元朝灭亡后，大批居住在中原内地的蒙古人没有返回漠北，一直与汉族和其他各族友好相处。至今，云南、河南、湖北、江苏、河北等地许多蒙古族就是元代蒙古人的后裔。

西北的蒙古族　蒙古向外扩张后，西北的畏兀儿、哈剌鲁、西辽最早臣服和征服，以后又多次发动西征，在西北和域外建立了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和伊利汗国，因此，蒙古人移居西北和域外的数量很

大。久而久之，元代西迁的蒙古人中，除一部分仍然保持自己的民族特点外，相当一部分与其他民族融合在一起，组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于是，西北地区和域外在民族格局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窝阔台的封地在叶密立（今新疆额敏）和霍博（今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地区。后来窝阔台之孙海都起兵反对忽必烈，建立汗国。1301 年（大德五年），海都兵败死去，汗国逐步瓦解，一部分归元朝，一部分为察合台汗国所有，其民众大批迁入漠北。

察合台的封地在窝阔台封地之南，海都叛乱失败后，察合台后王瓜分了窝阔台汗国的领地，势力扩大到东起吐鲁番，西达阿姆河。14 世纪 30 年代后，察合台汗国逐渐伊斯兰化，并分裂成东西两部分。西察合台汗国后来演变成帖木儿帝国。东察合台汗国到 1418 年（明永乐十六年）迁都亦力把里（今新疆伊宁），明朝称其国名为亦力把里，其境内蒙古人大都与当地居民融合。居住在哈密地方的伊斯兰化的蒙古人，称“哈剌灰”，又称“黑回回”，后来成为回族的一部分。汗国西部的蒙古人，多融合在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中。

钦察汗国、伊利汗国的蒙古人也逐渐与当地居民融合，包括哈萨克、乌兹别克等族。塔塔尔族则是蒙古共同体中自称为“鞑靼”的突厥人种克烈、乃蛮人的后裔。

二、畏兀儿等西北各族

畏兀儿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由于率先于 1211 年归附蒙古，因此成吉思汗保留亦都护世袭统治畏兀儿的权力，又设畏兀儿断事官等机构，管理畏兀儿民政。

元朝政府对畏兀儿地区的农业也很重视，至元年间即专设劝农官，负责劝农和水利等事宜。元代在今新疆地区的屯田，主要是在斡端（今和田）和别失八里（今奇台西北）。由于屯田规模不断扩

大，还专门设立冶场，铸造工具。对于畏兀儿地区无力维持生产的贫苦农民，忽必烈也是采取积极扶植的办法，如1293年（至元三十年）给亦迷立贫民及哈剌火州人民耕牛和种子。

畏兀儿地区盛产棉花和瓜果。棉花生产比内地早，生产技术也很高。瓜果有葡萄、西瓜等。所产葡萄酒闻名全国。丝织业也很发达。别失八里的织造局专门制造一种叫纳失失的丝织品，是供皇室用的。

入居内地的畏兀儿人，大都是随蒙古军队东征西讨的武将和军士，他们战功显赫，是蒙古贵族征服和统治各地的重要支柱。许多畏兀儿上层人物，如岳璘帖木儿、布鲁海牙、孟速思等，成为蒙古大汗所倚重的亲信。畏兀儿人中人才辈出，有许多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布里海牙之子廉希宪是元朝建立中书省后的第一任右丞，不久升为平章政事，他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争中，在平定阿兰答儿、浑都海叛乱中，显示了非凡的政治才干。

掌握汉文化的畏兀儿人，在文学、艺术、史学、科技领域作出了卓越的成绩。

廉希宪不仅是位政治家，而且是位熟读经史的儒者，忽必烈称之为"廉孟子"。畏兀儿人崇信佛教和摩尼教，阿鲁浑萨理三世精佛学，但他初见忽必烈时，即对以治天下必用儒术。翻译家安藏曾将《尚书》、《贞观政要》、《申鉴》、《资治通鉴》、《本草》等书译成蒙文，迦鲁纳答思通诸国语言，曾以畏兀儿语译过不少佛经。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则是元代三部著名的农书之一。当他任安丰（今安徽寿县）肃政廉访司官员时，对江淮地区的农业情况作了许多调查，最后写成了这本书。这本书以崔实的《四民月令》的体例，以农家月计划来按月编写，补充了元初编的《农桑辑要》中《岁月杂事》那一篇的不足。书中按12个月详细记载了每月应做什么农事、应准备什么农事，搜集了许多农谚，如"移树无时，莫教树知；多留宿土，记取南枝"、"十耕萝卜九耕麻"等，作为

经验介绍给农民。书中还有许多关于收贮蔬菜、制作酱菜等生活常识的介绍。

今甘肃、宁夏一带，元时称为唐兀，属甘肃行省。蒙古军队在灭西夏过程中，使这里的生产力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元朝建立后，在那里兴修水利、移民垦殖、军民屯田，农业生产发展了起来。1264年（至元元年），忽必烈命郭守敬、唆脱颜巡视西夏河渠。原来西夏境内沿黄河5州都有古渠，在中兴（今银川）地方的一条叫唐来，长400里；一条叫汉延，长250里。其余4州又有正渠10条，长各200里，支渠大小共68条，计溉田9万余顷。中统初，浑都海兵乱后，各渠废坏淤浅，郭守敬一一加以疏通。同年，董文用又开垦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水田，引唐来、汉延、秦家诸渠灌溉，四五万名逃散的人民纷纷回到原籍，政府都一一给了田和种子。到1266年（至元三年）又一次浚疏了汉延、唐来等渠。经过连续3年的努力，使当地农业生产逐渐有所恢复。1271年（至元八年）后，忽必烈又将不少蒙古人和南宋降附的“新民”安置在西夏中兴等路垦荒。1274年（至元十一年）起，又先后建立5个屯田机构，在中兴、甘、肃、瓜、亦里黑、亦集乃等地屯田，参加生产的有蒙、汉、畏兀儿等族广大军民。

蒙古灭亡西夏后，对中兴府进行了屠城，大批西夏人遭到杀戮，西夏遗民或隐居山林，或远徙他乡，或从蒙古军转战各地。名儒高智耀，夏亡后隐居贺兰山，窝阔台访得，为太宗、宪宗、世祖讲述儒术治天下的道理，对蒙古统治者采用汉法起过一定作用。整个元代，党项人立有战功的，为数很多，他们之中有的官位很高，如亦怜真班之父俺伯，世祖时官至知枢密院事，掌握了国家的军事机密。著名的文学、史学、艺术家也很多。

西夏音乐深受蒙古人喜爱。元朝宫廷里有汉、回回、西夏三色细乐，每色各3队，每队达324人。这些乐队是供朝廷祭飨、供奉及娱乐时使用的。

居住在阴山以北的汪古部，元朝时属色目人之列。因其主阿剌

兀思主动归附成吉思汗，故允许与成吉思汗家族世代通婚，其后裔先后封为北平王、高唐王、赵王。入居内地的汪古人中，著名的文学家有马祖常、赵世延等。巩昌盐川镇（今甘肃漳县）汪世显1235年（太宗七年）降蒙，他和其子德臣、良臣等，在灭宋战争中立有战功，世代为官。

三、回回民族的初步形成

元代是回回民族形成的重要阶段。没有蒙古的向外扩张，打通中西交通，就不可能有源源不断的域外穆斯林来到中国，也就不可能在中国出现回回民族。

公元7世纪初，穆罕默德在麦加创立伊斯兰教，他的继承者统一阿拉伯半岛，建立阿拉伯哈里发帝国。唐贞观初，穆罕默德遣弟子撒哈八来华传教（或说唐武德中，穆罕默德遣四贤来华传教）。永徽二年（651），阿拉伯哈里发帝国正式遣使臣来华。此后，大批阿拉伯、波斯和中亚各族的使臣、商人通过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来华，其中不少人在华定居、繁衍，他们多居住在唐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和沿海广州、泉州、扬州等地。他们是最早的回族先民，称为“蕃客”、“胡商”。两宋时来华的蕃客仍源源不断。他们之中，除了阿拉伯、波斯人外，还有伊斯兰化的突厥人，东南亚、南亚、非洲国家的穆斯林。

蒙元时期回回人的主要来源是阿拉伯人、波斯人、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人。由于回回人是元代色目人中的主要民族，又有很高的政治地位，通过伊斯兰文化的维系，原来信仰伊斯兰教而已“华化”程度很高的“土生蕃客”（回族先民），来自东南亚、南亚的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穆斯林，并不信奉伊斯兰教的唐宋时期到中原的回鹘人、阿速人、宋时已来华的犹太人、吉普赛人，以及与回回人通婚的汉人、蒙古人及其他民族，也融合在回回人之中。宪宗蒙哥时，回回人正式入籍，称为“回回户”，标志着中华民族大家庭

中增加了“回回”这一新的民族成分，回回人再也不是“蕃客”、“胡商”了。

回回人在元朝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在蒙古西征、灭夏、灭金、灭宋战争中，不少回回人立过战功，成为蒙古统治全国的支柱和帮手，权臣奥都剌合蛮、阿合马、倒剌沙曾先后操纵过元朝的行政、财政大权；名臣赛典赤·赡思丁、乌巴都剌、曲枢、答失蛮、不忽木、康里脱脱等家族世代为官，其中赛典赤·赡思丁官拜中书平章政事、云南行省首任平章政事，在治理云南、处理南方境内外民族关系中有特殊贡献；乌巴都剌曾经担任过只有蒙古人才能担任的中书右丞相。但是，回回人亦有破产沦为“驱口”而被人买卖的。因此，当元末农民起义爆发，阶级矛盾激化之时，回回上层官僚站在元朝统治者一边，对抗、镇压农民起义军，而广大回回劳动人民则同情和支持起义军，有的甚至投奔起义军成为明朝的开国功臣，如常遇春、胡大海、冯国用、冯国胜、沐英等。

回回人在经济活动中相当活跃。许多回回人从事海内外商业活动，出现了大批回回富商，有的还从事发放“斡脱钱”，攫取更多的财富。广大回回户则多从事农牧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由南宋投奔元朝的泉州回回蒲寿庚，就是拥有大批海船的巨商；另一位泉州巨商佛莲拥有海舶 80 艘，珠宝无数。

回回人在民族成分上的多元性导致了回族文化的多元性。来自阿拉伯、波斯和突厥各族穆斯林，由于种族语言各异，以阿拉伯文字为基础而创制的新波斯文回回字即成为当时回回人中通行的文字，也是元代通行的三种官方文字之一。回回国子监是讲授这种回回字和亦思替非文字（阿拉伯文）的学校。回回人入华时，带来的穆斯林文化（文字语言学、文学、史学、哲学、阴阳学、医药学、天文学、地理学、工程技术等世俗文化和宗教文化），在回族人民中长期流传。回回家族中不少人从第二、三代开始，广泛地接受汉文化，涌现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诗人、史家、思想家、翻译家、书画家。

回回人把阿拉伯的天文、医学、建筑、工程技术知识传到中国。1267年（至元四年），不花剌人札马剌丁进《万年历》及回回天文仪器，《万年历》一直在穆斯林地区推行。回回医药为阿拉伯——伊斯兰医学于宋元时期传入中国后形成的中国穆斯林医学，在制作和利用丸、散、膏、丹方面，以及外科手术和正骨技术，均较先进。元朝政府在大都、上都均设回回医物院，元时民间回回医术在头颅开刀等方面均有医例，明初抄本《回回药方》当为元代流传下来的医方书。回回人忽思慧著《饮膳正要》3卷，对饮食卫生、育婴妊娠、食品营养、疾病治疗均有医疗价值。书中介绍的许多植物为我们研究古代植物志提供了重要资料，忽思慧对这些植物性能的介绍，又反映了他对中医医药学和营养学的研究成果。中医学家萨德弥实曾著《瑞竹堂经验方》一书，原书15卷，现存5卷，其中有调补、妇科、疮科等门。瞻思精于天文、地理、数学、水利等知识。他的祖先是阿拉伯人，生长在河北真定，从幼年起即博览群书，学问渊博。他根据宋金时期治理黄河的经验和著作，重新汇编了《河防通议》一书，是后来治理黄河的重要参考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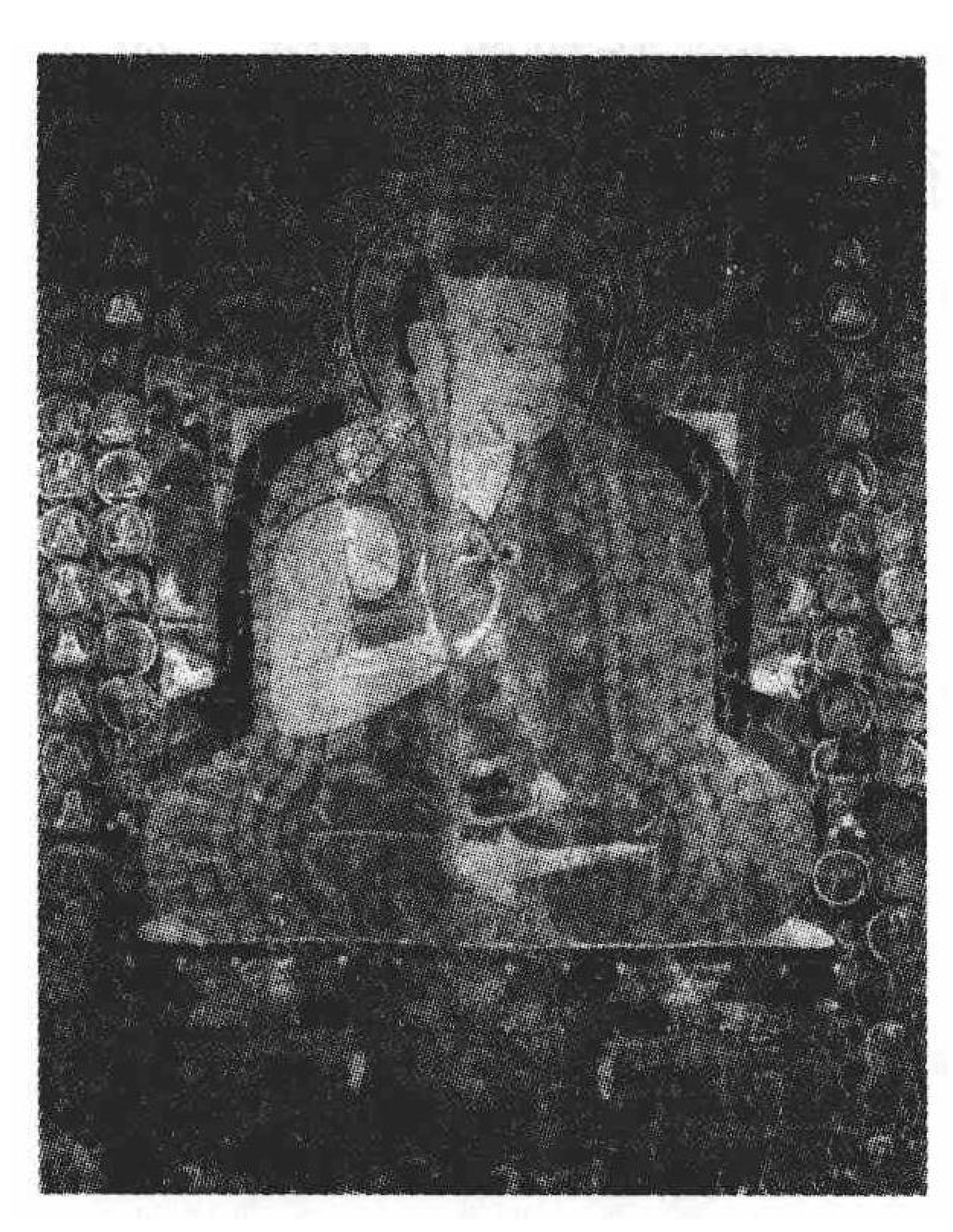
伊斯兰教是回回人得以维系的重要条件。元时凡回回人聚居之地均建有礼拜寺，宗教活动、生活习俗、饮食禁忌，甚为严格。元中期后，回回人因受汉文化影响和日常生活的需要，采用汉姓、汉名，或用先祖姓氏中之一字为姓者日益普遍，日常用语也逐渐以汉语为共同语，回族共同体正在逐步形成当中。

四、元朝政府对吐蕃的管辖

公元7世纪30年代，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后，与唐朝建立了舅甥关系，“和同为一家”。公元842年吐蕃达磨赞普被刺杀，吐蕃王朝处于分裂状态中，最后完全崩溃。吐蕃地区经历了长达4个世纪之久的分裂割据局面。

1235年，窝阔台封其次子阔端于甘肃、宁夏，并命令他进攻

南宋的四川。阔端进攻秦州（今甘肃天水）和巩州（今甘肃陇西），金巩昌便宜总帅、汪古人汪世显和熙河节度使、吐蕃首领赵阿哥昌投降，阔端以赵阿哥昌为叠州（今甘肃迭部）安抚使。1239年和1244年，阔端两次派其将道尔达进兵乌思藏，并召萨斯迦派首领萨斯加班智达（简称萨班）来见。1246年，萨班携他的侄儿八思巴、恰纳朵儿只到达凉州（今甘肃武威）会见阔端，议定了西藏归附条款，并由萨班发表致西藏各地僧俗领袖的分开信，即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



八思巴罗追坚赞画像唐卡

萨班在信中讲述了他在凉州受到的款待，赞扬阔端信仰佛教的虔诚，要求各地领主归顺蒙古。归顺后，世俗行政事务由蒙古派人管理，宗教和寺院僧人事务由蒙古委派萨斯迦派领袖主持，吐蕃各地的原僧俗官员可照常任职。愿归顺者，交出三种表册：地方官员姓名、俗民的数字、缴纳贡物的品种数量。

这封信的发表，标志着吐蕃归顺蒙古已经付诸实施。

1251年，蒙哥继承大汗，这年阔端死于凉州。蒙哥命和里䚟统领吐蕃等处蒙古、汉军。命八思巴（萨班已去世）协助蒙古使臣进藏清查户口，划定地界。同年，忽必烈驻军六盘山，召见八思巴。1253年，忽必烈分三路进攻云南大理，在忒剌再次召见八思巴，并正式皈依佛教。

忽必烈进兵大理途经今四川西部的藏区，收服了这些蕃部。不久，蒙哥率军亲征四川，也曾进军朵思麻、朵甘思地区，收服了零星部落。

1260年，忽必烈即位。1269年（至元六年）封第七子奥鲁赤为西平王，把吐蕃封给奥鲁赤家族作为封地。元代吐蕃有事，常由奥鲁赤及其继承者受命处理。

元朝统治吐蕃的行政机构叫总制院（后改名宣政院），成立于1264年（至元元年），以国师八思巴领院事，其下有院使若干人，为首者由朝廷大臣担任，其余由国师（帝师）推举僧人担任。宣政院用人原则是军民、僧俗并用。遇到有重大政务或重要事件，另设行宣政院前往处理。在地方则推行统一的行政建置，最高一级为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简称宣慰司），行政区划上称为“道”，宣慰司之下，设元帅府、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万户府、千户所等；与汉地接近的藏区则置路、府、州、县。所以在乌思藏地方共设立了13万户。

世祖忽必烈对萨迦斯派领袖八思巴特别器重，上台后即封八思巴为国师，统领天下佛教。1269年（至元六年），八思巴完成以藏文字母为基础的蒙古新字（八思巴字）的创制，忽必烈下令在全国通行。同时升八思巴为帝师、大宝法王。以后八思巴的弟、侄、门徒一直继承帝师称号，并一直受到历代元朝皇帝的尊隆和赏赐。元朝宫廷中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佛事，吐蕃喇嘛也经常出入宫廷。


八思巴文字

总的来说，西藏地方由元朝中央政府统一管辖后开始有了比较安定的环境，这对于西藏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当时西藏与内地有驿站相通，物资交流很频繁，元政府在碉门、黎州二地设置榷场，便利了汉藏人民进行茶、马、绢、帛的交换。

五、契丹、女真和南方各族

契丹、女真分别建立辽朝和金朝后，大批契丹人、女真人进入

华北，他们通汉语，有的人具有相当高的汉文化。所以，元朝推行“四等人制”时，把契丹、女真人归入第三等“汉人”中。

耶律楚材在蒙古国所起的作用，足以证明他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政治家。他的才能是多方面的，既是文学家、诗人，著有《湛然居士集》；又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西征时，耶律楚材驻撒马尔罕，与当地穆斯林天文学家研究后，以撒马尔罕为准，按经纬度不同，以差距乘 4 359，取得里差，用以加减经朔弦望小余，编成《西征庚午元历》进献成吉思汗。他还精通佛法，在《西游录》中对道家丘处机进行了抨击。其子耶律铸，中统至元年间，曾三度出任中书左丞相，亦善诗文，有《双溪醉隐集》。耶律铸子希亮，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著有诗文集《愫轩集》。

此外，还有一批契丹将领早期归附蒙古，立有战功。如耶律阿海，石抹大家奴、石抹按只父子，耶律留哥，石抹明安，石抹也先等。

东北地区的女真人分为三部分：辽阳以南的熟女真，文化程度较高，受汉文化影响较深；长白山、松花江地区的生女真，经济文化水平略低于熟女真。

云南地区居住着白、纳西、傣、彝等少数民族。元朝建立后，忽必烈派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当云南行省平章，在云南采取了发展生产、制定赋税标准、改善民族关系等措施。云南地区的经济继续有所发展。特别是金、银、铁矿的开采，



赛典赤墓碑

毡、刀、甲等手工业制品都有了较大的发展。马可·波罗到云南时看到当地米麦丰富，鱼类繁殖，居民稠集，百姓富庶，说明云南地区的发展是很快的。

南方的广西地区居住着壮、黎等族。元朝在这里进行大规模屯田，兴修水利，农业生产发展很快。黎族人民很早就有种植棉花的经验，生产技术也是很高的。

第十章　中外友好关系的新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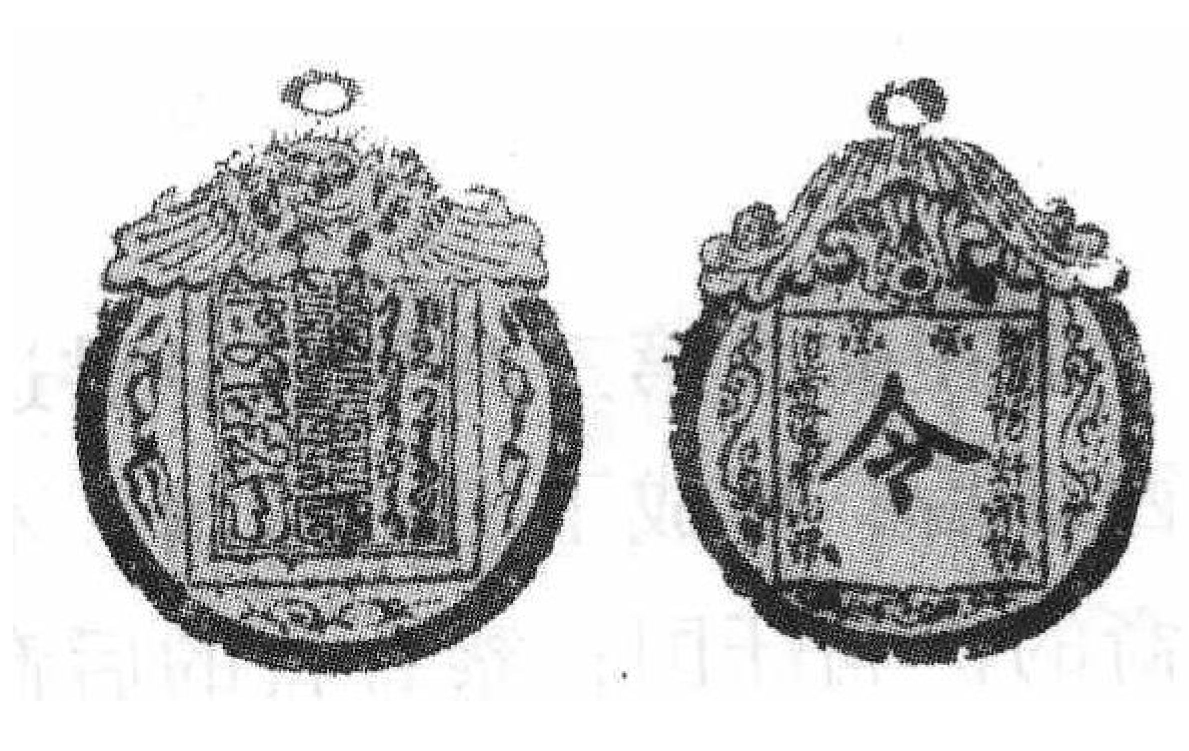
一、与钦察、伊利两汗国的密切往来

在前面第三章里已经讲过，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多次发动西征后，形成了四个汗国：术赤后裔的钦察汗国；旭烈兀及其后裔的伊利汗国；察合台的后裔封地称察合台汗国；窝阔台后裔的封地称窝阔台汗国。其中窝阔台汗国由于窝阔台及其儿子贵由都是蒙古大汗，他们的封地是大汗直接统辖的地区，因此不再具有独立性；后来海都叛乱被击败，窝阔台后裔的封地一部分仍由元朝管辖，一部分归察合台汗国，这个汗国就不再存在了。所以，我们说的西北诸汗国只是指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和察合台汗国。但察合台汗国也是归元朝政府管辖的，察合台汗阿鲁忽曾拥护忽必烈即汗位。后来笃哇追随海都叛乱，遭到失败，元朝政府继续对它行使权力。

钦察和伊利两汗国的情况就不同了。他们虽然名义上是元朝的“宗藩之国”，实际上成了独立国家。虽然元朝与这两个汗国之间在政治上仍有很多来往，但由于地理、民族、历史等原因，两汗国完全走上了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因此，元朝与他们的关系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了。但是，他们在文化、经济上的联系却依然十分密切。

钦察汗国与元朝相隔甚远，早在窝阔台时期，就设置了和林到拔都营帐的正式驿路。元朝建立后，这条驿路又从钦察汗国的都城

萨莱通到大都。当时只要持有元朝政府发给的牌子（金、银符），就可以在这条路上乘驿往来。考古学家曾在这一带发现过八思巴字的银牌。据当时的阿拉伯和欧洲商人记载，从钦察汗国的塔纳（今俄罗斯罗斯托夫南，顿河河口南岸）有商路通到中国甘州等地，这条路虽然很艰难，但对旅客和商贩来说是有安全保障的。14世纪上半叶，塔纳城的商业相继操纵在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人手中，许多欧洲商人从这里出发，经过钦察汗国境，来到中国各地进行贸易。



元代令牌

钦察汗国的许多城市——克里木半岛的速答黑、亚速海边的塔纳、拔都萨莱、别儿哥萨莱和花剌子模的玉龙杰赤等，都在当时的中西交通线上，是沟通中西经济和文化联系的“国际性”都市。据14世纪阿拉伯历史家阿里·乌马儿和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记载，在这个都城里居住着大批从各国来的商人。欧洲商人用不着亲自到中国去，就能在这里买到中国的丝织品。这说明元朝时中国与钦察汗国的贸易是经常性的，产品输入品种繁多，数量充足。

中国的手工业工人也来到钦察汗国定居。当时在都城萨莱有许多从事铸造铜镜的中国人，他们带去了先进的技术。

伊利汗国与元朝的关系密切。在旭烈兀西征过程中，大批中国的学者、工匠来到了阿拉伯国家，中国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也传到了伊利汗国。

旭烈兀从中国带去不少精通天文历数的学者，其中有一名叫屠密迟（译音）的人，被称为“先生”。伊朗著名天文学家纳速剌丁·途昔奉命编纂《伊利汗天文表》时，曾向他学习中国的天文推步之术。元朝时期，有不少中国学者到伊利汗国任职，他们带去了中国的医学、天文历法及历史等各类书籍。伊利汗台赞命令丞

相拉施德丁编纂《史集》时，曾要他搜集有关中国的历史著作；精通天文历法和历史的中国学者李大迟、倪克孙（译音），也应召参加了编纂工作，并为拉施德丁讲述了中国的干支纪年法。

拉施德丁在《史集》中还多次提到，为他提供了最丰富的史料、给予他最大帮助的是孛罗丞相。孛罗是蒙古朵儿边氏人，在元朝曾担任过御史中丞、大司农卿、御史大夫、枢密副使等要职。1283 年（至元二十年），忽必烈命他以丞相职衔出使伊利汗国，以出身于叙利亚西部的拂林（欧洲及地中海沿岸西亚地区）人爱薛为副。孛罗、爱薛一行于 1284 年冬到达波斯，参见了新即位的伊利汗阿鲁浑，后来爱薛回到中国，孛罗仍留在那里。孛罗是杰出的蒙古族学者，精通蒙古各部族以及成吉思汗建国以来的历史，熟悉元朝的各种制度。在《史集》编纂工作中，拉施德丁得到他的密切配合，由他系统而详尽地口述，拉施德丁据以笔录，编纂成书。这部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名著，其中的蒙古史和元史部分，可以说是他们两人合作的作品。

孛罗还将中国的钞法介绍到伊利汗国。伊利汗乞合都奢侈无度，滥行赏赐，弄得国库空虚。主管财政的丞相撒都鲁丁和一些官员穷于应付，建议采用中国通行的钞法，发行纸币，企图用这个办法进一步搜括人民的财富。乞合都命孛罗丞相说明钞法情况，孛罗就将元朝宝钞的形制及发行办法做了详细报告。1294 年 7 月，乞合都下令在都城帖必力思制钞，行用全国。并在各地设立钞库，负责发行及倒换昏钞等事务。所制钞为长方形，上面印有几个汉字，中间圈内印钞值，其下为乞合都的喇嘛教名。这一套发行制度和钞的形状，基本上是从中国照搬去的。伊利汗国的钞法只实行了两个月，因遭到商人的反对，造成市场瘫痪，便宣布废除了。但当时的波斯、阿拉伯人却因此认识了世界上最早实行的纸币制度，以及中国的雕版印刷技术。至今波斯语中还保留着“钞”（纸币）这个词。

驿传制度也在伊利汗国得到了实行。早在1239年，窝阔台命畏兀儿人阔里吉思主管呼罗珊等地户口、赋税事，阔里吉思就在境内遍设驿站，备马匹等以供使者驰驿，严令不得骚扰百姓，不得向农民需索马匹、粮草及各种食物，使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得到一定保障，因而深得民心。

中国和波斯、阿拉伯国家的古代医学都很发达，而且很早就互相交流了。在元代，医学方面的交流得到更大发展。有不少中国医生在伊利汗廷任职。旭烈兀生病时，就喜欢随身带去的中国医生给他治疗。有一次合赞汗患眼疾，曾按照中国医生的针灸法治疗，收到了很好的疗效。

来到中国的波斯、阿拉伯人，其数量之多，是前代任何时期无法比拟的，他们在中国定居，从事商业、手工业、工艺技术等活动，有的因战功或其他功劳上升为统治集团的成员。他们把波斯、阿拉伯的天文历法、医药等方面的知识介绍到中国来，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科学知识。

二、与亚洲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各国都是我国的近邻，元朝交通方便，与这些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是非常密切的。

朝鲜与中国是一江之隔的邻国。元朝时，朝鲜为王氏所统治，称高丽。虽然蒙古军队多次入侵高丽，元朝统治者也对高丽采取压迫政策，但是两国人民之间经济和文化联系，是统治者无法破坏的。朝鲜很早就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特别在唐朝时，朝鲜吸收了很多中国的典章制度和文化艺术。元朝时，中国典章制度对朝鲜继续发生影响，像兵制、驿站等，王氏高丽也是仿效的。中国文化也继续为朝鲜人接受，高丽名儒安珦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时从元朝归国，带去了《朱子全书》等中国典籍，并在太学讲朱子理学，从此程朱学说在高丽广为流传。中国的科学技术也传到了朝

鲜，忽必烈时期编的《农桑辑要》、《授时历》等科技著作在朝鲜广为流传，朝鲜人种植棉花也是从中国带去种子后开始的。中朝两国的贸易十分频繁，陆路上可通过互市进行物资交流，海上贸易也非常兴旺，韩国海岸曾发现过沉没在海底的装载有大批货物的元代中国海船，足以证明当时两国海上贸易的规模。这艘沉船有12间船舱，载重四五百吨，装载了几千件瓷器等商品和7万枚左右的钱币。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在漫长的岁月中，互相交流，彼此汲取文化成就。元朝初年虽然有过一段入侵日本的令人不快的历史，但是当元朝统治者入侵失败后，两国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又恢复了。1299年（大德三年）元朝派妙慈弘济大师一山出使日本，他率领商船，携带货物，远涉重洋，来到日本，为元代中日两国新关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以后，中日之间的贸易有了发展，日本商人经常到闽浙海口来做生意，中国的海船也常常到达日本。日本僧人到中国游历名山、参观巨刹的也很多，他们钻研佛学、儒学和文学，为中日文化的继续沟通作出了许多的努力。

今天的越南，元朝时分为安南和占城两个国家。蒙古国时期和元朝初年时，蒙元统治者曾侵入过安南。战争结束后，关系恢复正常，两国使臣往返不绝。据元代旅行家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记载，中国商人经常从海路到安南、占城去经商。长期居住在中国的安南人是很多的，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汉文化的水平很高。中国典籍、文化科技成果也传到了安南、占城，《授时历》在安南是通行的。

此外，元朝时柬埔寨叫真腊。中柬两国有悠久的历史往来，中国的货物极受柬埔寨人的欢迎，他们把来自中国的手工艺品、生活用品称为“唐货”。

元朝时中国与缅甸、泰国等国家关系是友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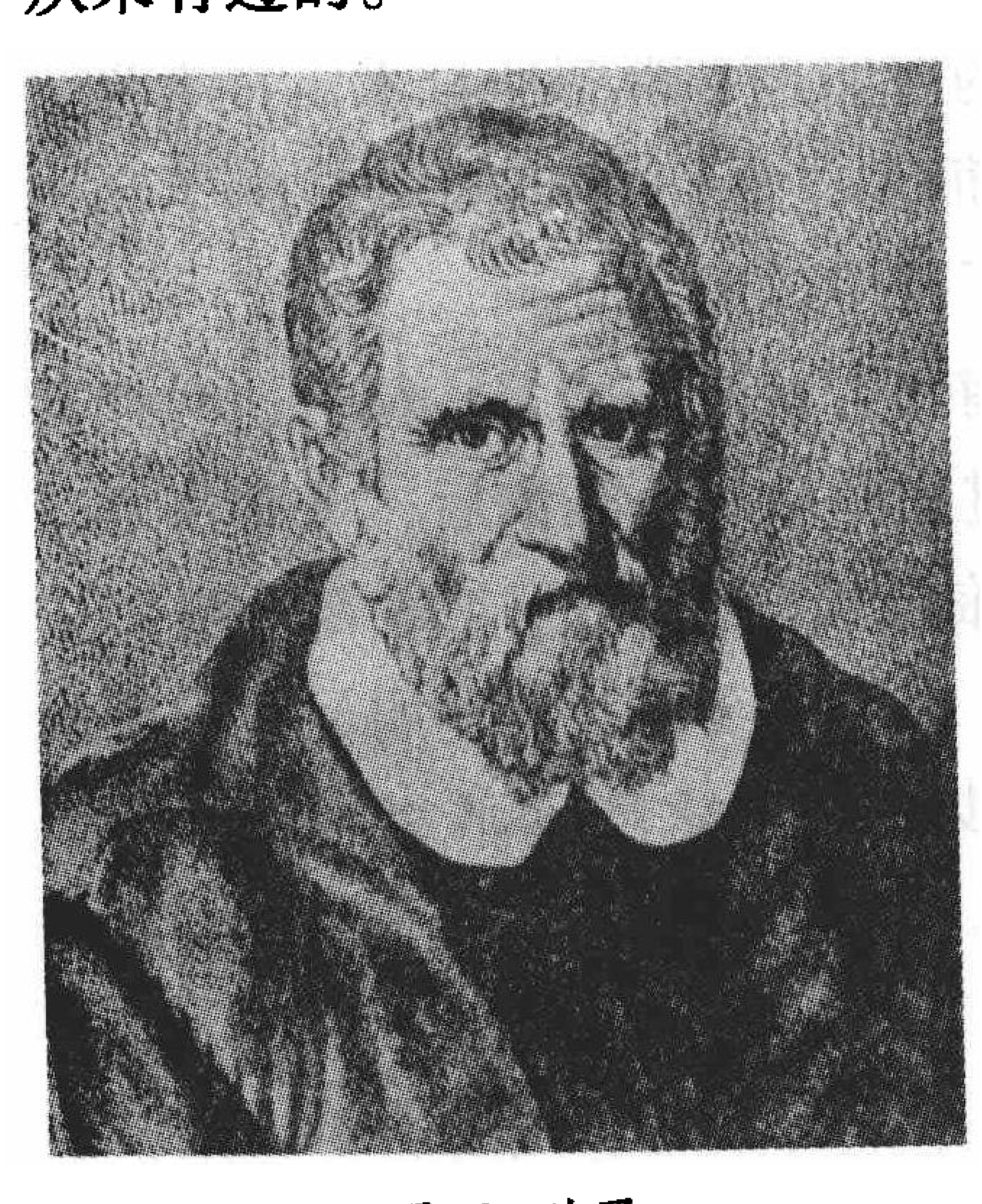
中国与南亚各国的贸易，据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目睹的情况，当时主要由中国商人操纵。马可·波罗也说，中国商人的海

船经常载货至俱兰、下里、马八儿等地沿海进行贸易，中国的商品大部分是丝绵、绸缎、瓷器等特产，返航时携带当地大批土特产回国。汪大渊在游历南亚各国时看到海商从北溜（今马尔代夫）将贝八子（即海贝）运至乌爹（今印度西部的乌代浦尔）、朋加剌（今孟加拉）等地，换取大米等。海贝是当地的一种货币。

三、中欧关系的发展和马可·波罗来华

元朝时期，中国与欧洲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欧洲传教士、商人大批东来，中国人也有到达欧洲的。元朝与欧洲的宗教关系很密切，贸易也很兴旺。

由于欧亚交通的方便，元朝时到中国的欧洲人数量之多是前代从未有过的。



马可·波罗

到中国来的欧洲人要算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最著名了。马可·波罗的父亲尼古拉·波罗和叔父玛赛，波罗都是意大利威尼斯的大商人。他俩第一次来中国时，受到了忽必烈的欢迎。当他们回国时，忽必烈让他们携带他给教皇的信，请教皇派传教士到中国来。1271 年夏天，他俩又带着 17 岁的马可·波罗第二次来中国。随行的还有两名传教士，但他们只走了一段路，就不敢前进了。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叔父从地中海东岸的阿迦城出发，穿越叙利亚和两河流域，经过波斯，越过中亚大沙漠，翻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今天的新疆地区，路经喀什、于阗（今和田）、罗布泊等地。他们一路上跋山涉水，历尽艰辛，用了将近 4 年的时间

才到达上都。在那里受到正在避暑的忽必烈的欢迎。忽必烈任命他们3人做了元朝的官吏。

聪明的马可·波罗很快学会了蒙古语，由于他办事干练，细心认真，深受忽必烈的信任。他除了在大都供职外，还经常奉忽必烈的命令去巡视各省或出使外国。他曾经去过今天的山西、陕西、四川等省，深入川、藏少数民族地区，到过云南和缅甸北部，据说还当过扬州总管。后来奉命出使南洋，到过安南、爪哇、苏门答腊等地，还可能到过印度各国和僧迦剌。

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叔父在中国整整生活了17年。1291年初，他们随伊利汗国使臣兀鲁斛、阿必失呵、火者3人护送阔阔真公主离开中国去伊利汗国，1295年底回到了家乡威尼斯。当时威尼斯和热那亚正发生战争。1296年，马可·波罗因参加威尼斯舰队与热那亚作战，兵败被俘。他在狱中关押了1年，同狱中有一位作家叫鲁思蒂谦，马可·波罗把他在亚洲的丰富见闻口授给鲁思蒂谦听，鲁思蒂谦把它记录了下来，这就是闻名世界的《东方闻见录》(俗称《马可·波罗行纪》)。

《东方闻见录》被誉为“世界一大奇书”。全书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描写马可·波罗东来时所经过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第二部分讲元朝前期的政治情况，记载了许多中国城市的丰富的物产和繁荣昌盛情况；第三部分讲中国近邻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第四部分讲成吉思汗之后的蒙古诸王之间的战争和俄罗斯的情况。马可·波罗关于元代中国情况的记载是很有价值的，例如他对北京（汗八里）、西安、济南、开封、襄阳、镇江、常州、苏州、杭州、福州、泉州（刺桐）等城市情况的记载，非常真实，对各地的风土人情、丰富的物产以及城市建筑等都写得很详细。书中还介绍了中国使用纸币、用煤炭当燃料等情况。这些情况的介绍使欧洲人大开眼界，对东方十分向往。

《东方闻见录》的出版对后世的影响很大。14、15世纪欧洲的一些地理学家，根据它和其他资料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著名的

热那亚青年水手哥伦布早年曾细心阅读过马可·波罗的这本书。1492年他带着西班牙国王致中国皇帝的书信进行了著名的远航，后来到达西印度群岛却误以为到达了东方的印度。这一“地理大发现”是与马可·波罗对东方的介绍分不开的。

四、中非交往和伊本·白图泰东来

中国与非洲相去遥远，但自汉唐以来，中国与非洲的交往就一直没有间断过。

元代中国与非洲最早的交往是旭烈兀西征时的事。当时蒙古军队占领叙利亚等地后，与密昔儿（今埃及）开始接触。蒙古将领郭侃曾率军侵入密昔儿，后来被密昔儿算端击败，蒙古军队就没有再侵入非洲。

元朝建立后，中国与非洲的关系，主要是通过使臣和商人来取得联系的。马可·波罗在他的《东方闻见录》里曾记下了忽必烈派遣到马达加斯加岛的使臣所讲述的情况，他说：忽必烈大汗所遣的使者到达马达加斯加后，被岛上的土人拘留了，后来大汗不得不派人用金子去赎了回来。使臣回国后带回来一根长达90掌（拇指及小指间张开时的距离）的卢克鸟羽，这根鸟羽的羽管有两个手掌这么粗，使臣把它献给忽必烈，大汗见了高兴极了。使臣还带回两根野猪牙，每根重达14磅，这种野猪有水牛那么大。使臣还说，岛上的麒麟、野驴和各种奇形野兽非常多。元末时，中国旅行家汪大渊也到过非洲。他在《岛夷志略》中记载了层摇罗国（今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的情况：那里谷物很少，土人种薯做粮食，煮海水为盐，酿甘蔗汁为酒，也从事狩猎，捕野兽为食。男女都挽发髻，穿无缝短裙，性格朴实、爽直，由酋长统治。土产红檀、紫蔗、象牙等物，中国商人以花银、丝缎等商品和他们交易。元代中国商人到非洲去贸易当然远远不止这两个国家，现在东非许多国家都保存着中国的元代瓷器等中国物品，足以证明当时中非贸易的

盛况。

非洲人到中国来的，最著名的要算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他是继马可·波罗之后的又一位大旅行家。

伊本·白图泰是摩洛哥丹吉尔港人。21 岁时去麦加朝圣，开始周游各国。1346 年（元顺帝至正六年）以印度苏丹使者的身份来到中国泉州，他在中国期间，曾到过广州、杭州、大都（汗八里）等地。后来再从印度、西亚、埃及返回摩洛哥。1354 年时，摩洛哥苏丹命令他将自己的游历写成书。后来，由他口述，穆罕默德·伊本·朱赞·凯洛比记录，这就是闻名世界的《伊本·白图泰游记》。

《游记》中关于中国部分的记载虽有许多是传闻，未必确切，但仍然有许多极有价值的材料。如前面第七章中已写的关于中国海船的结构和规模的记载就是非常珍贵的。下面是《游记》中关于他看到的当时中国的情况：

> 中国幅员辽阔，土产甚丰。有水果、五谷、金银等。在世界各国中是无与伦比的。大马士革的李子是世界上最好的，但我到中国后看到的李子，不亚于大马士革；又有西瓜，与花剌子模的相似。总之，我们家乡所出产的，中国都有，甚至比我们的更好。小麦很多，我未见过这样好的品种，豌豆和黄豆也比我国的好。
>
> 中国的瓷器产于泉州和广州。中国人将瓷器转运出口到印度等国，然后再运到我们摩洛哥。这种瓷器，质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
>
> 中国人信奉异端，崇拜偶像，死后火葬。中国的皇帝是蒙古人，都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在城市中，到处有穆斯林居住，有清真寺。中国人很富裕，安居乐业。中国的养蚕业很发达，丝织品很多，即使是穷苦人也穿丝料，但棉织品很贵。中国通用钞币，纸币大如手掌，上面印着皇帝的玉玺。居民用煤土作

燃料。这种土是地下的天然物产，燃烧时火力比炭更旺。

……

汗八里（京城）是世界上最大的京城之一，城的中央是可汗的宫殿，建筑多为精工雕刻的木质结构，布局独具风格，有门7座，守卫中有印度人和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人。

伊本·白图泰关于中国记载还很多，这里不再一一介绍了。

摩洛哥人以有伊本·白图泰这样一位杰出的旅行家而感到骄傲，因为他在《游记》中把中国和东方各国介绍给摩洛哥人，他在中非之间架起了友谊的桥梁。

第十一章　元朝的灭亡

一、元末社会矛盾的激化

“开河”和“变钞”　元末，社会上曾流传着一首《醉太平小令》，唱道：

> 堂堂大元，奸佞（nìng）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
> ——《醉太平小令》

这首小令写得很有风趣，它把元朝社会“人吃人”的本质刻画得入木三分，淋漓尽致。朝廷里是奸佞当权，法纪败坏，贤愚不分，沉重的剥削和压迫，弄得黎民百姓怨声载道。天下的劳动人民再也不能忍耐了，他们迟早有一天要举起义旗，把腐朽的元朝统治推翻掉！浙江温州、台州地方的农民干脆树起了旗帜，上面写着：

> 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
> 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如果说，元末农民起义是元朝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开河”和“变钞”就是这次大起义的导火线。

1343年（至正三年）五月，黄河在白茅堤决口。次年五月，大雨连续下了20多天，黄河水暴溢，平地水深2丈，白茅堤、金堤相继决口。今天的河南、山东境内的黄河两岸，农田被淹，民屋倒塌。诗人高志道写道：

屋倒人离散，风生水浪滔，
周围千里外，多少尽居巢！

大水之后，又是大旱。诗人迺贤写道：

河南年来数亢旱，赤地千里黄尘飞，
麦禾槁死粟不熟，长铲挂壁犁生衣。

谁知祸不单行，水灾、旱灾之后，又是瘟疫蔓延。黄河两岸的百姓连年遭灾，过着饥寒交迫、痛苦万状的生活，据估计，当时饥民总数达到100万户、500余万人，他们之中不少人在悲惨中死去。

大水也冲坏了沿河一带的盐场。元朝政府每年要从盐课中取得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有个官员说："国家收入盐利居十之八。"黄河泛滥后，奔腾的洪水沿着运河北上，冲坏了山东地方的盐场，使政府的收入遭到了很大的损失。

元朝政府面临最严峻的问题就是要不要治河和如何治河的问题。

都漕运使贾鲁曾沿黄河考察地形，往返数千里，提出"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以制横溃"的正确治河方略。就是说，让黄河仍然回复原来的故道（下游从淮河入海），对南河故道采取疏通的办法，对北河采取填塞的办法。遭到工部尚书成遵等人的极力反对，主要理由是聚集20万人开河，必将导致民工造反。中书右丞相脱脱认为：越是不治，越是难治，越难治，饥民、流民的造反越加蔓延，"役不大兴，害不能已"。最后，决定开河。他任命水利

专家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河防使，于1351年（至正十一年）四月，调发汴梁、大名等13路民工15万人，又派驻守在庐州（今安徽合肥）等地2万士兵负责监督，开始治河。按照贾鲁设计的方案，从黄陵冈（今河南兰考东）开挖，南到白茅堤，西到阳青村，280里河道要加深，然后把黄河勒回旧道入海。

黄河泛滥后7年来，沿河两岸的贫苦农民遭受洪灾、旱灾、瘟疫和饥荒，长期在死亡线上挣扎，早已恨透了元朝的黑暗统治。现在被强征为民工后，待遇极低，加上治河官吏的克扣，他们所得更少，这些半饥半饱的民工，在军队的皮鞭下担负着极其沉重的劳役。怨恨、愤怒的气氛笼罩着整个治河工地。“开河”使分散的农民聚集在一起，他们互相发泄不满，形成了一股反抗元朝政权的力量，为大起义创造了条件。

脱脱采取的另一个重大措施是“变钞”。

变更钞法的主要原因，一是国库空虚，入不敷出。世祖至元后期以来，纸币发行量猛增，纸币不断贬值，历代日积月累印发纸币，到顺帝时已形成巨大的压力。加之统治集团挥霍浪费，赏赐、佛事远远超过以前，政府已无力支付这些庞大的开支。二是伪钞横行，印造伪钞几乎遍及全国，仅杭州路一地，大德元年到四年（1297—1300），查处的伪钞案达88起，案犯达274人之多。这些伪钞愈积愈多，给钞法带来了严重的破坏。1350年（至正十年）四月，左司都事武琪向脱脱建议变更钞法。但在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集贤、翰林两院官共同讨论此事时，遭到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吕思诚等人的竭力反对，双方进行激烈辩论后，脱脱决定变钞。

变钞的具体办法是：一是印造“至正交钞”（实际上是用旧的中统交钞加盖“至正交钞”字样，故又称“至正中统交钞”）；二是发行“至正通宝钱”，与历代旧币通行，造成钱钞通行局面，并以钱来充实钞本。为了搜括民脂民膏，政府拼命印造这种纸币，老百姓拿了这种货币买不到东西，在大都钞10锭（等于铜钱5万文）

不够买1斗米，所以大家干脆不用了，都以货物进行物物交换。这种“钞买钞”的局面，弄得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以上讲的就是“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的来历。

二、韩山童、彭莹玉秘密传教

元末农民起义是通过宗教把农民组织起来的。当时利用的宗教主要是白莲教和弥勒教。

白莲教最初称白莲社，是公元5世纪初出现的，它来源于佛教的净土宗，供养的是阿弥陀佛，他代表光明，就是“明王”。这种宗教劝人念佛修行，多做好事，死后便可到西方净土白莲池上过快活日子。到12世纪前期，又加进了天台宗的格言，忌葱乳，不杀、不饮酒，发展成为白莲教。金末、南宋时，全国许多地方都有白莲教活动。

佛教净土宗的另一派叫弥勒教。弥勒教信奉弥勒佛。据佛教传说，弥勒曾是一个对百姓慈育的好国王，后来在释迦牟尼旁边听法，释迦牟尼灭度（死）后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弥勒下降人世而成佛。据说，释迦牟尼死后，世界变坏了，气候变坏了，庄稼变坏了，人心也变坏了。幸亏释迦在灭度前留下遗言：再过若干年，弥勒佛出世了，等弥勒佛下生，世界立刻变样子，到处有宽阔、干净的土地，青山绿水，满地铺着金沙，还有各种无名的宝贝，人心也变好了，寿命也长了，人口增加了，城市富庶了，稻麦1次种子有7次收成……弥勒教相信世界上有明和暗，好和坏两种力量，斗争到最后，明和好取得胜利。

白莲教和弥勒教的教义给贫苦的农民带来了无限美好的希望。他们一经信教，就坚信不移，虔诚地等待明王出世，弥勒下生。因此，不少农民领袖就利用这种宗教来鼓动农民起来反抗现政权。

元朝末年时，逐渐形成了南北两大系统的秘密宗教组织，他们的领导人就是著名的农民领袖韩山童和彭莹玉。

韩山童是赵州栾城（今河北栾城）人。他祖父是一个教书先生，人称韩学究，在栾州一带宣传白莲教，烧香聚众，大约在元武宗取缔白莲教时，勒令他迁到广平永年县（今河北邯郸东北旧永年）。到韩山童继为白莲教主时，他的教徒更多了，在河南、江淮一带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他周围还有一批像刘福通、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等忠实信徒。当元末社会矛盾激化时，韩山童等加紧了宣传组织工作，用“明王出世”、“弥勒下生”等宗教迷信来吸引群众，鼓动武装起义，把斗争矛盾引向元朝统治者。

彭莹玉（又叫彭翼、彭和尚、彭祖，敌人叫他“妖彭”）是南方白莲教领袖。他出生在江西袁州（今江西宜春）南泉山东村庄的一个农民家庭里，村庄附近有一座大佛寺，叫慈化寺。这慈化寺历史很悠久，规模很大。据说，彭莹玉出生时，天空有红光，映红了半边天，慈化寺一位姓彭的老和尚看到后十分惊奇，以为有人家着火。第二天，这彭老和尚去村中询问，才知道昨晚村中诞生了一个男孩子。彭老和尚要求将这小孩收为徒弟，莹玉的祖父同意了，到 10 岁那年，莹玉入慈化寺为僧，并改姓为彭。到 15 岁那年，南泉山下冒出一股泉水，恰巧当时袁州一带瘟疫流行，彭莹玉用这种泉水治好不少病人，当地老百姓感恩戴德，把他当作活神仙一样看待。彭莹玉的威望越来越高。他便以宣传弥勒教为名，发展教徒，逐渐成为南方秘密宗教的领袖。他一面传教，一面组织武装起义。起义爆发前，他的徒弟已经布满在江淮一带。由于彭莹玉的辛勤活动，大江南北已经布下了起义的种子，为日后南方红巾军起义的爆发作好了准备。

三、刘福通首义颍州

元顺帝调发 15 万民工开河后，韩山童等看到时机已经成熟，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发动起义。

韩山童等派人到处散布童谣说：“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

反！"又派几百个教徒去做挑河夫，在民工中宣传"明王出世、弥勒下生"，发展教徒。并暗暗地凿了一个独眼石人，背上刻了"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几个字，埋在即将挖掘的黄陵冈附近的河道上。经过这番大造舆论的活动后，黄河两岸的人心浮动，大家以为元朝灭亡已是指日可待了。不久，民工们果然在河道里挖出了独眼石人，于是个个惊诧不已，一传十，十传百，中原地区沸腾起来了。

这时，聚集在颍州颍上县（今属安徽）一带的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决定立即发动起义。1351 年（至正十一年）五月，韩山童等召集 3 000 教徒，人人头裹红巾，在白鹿庄斩白马乌牛，祭告天地，准备起义。他们发布文告，宣称韩山童是宋徽宗的第八代孙子，应当继承皇位；刘福通是宋朝大将刘光世的后代，应该辅佐宋朝皇帝的子孙，恢复天下。

由此可见，韩山童在起义一开始目标就很明确，就是用"复宋"作为口号，推翻元朝的黑暗统治。

但是很不幸，正当起义开始发动的时候，韩山童被捕牺牲，他的妻子杨氏带着儿子韩林儿逃到武安（今江苏徐州）避难，刘福通等人经过苦战才逃出重围。他们出敌人不意，转而一举攻下了颍州城（今安徽阜阳）。

因为刘福通的起义军都头裹红巾，所以称红巾军，这些起义军多数信奉白莲教，烧香拜佛，所以又称香军。埋葬元朝封建统治的元末农民起义正式开始。红巾军是元末农民起义军的主力军，他们人数多，组织得好，斗争目标明确，贡献最大，所以元末农民起义又叫红巾军起义。

红巾军占领颍州后，很快占领了亳州（今安徽亳县）、项城（今河南沈丘）、朱皋、罗山、真阳、确山（以上均属今河南）等地。到这年秋天时，红巾军又占领了汝宁（今河南汝南）、息州（今河南息县）、光州（今河南潢川）等地，起义人数达到 10 万人。

刘福通在颍州发动起义取得了胜利后，对其他地方的人民群众

的鼓舞很大，各地纷纷起兵响应。在北方地区的主要有芝麻李等起义于徐州，布王三、孟海马等起义于湘汉流域，郭子兴等起义于濠州（今安徽凤阳）。

1352 年二月，郭子兴在濠州起兵。郭子兴是定远（今属安徽）的富豪，但出身低微，没有靠山，常受地方官府的气，所以也参加了白莲教，平时结交江湖好汉，很有点名气。刘福通起义爆发后，当地农民也在闹造反。郭子兴带了几千人，趁黑夜，偷入濠州城，半夜里冲进州官衙门，杀了州官，宣布起义当地民众纷纷参加起义军。贫农出身的朱元璋就是在这之后不久投奔郭子兴的。

朱元璋是濠州钟离太平乡孤庄村人，家境十分贫寒，父亲朱五四一辈子替地主种田。1344 年淮北大旱，瘟疫流行，朱五四和朱元璋的母亲、长兄都相继病死。朱元璋不得不到皇觉寺做和尚，不久又出门云游，靠化缘为生，后来回到皇觉寺。农民起义爆发后，他耳闻目睹了元军的种种暴行，最后决定参加郭子兴部队。

芝麻李、布王三、孟海马、郭子兴等人领导的起义军，都信奉白莲教，也都称为红巾军。由于宗教宗派的原因，他们都属于北方红巾军系统，有的一开始就受到刘福通的节制。

刘福通领导的主力红巾军，始终是元朝的“心腹大患”。赫厮镇压红巾军失败后，元顺帝又令知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儿、卫王宽彻哥等率诸卫兵 10 余万人去镇压，后来又增派了不少元军去助威。元军攻陷上蔡，起义军最早的领导人之一韩咬儿牺牲。1352 年三月，元军攻陷汝宁，元将巩卜班率数万军队驻汝宁沙河岸，他们为暂时的胜利所陶醉，日夜饮酒作乐。刘福通乘他们不备，偷袭元营，巩卜班被打死，元军溃散。不久，也先帖木儿驻军沙河，但是巩卜班的下场使他记忆犹新，因此日夜提心吊胆，疑神疑鬼，有一天晚上，士兵突然惊叫起来，也先帖木儿以为刘福通又来偷袭了，只顾上马逃命，军资器械、粮草全部丢弃，几万大军直往汴梁逃窜。朝廷知道了这件事，下令把也先帖木儿撤职查办。元朝几次派军镇压刘福通都遭到了惨败，便改变策略，把进攻的重点放在刘福

通主力红巾军的两侧上，而利用当地的地主武装“义兵”来牵制刘福通，严重阻碍了刘福通起义军的发展。到了1354年时，北方红巾军被迫采取守势。这一年，他们的处境很困难。

四、徐寿辉建立“天完”

刘福通在颍州发动起义后，在江淮一带的彭莹玉和他的徒弟们也积极活动起来。1351年那年，先后有许多地方爆发了起义。

徐寿辉于1351年八月正式发动起义，一举攻占蕲州。徐寿辉的起义军也是头裹红巾、烧香拜佛的，所以也是红巾军或香军，但因为他们属于南方系统，因此我们把它称为南方红巾军。

十月，南方红巾军攻占蕲水（今湖北浠水），并以此为都城。国号天完，改元治平，徐寿辉称帝，邹普胜为太师，建立了元末农民起义中的第一个农民政权。“天完”就是压倒“大元”的意思。忽必烈建立元朝时，因版图辽阔，自称“大元”，显得很威武，现在农民军要推翻大元，就要有一种压倒大元的气概。所以在“大”字上加一横，变成“天”；在“元”字上加一个“宀”，变成“完”，表明了南方红巾军推翻元朝的决心。天完农民政权行政机构有中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军职有百户、千户、万户、总管、统军元帅等。起义农民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对于打击和镇压敌人，维护社会治安，保证起义军的组织纪律和统一指挥各地起义军，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使原来以宗教为纽带联系的南方各地教徒有了自己的政治中心。

天完政权建立后，南方红巾军起义的形势发展极其迅猛。为了扩大战果，天完政权通过分兵四出的战略，发展了起义形势，对南方各地的元朝统治打击很大，红巾军所到之处，所在贫苦农民纷纷起兵响应，他们穿着短衣草鞋，没有兵器，就用木头竹子削成武器，剪段红布裹着头，像潮水一样奔向起义队伍。

南方红巾军之所以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是与他们提出明确的

政治口号分不开的。他们在“摧富益贫”口号的鼓舞下，夺取地主富豪的钱财、粮食，那些逃入穷乡山谷的富豪也无法逃脱农民起义军对他们的沉重打击。

彭莹玉和项普略所率领的一支红巾军，活动范围最广，战斗最激烈。彭莹玉是南方秘密宗教的首领，也是红巾军的领袖。但自己却没有称王称帝。他尽管地位很高，徒弟遍布南方各地，人们对他很尊重，但他总是浴血奋战在第一线。1352 年二月，彭莹玉率领的红巾军占领江州（今江西九江），杀了曾做诗咒骂红巾军的江州路总管李黼。接着攻克南康（今江西星子）、饶州（今江西鄱阳）、信州（今江西上饶）。四月，进入安徽境内，占领婺源、黟县、休宁和徽州。在这一带，与汪同、程国胜、俞茂等地主分子组织的地主武装展开了激烈的搏斗。六月，彭莹玉、项普略率军突破昱岭关，进入浙江。七月，攻克江浙行省首府杭州，元朝官吏纷纷逃窜，参政樊执敬顽抗被杀，总管宝哥与小老婆投西湖自杀。彭莹玉的军队进入杭州后，纪律严明，不乱杀人，不奸淫妇女，军队驻扎在寺庙内，不占民舍。他们继续宣传“弥勒佛出世”，号召人民参加红巾军，贫苦大众投奔红巾军的十分踊跃；同时，他们把元朝的府库打开，把金帛等贵重的物品运走。这时，元军汇集在集庆，并形成了对红巾军包围的势态。在这样的形势下，彭莹玉只好退到江西瑞州，1353 年的十一月，元军包围瑞州，彭莹玉等红巾军将领进行了英勇的保卫战，城破后，他们都遭到元军的残酷杀害。

彭莹玉是南方红巾军的杰出领袖，他有着推翻元朝黑暗统治的信心，有着组织群众和宣传群众的丰富经验，有着在困难条件下坚韧不拔的毅力，有着在胜利条件下继续战斗的顽强意志，在他身上，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他的牺牲给南方红巾军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在彭莹玉牺牲的同时，南方其他各支红巾军也都遭到了敌人的镇压。这样，元朝军队的包围圈渐渐缩小，到 1353 年十二月时，元军攻陷天完政权的都城——蕲水，天完政权的 400 多名官员惨遭

敌人屠杀，徐寿辉等经过英勇奋战，突围而出，被迫逃到黄梅山区和沔阳湖中，以保存起义力量，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蕲水的失守，使南方红巾军起义受到了很大挫折，由于起义军失去了指挥中心，被敌人各个击破。

1353年时，由于天完政权的各支起义军先后为元军镇压，江淮地区起义军余部连结水寨于巢湖。

五、北方红巾军的兴衰

“小明王”亳州称帝 从1355年初开始，刘福通率领北方红巾军的主力开始大规模出击，元朝统治者对刘福通率领的主力军仍然采取“围剿”和堵截战术。但这个战术很快就遭到了失败。起义军在击败了元军后更加壮大了。

为了进一步联络、调遣北方各支红巾军，建立牢固的根据地，1355年二月，刘福通将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接到亳州（今安徽亳县），正式建立北方红巾军的政权——宋，改元龙凤，韩林儿为帝，又号“小明王”。“小明王”是“明王出世”的标志，表示光明已经来临，黑暗势力即将驱逐。



刘福通雕像

宋政权的建置与天完政权类似。中央政权设有中书省、枢密院和六部。通弟刘六为知枢密院事。刘福通为丞相，后来封为太保，所以刘福通又叫“刘太保”。随着各支起义军的发展，占领的地方越来越多，宋政权还设立了行中书省和府、县等地方行政机构。管军机构也逐

步完善起来，有统军元帅府、管军总管府、管军万户府等，均属枢密院管辖，并有百户、千户、万户、总管、统军元帅等相应的军职。

宋政权建立后，元朝反动军队进一步加紧了对红巾军的镇压，调兵向宋政权的都城——亳州进犯，刘福通在太康（今属河南）失利，元兵进围亳州，韩林儿逃到安丰（今安徽寿县）。次年三月，刘福通与元军激战于亳州，元军大败退走，亳州得安。

北方红巾军的失败 1356年九月，刘福通为了分散元军对宋政权都城亳州的压力，扩大战果，作出了重大的战略决策，即三路北伐。宋政权三路北伐后，牵制了元朝的许多兵力，刘福通亲率的中央红巾军解除了压力，于是便开始向外出击。

1357年六月刘福通攻汴梁。汴梁是北宋的首都，北方红巾军以“复宋”为号召，因此进攻汴梁，对于推翻元朝封建统治是有很大的号召力的。

1358年五月，刘福通发动对汴梁的进攻。元汴梁守将竹贞逃跑。这样，北方红巾军多年的愿望实现了，刘福通便将汴梁定为宋政权的都城，韩林儿也从安丰迁来。这时，北方红巾军出现了鼎盛局面。旧史书上记载：“造宫阙，易正朔，号召群盗，巴蜀、荆楚、江淮、齐鲁、辽海，西至甘肃，所在兵起，势相联结。”

但是，由于三路北伐军的失利，形势发生了逆转。敌人对宋政权的“围剿”愈益加剧，对宋政权的包围进一步紧缩。1359年八月，汴梁城破，刘福通保护韩林儿冲出重围，逃奔安丰。汴梁城内数万红巾军战士及宋政权官吏、家属被俘。

小明王韩林儿不得不遣人向朱元璋求救，朱元璋亲率大军来救，救出小明王和刘福通。后来，小明王被安置在滁州，到了1366年十二月，朱元璋命廖永忠迎小明王到应天，途经瓜步，将小明王韩林儿沉死在长江里。

北方红巾军虽然最后失败了，但是他们在元末农民起义中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正是他们最有力地打击了元朝的有生力量，正因

为有他们的英勇斗争，才为后来朱元璋最后灭亡元朝、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六、朱元璋削平群雄

朱元璋从1352年参加郭子兴部队到1368年（洪武元年）建立明朝为止的16年内，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头目，稳扎稳打，逐渐壮大，经过南征北战，削平群雄，最后推翻元朝，建立于新的封建王朝——明朝。下面要讲的，是他逐步壮大的过程。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濠州解围后，朱元璋领兵攻五河，取定远，攻怀远、安丰，后定远被元兵包围，朱元璋突围取含山、灵璧、虹县等地。

朱元璋很注意自己军队的建设，逐渐组成了一支主要由素质较好、出身较苦、勇敢善战的淮西人组成的军队。1353年六月，朱元璋到家乡钟离招募了700多人，其中徐达、邵荣、周德兴等人都是朱元璋幼时相好，出身都很贫苦，这些人和后来陆续投奔朱元璋的邓愈、常遇春、胡大海等，朱元璋的亲戚李文忠、朱文正，养子沐英等，以及巢湖水师俞廷玉、俞通海父子，廖永忠、廖永安弟兄，桑世杰、张德胜等人，都是朱元璋起义军的骨干，有了这样一批骨干，有了自己的一支队伍和郭子兴旧部、巢湖水师，就构成了朱元璋队伍的基础。


朱元璋

1353年冬，朱元璋有了自己的一支队伍后，开始南略定远。1354年春得驴牌寨“义兵”三千，六月得横涧山“义兵”2万（原为7万，后来加以训练，裁汰后剩2万）、得洪山寨“义兵”数千，所以在定远时朱元璋就已拥有数万人了。七月，克滁州。这时，赵均用、

彭早住也东略泗州、盱眙。郭子兴从泗州到滁州，朱元璋把部队交郭子兴管辖，郭子兴把朱元璋由镇抚升为总管。

1355年三月，郭子兴病死。四月，宋政权任命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为都元帅，郭子兴的妻弟张天祐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从此，这支起义军正式归韩林儿的宋政权统辖。

1356年三月，朱元璋亲率水陆大军，三攻集庆，城破。朱元璋入城后宣布："元朝政治腐败，到处起兵反对它，老百姓吃够了苦头。你们困处危城，成天担心受怕，生命没有保障。我带兵到此是为你们除乱的，希望大家安居乐业，不要疑惧；贤人君子愿意跟我建功立业的，以礼任用；做官的不许横暴，作践百姓；旧政不好的，立即改掉。"受到人民的拥护，社会秩序很快安定了下来。朱元璋便将集庆路改为应天府，以表示他的起义是"上应天命"的。七月，宋政权升朱元璋为枢密院同佥。不久，宋政权又在应天设江南等处行中书省，任命朱元璋为行省平章。

在朱元璋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起了很大作用。在攻下徽州后，朱元璋特地召见了儒生朱升，向他问政，他说了三句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意思是要朱元璋巩固后方，建立根据地；要发展生产，有足够的粮食；要缩小目标，作长远打算。朱元璋对此非常领会。他利用应天的龙蟠虎踞的形势，作为自己的统治中心，这个根据地一直是很巩固的。为了保证粮食供给，他非常注意农业生产，禁止士兵在行军、作战时破坏农田，同时，十分重视开展屯田，专门设立了民兵万户府，在应天、江阴、衢州等地都开展了屯田，还设立营田司，由康茂才负责兴修水利。朱元璋虽然取得了许多胜利，地位也不断提高，但他怕树大招风，在形式上一直属于宋政权领导，斗争口号也不改变，他占领婺州，开设浙东行省时，在省衙门口树起了"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的大旗，与刘福通的"直抵幽燕之地，重开大宋之天"的旗号是一致的。他担任的职务，从江南行省平章到吴国公，都是韩林儿封的。

朱元璋攻下浙东后，搜罗了刘基、宋濂、叶琛、章溢“四先生”，他们都是很有学问、很有见识的知识分子。替朱元璋出谋划策，深受器重。1360 年时刘基分析当时的形势是：南方起义军“张士诚部只满足于割据，没有什么可怕；陈友谅部挟徐寿辉胁群臣，名号不正，又占据上游，时时企图来攻打我们，应该先把他消灭。陈友谅一灭，张士诚就势孤，很快就可以征服。那时再出兵中原，王业就成功了。”朱元璋就是根据这个主张，先后灭掉陈友谅和张士诚等南方割据势力的。

七、元朝的灭亡

朱元璋在消灭了张士诚的割据势力后，开始了南征北伐。南征，就是削平南方割据势力，前面已经讲过；北伐，就是灭亡元朝。

1367 年十月，朱元璋命中书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 25 万北伐。朱元璋提出的北伐具体方略是：“先取山东，撤除元朝的屏障；进兵河南，切断它的羽翼；夺取潼关，占据它的门槛；这样，天下的形势就由我们掌握了。然后，进兵大都，这时元朝势孤援绝，不战而取之；再派兵西进，山西、陕北、关中、甘肃可以席卷而下。”他还一再告谕北伐的将领：“凡遇敌则战，所经过的地方或攻克城池之后，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朱元璋的战略计划说明他有很高的军事才能；他对军纪的重视和对军队的约束，这是使北伐军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重要原因。

在南征北伐胜利进军过程中，朱元璋着手建立新的封建王朝。1367 年十二月，朱元璋即皇帝位。1368 年正月，定国号为明，建元洪武，以应天为京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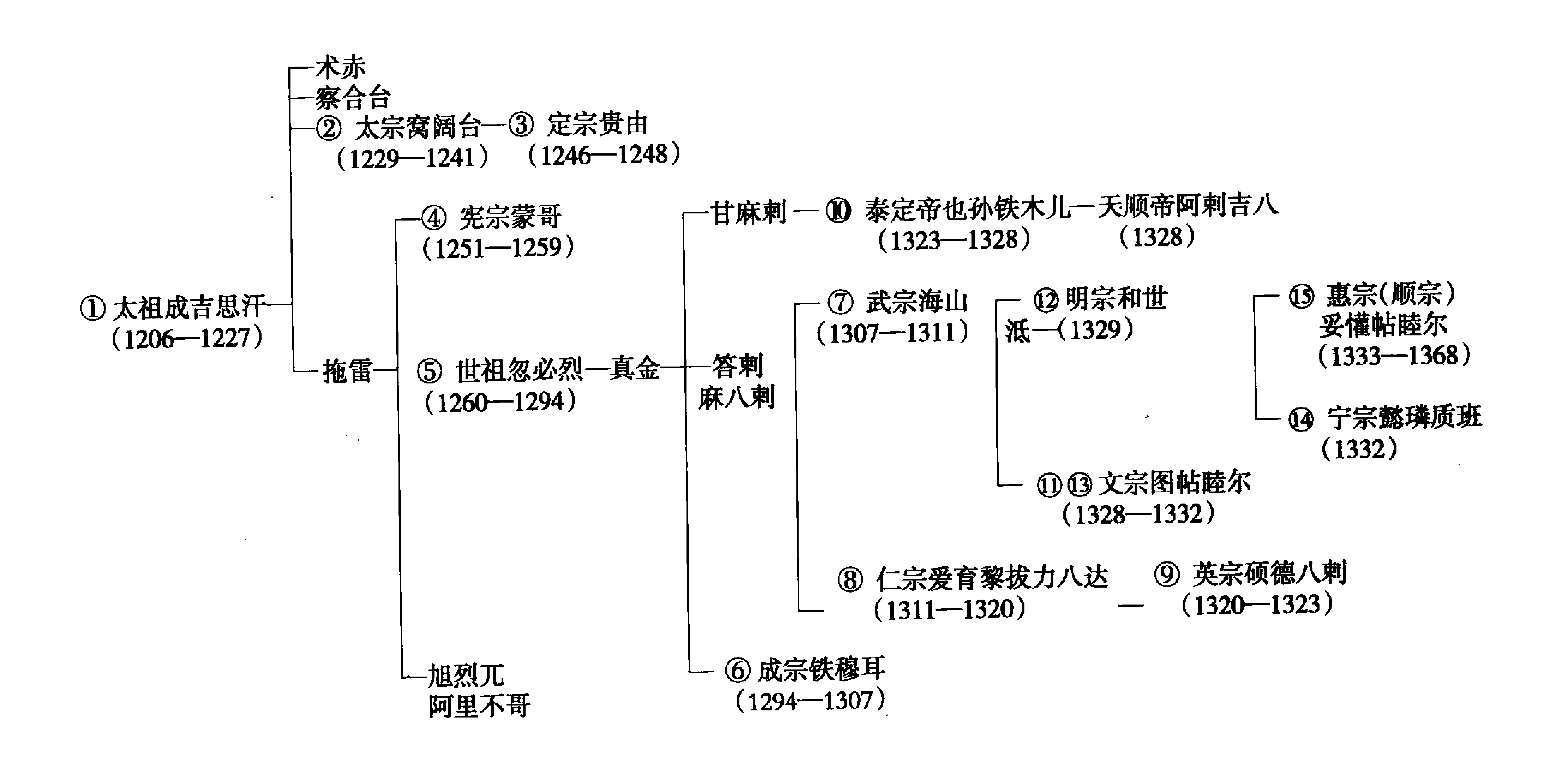
这时徐达的军队已经占领山东全境。当徐达率军抵达淮安时，曾遣人往沂州招谕盘踞山东的“义兵”头目王宣，王宣投降，但

不久又叛变，被徐达杀死。于是各地纷纷被北伐军占领。

1368 年三月，徐达率军进入河南，攻占汴梁。五月，朱元璋到达汴梁，部署进军大都的方略。

明兵占领山东、河南后，大都已完全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1367 年八月初二日，徐达率明兵进入大都。至此，统治了 162 年的蒙元政权终于被推翻！

附录一　元朝帝系表(1206—1368)



附录二　元朝大事年表

中国纪年	公元纪年	大　事
	1206	铁木真建立蒙古国，各部尊铁木真为成吉思汗。
	1209	畏兀儿归附蒙古。
	1211	成吉思汗征金，大败金军于浍河堡。哈剌鲁归附蒙古。
	1215	蒙古取金中都（今北京），成吉思汗召见耶律楚材。
	1217	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命经略中原。
	1218	命术赤征服吉利吉思等部。遣者别征西辽，屈出律败死。蒙古军追契丹叛人于高丽，高丽向蒙古称臣。
	1219	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
	1220	蒙古军取不花剌、撒麻尔罕诸城，花剌子模沙摩诃末逃入里海一岛上，病死，其子札兰丁抗蒙。
	1221	蒙古军取玉龙杰赤，屠城，俘工匠 10 万。追击札兰丁至印度河。
	1222	蒙古军侵入谷儿只、阿速等地。
	1223	败斡罗思、钦察联军。
	1225	成吉思汗结束西征，返回蒙古本土。
	1226	成吉思汗征西夏。
	1227	成吉思汗病死于清水。蒙古灭西夏。
	1229	窝阔台即大汗位。

	1230	窝阔台南征金国。
	1231	蒙古军侵高丽。
	1234	蒙、宋联合破蔡州，金亡。
	1235	窝阔台命拔都西征斡罗思、钦察等国。
	1240	拔都征服斡罗思诸国。
	1241	拔都侵入马札儿、孛烈儿诸国。窝阔台死，乃马贞皇后称制。拔都军侵入马札儿、孛烈儿，次年拔都班师。
	1246	贵由即大汗位。吐蕃萨斯迦派法主萨斯迦班智达抵凉州，次年会见阔端，表示归顺蒙古。
	1248	贵由死，斡儿立海迷失皇后称制。拔都召集忽里台，推举拖雷长子蒙哥为大汗。
	1251	蒙哥即大汗位。命弟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重事；命弟旭烈兀统军西征。
	1253	忽必烈征服大理。旭烈兀出兵西征。
	1256	旭烈兀灭木剌夷国。忽必烈建开平城。
	1257	蒙哥亲征南宋。旭烈兀进兵报达，次年破城。
	1259	旭烈兀侵入叙利亚。蒙哥病死于四川军中。忽必烈在鄂州与南宋议和，北还夺位。
中统元年	1260	忽必烈即大汗位于开平，改元中统。阿里不哥即大汗位于和林。忽必烈统兵讨阿里不哥。发行中统元宝交钞。
中统三年	1262	益都行省李璮叛于济南，旋被平定。
至元元年	1264	七月，阿里不哥降。八月，改燕京为中都。
至元五年	1268	忽必烈命阿术、刘整督军围南宋重镇襄阳、樊城。海都、八剌起兵叛乱。
至元八年	1271	十一月，忽必烈建国号大元。
至元九年	1272	改中都为大都。
至元十年	1273	元军破樊城，吕文焕以襄阳降，历时 6 年的襄樊之战结束。
至元十一年	1274	忽必烈命伯颜率元军 20 万征南宋。

至元十二年	1275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随其父、叔抵上都，从此在华17年。
至元十三年	1276	正月，南宋幼帝赵㬎降。五月，南宋益王赵昰即帝位于福州。
至元十五年	1278	四月，赵昰卒，广王赵昺立为帝。十二月，文天祥被俘。
至元十六年	1279	正月，张弘范率元军破崖山，宋帝溺死，南宋残部覆灭。
至元十八年	1281	郭守敬等制成《授时历》。忽必烈发兵侵日本，元军被台风覆没。
至元十九年	1282	朱清、张瑄等造船开辟自刘家港至杨村码头海道，北运粮食成功。
至元二十年	1283	黄华起义于福建福宁，次年败死。
至元二十四年	1287	发行至元宝钞。诸王乃颜叛，忽必烈亲征，擒杀乃颜。
至元二十六年	1289	忽必烈亲征海都于漠北。
至元三十年	1293	郭守敬主持开凿的通惠河成，至此，分段开凿的新的南北大运河通航。
至元三十一年	1294	元世祖忽必烈卒。其孙铁穆耳即位，是为成宗。
元贞二年	1296	周达观出使真腊，回国后著成《真腊风土记》。
大德四年	1300	元成宗发兵侵八百媳妇国。
大德五年	1301	云南宋隆济、贵州蛇节起兵，围攻元朝侵八百媳妇军。海都兵败病死。
大德十一年	1307	成宗卒。右丞相哈剌哈孙与成宗侄爱育黎拔力八达夺位，拥爱育黎拔力八达兄海山为帝，是为武宗。
至大四年	1311	武宗卒。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是为仁宗。
皇庆二年	1313	王祯著成《农书》22卷。
延祐元年	1314	实行科举、史称“延祐科举”。同年，经理江南田粮，史称“延祐经理”。
延祐二年	1315	赣州蔡五九起兵反对经理田粮，旋败死。
延祐七年	1320	仁宗卒，子硕德八剌嗣位，是为英宗。

至治三年	1323	英宗起用拜住推行新政。八月自上都返回大都，驻南坡，被铁失等谋杀，史称“南坡之变”。晋王也孙铁木儿即位，是为泰定帝。
致和元年 天顺元年 天历元年	1328	七月，泰定帝死于上都。九月，燕铁木儿于大都发动政变，迎武宗次子图帖睦尔为帝，是为文宗。左丞相倒剌沙立泰定帝子阿剌吉八为帝，是为天顺帝。遂爆发两都之战，倒剌沙兵败投降，被杀；天顺帝不知所终。图帖睦尔遣使迎其兄和世㻋于西北。
天历二年	1329	正月，和世㻋即位于和林北，是为明宗。八月，明宗南下至王忽察都，被文宗和燕铁木儿毒死，文宗复位。文宗立奎章阁学士院。
至顺二年	1331	《经世大典》成。
至顺三年	1332	文宗死。明宗次子懿璘质班即位，是为宁宗，在位43天卒，年仅7岁。
元统元年	1333	明宗长子妥懽帖睦尔即位，是为顺帝。燕铁木儿死后，伯颜开始专权。
至元三年	1337	广州朱光卿、河南棒胡等起义。
至元四年	1338	袁州周子旺、漳州李志甫等起义。
至元六年	1340	脱脱发动政变，逐走伯颜。
至正元年	1341	脱脱任右丞相，推行更化政策。
至正二年	1342	罗马教皇遣马黎诺里来华，抵上都，献天马一匹。
至正四年	1344	五月，大雨20余日，黄河北决白茅堤、金堤，山东、河北皆受灾。
至正五年	1345	《辽史》、《金史》、《宋史》修成。
至正六年	1346	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受德里苏丹派遣来华，先后抵达泉州、广州、杭州、大都等地。
至正八年	1348	台州方国珍起兵反元。
至正十年	1350	元廷更改钞法，发行新中统元宝交钞，铸至正通宝钱，钞法大坏。汪大渊著成《岛夷志略》，以其亲身经历，记亚非220余国和地区史地及社会经济状况。

至正十一年	1351	四月，贾鲁治黄河。五月，刘福通起义于颍州。八月，徐寿辉起义于蕲州，国号天完，改元治平。芝麻李占领徐州，次年被元军镇压。
至正十二年	1352	二月，郭子兴起义于濠州。
至正十三年	1353	正月，张士诚起义于高邮。
至正十四年	1354	张士诚称诚王，国号大周。脱脱率军围高邮，顺帝突然下诏削脱脱官爵，元军溃散。
至正十五年	1355	刘福通迎韩林儿为帝，国号宋，改元龙凤。
至正十六年	1356	张士诚定都平江。朱元璋占领集庆。倪文俊重建天完于汉阳。
至正十七年	1357	张士诚降元。宋红巾军三路北伐。倪文俊杀徐寿辉篡位不成，被其部将陈友谅杀。
至正十九年	1359	宋红巾军三路北伐失败，元军破汴梁，韩林儿逃至安丰。
至正二十年	1360	陈友谅杀徐寿辉，称帝，国号大汉，改元大义。
至正二十一年	1361	明玉珍在四川称帝，国号大夏，改元天统。
至正二十三年	1363	张士诚袭击安丰，朱元璋救出韩林儿。朱元璋陈友谅在鄱阳湖大战，友谅败死。张士诚称吴王。
至正二十四年	1364	朱元璋称吴王。朱元璋出兵汉阳，灭汉政权。
至正二十六年	1366	朱元璋大举进攻平江张士诚。十二月，韩林儿、刘福通被元璋将廖永忠溺死，宋亡。
至正二十七年	1367	朱元璋军破平江，张士诚被俘自杀。徐达率军北伐。方国珍投降。
至正二十八年 明洪武元年	1368	正月，朱元璋称帝，国号大明，改元洪武。八月，明军克大都，顺帝北逃应昌，元亡。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元朝史话
作者=邱树森著
页数=179
SS号=12436753
出版日期=2009.10